

說 明

这部《艾地选集》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艾地选集出版委员会編輯，为了迎接一九五九年年中召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出版的。这部选集分为两卷，在各篇著作之前附有簡短的題解，每卷卷末附有注釋和分类目录。

《艾地选集》包括了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八年时期的著作，它是依照著作時間的先后順序編排的，第一卷收集了从一九五一年新傳統时期起到一九五四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一九五五年印度尼西亚第一次議會普选和制宪議會普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收集了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主要是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會議到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的时期的著作。

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艾地选集》沒有把所有重要和寶貴的著作都收进去，而原作中一些已經沒有多大现实意义的部分，已遵照著者的意見加以删节。出版委员会尽量把最重要的著作編入本选集中，并且征得著者同意，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以适应印度尼西亚語文的发展。出版委员会在編輯过程中确定作如下分类：革命的基本問題、党的建設、民族統一战綫、群众运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及科学和文化。为了把今后的出版工作做得更好，出版委员会誠恳地希望讀者提出意見和建議。

为了迎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出版《艾地选集》，是同

执行我們党的两项基本任务密切联系的，这两项基本任务是：**第一**，建立以反封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第二**，继续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党。

《艾地选集》指出，在结束了一九五一年以前的无知时期——即经历了許多錯誤的和慘痛的經驗教訓的时期——以及为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工作成功地奠定了新的基础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执行上述两大任务中已經取得了迅速的进展。

在迪·努·艾地同志写的《走人民的道路》这篇文章的精神的鼓舞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逐步地摆脱了宗派主义，并且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党組織的工作方面也逐步地取得了进展。一九五四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地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各项基本的和重大的問題，对于加强党和規定旨在执行上述两大任务的总路綫方面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召开的历次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年中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會議上，不但把党在解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的和重大的問題方面的任务具体化，提出了像**彻底完成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和**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諾总统方案**这样大众化的战略和策略口号，而且也牢固地树立了制訂长期和短期組織教育工作計劃这种工作方法的傳統，这些決議在执行上述两大基本任务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党。在面临着即将举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今天，在执行民族统一战线任务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些进展表现在改变力量对比方面，即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中間力量和孤立頑固力量方面。在执行党的建設任务方面，已經把一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党员人数不到一万人的党，发展成为一个目前其来自

各族人民的党员遍布全国、数达一百五十万党员的强大政党。

为了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以迎接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高潮和赢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每一个党员的任务是，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学习《艾地选集》将大大有助于进步派完成他们的艰巨而光荣的革命任务。只要我们在“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清算一九五一年以前的时期”与“发扬一九五一年以后的时期”的口号下继续前进，这些任务就一定能够实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艾地选集出版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五月于雅加达

目 录

說 明	I
克服我們的弱点	1
走人民的道路	33
民族統一战綫及其历史	56
国内出現了自圓桌會議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好形势	66
民族光荣和民族意識	72
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	79
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为爭取自身权利而斗争	111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建立一个統一战綫政府	124
組閣人理应交回他們的委任书	129
反动派的歇斯底里	132
民族統一战綫內閣是唯一的出路	135
建立民族統一战綫政府的时机已更加成熟了	137
民主对法西斯的輝煌胜利	141
印度尼西亚农民运动的前途	143

民族团结和民族警惕	154
加强共和国的地位!	160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不断传播民族团结的理想	165
为争取更大的成就而继续前进!	181
✓ 印度尼西亚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	188
关于陈莽如主义	234
发扬一九五一年时期!	248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52
加强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党!	266
八月革命万岁!	271
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起来,争取解散印度尼西亚 荷兰联邦,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版图.....	283
苏纳里约代表团成功地取消了圆桌会议协定的 一部分	291
争取印度尼西亚一切民族力量更广泛的团结	293
联合国没有通过西伊里安问题决议案,暴露了 联合国自己和西方国家的面目	318
《党的生活》发刊词	321
使党小组活跃起来	325
控诉茉莉芬事件	331

亚非国家在万隆开始集体創造自己的历史.....	363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及其发展.....	366
爭取民族統一战綫在普选中的胜利.....	402
維護和巩固統一战綫的胜利.....	421
保卫一九四五年宣告成立的共和国!	432
注 釋	461
分类目录	499

克服我們的弱點

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反动派猖狂发动大逮捕事件的时候写的,这次大逮捕事件的目的在于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使印度尼西亚的人民运动全部陷于瘫痪的准备。虽然策划这次事件的苏基曼反动政府没有公开取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但是事实上不过几天的时间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主义者被投入监狱的不下二千人。

遭到反动派进攻的时候,党的某些主要弱点便显露出来了。迪·努·艾地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这些弱点,指出了它们的根源和克服它们的方法。全体党员把这篇文章作为抗击苏基曼大逮捕事件的行动指南。这篇文章武装了党员去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加强集体领导,发挥主动性,提高警惕性,发扬英勇战斗的精神。在人民的压力下,经过党的顽强斗争,当局不得不把被捕的人全部释放,一个人都没有能提交法庭审讯。党经过这一段反动派进攻的时期显得更加巩固、更加团结了。

政治警惕性

八月大逮捕事件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获得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一大逮捕事件的发生,使得党必须确定正确态度,确定克服弱点的办法,重新检查党的整个队伍。八月大逮捕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同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逮捕事件、一九三六年的逮捕事

件、茉莉芬挑畔事件⁽¹⁾等重大事件发生时的情况，有着重大的区别。八月大逮捕事件发生的时候，党员的觉悟程度和警惕性已经进一步提高了，党员已经开始掌握理论了，党内的团结也已经开始巩固了。可是，这并不是说，党的缺点和弱点已经完全消除了。党的缺点和弱点还是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待后面再谈。

八月大逮捕事件说明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明显地威胁着我们的党，威胁着人民的整个民主生活。党对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是否有了足够的警惕？面对着这种危险，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是否有了准备？党员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它表明了党员已经开始采取批判的态度。只有正确地解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党内的团结，而党员对自己的力量、对领导、对党的信心也才会增强。

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击败了机会主义派别，成立了新的政治局之后，从一九五一年正月里，党才能够正确地、有计划地和顺利地进行各种工作，巩固党的思想和组织，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揭露政府维护荷、美、英帝国主义利益的破产政策，拆穿美、英、荷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假面具等。新的政治局的任务是维护党的纯洁性及在实践中贯彻实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慕梭同志⁽²⁾的纠正。在这之前，党进行的斗争大多是对内的，是反对那些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他们固执己见，想继续盘踞在党内，使党恢复到还没有《新道路》以前的那种状况。但是，这并不是说党内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已经全部解决了。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的残余。

党最重要的政治工作之一就是：号召人民起来保卫一九四五

年八月革命中所已經取得的民主權利，繼續爭取更廣泛的民主權利，以恢復印度尼西亞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傳統。黨向人民揭露政府種種反民主的法西斯措施，指出政府這些措施同反民族的圓桌會議協定和美國的戰爭政策的關係。關於這一點，在黨的聲明和黨的機關刊物《紅星》雜誌上面的文章里已經說清楚了。這些聲明和文章表明在面對法西斯主義時黨是有政治警惕性的，這裡列舉一些如下：

一九五一年二月納席爾政府頒布了**禁止罷工條例**^{〔3〕}，黨立即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發表了一項聲明，指出納席爾政府**禁止罷工條例**的惡毒意圖，闡明這一條例同政府袒護資方壓迫工人的措施之間的關係，闡明它同美帝國主義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聯合防禦之間的關係。禁止罷工條例是公然違反民主權利的。黨在那篇聲明中，號召全體人民起來抗議政府摧殘民主權利的措施。黨的號召得到了各民主進步階層的熱烈響應。各地紛紛提出抗議，不但是著名的進步的人民團體，連民族主義政党和宗教政党的分、支部及其影響下的團體也提出了抗議。

《我們的責任》^{〔4〕}一文提到了朱威彝（位於梭羅的格拉登縣）的農民怎樣行使民主權利，他們舉行遊行示威，要求政府釋放印度尼西亞農民陣綫的領導人。但是納席爾—沙弗魯丁政府卻用射擊來答复農民完全合理的要求，結果農民犧牲的八人，重傷的二十三人，輕傷的多人。針對着政府軍警這種毫無人道的措施，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號召人民“盡一切力量來保衛現有的民主權利，反對一切企圖損害民主權利的措施，爭取更多的和更廣泛的民主權利……”。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5〕}一文指出，

“目前我們面对着更大的挑畔，这就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在美、英、荷帝国主义特务机关主使下再次准备的新的挑畔。他們竭力使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識滲入我們党内部，并竭力利用托派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及其他破坏分子分裂人民的团结。帝国主义的这一罪恶勾当是必然的，因为帝国主义者极力使国际形势恶化，煽动和准备侵略战争的美、英帝国主义已公开发动进攻，例如进攻朝鲜，并且已經使资本主义各国整个生活軍事化。因此，我們的革命警惕性，絲毫不能松懈。”

由此，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为什么会有八月大逮捕事件的发生和誰在八月大逮捕事件幕后作祟。毫无疑问，美国特务机关联邦調查局的甘貝尔是八月大逮捕事件极重要的幕后角色。甘貝尔会依照联邦調查局在欧美的經驗，建議依靠那些卖身投靠的宗教界人物和善于挑畔的托派分子之間的同盟来消灭共产党和消灭人民运动，这也是无可置疑的了。联邦調查局在欧美所进行的消灭共产党人的經驗說明，最重要的一着便是把卖身投靠的天主教著名人物同托派分子拼凑成阴谋集团。联邦調查局的这个处方事实上也用上了。馬斯友美党在制造八月大逮捕事件中也像在茉莉芬挑畔事件中那样，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那些肯定是托派分子的人，虽然爱发表“激烈”的言論，可是一个也沒有被捕。是的，現在托派分子已經再也不能那么容易用“慷慨激昂”的言論来作掩飾了。在原則性的問題上，特别是在消灭共产党的各种活动中，他們公开和政府联合起来。例如，在井里汶地区，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托派分子公然破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名誉和制造新的挑畔事件的活动。他們无耻地自称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挂起“共产主义者”的招牌去欺压人民。幸亏那些受欺压的人民，已經有充分

的覺悟，知道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是不會欺壓人民的。久而久之，他們這一伙挑釁分子的真面目在人民的面前再也掩蓋不住了。托派分子也企圖控制政府工具來對付共產黨人。在反動勢力猖獗的地方，托派分子就原形畢露了。他們再一次起了像在茉莉芬挑釁事件發生時那樣的作用，這就是充當“眼線”，同時利用共產黨人被追緝的機會來進行分裂人民團結的勾當。對於稍微有警覺性的人來說，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而且人民根據自己的經驗也愈來愈明白了。右翼社會黨人的作用也是這樣，他們在分裂人民團結，特別是在分裂工會和組織黃色工會（帝國主義的工具）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同樣是罪惡的。印度尼西亞社會黨東爪哇勞工聯絡員在報上所發表的信，就是明證。這封信是一九五一年八月初寫的，它指示南海漳、龐越、岩望、瑪琅南部和外南夢等地的印度尼西亞社會黨分部，按照該黨中央的命令“**擴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農場工會任抹分會的分裂**”。這些小丑自稱為工人領袖，實際上卻蓄意分裂工人團結，對於工人來說，哪里還有比這更大的罪惡呢？托派分子和右翼社會黨人，像帝國主義的“英雄”一樣，無恥地跟着誣蔑共產黨人，他們還愚蠢地企圖利用許多共產黨人坐牢、被追緝的機會，篡奪工會的領導權。這也就是他們的“道德”和“英雄主義”。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發表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爭取建立民族聯合政府的綱領**》〔6〕和**政黨協商會議**〔7〕**共同綱領**很明確地規定恢復民主傳統和防止法西斯主義危險的任務，提出釋放一切政治犯、取消戰時戒嚴令和一切反人民的法令、保障罷工權利等要求。

由於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挑釁事件日益增多，政治局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發表了一項聲明。聲明揭穿了那些從事挑

衅、制造恐怖、进行法西斯活动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假面具。声明明确指出，他们指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事各种骚乱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却正好就是美国匪徒、国民党匪帮和樊德不拉斯⁽⁸⁾分子干出来的。樊德不拉斯分子在东爪哇的罪行终于掩饰不住了。政府在答复议会議員的质問时不得不承认东爪哇的骚乱事件是那些充当樊德不拉斯走狗的伊斯兰教界上层分子干出来的。有些政府官員曾經輕率地誣指东爪哇的骚乱事件是共产党人制造的，但是，政府对这件事情却完全不提。是的，哈达先生本人在棉兰的群众大会上曾經諷示似乎麦苏基烟草仓库是被左派焚毁的⁽⁹⁾。

指出这些事实的必要性，在于使党员和预备党员能够一致地认识到，党的领导方面，首先是政治局，一开始就不断地努力使党和人民得到锻炼，以便随时防止和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党不仅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同时也在组织和工作方法方面，发过许多指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党是有警惕性的。认识了这点，那就会增强党员和人民对党的信心。

有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警惕性，我们才能够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才能够使我们的党和整个人民运动挡得住垄断资本集团对劳动群众所发动的最猛烈、最猖狂的进攻。事实证明，凡是有了警惕性的地区，法西斯野蛮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就不大，那里的组织还能够继续活动，他们对自己、对党、对将要到来的胜利的信心也就增强了。

对我们党的再一次考验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清早，在雅加达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

我們黨在議會里的議員和領導工會的黨員也有被捕的。八月十六日當天，黨中央委員會通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議會黨團主席沙基曼同志，對政府這種橫暴措施提出嚴重的抗議。

黨提出抗議之後，各人民團體的中央和地方組織、城鄉人民立即紛紛響應，相繼提出抗議，一致譴責政府這種措施，要求將這次事件中被拘捕的人士全部釋放。這又再一次證實了在人民的心目中黨的政策是正確的，而政府這種無理逮捕人民領導人的措施是錯誤的。顯然，政府同人民關係的疏遠，事實上並不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搞的，而是政府自己的這種措施造成的。如果說，政府的威信在人民心目中日益下降，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却日益深得人心，受到人民的擁護，那是因為人民体会到，也從自己的經驗中證明了，只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才是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和理想的。

黨員對八月大逮捕事件有什麼看法呢？

有的黨員認為，這次大逮捕事件是偶然的，只不過是恰好碰上八·一七紀念日，而政府又想包辦八·一七紀念日的慶祝，“被拘禁的同志不久就會獲釋的，因此我們不必擔心”。這種見解過低地估計正在威脅我們的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性，沒有充分認識到法西斯主義的殘暴性和野蠻性，誇大了利用現有的民主的可能性。他們貌似勇敢，但是這樣的“勇敢”，實際上是向敵人投降。這種見解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對整個世界和印度尼西亞日益尖銳化的階級鬥爭沒有正確的看法。這種見解當然是錯誤的，它表現了缺乏警惕性，並導致喪失警惕性。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毛病的徵象。

又有一部分黨員認為，八月大逮捕事件和血腥的茉莉芬挑釁事件一模一樣，政府會把抓到的人絞死殺光。黨不應再利用現有的民主權利，因為現有的民主權利純粹是虛偽的。他們並沒有認

識到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本質就是虛偽的。他們主張自動地把整個黨轉入地下活動。他們不贊同黨的議員繼續留在議會里，不贊同黨的機關繼續公開。這些同志實際上是对利用現有的民主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民主是多么有限和多么虛偽——感到失望和束手无策，因而主張自動地把黨轉入地下活動。他們不大了解政治自由与議會斗争对教育群众和訓練群众的重要性。其实党从三十一年前成立之日起，就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争取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自由和党本身的自由发展。我們自動地轉入地下活動，这正是苏基曼—維比梭諾政府⁽¹⁰⁾所求之不得的，这样一来，我們就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政府就有“理由”来消灭我們党，并进一步扑灭整个民主和平运动。这些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毛病的征象。

党章总綱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实现真正的独立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是长期性的”，而“长期性的革命斗争将会产生这种危險：有些缺乏理論修养的和品质不好的人将会执行投降政策和冒險政策”。关于长期斗争和可能出現的毛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布尔什維克化》这篇文章在論述建立布尔什維主义的政治思想基础的斗争时曾經提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队伍内部在长期斗争中可能产生右傾和‘左’傾两种机会主义毛病，一种是投降主义，另一种是冒險主义（急性病、急于求成）。”

党章总綱指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經驗证明了投降主义毛病和冒險主义毛病都是革命的危險敌人。

由此可見，經常正确地認識整个世界和印度尼西亚日益尖銳的階級斗争，对于党员來說，是多么重要的事啊！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一六年不同。当时帝国主义仍然控制着整个世界，因此列宁写道，

帝國主義國家集團間的鬥爭是必然的。但是現在的情形已經完全改變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已經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在蘇聯、人民中國及其他各人民民主國家里，帝國主義已經被徹底打垮了。這些國家不會也不可能有任何侵略別國的企圖。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和平運動日益蓬勃發展。在一切戰綫上，帝國主義國家不斷地受到自由、民主和和平力量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不斷地促使局勢惡化，他們煽動戰爭和準備戰爭，進而發動了公開的侵略，例如進攻朝鮮，並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生活軍事化。在他們控制的地區，包括印度尼西亞在內，他們橫行霸道，為非作歹。他們愈逼近墳墓，就愈殘暴、愈野蠻。我們時刻都不可以忘記這一點。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會估計錯誤，忽視他們的法西斯本質，喪失警惕性。

要是我們沒有看到一九四八年茉莉芬挑釁事件和一九五一年八月大逮捕事件之間的重大區別，那是非常錯誤的。沒有看到這兩個事件之間的區別，也就等於我們沒有珍視人民和我們黨從茉莉芬挑釁事件得到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黨也教育了人民，使我們對反動派所發動的各種挑釁事件有更高的警惕性。我們黨現在已經和一九四八年不同了，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和道德上都已經布爾什維克化了。黨的正確政策（如廢除圓桌會議協定、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和保衛世界和平的政策），已經獲得大多數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擁護，這對反動政府是一個障礙，使它不能那麼容易地公開消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在思想上愈鞏固，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就愈正確，這就保證黨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挑釁時不容易上當。黨的組織健全了，黨員的道德提高了，這就是黨克服它所面臨的種種困難的一個重要保證。我們有一部分同志忘記了這些事

实，他們也不大了解党自一九五一年以来的发展。

以上两种錯誤的見解，即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毛病的征象，其根源都是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在許多問題上总是有意或无意的从个人利益出发。这說明他們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群众的意見，而且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群众并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么胆小和无知。他們不是实事求是地看待他們所面对着的现实，过于偏重自己的主观意願，不是客观地去看問題，而是把自己所面对的具体情况理想化。他們軟弱的、經不起考驗的和不喜欢深思熟虑的个性對他們見解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党的領導怎样对待一些党员的不同見解呢？党中央八月二十四日发表一項声明，內容和大部分党员的見解相同。這項声明对統一党员各种不同的見解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声明批判了把八月大逮捕事件看作是偶然事件或把它和茉莉芬挑衅事件等同起来的錯誤看法。

声明的簡要內容如下：八月大逮捕事件和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备战是有关联的。美国的备战計劃遭受到世界民主力量，包括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力量的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沒有办法采用一般議會民主的方式来克服因执行圓桌會議协定所造成的印度尼西亚經濟和政治的混乱状态，美、荷帝国主义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因而更加瘋狂起来。这种瘋狂性表現在他們蓄意制造麦苏基、丹絨不碌、茂物⁽¹¹⁾等地的挑衅事件，同时也表現在禁止罢工、解散工会、禁止集会和示威游行等专橫的措施上面。但是帝国主义这种挑衅活动并不能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样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他革命組織推进第二个茉莉芬挑衅事件中。印度尼西亚

共产党已經开始成熟了，党懂得應該怎样对付万恶的帝国主义的挑畔活动。党在声明的結語中，号召全体人民、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民族統一战綫。党提醒說，既然我們在剛过去的世界大战中能够打败法西斯主义，那么，只要一切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法西斯的危險，我們現在也就能夠打败它。

党这项声明十分明确地指出，反动派的法西斯行为并不意味着反动势力的强大，相反的，挑畔活动和倒行逆施等等法西斯作法日益猖獗正好证明了反动派已經更加弱了，已經不能再用他們自己制定的政治制度即一般議会民主方式来对付人民的革命运动了。**打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打击整个人民运动的准备和开始。**

历史证明了，德、日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法西斯制度之后，它們崩潰的日子就愈来愈接近了。法西斯主义就是帝国主义用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烂疮的魔鬼的猙獰面目。

党提出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危險的号召，得到热烈的响应。各人民团体发表的意見、公众輿論和議員的发言都证明了这一点。

党中央委员会除了八月二十四日的声明之外，还就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作了許多具体的分析和指示。法西斯主义就是資本家对劳动人民最猛烈最橫蛮的进攻。法西斯主义就是沙文主义（狹隘和錯誤的爱国感情）和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强盜行为。法西斯主义就是金融資本家公开的恐怖专政。党也列举了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四个条件**，这就是：**需要有工人階級本身的斗争积极性，需要有共产党，需要有工人階級同城乡人民群众之間的广泛的統一战綫政策，最后就是需要有无产階級的警惕性。**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和人民已經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为了要繼續充实这四个条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号召全体劳动群众，要始終不渝地

忠于組織，以战斗的精神勇敢地、頑強地、警覺地保卫組織，积极宣傳工人階級、劳动群众、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斗争事业的正确性和正义性。党在作出上述指示的同时，也斥責了投降主义和不計后果的“勇敢”，因为这两种态度都会使人民的組織和人民的斗争陷于瘫痪。抱着这两种态度正合法西斯主义的口味。

必須克服的弱点

本文开头說过，我們还有许多必須克服的缺点或弱点。我們对党內存在的每一个弱点或缺点，都不應該把它隱藏或掩盖起来，相反的，必須把它揭开，这样才能看到病情，作出診斷。只有知道了我們党存在着什么毛病，我們才能对症下药。我們无产階級的政党必須經常进行自我批評。这就是我們党和那些害怕自己的錯誤被人民知道的資产階級政党之間的重大区别。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部著作里，就談到无产階級党內的自我批評，他說：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在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階級和劳动群众所負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階級，以至于教育和訓練群众。”〔12〕

我們同志中还有一些人认为，揭露自己的錯誤、缺点或弱点，同时展开自我批評，这是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来打击我們党。列宁及其学生，如斯大林、毛澤东、慕梭等早就駁斥了这种看

法，我們自己實行《新道路》的經驗也否定了這種看法。當時我們有些同志認為，黨的敵人，首先是托派分子和其他挑撥分子，會從慕梭的深刻而坦率的糾正中，取得武器來打擊我們，我們就會因此變弱。但是，事實恰好相反。同我們黨從這次糾正中所能取得的用來打擊敵人的武器和本領比較起來，敵人可能取得的武器真是少得很，是微不足道的。有了《新道路》之後，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空前地鞏固起來了。我們為保持黨的純潔性和為實現偉大的《新道路》的內容而進行鬥爭之後，黨內團結的鞏固也達到空前的程度。《新道路》這本小冊子散布得愈廣，黨員對它的理解愈深，我們黨也就前進得更快。人民的眼睛愈來愈雪亮，他們看到，我們黨是一個嚴肅認真的黨，因為我們時刻在準備接受人民的批評並坦率地指出自己的錯誤和弱點，這就是說，我們的一切行為始終都是向人民負責的。只有這樣，只有我們黨在實踐中證明，黨是群眾的**武器或工具**，它才能獲得群眾的完全信任。

這就是我們無產階級政黨的特點，我們必須繼續保持這種特點。因此，我們對黨中央以至各級地方組織的錯誤和缺點、對每一個黨員的錯誤和缺點，都必須勇敢他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是達到黨內意志統一和行動統一的條件。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生命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目前黨有什麼缺點呢？現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反動派野心勃勃企圖粉碎我們黨，我們黨正對着具體的法西斯危險，在這樣的時候，表現黨的弱點的跡象也就明顯地表露出來了。目前明顯地表現在一部分黨員個人身上或在某些黨組織集體上的弱點，有下列五種：

(一)一部分黨的幹部在抵抗反動勢力的襲擊中還不夠機敏。

他們干勁不足，沒有全心全意工作。他們对工作往往漠不关心，像是一架机器，推一下、动一下。尽管法西斯的危險不断威胁着我們，反动派要消灭党，要摧毁人民团体，而且还要拘捕他們，但他們却还和普通的落后群众一样，沒有主动性，不推就不动。如果有什么集会或討論会，他們常常迟到或者索性不到，不事先請假，或者提不出正当的理由。不认真执行党的決議。工作热情很差。

消极被动，“唯命是从”，这是殖民主义統治者故意培植起来的，直到現在还没有完全鏟除，在一些党员身上多少还沾染着这种东西。

此外，这也是我們党的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残余，在那个时期，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党内多少是占了上風。在一九四七年左右，有一位党中央委員有过这样的“理論”，据说共产党人是不承认所謂“精神”的。根本就沒有有什么“道德”和“英雄主义”，这就是那位中央委員的見解。精神、道德和英雄主义都是“市民階級的东西”！有一位政治局委員甚至还說，“写詩是資產階級幻想家的事。”既然已經否定了精神的存在，哪里还能够把全部精神用在工作上呢！

但是，我們党現在已經和过去不同了，現在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再也不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七年以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了，它現在已經是在执行《新道路》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了。我們党不但在政治、思想和組織方面，而且也在道德方面已經逐漸布尔什維克化了。

沒有全心全意为党、为无产階級和广大人民工作的高尚精神，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人。我們要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把我們所学到的理論变成活的理論，把理論同人民生活和日常斗争联系起来。这样我們才能組織和领导改善人民生活的斗

爭。因此，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要創造，**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創造者**，而廣大的人民也同樣是創造者。一個人要是不把他的精力貫注在他的工作上，他怎麼能夠創造呢？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是一個不全神貫注工作的人，而是一個創造者，他必須把全部精神貫注在每一項工作上，即使是很細小的工作也必須這樣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管從事什麼工作，不管是在學習還是在運用革命理論，不管是在搞工人運動還是在搞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和平運動或文化運動，不管是在從事寫作還是在推銷黨的出版物、校對黨的雜誌或送書信，他都必須全心全意地精神飽滿地認真工作。只有這樣才會有工作熱情。**只有全心全意、精神飽滿、滿腔熱情地工作，才能夠爭取群眾跟着我們走。精神疲塌、萎靡不振、沒有熱情的人，群眾是不會歡迎的。**

儘管現在有許多人發表冗長的激烈言論，但是，人民照樣不理睬他們，照樣嘲笑他們。他們空空洞洞的言詞是迷惑不了人的。因為他們講的並不是真心話，他們內心實際上也不相信它。他們和走江湖賣膏藥的人差不了多少。

一個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要跟上時刻都在變化着的情況。歷史不斷地前進，馬克思主義者也必須不斷地前進。缺乏創造性便不能很好地跟上歷史的發展，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部分黨的幹部，遇到問題，不管這些問題的性質、情況和時間已經發生變化或者和過去的多少有些不同，他們却總是作出同樣的答案，老是那麼一套。這實在是令人感覺厭煩。這也說明了他們沒有吸取新鮮事物，來求得進步和進行革新。

(二)一九四七年前後，我們已經順帶談過，在黨內或在黨員所領導的群眾運動中，特別是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中，存在

着“粗枝大叶”的毛病。当时，几乎所有的干部都“会”用“粗枝大叶”的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从国际政治问题到乡村的农民问题都是这样。当时的领导和普通党员，都有自由主义的毛病，因此，虽然已经知道有“粗枝大叶”的毛病，但却没有深入讨论，而只是把它拿来当做挖苦和取笑的资料，这就不足为奇了。

也许有人会說，我們当时没有像现在这么进步，所以我們談起来也只能是粗枝大叶的。就算这也是正确的理由吧，但是，正是我們要进步，我們才需要深入地討論自己存在着的弱点，才需要召开各种會議来专门討論我們的弱点。可是这样的會議却不曾召开过。

另一种“粗枝大叶”的毛病就是一般地、抽象地談問題，沒有把一个问题同別的問題联系起来看，也沒有把它同形势的发展联系起来看。直到現在我們一部分党员还有这种毛病。因此，他們碰到問題，就不可能解决得細致，不可能解答得具体。我們有許多党员都能背誦有关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等术语、定义、原理。我們相信，他們大多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些术语的内容。但是，他們有沒有认真想办法弄通它們呢？譬如說，展开深入的討論或者問一問《紅星》杂志編輯部。很少这样做。同样的，还有許多党员沒有真正理解和平政策、民族統一战綫政策等的精神实质。提起圓桌會議協定的害处，他們只是泛泛而談，沒有深入細致的分析，也沒有把問題同人民的日常生活具体地联系起来。虽然党的领导和《紅星》杂志編輯部有責任經常解釋各种术语、定义、原理，他們也應該积极认真地研究問題的内容，透彻地領会它，但他們沒有这样做。

知道有些什么术语、定义、原理是有必要的。但是，重要的是理解术语、定义、原理的内容和深刻含义。更加重要的是，理解之

后，怎样把我們所学到的同日常的实际斗争联系起来。因此，要弄通这一切，我們必須同党組、党委会、支部或小組的同志进行討論。总之，我們必須真正理解我們所讀到的和听到的东西。如果我們討論一次还不能理解，那就要进行第二次或更多次的討論，直至搞通为止。如果我們全心全意认真做下去，最后必然会搞通的，也必然会把它們同日常的实际工作具体地联系起来。

拿一个問題来做例子吧！宗派主义是导致我們党脫离群众的大危險，目前我們党内也还有宗派主义，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問題，每位同志都曾經一般地和“粗枝大叶”地討論过。但是，宗派主义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在你所在的党組、党委会、小組或支部，在你所領導的群众組織，在你自己的身上有沒有宗派主义的征象，这些問題已經深入討論过嗎？有沒有想办法，有沒有找到正确的工作方法，使党不脫离群众，使党能够把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文化、体育、科学、和平运动、合作社运动、居民組織等方面的群众最广泛地团結在党的周圍？有一些党员的确曾經深入地討論过消灭宗派主义的方法、执行党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有些也已經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例如，我們可以从一些地区的同志的工作方法中看出，他們善于使参加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¹³⁾的工人与那些沒有加入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的工人采取統一行动，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农民方面的工作方法已經团結了非常广泛的群众。因此，党员領導的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和农民团体（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或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¹⁴⁾）不仅得到它們会员的爱护，而且也得到广大的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爱护。但是，这种工作方法还没有推广，还不是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普遍采用。由于存在着这种宗派主义，所以党在群众中間扎根还不够深。

每一个党员都学习过党章总纲，总纲提到：

“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随时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孜孜不倦地教育人民群众，启发并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认识到脱离人民的危险性。”

党委会、党组、支部和小组对党的群众路线已经讨论到什么程度，实行到什么程度呢？实行了群众路线就是消灭了宗派主义。党员在减轻工人负担、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时、克服物价高涨的困难、争取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农民苦于缺少耕牛，水利不善，地租太高，放青苗和高利贷剥削仍然严重，缺少农业、渔业、畜牧业的技术指导，文盲仍然非常多。党员到底给了农民什么帮助？在帮助青年和学生，组织并领导他们去实现他们关于增加具备应有的条件的校舍、更有计划地提高教学质量、关于体育、文化、旅行等要求方面，党员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我们还要问一问，党员对妇女群众、文化工作者、科学爱好者、居民的工作和在世界和平运动方面做得怎样？

我们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党和我们领导的人民团体就会在群众当中获得**良好的声誉**。我们的工作使我们领导下的**团体获得良好的声誉**，也就是使我们党获得良好的声誉。有的党员认为，我们的任务只是在组织的成员中提高组织的声誉。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宗派主义的看法。我们领导下的**团体在人民中的声誉必须是良好的**，因此，我们的团体就不仅要为它的会员服务，而且也要为那些还未成为会员的广大人民服务。例如，全印度尼西亚中

央职工会不仅是屬於它的會員，为它的會員服务，而且也是屬於所有的工人群众，为他們服务。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人民青年团、印度尼西亚觉醒妇女会⁽¹⁵⁾等也都是这样。认真、深入的討論有助于我們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有助于我們具体解答人民所面对着的各种問題，这样我們也就能够采取具体的措施来为人民服务。

因此，我們对任何問題不要仅仅滿足于模糊的了解，必須深入钻研，找出具体和正确的答案。如果已經有了具体的答案，我們就必须自觉地实践，这就是說，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以我們的全部精力来实行它。

(三) 还有一些党的干部，工作沒有計劃，随随便便，馬馬虎虎。党組或党委会所举行的討論会，有許多是沒有計劃，不按期举行（例如，原来規定至少每星期或每十天举行一次，而沒有按規定召开），不按应有的方式举行。有些党組或党委会仅仅在“认为需要时”才召开討論会，但实际上是好几个月都沒有开过一次。这說明了这些党組或党委会还存在着自由主义的毛病。

虽然我們已經規定，党委会書記或副書記必須拟定會議的程序和发言稿，但是仍然有这样一些書記或副書記，他們毫无准备就出席會議或参加討論，一切听由會議解决。如果問他为什么沒有准备，我們的書記就会回答說，为了“更加民主”，为了“不致影响”，为了“避免命令主义”等等。这些理由都是不正确的，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他疏于职责的借口。

党委会委員或党組成員沒有作好任何准备就出席會議或参加討論会，也是常有的事。結果在进行討論时，他才急急忙忙地找問題，或者采取消极的态度，只是附和其他黨員的意見，或者从古里

古怪的角度来看問題，妨碍會議的进行。有时，他居然点头贊成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見。这样的討論会，除了令人感到可笑之外，当然不会有什么結果，也不可能提高黨員的政治觉悟。自由主义的領導人或黨員是不会提出任何批評的，只是听任这种情况繼續发展下去。但是，这就說明了他沒有尽他应尽的責任。

討論的方式沒有安排妥貼，因此討論会的程序就变得乱七八糟，討論也不可能郑重其事地进行。所以討論的結果也就难怪往往沒有整理出来，或者整理得不好、不細致。每一个負責人对已經得出的結論都有自己的解釋。由于沒有把決議整理出来，黨員不够关心，因此发生过这样的事：已經討論通过的決議，后来忘記了，又再通过一次。

沒有經過系統的討論，虽然做了結論，也不可能將真实的情况反映給有关的党委会。有关的党委会也就无法了解它領導下的党組或党委会在討論方法上或它們所通过的決議方面的缺点或錯誤的。其实，有关討論結果的报告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包含着經驗教訓。党根据好的討論方法和討論結果，就可以作出一般指示，或者歸納为总的看法。有了討論結果的报告，有关的党委会才能正确地領導它屬下的党組或党委会。

由于討論会沒有系統地进行，因此討論所得的結論沒有正确地整理出来，各人有各人的解釋，这样就不可能对黨員如何执行討論会所通过的決議及其执行的程度进行仔細的檢查督促。如果对黨員的工作以及他們是否执行決議和如何执行決議沒有或缺乏檢查督促，結果工作就不可能很好地进行，紀律就会松弛，經驗就不能迅速地积累，而且領導也不能起应有的作用。

(四) 黨員是活的人，有思想，也有感情，有优点，也有缺点。

我們有許多同志在工作方法方面很少注意到人及其不同的特性的問題。其實，對組織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和使用黨員，即如何認識和使用人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認真注意這一問題，我們就不可能幫助一位同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使他更多地、更好地為黨和人民工作。

我們要建立人民民主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依靠天上掉下來的人，而是依靠目前已經存在的人。他們無非是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的人，擔負着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任務的人，或者在目前我們國家內為着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並建立新民主主義或人民民主社會的人，此外，就再也沒有別樣的人了。

現在的印度尼西亞人，作為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不僅受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壞教育，而且受過殖民地社會更壞的教育，這是培養自私自利、胆怯、自卑等品格的惡劣教育。

當然，對於一個參加了共產黨的人，黨必須像對其他黨員一樣，把他當作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看待。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自發地、自然而然地發生的，同樣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成為一個完善的共產主義者。一個剛參加黨的人，他不會立刻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正如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應該成為的一樣。要成為一個好的共產黨人，他就必須把舊的思想意識徹底改造成為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這是需要許多年的時間，要有理論修養，要參加實際工作取得對付反動派進攻的經驗。對於一個剛參加黨的人，也就是說他剛剛登記，承認黨綱黨章，參加黨的某一個組織並積極進行工作，服從黨的決議，繳納基金和黨費，參加黨的會議和黨的学习以及閱讀黨的刊物（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章第一

条所规定的)，如果我们要求他的质量同那些受过更多教育锻炼、党龄较长的党员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就不是现实主义者。

最近大逮捕事件发生时，有迹象表明一部分党的干部对每一个党员的品质，对他的优点和缺点了解不够。没有看到上述事实的干部，当他领导下的党员（一般是新党员）不能迅速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法的时候，尤其是新党员提出许多要求和建议，或者是稍为表现胆怯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不愉快。这种干部认为提高新党员觉悟只要进行两三次教育就够了，因此他不愿意再进一步做这种工作了。他有一点灰心和生气。他不懂得他的责任，正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对于比较弱的同志，我们更需要加强他的信心，提高他的觉悟，重新鼓起他的斗争热情。在这样的问题上表现灰心、生气、恼火，就是表现了我们的干部的小资产阶级情绪。这将给党造成很大的损失。

我们党的干部中有的是善于在和平时期领导人民运动的，但是一旦风吹草动，他们就不容易适应新的情况。那些曾经在殖民战争中受过枪林弹雨的锻炼，经常遭到荷兰当局的追捕，曾经在茉莉芬挑衅事件中经历过严重斗争考验的干部，当然要比新干部更容易适应新的情况，他们的警觉性已经提高了，他们懂得在动荡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方法。因此，在反动派猖狂的进攻下，对那些不知所措的新同志，不应该责备他们或者打击他们的情绪，而必须耐心地稳定他们的情绪，重新鼓起他们的斗志，使他们热情地继续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切实体会斯大林同志的话，“人材、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

不仅是在上述的问题上，而且在其他问题上，同样可以看到，

在工作方法上，我們黨的幹部對於如何客觀地了解每一個黨員的情況注意得還很不够，每一個黨員除了有優點之外，還存在着因殖民地教育和過去我們黨的錯誤所造成的缺點。

還有許多黨的幹部好像在做雇員，他們把黨當作一般的辦事處，當作政府機關或沒有生氣的企业機關。這種作風必須加以鑿除。黨是活人的組織，黨的幹部也是活人的領導者，而不是一般的辦事處、政府機關或企业機關的領導人，只要照章辦事，發發通知，它們“就能办好”。

(五)最後的但也是重要的問題是，在一部分黨員中還存有對自己的力量、對黨、對我們必勝等等都缺乏信心的跡象。他們還沒有真正相信我們的鬥爭是必定會取得勝利的，他們有時還半信半疑，還想到失敗的可能性，想到資產階級將繼續統治下去的可能性。

這樣的同志主要是那些思想修養還很差，而且沒有在人民鬥爭(革命初期在城市中的戰爭，殖民戰爭^[16]，德朗古罷工^[17]，茉莉芬挑釁事件，大示威遊行和罷工等)的洪流當中鍛煉過的黨員。他們從未看到過而且也不能想像到在一定的時期“平凡”的群眾能夠發揮出非凡的力量，能夠創造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事跡，能夠激烈而愉快地鬥志昂揚地進行鬥爭。曾經在革命時期中受過激烈的人民鬥爭鍛煉的並經過自我鍛煉的每一個黨員，不可能忘記戰鬥的人民的眼睛所閃射着的顯示堅決、勇敢、忠誠和必勝信心的光芒，他們不會忘記人民沒有得到政府機關的命令而自動起來架設障礙物和沒收帝國主義在市區和郊外的企业，也不會忘記人民給予驅逐荷、英侵略者的爭取獨立的戰士以支援時所表現的無限的主動性。通常過着“安靜”生活的黨員是不能夠體會和想像到這一切

的。他們必須先亲身体驗，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斗争的壮丽和乐趣。

有些人对自己的力量、对党、对将来的胜利缺乏信心，他們說的話似乎是善意的，好像是建設性的。例如他們說：“算了吧，在茉莉芬挑釁事件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被反动派杀害的太多了。我們現在不要作声，不要进行宣傳鼓动，也不要批評論兽性发作的政府，我們的力量必須好好地保存起来，将来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中国人民的军队不就会来解放我們。”有的說，“印度尼西亚已完全为美帝国主义所控制，我們不可能再有任何作为，如果我們真的能干些什么，那帮助也不大，因此我們只好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那时候，我們的大好机会就到来了。”有的說，“征集世界和平的签名沒有用处，这样，人民就会失去打仗的勇气，而实际上打垮世界資本主义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此外，还有其他的言論，也都帶有同样的偏向。这些言論是非常危險的！沒有別的言論比这些言論更危險的了。正因为这些话是共产党員說出的，因此就比杜魯門本人或他在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地方的走狗所进行的战争宣傳更为危險。

上述“左”的言論是有其思想根源的。这种思想如果不立即加以克服，那就不仅会搞垮或者損害我們建立强大的民族統一战綫和組織和平运动——它是保护人类免受美国正在积极准备的新的世界大战的灾难的最重要的运动——的活动，而且还会大大有助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誣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整个人民运动的行徑。这种言論和思想，帮助了反动派的造謠誣蔑，反动派不断訓練他們的走狗和工具，造謠欺騙人民，說什么“民族独立”之所以受到威胁，是因为共产党人想用外力，想借外国的力量来达到共产

党的政治目的，說什么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希望世界大战，以便混水摸魚。瞧，像上面这些言論和思想，不論有意或无意，其实质不就是极端反共的言論和思想嗎？这种“左”的言論和思想实际上**会造成党在群众中的孤立**。对那些仍然具有着这种危險思想的党员，必須赶快提醒他們，召集他們进行討論，使他們认清錯誤。如果經過多次提醒之后，他們还不努力改变上述思想，那么我們党内就沒有让这种人容身的地方了。这种人更像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更像是潜伏在党内的資产階級代理人和挑衅者的工具，而不像是一位真正热爱党、真正保卫人民利益并且领导人民爭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共产党人。

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須充分确信，他們的信念和道德跟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信念和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必須完全相信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力量和和平的力量。是的，共产党人认为，人民和和平就是一切的泉源。相反的，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或在任何地方的走狗，都是不相信人民，敌視人民的。他們更相信美国的“援助”，并且利用美国的“援助”来鎮压人民。他們不相信和平能够胜利，他們积极执行美国的战争政策。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总綱，完全沒有提到要等待外国軍隊解放印度尼西亚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是具体地提出：**对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是“組織与团結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小企业主、民族企业家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以及一切外裔公民”。**对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則是“联合全世界无产階級，被压迫人民，被殖民統治的民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的、热爱民族独立、热爱人民民主和世界和平之民族”。每个党员必須严格遵守党章总綱。在党章总綱中，絲毫沒有提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

等待外国军队或第三次世界大战。

正是在目前，当人民对我们党的信心愈益增强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充分地表现我们党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每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当做的那样。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在日常的行动中表现出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这样，我们才能拆穿坏分子对我们党的诬蔑。

我们必须诚恳坦率、反复不倦地向人民说明，我们的理想实际上也就是广大人民的理想。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一样，只是要求真正的独立与和平，而不是别的。我们进行斗争是为着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决不是建立一个仅仅是属于共产党人的共和国，而是由共产党人同其他进步阶层和人士联盟的共和国。我们的理想根本不是要从外国输入民主的人民共和国，也不是要把新的世界大战的担子加到因圆桌会议协定而背着那么沉重的担子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身上，来达到建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这一目的。我们确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现其理想的方法不是通过输入外力，也不是通过新的世界大战。只有当大多数人民有着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要求并为它而斗争，这样的共和国才能建立。但是，只有当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民族主义者、进步的宗教人士及其他民主阶层联合行动起来，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内外的工人行动起来，农民统一战线⁽¹⁸⁾内外的农民行动起来，青年、妇女、学生等群众行动起来，要求改善生活和争取我们的权利，上述要求才能产生，斗争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我们所热爱和尊敬的党——的党员，我们为实现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我们有着国际的支援，没有这种支援，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胜利。但是，我们有了国际的支援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推卸对祖国与人民的责任。

相反的，國際支援要求我們必須更加誠心誠意努力為民族獨立而工作，因為我們為民族獨立而鬥爭也就加強了世界的和平民主鬥爭。

我們克服弱點的方法

上面已經說過我們黨的一些弱點。我們所看到的目前黨內這些弱點，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有過。例如，美國共產黨最近對他們自己的弱點也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們的弱點和我們黨內目前仍存在的弱點是相似的。還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美國黨內的弱點是在具有法西斯性質的杜魯門政府更猛烈地進攻美國共產黨的時候暴露的。從好的方面來說，經過八月大逮捕事件以後，我們現在已經覺察和認識到了自己的缺點和弱點，使我們能夠認真努力改正。這對我們黨今后的發展是很重要的，何況我們黨今后必定還會遭受到反動派更猖狂的進攻。

我們黨目前所表現出的弱點並非過去就不存在。這些弱點過去就存在着。我們不是魔術家，我們不能在半年的時間里（從一九五一年初起，也就是在黨中央委員會內部展開了尖銳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並在一九五一年一月成立新的政治局之後）就把過去曾深陷在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請參閱《新道路》）泥坑的我們黨的一切毛病全部清除乾淨。何況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仍然繼續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造成思想混亂。一般的來說，最近黨的幹部已經感覺到我們黨內還有許多缺點和弱點。一部分同志能夠及時注意這些弱點，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使問題得到正確的解決。但是另一部分同志卻還沒有這樣做。

在这个問題上，在我們党内担任领导工作的各級負責人有責任进行自我批評。对党的各級負責人的要求，要比对普通黨員的要求来得更高，因为党的各級負責人所負的責任比普通黨員更大。一个黨員的地位越高，責任就越大。

党的各級負責入更應該以批判的精神来进行工作，才能够檢查和改正缺点和弱點，提高工作的质量。每个严肃认真的領導者都必須具有这种作風，才能够領導整个党的工作。

我們党内已經普遍地承认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必要性。但是，一般的承认和具体的**实践**之間往往橫着一道鴻沟。认真、正确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克服障碍、解決問題的不断斗争中产生的。

过去，批評和自我批評往往未能认真地和正确地进行。經常还有这样的現象发生，一个党的負責入向党的組織（党委会、党组或党团）所作的工作报告和殖民地时代一个村长向其上級所作的报告，沒有多大的差別。村长当然把他所管轄的区域內的水量不足、傳染病蔓延、农民缺少牲口、水災等等缺点列入报告，但是他並沒有檢查自己和他的工作，沒有具体地分析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也沒有提出克服的办法。最后他“机灵”地用漂亮的詞句来結束他的报告說，有着这个机关或那个机关的帮助，护畜員、防疫員的高明技术，副区长先生的英明領導，上帝保佑，但願来年一切順利，农业增产，稅收增加。这样的工作报告当然得到殖民地官僚的欢迎。殖民地的大小官僚都反对批評，職員机械地进行工作，因此，他們的官僚机构日益混乱。不是还有一些党組織的負責入不喜欢檢討自己的工作，而把問題推給別的負責同志或上級領導去解決嗎？其实，最了解如何去檢討他的工作的是他本人，因为他更了解他自

己的工作和工作方法。但是，的確，如果他對自己的工作和工作方法進行尖銳的批評檢討，他的弱點就會給其他負責幹部或黨員知道，這就會降低我們這位朋友的“威信”。這種想法就是個人主義的思想，當然就是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一个大障礙。

另一方面，有些負責幹部或黨員聽了不具體、不深刻、沒有自我批評精神的報告之後，也不提出尖銳的批評。他們害怕尖銳地批評了這些同志的工作報告就一定會產生後果，他們害怕會傷害對方的感情，因而自己的工作也很有可能受到同樣尖銳的批評。因此，對他們的報告只作一般的討論，而沒有進行嚴厲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一來，討論會就“一團和氣”地進行着，而沒有“激烈的鬥爭”。

但是，從這樣的報告和討論中，我們能夠吸取什麼經驗教訓呢？能夠正確的解決什麼問題呢？這樣的集體組織能夠給予什麼樣的領導呢？**這不是領導，也完全不是集體領導！**這是那些負責幹部閑談、自吹自擂和互相恭維的場所！在一些還是落後的集體組織里，有時候幾個負責幹部結成小集團、小宗派，互相奉承，互相包庇，以便能夠突出他們的“優點”，掩蓋彼此的弱點。

我們所說的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毛澤東同志曾經嚴厲地批評說，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它是消極的東西，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上述弱點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所以我們不可以讓這些弱點繼續存在於我們的黨內和所有的革命運動里。有了自由主義，黨內就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而其他的弱點自然也就不可能克服。

黨經常教導我們說，要進行批評是不容易的，而且絕不可草率從事。批評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把被批評的人整死。批評和外科

医生动手术一样。給病人动手术，把他弄死，这并不困难，但却不是动手术的目的，問題是如何动手术使病人痊愈。对于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問題就是如何运用批評，使被批評者能够觉悟过来，热情地繼續斗争。所以我們的批評不能是反馬克思主义的，不應該打击并吓跑被批評者。

近来，党员和干部經常談起君麟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小册子。党內的弱点变得明显了，而要克服这些弱点，党员和干部必須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工作方法和經常認真地进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这本小册子在这样的时候翻譯出版，是很适时的。現在的問題是：党员和干部学习这本小册子，認真到什么程度，領会到什么程度，把小册子的內容联系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到什么程度。我們党現在已經走向成熟，像古人那样把讀書当做炫耀自己、出風头和掩盖自己的不认真学习的时候已經过去了。現在是把我們讀到和听到的好东西認真付諸实践、全心全意尽力实行的时候了。

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不仅不可能及时了解和及时改正党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也不可能有**集体领导**。只有进行坦率的、开誠布公的和善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集体领导才能够实现。每一个集体組織都應該这样做，否則它就不配称为集体組織，也不可能进行良好的领导。

八月大逮捕事件以后，更加明显的是：凡是过去沒有实行集体领导的地方，凡是领导方面沒有把批評和自我批評当作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前提的地方，那里的党的领导就陷于停頓，党员就感到沒有领导，群众感到他們被领导所拋棄。那个地方的人民运动可能平时是比較开展的，但这种局面只是靠一个或几个积极的人搞起

来的，而不是領導机构采取集体領導工作方法来进行領導而形成的。因此，如果积极的領導人被捕或者他有某种原因不能照常活动的話，那里的运动也就停頓下来了。領導中斷，要培养一个新的領導人，就必须花相当长的時間。

这些喜欢独断独行的同志自己一向是积极工作，不辞劳苦的，但是这种人有一个大缺点，他們瞧不起一起工作的同志，他們认为这些同志沒有像他那种“非凡”的思想，因此就沒有必要和他們討論問題，把自己所作的决定告訴他們就行了。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出他不尊重領導机构內的其他同志，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尊重群众和輕視群众，尽管他口口声声說他是多么热爱和尊重群众。領導机构的其他同志不也是因为得到群众的信任而被群众选举出来的嗎？这种人，实际上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不相信群众，視群众为“群氓”，为他們随意驅使的群兽。他們把人民看成是被牵着鼻子走的牛一样。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惡的事嗎？

同上述例子相反，八月大逮捕事件以前，我們党的一个地方組織，并不怎么强，但它的領導人和黨員已經习惯用集体方式来进行工作。能够認真地进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有計劃地进行了政治和理論的学习，材料是取自《紅星》杂志或其他小册子。虽然在八月大逮捕事件中当地有一些党的或群众团体的領導人被捕，但是党的領導还能够繼續起作用，黨員仍然感到党的領導，群众也是如此。而且就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还涌現出新的領導者和新的英雄人物。

由此可見，集体領導是多么重要啊。在目前情況下，階級斗争尖銳化，反动派企图先粉碎我們的党，进一步就扑灭整个人民运动，我們更需要有集体領導。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党的領導應該比

平时更坚强、更有创造性、更警惕和更勇敢。党的缺点和弱点，即使只是一些苗头，也必须通过深入的集体讨论加以克服，不可以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放任自流，也不可以迁延时日而不及时克服。

在目前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党员要求更好的领导，而群众在目前情况下，也要求党员更好的领导。**只有采取集体工作方法的组织才可能产生这样的好领导，也只有领导阶层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可能有集体领导。**

今后，我们应该把我们在观点上、政治上和作风上的宗派主义残余连根拔除。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向改良主义作斗争，执行革命的政策，动员群众站到党的旗帜下面。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任务是：**第一，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起来争取他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切，同时，第二，我们要时刻不能忘记，应该随时随地抓住机会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特别应该根据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如果只实行第一项任务而没有实行第二项任务，我们就是走向改良主义，如果只实行第二项任务而不实行第一项任务，我们就是走向宗派主义。**在反对改良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多多学习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以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身的经验。在这种基础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能克服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弱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定会发展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一定能够完全担负起它所面对着的激烈斗争的任务。

我们必须更好地支配时间，安排工作，全心全意，竭尽全力，来完成我们的这一任务。

原文发表时署名：阿兰姆布德拉

走人民的道路

这是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二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艾地同志通过这一次讲话，引导党摆脱了当时还相当严重地妨碍党的发展的宗派主义的束缚。他阐明了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完全独立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的斗争的客观需要。他又指出了关于根据人民意愿改革议会和其他国家机构的可能性。

当时，已经成立了韦洛坡政府，即由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人担任总理的政府。同一九四八年以后成立的各届内阁比较起来，韦洛坡内阁是第一届多少有些进步因素的内阁。当它还执行有利于人民斗争的政策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支持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的这种态度有力地使顽固势力开始逐渐陷入孤立和挨打的境地，而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却开始逐渐团结和发展起来。

艾地同志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同机会主义者、右翼社会党人及其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行动上却同工人敌对的那些人作斗争的重要性。他也分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真正的爱国主义——这是每个共产党人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之间的关系。

这个文件在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其组织遍布全国和深入各族人民的强大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首先，我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向欣然前来参加今晚这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二周年庆祝会的各位表示感谢。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向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的进步的著名人士致敬，因为你们所代表的各界人民，在为建立新的印度尼西亚，为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民主和持久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精神。

各位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到今年五月二十三日就满三十二周岁了。就我国的政党生活看，三十二岁可算是高寿的了。许多政党或政治团体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诞生之前或之后成立的，可是，没有几年便夭折了。由此可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定具有极其坚固的基础和非凡的韧性，才能活到三十二岁。

三十二年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的意义

前几天，在五月二十日〔1〕我们刚刚庆祝过民族觉醒节四十四周年。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深刻意义，它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深深地体会到五月二十日的重大意义。如果没有瓦喜丁·苏第罗·胡梭多医生（一八五七年——一九一七年）在四十四年前领先开路，那么，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真正民族独立、民主和世界和平的斗争就不会发展得像今天这么快。

印度尼西亚青年早就努力寻找能够使他们的国家和人民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理论和组织形式。一九〇八年起，他们的努力愈来愈显著，也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最初，他们主要是尽量向西方的书本和老师学习。瓦喜丁医生建立了至善社，此外，还设立了各种奖学金，其中包括名为“慈善社”的奖学金，资助许多聪明的清

寒子弟到欧洲去向西方人学习。还有许多印度尼西亚学生不是通过瓦喜丁医生的关系前往欧洲留学。**利怀博士**(一八七一年——一九三三年)就是这类青年留学生当中的一个,他是开拓赴西方求学道路的先驱。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是能够掌握阿姆斯特丹、柏林、剑桥和巴黎等大学所传授的知识的,利怀博士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

但是,事实也证明,在争取同各民族处于平等地位的努力中,印度尼西亚的知识分子到西方去,拜西方人,首先是拜荷兰人为师,把他们当作榜样,而西方人并没有传授什么好东西,也没有作出什么好榜样。他们给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讲解民主,却把殖民专制制度强加在印度尼西亚人民身上。他们给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讲解革命和西方民族如何为争取国家独立而英勇斗争,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帮助印度尼西亚人去实现他们从西方学来的东西,而且禁止印度尼西亚人去实现这些东西,甚至不准印度尼西亚人用“革命”、“独立”等字眼。

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所接受的理论和西方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实际行动不相符合。西方人侮辱并仇视自己的学生,引起了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激烈的反抗,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更沉重的压迫的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这些反抗斗争。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成立的“土著委员会”就是上述反抗斗争形式之一。该委员会的领导者是**基·哈查尔·德宛达拉**、**吉多曼贾古苏莫博士**(一九四三年去世)等人,其目的在于抨击荷属东印度政府的轻视和侮辱印度尼西亚民族^[2]的政策和措施。

基·哈查尔·德宛达拉的《假如我是一个荷兰人》一文是对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政权的一个严重抗议。利怀博士的笔锋犀利和

立論正确的作品也表现了激烈的反抗。

但是，上述反抗斗争还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没有有组织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当然，就唤醒印度尼西亚人民起来反抗荷兰殖民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这一点来说，这些斗争的意义是重大的。但是，由于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又缺乏有组织的广大人民的参加，这些斗争就容易被击败。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给印度尼西亚人民（特别是工人和一部分知识分子）送来了新的观点，使他们受到了鼓舞，使他们醒悟过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当时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3〕以很大的影响。这个联盟成立于一九一四年，参加的有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知识分子。十月革命不仅仅是被压迫民族的火炬和希望，而且它也给了他们关于建立新型的党的经验。这个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有来自劳动阶级的高度觉悟的党员、有铁的纪律、采取自我批评方法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党。这个党就是列宁的党、共产党。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倡议下，根据这种经验教训和认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改组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一届的执行委员是**司马温**（主席）、**达尔梭诺**（副主席，现已背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斗争）、**伯斯玛**（秘书）、**德克尔**（司库）、**巴尔斯**、**斯坦姆**、**登阿**、**苏哥诺**等人。同年十二月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

由此可见，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这个日子，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特别是对寻找革命理论，寻找一个能够领导人民为推翻在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统治而斗争的政党，是有着重大意义

的。印度尼西亚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应当感谢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因为是在俄国无产阶级一九一七年打垮了反动营垒之后，印度尼西亚人民才认识到，**只有用暴力、用革命，而且必须是由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的革命，才能够把帝国主义打倒。**

三十二年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诞生，不仅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是重要的，而且对全民族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从一九〇八年开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然是以自豪和兴奋的心情来庆祝它的三十二周年纪念日，因为在民族觉醒四十四年的历史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起最重要的作用已达三十二年之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既然能够在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暴风雨的袭击下度过三十二年，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将能够继续存在，并且能够实现它**消灭人对人的压迫和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目标。这也就是所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一致信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关系

在有阶级的、或多或少地有产生政党的可能性的社会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政党存在着。各个阶级建立各自的政治组织——政党。一个阶级往往分为好几个阶层，各个阶层又建立各自的政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印度尼西亚存在着各色各样的政党，这是必然的，因为印度尼西亚社会是阶级社会，而且宪法或多或少地保障了各政党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设法简化目前这些政党，

因为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情报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亚的政党**》一书，印度尼西亚共有二十七个政党。这已经是太多了，何况还有一些政党没有列入上述的官方出版物。这些政党的基础和目标是许多是相同的，或者差不多是相同的。像这样的政党应该合并起来，而且历史的发展也必然要把他们合并起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即使是在同其他政党联合时，也不会去干预其他政党的内部问题，因为这是各有关政党自己的事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一切愿意和有诚意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合作的任何党派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活动爱好者、妇女、青年、企业家等各界人民中建立统一战线。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党员和同情者要努力同其他政党的党员和同情者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或在各阶层中建立统一战线，这完全不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不理或者不批评这些政党的党员、下级负责人员和上层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政策。双方进行善意批评的合作，或者像政党协商会议章程〔4〕中所说的“在真挚友好的基础上”的合作，才是健全的合作。只有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其他政党的党员和下级负责人员才能有所帮助。而且也只有这样，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得到其他政党中的正直的党员和下级负责人的帮助。

很多事实说明，许多政党的一些上层领导人的利益是直接同他们的党员和下级负责人员的利益相矛盾的。例如，有许多条约和协定，包括圆桌会议协定、禁运、旧金山对日和约、共同安全法〔5〕等，直接损害了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执政党的党员也不能例外。有些政党没有同它们的党员好好磋商或者连听取他们的意

見这种最起码的做法都没有做到，便同意了上述跟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再举一个例子，各政党在政党协商会议的合作和为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民族觉醒节通过联合声明而进行的合作，各政党的党员和下级负责人员都热烈欢迎，但是，偏偏有一些政党的上层领导人要压制他们的党员和下级负责人员的这种合理愿望。还有一个例子，极端仇视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和冒充工人代表的参加执政的工党领导人，制造了不少卡住工人脖子的法令，其中包括德查苏马纳第十六号紧急法令〔6〕，这些法令同工人的利益，包括那些因认识不清而加入工党的党员们的利益，是直接相违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不断争取同其他政党合作的过程中，不能听任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继续下去，而且还要批评那些应对这种现象负责的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于那些 自称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样以 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党的态度

从一九二〇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就在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人民中间广泛流传。那时起，每一个想要在人民当中建立威信的政党就势必要采用社会主义或者意思同社会主义相似的其他字眼作为该党的宗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以后，一切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都被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尽管参加斗争的可能只是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狂热分子。基·哈查尔·德宛达拉、吉多曼贡古苏莫博士、多威士·德克尔、卓哥罗阿米诺多等人，甚至连苏加诺、哈

达，也曾經被荷兰人扣上“共产主义分子”的帽子。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英勇起义失敗并被荷屬东印度政府宣布为非法政党之后方才成立的一些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如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印度尼西亚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給他們的同情者讲授馬克思主义。这些政党及其党员和同情者也被荷兰人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把他們逮捕、监禁或流放。

現在，沒有一个政党能够爭取到广大人民，如果它不是以社会主义或以“社会公平”之类的字眼为宗旨的話。有的甚至标榜以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最近，制訂卡住工人脖子的法令的人也大言不慚地說他自己是“馬克思列宁的信徒”。他們无耻地挂起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片当作自己的政党的广告。关于这样的明目張胆弄虛作假的情况，列宁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曾經描述过：“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辯证法就是如此。”〔7〕不仅印度尼西亚的德查苏馬納，甚至連希特勒、墨索里尼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不仅印度尼西亚的托派分子，甚至連铁托、克里門蒂斯和斯兰斯基也自称为共产主义者。

这一切說明了什么呢？一方面說明了印度尼西亚人民愈来愈广泛和愈深刻地領会了社会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对社会主义一詞的歪曲甚至是歪曲到令人发笑的地步的現象也愈来愈多了。这也說明了馬克思主义在印度尼西亚已經取得了理論上的胜利，連馬克思主义和人类最危險的敌人，为了要掩飾他們背叛工人階級和人民的罪行，也不得不伪装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的还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他們像希特勒、墨索里尼、像艾德里、德里斯、像克里門蒂斯那样做法，这只不过是為了要掩飾他們野蛮殘忍的

法西斯本质才这样作的。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阉割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的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这些骗子和阉割者呢？对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又尽忠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利益的右翼社会党领导人，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工人领导人和人民领导人必须同右翼社会党领导人的欺骗行为进行激烈的斗争。三十二年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立时就抱有这样的方针目的：要遵循列宁和列宁的党的教导，成为一个摆脱机会主义错误即第二国际错误的党，对党内外任何机会主义展开激烈的斗争。

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工人阶级不信任和唾弃了那些应对分裂工人阶级负责的右翼社会党人的时候，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的斗争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关于反对工会中右翼社会党人的斗争，列宁曾经这样说：“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把斗争进行到底，进行到使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颜面扫地，并把他们从工会中驱逐出去。”〔8〕

在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中有许多事实证明右翼社会党人是工人运动的分裂者。他们是钻进工人队伍的资方代理人。农场、糖业、纺织、石油、空运等等部门工人中的分裂现象，都是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即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和工党里的老板、托派分子陈马六甲的徒子徒孙及其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革命中央职工会”〔9〕所制造的。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是最优秀的和平民主战士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这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分子或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工党分

子是不是也这样呢？不，完全不是这样。

右翼社会党人不但积极支持世界和平运动，而且还誣蔑和平运动，同时他們日常所执行的政策实际上都是美国战争政策的附屬品。他們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工具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或會議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¹⁰⁾的关系，同国际的反动活动，特别是掀起新的世界大战的活动結合起来。

他們不但不认真保卫民主，而且还积极参加促使印度尼西亚国家制度法西斯化的活动。当一九五一年八月挑衅事件⁽¹¹⁾正在瘋狂进行的时候，工党的德查苏馬納先生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领导人非常卖力地进行粉碎工人运动的活动。工党的德查苏馬納先生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右派领导人，野心勃勃地抓住这个机会，认为这是他們搗乱和粉碎工人运动和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大好时机。他們破坏民族統一战綫，恫吓进步人士，要进步人士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疏远开来。

右翼社会党人不但积极建立民族統一战綫——这是使印度尼西亚摆脱荷兰和美国的殖民統治并使人类免受世界大战等灾难的最重要的保证，而且还誣蔑一切旨在团结民族力量和加强民族統一战綫的努力。他們把自己孤立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竭力阻撓民族統一战綫的实现。他們沒有支持政党协商會議，也沒有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民族觉醒节通过的联合声明上签字。右翼社会党领导人同馬斯友美党和其他保守党领导人有什么区别呢？事实上，他們是一丘之貉。

右翼社会党人現在开始更加紧活动，每一个共产党人、正直的工人领导人和人民领导人都必須注意这一明显的事实。世界各地的事实已足够說明，右翼社会党人是美帝国主义分裂工人运动、压

迫求独立的人民和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帮凶。美帝国主义为了准备战争，不仅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府，还极力派人潜进那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去，在工会中进行贪污舞弊，制造混乱和分裂，以便使工人运动陷于瘫痪。右翼社会党人是美帝国主义进行这种种活动的头号帮凶。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同时对那些假冒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右翼社会党人和机会主义分子展开激烈的斗争，那么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关于这点，列宁曾经说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12〕。

但是，共产党人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和下级负责人同他们的全部或一部分上层领导人区分开来，那就会犯很大的错误。共产党人必须注意这一事实：上述政党的党员和下级负责人一般说来都是民主和进步的，不像他们的上层领导人那样别有用心。这些上层领导人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有时尖锐，有时不那么尖锐，他们常常为争夺金钱或名位的“利益”而发生内讧。

因此，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继续坚持不懈地争取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工党、平民党及其他政党的党员和下级负责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是在工厂、乡村和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统一战线。再说一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党员和同情者努力同其他政党的党员和同情者建立统一战线，完全不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不理或者不批评这些政党的党员、下级负责人和上层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政策。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希望其他政党对它提出批评。

只有继续进行坚韧而机智的斗争，才能实现工人阶级以及全

体人民的大团结。共产党人一方面必须彻底揭露那些死硬的右翼社会党领导人，同他们进行尖锐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继续努力说服那些政党的党员和下级负责人，使他们相信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相信建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妇女、青年等等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能够有效地给工人和人民指出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就能够鼓励其他政党的正直的领导人能够继续保持正直的行为，促使那些动摇不定的领导人克服他们的动摇性，尽快地走向正确的道路。显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点也不仇视其他政党的党员，相反的，是争取他们真正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民主

人民的敌人常常说，共产党人要取消民主而且要建立个人独裁或共产党专政。这是造谣，是那些无法阻止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的发展的人所制造的诽谤。根据这种诽谤，人们自然就会得出一个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真正的要求完全相反的错误结论。

如果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实行人民对人民的敌人的专政，这就说对了，这正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要求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要求的，不是个人独裁、共产党专政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要求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对不到百分之十的人的专政或统治。这些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就是反动派，包括外国大资本家、大地主和买办，或者是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外国人或印度尼西亚人。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要求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其敌人实行专政呢？

一九〇八年以来，印度尼西亚人民四十四年的斗争经验教育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对敌人实行专政。必须剥夺人民的敌人，剥夺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大地主和充当他们的代理人的外国人或印度尼西亚人——的发言权。只有人民，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才有发言权。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也包括在人民的范畴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需要的民主制度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权利。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的专政，或简称人民民主专政。

有的人说：“如果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异常粗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进行挑衅，刺激了那些人。如果这样，反动派就会大发雷霆，就会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错，对于反动派来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是粗暴的，都是会刺激他们的，会激怒他们的。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待人民的态度和行动却都是很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会对人民粗暴过，也不会刺激过人民。不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粗暴还是不粗暴，刺激还是不刺激，反动派反正是要发怒，反正是要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的。要把反动派的怒气压下去，就只能去打倒反动派，而不能好言好语、和颜悦色地去讨好他们。而且也只有人民才能够打倒反动派。因此，人民应该知道，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只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够永久地镇压住反动派。人民民主专政不是针对着个人，而是针对国内外的反动派及其代理人。

由此可见，人民的敌人所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建立个人

专政或共产党专政，是彻头彻尾的誹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九五一年三月的声明闡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印度尼西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即由各党派、各阶层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組成的联合政府⁽¹³⁾。声明接着說：“有了这样的联合政府，我們就結束一党或数党的专政，建立民主政权。”印度尼西亚人民去年的經驗证明了，一党或数党专政已經产生了苏基曼—維比梭諾—苏巴佐政府发动的八月挑衅事件这样的极大的禍害。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主張的人民民主政府对宗教問題采取什么态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总綱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保障宗教自由的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来从事分裂我們民族团结的勾当，如几十年来樊德不拉斯及其代理人在印度尼西亚所从事的那种勾当。根据这一原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同意某一宗教支配另一宗教，这也合乎印度尼西亚各个宗教集团的主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 民族企业家和中农的关系

有些政党的领导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現在不打算消灭民族企业家（民族资产阶级）。他們认为，民族企业家也是资本家，如果任其发展，他們就会成为壟断资本家，就会和外国壟断资本家同样的危險，难道不是这样嗎？因此，我們不能給他們以生存的机会，現在就应该立即鎮压他們。

这种思想是极其有害的思想，是脱离现实的思想，是懦夫思

想。这些懦夫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打击外国壟断資本，于是想向那些因外国壟断資本的競争变得軟弱的民族企业家开刀。他們把朋友当作敌人，这是最愚蠢不过的了。民族企业家是受到帝国主义的損害的。看吧，在美、荷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禁运政策和財政政策給民族企业家造成的損失是多么严重。因此，民族企业家必須成为反帝統一战綫的力量之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現阶段的綱領，即人民民主綱領，完全不是要通过把民族企业家的企业收归国有的方式来消灭他們。相反的，人民民主綱領是要給他們以稳定的地位，以便提高社会生产力，为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創造条件。人民民主綱領恰恰就是要保护民族企业家的私有财产。因此，这跟反动派所作的宣傳，說什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消灭个人所有权，使大家都一无所有，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实际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断的在消灭民族企业家，使全部經濟生活完全集中和操纵在帝国主义集团的手里。

人民民主綱領也不是要消灭中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土地綱領闡明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消灭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以便使农村社会达到中农（自耕农）的水平，作为发展现代化的民族經濟的重要条件。土地改革的最終目的不仅仅是分配土地和工具給貧苦的农民，因为仅仅通过这种办法还不能帮助他們摆脱穷困和愚昧。土地改革的最終目的是为了要使农村的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工业化开辟道路，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

反动派宣傳說什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消灭个人所有权，使大家都一无所有，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土地綱領中也可以看出，情况是完全相反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

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大部分的印度尼西亚农民沒有土地或者缺乏土地，而且貧农和中农原有的一点点土地也漸漸地轉移到一小撮高利貸者手里。因此，恰恰就是政府的反动政策消灭了小农和中农的土地个人所有权，而最后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貧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苏联 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

人民的敌人經常誣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这样的誣蔑是卑鄙的，如果这种誣蔑是出自非靠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援助或其他援助便在社会上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社会党、工党或其他政党的领导人的口里，那就更加卑賤下流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它的每一項政策都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自己以民主的方式决定的，一点也不受外人的干涉。这种指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这国或那国的代理人的誣蔑，只是說明了这些资产階級政党的领导人慣于充当外国(特别是美国和荷兰)的代理人和掮客的老一套想法。

有人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这一边。正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完全不否认，而且还要进一步說明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一切問題上都是一边倒的。在荷兰殖民主义同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矛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边倒，倒向印度尼西亚民族一边。在日本法西斯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矛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边倒，倒向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边。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边倒，倒向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边。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同苏基

曼集团政府的矛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倒向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边。在民主同法西斯的矛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倒向民主一边。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同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倒向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一边。在和平同战争的矛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边倒，倒向和平一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打算站在这两种矛盾的中間，也不打算脚踏两只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要中立，也不要找第三条道路。中立完全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有人說：“如果我們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得不到国际援助，就会垮台。”我們要問一問是什么国际援助？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还是英帝国主义的援助？到現在为止，在美国和英国执政的仍是帝国主义者。难道他們肯援助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嗎？如果有外国人要卖东西給印度尼西亚，这只是通常的貿易，而不是什么援助，因为他們要賺錢。我們必須同任何国家在互利和不受任何政治束縛的基础上建立貿易关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在貿易中实行歧視，同时也反对企图阻撓印度尼西亚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一切活动。

还有人說，印度尼西亚人民沒有国际援助也能够取得胜利。印度尼西亚人民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的革命經驗說明，澳大利亚、印度、埃及、美国、荷兰等国家的人民和工人的行动和援助，加上駐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和乌克兰代表的援助，大大地增强了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沒有这些国际援助，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就会很容易地为美国、荷兰和英国所挫敗。因此，国际援助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是很重要的。真正的国际援助只能从那些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样以打倒帝国主义为目标的国家和人民那

里取得。帝国主义者統治下的美国、荷兰和英国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敌人，因此我們不可能从这些国家取得援助。

目前国际形势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苏联是第一个摆脱世界帝国主义制度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苏联的日益强大意味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益衰弱。这种情况十分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

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張，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須面向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不是面向帝国主义的美国。这并不是說，印度尼西亚以至其他国家都必須照搬苏联国家的形式，即苏維埃制。完全不是这样。相反的，各个民族将根据本国政治、經濟、文化的发展情况采取自己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斗争的經驗說明了，在民主的人民国家中，在其議會和其他国家机构改革一新——具有真正的民主内容并按照人民的意願組織起来——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我国有人喜欢引用已故的菲律宾总统奎松說过的一句話，大意是当需要忠誠于祖国的时候，就必須終止对党的忠誠，这一句話对奎松自己和那些不爱国的政党來說可能有用。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來說，这一句話只不过是說明奎松总统的党不是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的党，此外就沒有什么意义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三十二年来的历史证实了，印度尼西亚共

产党是为祖国服务的党，是为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服务的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工农运动中，不是维护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而是维护印度尼西亚本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废除圆桌会议协定、旧金山对日和约、共同安全法等等协定，因为这些协定损害了民族的利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美国侵犯印度尼西亚的主权，干涉印度尼西亚的内政。由此可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是反民族的，事实上，为了殖民统治者和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而牺牲本民族的利益的正是那些人类的敌人和诬蔑者。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为党服务，为民族的利益服务，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和为人民服务是统一的，是分不开的。一个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为民族、为祖国以及为人民的利益服务，那就是没有为党的利益服务，也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假如一个共产党人停止为党的利益服务，那么，他就不可能好好地为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要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服务，最好的和最完善的道路就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

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对于每一个非党的爱国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门时刻都是开着的，欢迎他加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有人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知道反对自己的政府。”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印度尼西亚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间的政府都是革命政府，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政府的忠诚保卫者，和政府一道反对荷兰帝国主义。如果印度尼西亚再建立起革命政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站到最前列来保卫这个政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反对的是不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服务反而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剥削利益和战争利益效劳的政府。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再执行损害民族利益的政策，不再为帝国主义的剥削利益和战争利益效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否随时准备停止反对政府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然是准备这样作的。在去年五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三十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曾经说过：“只要印度尼西亚政府是真诚地切实地执行和平政策并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随时准备停止反对它。”难道这不是说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准备同任何一个要为世界和平和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任何形式束缚而斗争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合作吗？对于韦洛坡内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表示愿意予以支持，只要这个内阁是执行基于和平民主的新政策。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世界和平

目前世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战争还是和平。斯大林同志一九五一年年初同《真理报》记者谈话的时候答复了这个问题：“在目前不能够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说：“苏联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政策”〔14〕。斯大林同志的谈话，准确地驳斥了战争挑拨者对苏联所进行的混淆视听的诬蔑。

人类的敌人说苏联企图用战争征服世界，而且还说在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者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是帮助苏联征服并统治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工具。

的确，目前世界大战仍然威胁着世界。但是准备挑起这一战争的，不是苏联，也不是人民民主国家。历史证明，发动第一次、第

二次这两次世界大战的，不是苏联；到处发动殖民战争的，也不是苏联。

誰发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呢？不是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诞生。发动战争的是那些企图争夺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誰发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不是苏联，是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则从旁慫恿。

誰制造目前在朝鲜、越南、马来亚等地激烈进行着的殖民战争呢？不是苏联，而是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印度尼西亚经历了两次殖民战争。在这两次殖民战争中，我們都没有见到过苏联红军或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么，誰对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了两次的殖民战争呢？不是苏联，是得到美、英帝国主义帮助的荷兰帝国主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美、英三国签订了旨在保障世界和平、保障战败的法西斯国家里的民主发展，保障各盟国之间的合作的雅尔塔协定、德黑兰宣言、波茨坦协定。联合国的成立更加巩固了原有的这些协定。

但是，我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和它的同谋者并没有遵守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签订的协定。美国不但没有保证日本、西德和意大利发展民主，反而复活了这三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并且还扶植了西班牙、土耳其等国的法西斯势力。在美国国内，帝国主义分子积极使国家制度法西斯化，拘捕和杀害民主人士。

同美国的侵略战争政策相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人民

民主陣营，坚决而又有原則地奉行和平政策。同資本主义制度相反，社会主义制度不需要殖民地，也不需要什么投資場所，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允許旨在追逐利潤的資本主义竞争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滿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和平的对外貿易。

共产党人认为，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社会主义要在一切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相反的，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却是非常可能的，尽管其他国家还存在着資本主义。这也就說明了，为什么政治、社会經濟制度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可能而且需要和平共处。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一貫願意同一切国家談判，并在不干涉別国内政的基础上，同它們进行合作和建立貿易关系。和平环境以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和貿易，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能够保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建設，是異常重要的。

由此可見，共产党人完全不需要战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也完全不需要苏联紅軍和中国人民解放軍来帮助他們在印度尼西亚实现自己的理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在內，只是需要和平，因为，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能够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深信，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如果各国人民将維持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保卫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

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是很强烈的。日本法西斯的占領和两次荷兰殖民战争的經驗使印度尼西亚人民更加深信为和平而斗争这一真理。这种和平精神使印度尼西亚人民近来极强烈

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的粗暴无理的政策，如表现为禁运、旧金山对日和約、共同安全法等，激起了印度尼西亚优秀儿女的强烈的反美情緒。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深信，人民爭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一定能够挫敗美国对战争的准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号召印度尼西亚的优秀儿女积极保卫崇高、光荣、神圣的和平理想。

上面所說的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目前的政策和斗争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我們今晚能够闡述这些問題，感到很高兴。如果在座各位响应我們剛才所提出的建立和加强民族統一战綫、保卫民主、保卫世界和平等呼吁，那么，我們就会感到更加高兴。这就是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的正确道路，人民的道路。我們深信，我們的这些呼吁是恰当地表达了人民自己的願望，因此，一定能够在我們今后的斗争中發揮强大的威力。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民族統一戰綫及其历史

这篇文章是专门为庆祝一九五二年“八·一七”独立纪念日而写的。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反动派正在誣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誣蔑民族統一戰綫的策略是“莫斯科的策略”，或者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将印度尼西亚置于外国統治之下的策略”。艾地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回击了这种誣蔑，同时指出民族統一戰綫的策略是符合客观的策略，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殖民統治早就已經采用的策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誕生前，就已經有过伊斯兰教联盟和急进同盟这种民族統一戰綫的組織形式。

始終坚定不移地实行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的正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是无可辯駁的事实了。文章向干部強調指出，在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时候，必須坚持不懈，耐心工作；同时也指出，只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民族統一戰綫才能强固。

民族統一戰綫的策略是符合客观的策略

一九五二年“八·一七”独立纪念日快要到来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二日发表声明，广泛号召各阶层人民本着友好和睦和充分負責的精神来庆祝一九五二年“八·一七”独立纪念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議，庆祝八·一七紀念日的事宜由一个庆祝委员会統一筹备，就是說，人民和政府共同举行庆祝。各党派和人民团体應該一致贊同建立

这一庆祝委员会，使这一委员会成为建立各党派和人民团体合作机构的开端，就像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纪念民族觉醒节时六十二个党派和人民团体签署的联合声明所要求的那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述声明是符合半世纪来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民族团结的愿望的，同时也是符合民主进步政党和人民团体的愿望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发表的这种易为人们接受、合乎情理和客观的声明，已经使各大城市（如雅加达、三宝壟、万隆、巨港、棉兰等地）和小地方的独立纪念日庆祝委员会都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选进了领导机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受到各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爱戴和欢迎并通过民主方式当选这一事实，对于不愿看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和不愿看到印度尼西亚民族团结的反动派是一个打击。反动派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大举逮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监禁或追緝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半年多，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为时不到一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又重新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因此反动派忿恨不已。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决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把反动派逼到角落里去。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派除了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挑衅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诬蔑和挑衅是反动派的惯技，但是，已经开始无法施展了。为了进行诬蔑和挑衅，他们这次又动员了他们在政府、报界及其他方面的一切力量，特别是在马斯友美党领导机构中的人物。

反动派工作重点是阻挠成立可能由一九五二年“八·一七”独立纪念日庆祝委员会产生出来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因为一旦组成了民族统一战线，荷兰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

政治、文化和军队的控制就会遭到打击。

反动派对民主进步阶层进行挑撥、恐吓，使他們不参加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的工作，反动派誹謗說：“民族統一战綫的策略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将印度尼西亚置于外国統治之下的策略。”凡是肯思索的人以及开始有政治觉悟的人民从这种誹謗中就可以洞察到誹謗者本身的心理状态，他們抱有很深的成見，不信任本民族的力量，离开了外国势力就无法思考和行动。

撇开反动派的其他誣蔑不談，他們所說的“民族統一战綫的策略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将印度尼西亚置于外国統治之下的策略”是真的嗎？关于这一点，讓我們客观地研究一下印度尼西亚民族本身的斗争历史吧。回顾一下历史，我們就可以知道，民族統一战綫的理論和策略是符合印度尼西亚民族爭取真正的民族独立斗争的客观要求与願望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执行的民族統一战綫的策略是符合客观的，是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的願望和要求的。因此，尽管障碍有多么大，尽管經常遭到挫折，民族統一战綫必将日益巩固，因为它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关于組織民族統一战綫的几点經驗

远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之前，印度尼西亚民族就进行过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的活动。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伊斯兰教联盟**，实质上是一个具有革命的綱領的民族統一战綫組織，尽管創始人原来可能并没有这种意图，而且它的名称本身也表明它是一个伊斯兰教团体。它最初仅仅是中小商人的組織，但是，接着迅速变为一个曾經一度拥有两百万盟員的群众組織，在这个組織中，除了商人

和农民之外，工人的影响极大，伊斯兰教联盟三宝瓏支部更是如此。同时，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也給了伊斯兰教联盟以革命的影响。

伊斯兰教联盟一九二一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在日惹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綱領，其中指出：“荷兰資本家占有生产資料又采用武力和强迫劳动等方式維持其地位，这是造成印度尼西亚工农业衰退、工农受凌辱的原因。伊斯兰教联盟认为資本主义破坏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必須用工农团体的力量来反对它。为此就需要取得各种政治权利。”

伊斯兰教联盟当时虽然存在着各种缺点，但是它仍旧是工人、农民、中小企业主反对荷兰帝国主义斗争的民族統一戰綫。这种民族統一戰綫性质一直保持到該盟一九二一年十月在泗水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紀律”的決議时为止。从那时起，其他政党的党员不能再参加这一組織。这个決議是由伊斯兰教联盟中的反动分子（哈吉阿古士·沙林等人）所强迫通过的，主要目的在于把左翼分子、工人和貧农清除出伊斯兰教联盟。这是反动派分裂民族統一戰綫，企图使共产党人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孤立起来的阴谋。但是，反动派企图孤立共产党人的阴谋并未得逞，因为当伊斯兰教联盟宣告破裂时有一大部分盟員随同革命的领导人退出了該盟。

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了一个名为“急进同盟”的民族統一戰綫組織，参加的有伊斯兰教联盟、至善社、英苏林德党、“巴巽丹”和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急进同盟”是各个政党和人民团体統一行动的机构，它要求荷屬东印度政府即速成立一个民选的議會，議会有制定法律和組織政府的充分权力，政府应对議會負責。

在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創議和伊斯兰教联盟党的支持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成立了一个名为**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的民族統一战綫組織。参加的除上述两个政党之外，还有至善社、“巴巽丹”、苏門答腊协会、巴达維亚人联合会、印度尼西亚讀書会等。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是一个民族統一行动机构，它要求取消不民主的殖民地法令，取消利辜流放地〔1〕，取消契約工人刑罰条例〔2〕，釋放政治犯，取消限制国家公務人員参加某些民族政党的禁令等。此外，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还努力从事民族教育和組織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全国性工会。該委员会把每一个不尊重印度尼西亚大团结的人都看作是印度尼西亚的敌人。为了建立更广泛的民族統一战綫，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底召开了**大印度尼西亚全国代表大会**，不是該委员会成員的人民团体也参加了大会。

各个政党和人民团体在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这一民族統一战綫組織中的良好合作，終因民族主义派（主要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印度尼西亚讀書会）同伊斯兰教派在一些問題上（如关于印度尼西亚国家銀行的利率問題、童婚問題、一夫一妻制問題，等等）的冲突而破裂，伊斯兰教联盟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退出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但是，无論如何，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已經帮助印度尼西亚各个政党和人民团体加强了它們之間的团结精神。

一九三九年五月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它是一切要求在印度尼西亚成立議会的政党的統一战綫組織。参加的有大印度尼西亚党、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巴巽丹”、米納哈沙联合会、

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党，后来还有印度尼西亚天主教政治联合会等。該联盟組織秘书处领导日常工作，第一届秘书处由下列数人組成：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代表**阿比古斯諾**（秘书长），大印度尼西亚党代表**譚林**（司庫），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代表**阿米尔·沙利弗丁法学士**（秘书）。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在雅加达召开**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非政党性的团体（工会及其他社会团体）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的首要議程是“在印度尼西亚成立議會”。一九四一年九月参加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个組織（即不限于政党）的领导人举行代表會議，决定将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會議**作为代表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机构，宗旨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爭取人民的幸福和荣誉。虽然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會議願意同荷兰合作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进攻，但是荷兰方面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投降日本为止，始終不願意理会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良好願望〔3〕。

由此可見，从荷兰殖民統治时期起，統一戰綫的策略就成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反对殖民統治的策略。因此就不能够把这种策略說成是“莫斯科的策略”或者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将印度尼西亚置于外国統治之下的策略”。是否有人会因为已故的**哈·奧·斯·卓哥罗阿米諾多**曾經建立了实际上是民族統一戰綫組織的巨大的伊斯兰教联盟就把他說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呢？是否有人会把参加急进同盟的伊斯兰教联盟、至善社、英苏林德党、“巴巽丹”等等团体的领导人都叫做“莫斯科的代理人”？或者是否有人会因为**苏加諾工学士**、**夏布丁·拉迪夫**、**古苏莫·烏多約**、**奧多·苏布拉打**、**譚林**等人曾經参加过名为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

体协商委员会的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机构就把他们叫做“莫斯科的代理人”呢？是否有人会因为沙多诺法学士、苏加佐·维利约柏拉诺多、阿·卡·干尼等人曾经领导过名为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会议的统一战线组织就把他们叫做“莫斯科的代理人”呢？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驳倒了反动派制造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将印度尼西亚置于外国统治之下的策略”的诽谤。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策略。只有那些不感到自己是和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斗争站在一道的人才会支持上述具有分裂性质的诽谤。

不错，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会议之类的统一战线组织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荷兰将印度尼西亚交给日本之后，没有能力进行反抗日本的斗争，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在反抗日本的斗争中没有采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各政党成员间的地下合作，以及他们跟无党派人士的地下合作都曾经出现过。独立印度尼西亚运动、印度尼西亚青年协会、印度尼西亚新青年联合会等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就是这样组成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独立宣言首先就是在这些统一战线组织的推动下诞生的。

因此，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显然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这个策略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有着强有力的基础。印度尼西亚社会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等阶级和阶层，他们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损害，因此都要求解放。为此，这些阶级和阶层，或者是有它们参加在内的政党和团体，就必须团结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就是印度尼西

亞人民自己的經驗，這也是我們從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經驗中吸取的教訓。基·哈查爾·德宛達拉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紀念民族覺醒節的演講中說得對：“從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日開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的人民運動充滿着**團結一致就勝利、四分五裂就失敗**的實例。”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始終堅決 實行民族統一戰綫的策略

因此，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一貫熱烈響應並積極參加任何一項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活動，只要這些活動確實是符合客觀需要，而且是在為祖國和民族利益服務的**真誠願望**推動下進行的。早在三十二年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建立的時候，它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便是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雖然在一九二六年起義後便不得不轉入地下活動，可是，沒有被捕的共產黨人都儘可能設法在工廠、城鎮和農村建立“**團結委員會**”作為群眾運動的核心。一九三二年七月制訂的作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地下工作準則的十八條綱領，就是一個爭取印度尼西亞獨立和世界和平的全國性綱領。制訂這十八條綱領的時候，納粹黨人在德國很得勢，戰爭危險日見增長，保衛和平成為當時的主要鬥爭。這十八條綱領提出的一些要求是：爭取印度尼西亞的完全獨立、完全脫離荷蘭，釋放一切被拘禁和流放的政治犯、取消利辜流放地，保證廣泛的民主權利，宣布國家給資本家的貸款為非法的，每日工作最長八小時、實行適當的社會保險制度，同工同酬，反對降低工資、要求增加工資，每星期休息一天工資照付，發放失業救濟金，掃除文盲、實行義

务技术教育,取消一切强制性的契約,廢除无偿的强迫劳动和农村劳役,分配土地給农民,取消貧苦人民一切未付的稅款,取消农民欠高利貸者的債務,反对帮助对苏联和中国解放区(当时叫做中国苏区)所进行的干涉战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之后热烈响应并积极参加在日惹成立的**民族同盟**(4),参加签署**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的联合声明**(5),参加制訂并签署二十个政党和人民团体的中央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一致通过的**民族綱領**,积极参加一九五一年三月成立的联合了大部分政党和人民团体的**政党协商會議**,贊成并签署**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的联合声明**。

上面已經說过,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的每一种活动都碰到不少障碍。民族同盟、政党协商會議、“急进同盟”、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等等都碰到种种障碍。这并不奇怪,反动派当然只能这样做,因为民族統一战綫力量增强,反动派就会遭到人民运动的更猛烈的打击,民族統一战綫加强了,帝国主义的地位就更加动搖,以致最后总崩潰。

在建立民族統一战綫工作方面,我們經常碰到我們党的这样的干部,他們經常兴致勃勃地向我們汇报已經在同其他党派或者团体簽訂紙上的合作方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是,他們这种高兴往往維持不了多久,有时甚至变成失望,流露出絕望情緒,因为原先那种完美的紙上方案不能見諸实践。其他党派和团体在合作中很缺乏认真的努力,开起会来許多人迟到,工作的分配也不能順利地进行。缺乏毅力的干部一碰到这种情况,他們对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的信心就发生动搖,他們还不适当地归咎于反动派的破坏。

必須想更多的办法繼續加强 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础

我們对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可能性和工作方法深入思考还很不夠。因此，每当同其他党派、团体开过會議之后，我們就應該馬上深入地討論我們的錯誤和缺点問題，探討今后工作的可能性和方式方法；同时也應該总结过去的經驗，从中吸取教訓。这样，我們就能够变失敗为成功之母。

每一个共产党人还应该認識到，一切事物都有其基础，基础不强固，便站不住脚，也不能持久。民族統一戰綫也是这样。如果基础不强固，民族統一戰綫就不能够站稳脚跟，也不能够持久。我們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础是什么呢？**我們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中人数最多和最受压迫的农民的紧密团结。**如果这种团结巩固，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正确，那就肯定能够保证民族統一戰綫坚强有力。民族統一戰綫坚强有力，反过来又能够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团结更加紧密，这也就使共产党更加强大，更加有力量。“急进同盟”、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民族同盟和政党协商會議等的弱点就在于这些民族統一戰綫組織还没有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紧密团结作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在不断爭取同各民主进步阶层、党派、团体建立合作关系的时候，一刻也不应该忘記加强我們的基础，加强我們的基地，也就是加强在政治上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紧密团结。特别是在碰到障碍和遭到挫折的时候，我們更应该記住这一点。

国内出现了自圆桌会议以来 未曾有过的大好形势

这是迪·努·艾地同志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荷兰共产党代表大会动身出国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欢送晚会上的讲话。

当时右翼社会党人和馬斯友美党的头子們把埃及納吉布的那套做法和口号照搬过来，进行了各种肆无忌惮的尝试，以图扼杀印度尼西亚的民主。但是，正如艾地同志所强调指出的，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迥然不同，我們人民的民主力量比法西斯力量更强大，所以他們所有的尝试都被粉碎了，而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力量却日益团结、强大和警惕起来。

大家知道，約多同志和我將暂时离开各位同志和各位兄弟。我們两人接受党的领导交給我們的任务，出国参加外国兄弟党代表大会。在我們动身之前，我觉得有责任跟各位同志和兄弟讲几句话。

党的政治局决定派遣党的领导人参加外国兄弟党的代表大会，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¹⁾。自从一九二六年起义失败以来，我們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就很少了。从那个时候起，直接交流經驗可以說是沒有进行过。当然，我們和兄弟党取得联系的目的不外是为了交流經驗。外国共产党的經驗對我們进行反对共同敌人，即反对現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

爭，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外国經驗都适合于我国的情况，而我們的任务正是要批判地选择那些对我国斗爭是宝贵的和有用的經驗。

尤其重要的是与荷兰共产党交流經驗，这是因为我們和荷兰人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荷兰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头号敌人，那就是荷兰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我說荷兰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是我們的头号敌人，那是因为荷兰帝国主义者仍然死賴在我国。情况所以如此，是因为罪恶的圆桌会议协定恢复了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荷兰帝国主义者对印度尼西亚的控制。

荷兰帝国主义者是头号敌人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荷兰帝国主义者的控制仍然可以使人深深感受到，而且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在**經濟**方面，我們知道，荷兰帝国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仍然拥有为数最大的投資，仍然控制着农場、銀行、矿場和工业等重要經濟部門。

在**軍事**方面，荷兰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在武装部队中仍然大量存在着；荷兰帝国主义者派駐了最具有危險性并最为印度尼西亚士兵和人民所痛恨的荷兰軍事代表团⁽²⁾；荷兰帝国主义者有像斯密特、波士等等荷兰人指揮的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之类的恐怖武装；荷兰帝国主义者在西伊里安仍然駐有强大的軍队，一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被认为損害到荷兰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时，这些軍队就随时会被派来进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在**政治**方面，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公務人員中仍然有

荷兰帝国主义者的人，这些人是殖民地官员，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中的地位是受到圆桌会议协定的保障的；此外，曾经数次控制印度尼西亚内阁的右翼社会党人，又是荷兰帝国主义者不折不扣的政治代理人。右翼社会党人在维护荷兰利益方面所充当的角色，我们从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对各项重要的民族的问题所执行的政策，例如他们对西伊里安、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荷兰军事代表团等问题采取的政策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些政策实质上是与荷兰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相一致的。此外，从右翼社会党人在最近企图解散议会的勾当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要求驱逐荷兰军事代表团，要求将帝国主义者的重要企业如熾布和北苏門答腊的油矿收归国有⁽³⁾的正是这个议会。

在文化方面，荷兰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教育政策还没有进行过原则性的改革，实际上仍是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印度尼西亚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文化和哲学方面仍然是面向西欧，首先是面向荷兰，而右翼社会党人尤其是持这种观点的急先锋。圆桌会议协定中的所谓印度尼西亚荷兰文化合作，实质上只不过是荷兰为了保持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特别是对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在文化和哲学上的影响的图谋罢了。

右翼社会党人是荷兰帝国主义者的 政治代理人

由上可见，荷兰帝国主义者依然盘踞在各个方面。荷兰帝国主义者仍然是留在我们家里的敌人，所以，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要是没有印度尼**

西亚人自己去充当荷兰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他们就不能控制印度尼西亚。而充当荷兰帝国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的走狗这一角色的首先是右翼社会党人，是沙里尔之流和他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他们最近竟恬不知耻地恣意攻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在八·一七人民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这一撮人狡猾地恢复了荷兰帝国主义者的地位，他们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政治宣言——即承认和保护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荷兰帝国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的财产的声明——发表时起就明目张胆地这样做，这已经不是一件什么秘密的事了。十·一七政变〔4〕是这一撮人为了维护他们的买办地位及为了维护他们的主子荷兰帝国主义者的地位而采取的一次行动，这也不是一件什么秘密的事了。

民主力量击败法西斯主义

人民中间的民主力量的壮大，迫使议会谴责了右翼社会党人卑鄙龌龊的贪污行为，并且迫使议会作出了旨在削弱并最后彻底消灭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势力的若干决议。这种形势使荷兰帝国主义者和右翼社会党人疯狂起来，他们无视印度尼西亚存在着的客观因素，竟然进行冒险，搬用埃及的纳吉布的做法〔5〕。他们以“解散议会”、“消灭贪污”、“清洗各政党内部”等等口号来欺骗人民。他们这班人愚蠢无知，不知道他们所要欺骗的人民已经有了足够的觉悟，并且知道从事贪污的正是他们这些人，必须加以清算的也正是他们的那个党。他们忽视了埃及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在客观和主观因素方面所存在着的巨大差别，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存在着的差别。他们这些充当美国、荷兰和英国

傀儡的人，忽視了并且也不去估計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力量。他們沒有看到印度尼西亚人民最近几年来所經歷的巨大变化。他們死抱着陈旧过时的想法，还以为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印度尼西亚人民一样。

自从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以来，从未有过像当前这么有利于民主力量发展的国内形势。荷兰、英国帝国主义者通过他們的走狗右翼社会党人在今年十月十七日所发动的政变的失敗，使我們国内力量的对比明朗化，使我們弄清楚了誰是民主的敌人、誰是民主的朋友，弄清楚了誰是真正的独立战士、誰是独立的敌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敌人。这次政变的失敗使我們可以肯定：当前民主力量已經远比正在破产的法西斯力量强大得多。这种形势使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有了迅速向前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最近的确表現得非常明显。右翼社会党人发动政变失敗，他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雨后春笋一般，全国各地出現了統一行动，人民发表了联合声明，譴責这次罪恶的政变嘗試，一心一德，决心保卫民主。民主的敌人的队伍已日益分崩离析，他們的党也四分五裂，而民主力量却日益团結，日益壮大。

对恫吓和挑衅保持警惕

正像我們在所有资产階級国家中所看到的事实那样，右翼社会党人和反革命分子在处于困境的时候，全都会采用非常恶毒的方法，他們进行各种恫吓和挑衅。是的，是恫吓和挑衅！我們在十月十七日看到的就是这种恫吓的詭計，这以后他們还繼續不断地施用这种詭計，企图使人民变得惊惶失措，并且指望由此发生輕率

的行動。

每一個民主主義者，特別是每一個共產黨人的責任是，不為反動派虛張聲勢的恐嚇所吓倒，不為他們的威脅所吓倒。每一個民主主義者，特別是每一個共產黨人的責任是，不要輕率採取行動，而要始終是實事求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採取行動，以免在反動派挑釁時上當。

我相信，要是我們民主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不為反動派的恫吓所吓倒，不掉進他們挑釁的陷阱，那麼，民主的勝利就會更迅速地到來，就會更大。印度尼西亞人民過去的英勇鬥爭經驗，各民主黨派之間、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宗教界同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正直的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的真誠合作，是民主必然擊敗法西斯取得勝利的基本保證。唯有這種民族統一戰綫的力量，才是粉碎法西斯分子的罪惡陰謀活動的唯一力量，不管它們是右翼社會黨法西斯分子、是蘇基曼的馬斯友誼黨法西斯分子，還是其他什麼法西斯分子的罪惡陰謀活動。

各位同志，各位兄弟，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形勢，簡單地說就是如此。我和約多同志就是這樣理解當前形勢，並且抱着這樣的信心暫時離開同志們和各位兄弟的。要是同社會歷史的進程比較起來，我們離別的時間是非常短暫的。

我們親愛的黨給了我們兩人莫大的榮譽，派遣我們代表黨出國。我們保證很好地完成黨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這次出國也是為了加強我們國內的民主運動和平運動，從而也是為了加強全世界的民主與和平運動。

同志們，再見！

民族光荣和民族意識

这篇文章是为紀念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日民族觉醒节四十五周年而写的。文章严正地駁斥了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誣蔑。反动派誣蔑共产党人“背棄民族利益”，但事实证明“背棄民族利益”的正好就是反动派。反动派散播世界主义，以此来竭力抹杀我們民族偉大的精神和实质。

艾地同志着重指出，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好儿女，都应该成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真正的爱国主义同資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相反。真正的爱国主义非常尊重世界上各民族的平等地位，珍惜各民族間的友誼。所以，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是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結合在一起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同資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相对立的。

文章指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历史，是我們民族解放斗争的偉大力量的源泉，是爱国主义思想永不干涸的源泉。我們对人民斗争的满腔热情和赤胆忠誠是以我們对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深入了解作为强固基础的。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贯要求干部和党员有系統地深入研究印度尼西亚民族及其斗争的历史，研究印度尼西亚的經濟史和文化史。

民族觉醒节后的第三天，在庆祝党成立三十三周年的干部大会上，艾地同志发表了题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演說，再次強調共产党人忠于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的重要性。他說：“爱国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銳利的武器，是反对諸如世界主义或右翼社会党人式的‘国际主义’等帝国主义思想的銳利的武器。”因此，共产党人也有責任教育人民，使他們“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去热爱祖国，热爱我們的大好河山，因为对我們的祖国

和大好河山的熱愛里面，也就包含着對爭取擺脫一切壓迫的勞動人民的熱愛”。

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日是印度尼西亞民族和人民的鬥爭發展中富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就在這一天，我們民族在英明能干的**瓦喜丁·蘇第羅·胡梭多**醫生的率領下，開始建立印度尼西亞民族的有進步思想作指導的現代組織。這件事是很自然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要求印度尼西亞人民必須用新的方式來組織反抗殖民主義的力量。

近來，進步的印度尼西亞兒女在每年的五月二十日都舉行紀念，這是很好的事情。只有某些政黨，一小撮反動頭子，特別是那些自稱為世界主義者、宇宙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人，才頑固地拒絕參加紀念這個富有歷史意義的日子。

紀念富有歷史意義的日子，紀念和尊崇民族英雄和偉人，就是發揚我們民族數世紀來世代相傳的愛國主義精神，即**對祖國、對本民族的人民、語言、文化、文學和優良傳統無比熱愛的精神**。愛國主義是爭取民族獨立鬥爭重要的力量源泉。

對於經歷了幾百年殖民主義統治的印度尼西亞民族，特別是在目前荷蘭和美國帝國主義大力派遣他們思想戰綫上的走卒，到處散發宣傳危害性極大的世界主義思想並含有毒素的讀物的時候，不斷地激勵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就更是十分重要了。

世界主義是資產階級國際陰謀集團的思想表現。世界主義培植不要民族的意識，否認祖國的存在，似乎人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感到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似乎某一民族和某一國家的成員改為世界公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國際社會主義者（右翼社會主義者）所宣傳和培植的也就是這種世界主義精神。

资本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和读物来培植世界主义精神，削弱他们所要统治的人民的民族意识。一个民族意识薄弱的民族就容易接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不加批判地接受外国的文化和风俗，把民族的独立、自由、主权和生活一概抛弃。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有些集团不愿意纪念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不愿意纪念和尊崇民族的英雄和伟人的原由。有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参加一些纪念活动，在形式上敷衍一番，当然对发扬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活动也就毫无意义。的确，有的时候，他们也装模作样纪念一通，但目的却在于取消纪念活动的伟大的民族内容和实质。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右翼社会主义分子及其他帝国主义代理人（其中包括马斯友美党的领导阶层），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公开拒绝参加几乎为所有政党和广大的人民团体所一致拥护的民族觉醒节纪念委员会。

但是反动派失望了，而且他们会永远失望下去！从我们英勇的民族斗争历史来看，可以肯定，叛徒和反动派压制印度尼西亚人民爱国精神是不会成功的。近来我们经常纪念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纪念我们的英雄和伟人，每次纪念过后，我们的精力更加充沛，我们的热情更加洋溢，这就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加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伟大力量，保证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

历史证明了，我们民族并不是一个老不长进、懦弱无能的民族，而且完全不是没有进取精神，没有创造力、没有勇气，心甘情愿地承受加在其肩上的各种殖民负担的民族。

历史教导我们，在十世纪有达尔玛旺沙。达尔玛旺沙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文学家、语文学家和法律学家。他也是一

个外交家，他的英明措施使印度尼西亚同偉大的和有高度文化的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历史教导我們，十三世紀室利佛逝时代出了一个德芒·勒巴尔·达温。他是一位能干的首相，并且是一个民主分子。他反对按照印度教教义区分种姓，在政府中进行多少带有民主色彩的改革。德芒·勒巴尔·达温的偉大可以同麻喏巴歇时代的卡查·馬达相比拟。如果我們认为卡查·馬达具有統一全印度尼西亚的崇高理想的話，那么，德芒·勒巴尔·达温却具有使政府制度民主化的崇高理想。

历史教导我們，十四世紀麻喏巴歇时代出了一个卡查·馬达，他毕生致力于統一印度尼西亚的事业，名聞全国，远至国外。卡查·馬达的偉大可以同馬來亚的英雄杭·杜阿將軍媲美。

历史教导我們，十七世紀有特魯諾·佐約，他是我們祖国勇敢的英雄，他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反对荷兰殖民者和以馬打藍的阿芒古拉特一世为首的民族叛徒。

我們祖国这几位偉人体現了我們民族的偉大。我們應該学习的是，他們的偉大抱負，英明治国，为政府制度民主化、为国家的統一，为使国家从外国殖民者和民族叛徒的統治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

此外，伊瑪目·朋佐、巴第慕拉、第博·尼哥罗、苏丹·哈沙努丁、西·兴阿·芒阿拉查、德古·烏馬尔、拉登·阿正·卡尔蒂妮、波林將軍、瓦喜丁·苏第罗·胡梭多医生、阿卜杜尔·利怀博士、吉多曼貢古苏莫、苏第尔曼將軍、阿米尔·沙利弗丁、慕梭、蒙因西第及其他許多人的无畏精神、英雄气概和光榮偉大也給我們民族的历史增添了光榮。印度尼西亚民族也产生了**朗哥哇尔西多**和**威**

廉·伊斯干达尔这样的偉大学者，产生了拉登·沙勒和拉登·阿卜杜拉这样的偉大画家，产生了苏布拉曼和哥尼尔·西曼絨达这样的作曲家，产生了惨遭日本法西斯杀害的細菌学专家、医学博士莫赫达尔教授和瘧疾病专家苏西洛博士这样的大科学家。

我們的英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表现了对祖国、对人民、对我們民族的文化和优良傳統的无比热爱。我們的英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就是最明显的证据，证明印度尼西亚民族是偉大而富有創造性的民族，并不是奴隶成性的民族，印度尼西亚民族不是可以随意让这一个殖民主义者移交給另一个殖民主义者，可以从荷兰殖民主义者移交給日本殖民主义者，移交給英国或美国殖民主义者的民族。我們是心地善良的民族，也是一貫坚决殊死进行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斗争的民族。

继承我們民族的英雄和偉人的无畏精神、英雄气概、光荣偉大，继承我們民族和人民的革命傳統和优良傳統，是每一个作为最优秀的印度尼西亚儿女的共产党人的义务。

印度尼西亚人民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了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各种斗争，进行了英勇的一九二六年起义，进行了一九三三年七省号軍舰起义⁽¹⁾，进行了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进行了反对一九四八年茉莉芬挑衅事件的斗争，进行了反对企图把印度尼西亚及其人民全部交給美国的苏基曼先生的一九五一年八月大逮捕事件的斗争，进行了反对企图把印度尼西亚及其人民全部交給英、荷帝国主义的右翼社会党人策划的一九五二年“十·一七”政变的斗争。

我們为拥有自己的英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而感到光荣。这是一种自然的、純洁的、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的民族光荣感，同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絲毫沒有关系。我們的民族光荣感产生了高度的

民族意識，产生了健康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沙文主义却是自私自利思想，是資本家的掠夺欲望在思想意識形态上的表現。我們的爱国主义同自私自利的、排外的、具有民族偏見的、狹隘的、閉关自守的、宗派主义的、孤立主义的和地方主义的資產階級沙文主义不仅有区别，而且是完全对立的。

我們不仅應該為我們的英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而感到光荣，而且也應該為我們的国歌和国旗而感到光荣。每一个优秀的印度尼西亚儿女，特别是共产党人，應該為我們的国歌和国旗而感到光荣。我們怀着对国歌和国旗的尊敬，經歷了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斗争的不同阶段。我們本着对国歌和国旗的赤誠，多次取得了胜利，我們还要以火热的精神保卫和維護国歌和国旗的尊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时期，革命战士或者手執紅白旗壮烈牺牲，或者唱着《大印度尼西亚》国歌咽下最后一口气，这种事迹是不胜枚举的。

我們統一的語言——印度尼西亚語在我們的民族独立斗争中曾經而且正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朴素美丽的語言，除了在团結各族人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外，在发展我們的文学和用我們的語言来傳播科学这一方面也是有光明的前途的。印度尼西亚語的前途必然更加光明美好，因为这种語言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这就是說，它容易学会，别的民族学起来也不难。我們必須把对印度尼西亚語的光荣感化为动力去钻研它，使它更加完善，使它能够完滿地表达最崇高、最深刻、最广泛的感情和思想。

我們對我們的英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国歌、国旗、統一的語言、文学、舞蹈、音乐——总之，我們的民族文化——，對我們的島嶼、山脉、河流、湖泊、植物、动物——总之，我們国家的自然界——

而感到的光荣和发生热爱，一点也不会减少我们对全世界人类的热爱。相反地，这加强我们同其他民族团结的愿望。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尊重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友谊，同时并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在我国实现而奋斗。

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右翼社会党人和一般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对立的。同样，我们的爱国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也是对立的。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同真正的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当我们成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的忠实的勤务员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而只有当我们为争取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友谊而奋斗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反动派喜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喜欢作出使人迷惑的解释，并从我们英雄的英勇事迹中，从我们的学者和艺术家的优美创作中，从我们的国歌和国旗中，从我们的锦绣河山和天然财富中谋求个人的私利。因此对反动派，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战线上的走卒，我们必须小心。

反动派恬不知耻，手里拿着国旗，嘴上唱着国歌，但是却干出最卑鄙的反民族的勾当，同帝国主义订立卖国条约，进行挑衅活动，发动大规模的逮捕事件和政变，拘捕和屠杀爱国者和人民，监禁工人和农民的领导人，压制民族舆论，惩罚正直的记者，这些都是我们国内经常发生的。

每个爱国者，首先是每个共产党党员的任务是，维护我们民族的英雄、伟人、国歌、国旗、统一的语言、文化、传统、锦绣河山、天然财富，使这一切不致因罪恶的目的而被玷污和被利用，因为这是我们民族光荣和民族意识所不允许的。

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

这是艾地同志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晚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三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艾地同志在这次讲话中列举了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史上重要里程碑的事件，指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印度尼西亚的道路。这次讲话的要点后来被归纳到一九五三年十月初中央委员会全体会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草案当中，而这一草案又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为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

首先，我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向欣然前来参加今晚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三周年庆祝会的朋友们和同志们表示感谢。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向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的进步的知名人士致敬，因为你们所代表的各界人民，在当前的斗争中，在为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在为争取民主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总之，在为争取实现新印度尼西亚和新世界的斗争中，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精神。由于你们的斗争，由于全体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胜利曙光在望，我们已经愈来愈接近胜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在这个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内容是阐述关于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几点总结。我的讲话的题目是《印度尼

西亚人民为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或者简称为《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

前 言

我国是亚洲地广人多的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是由许多大小岛屿组成，面积一百九十万零四千平方公里，现有人口约八千万。它联接着亚洲和澳洲，联接着印度洋和太平洋。因此，印度尼西亚在广大的国际关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一六〇二年荷兰商人建立了一个商业公司，名为东印度公司〔1〕。东印度公司就从这个时候起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开始进行的殖民和开拓活动，后来在十八世纪末正式由荷兰政府接手干下去。

在荷兰的殖民统治下，印度尼西亚人民遭受两种非常严重的压迫，外有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国内有地主的压迫。本国地主成了外国资本家的忠实助手。荷兰及其他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把印度尼西亚变为它们的原料供给地、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外国资本投资场所。大地主拥有对土地的垄断权，以致用自己的汗水浇灌了土地的印度尼西亚大多数农民缺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这种情况使印度尼西亚农民处于被地主奴役的地位。

印度尼西亚在世界生产中占着巨大的比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数字说明印度尼西亚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如下：胡椒占百分之九十二，奎宁占百分之九十一，木棉占百分之七十七，橡胶占百分之四十，椰干占百分之三十一，可可占百分之二十九，龙

舌兰占百分之二十五，棕櫚油占百分之二十五，糖占百分之二十五，茶叶占百分之十九，烟草占百分之五，石油占百分之十，铁矾土占百分之八，咖啡占百分之五，錫占百分之十八。

印度尼西亚虽然物产丰富，人民刻苦耐劳，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却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一样的贫苦。根据荷兰殖民政府一九四一年的统计，印度尼西亚国民收入的分配如下：仅占全印度尼西亚人口总数百分之零点四的欧洲人就占了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占印度尼西亚人口总数百分之二点二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外的亚洲人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而占全印度尼西亚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印度尼西亚人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还不到百分之十五。

印度尼西亚人民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疾病，如瘧疾、结核病、霍乱、痢疾、伤寒等等。虽然印度尼西亚出产的奎宁占世界总产量百分之九十一，但瘧疾却仍是印度尼西亚人主要的疾病。

在教育方面，印度尼西亚人民也很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印度尼西亚大学各科的学生只有一千名左右，其中印度尼西亚人约占百分之五十，余下来的就是欧洲人和其他亚洲人。小学生只有两百万名左右，而学龄儿童则约有一千万名。能读能写的仅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七。

印度尼西亚人民奋起反抗殖民主义者

荷兰殖民主义者惨无人道的沉重压迫，激起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强烈的反抗。

在多次的激烈反抗斗争中，有一八一七年**巴第慕拉**所领导的**馬魯古**战争，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〇年**第博·尼哥罗**所领导的**爪哇**战争，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九年**伊瑪目·朋佐**所领导的**米南加保**战争，以及在**馬达**地区和**巴厘**、**龙目**、**苏拉威西**等岛屿发生的战争。而**亚齐**则经过了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四十多年的战争才被荷兰所统治。这些事实证明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为独立而斗争中是多么坚强，多么富有战斗性，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爱国主义品质是多么崇高。印度尼西亚人民抗荷爱国战争的失败，并非由于人民的反抗不够激烈，也不是由于人民缺乏勇气或者是他们的领导人和指挥官缺乏才略，而是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没有革命的阶级的领导，同时也是由于荷兰拥有更多的现代化武器。

一九〇五年俄国爆发了由列宁和斯大林所领导的革命。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唤醒了被压迫的人民，它不仅给了俄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也给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不少的經驗教訓。对于这次革命，列宁曾这样说过：“**世界资本主义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彻底唤醒了亚洲。**”〔2〕

印度尼西亚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也奋起，組織起来，进行战斗。

一九〇五年铁路工人成立了第一个工会，名为**国营铁路职工会**〔3〕。一九〇八年，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开始組織起来，成立了“**至善社**”，这个团体起初纯粹是一个文化团体，后来变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政治組織。留荷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也組織了“**东印度协会**”，一九一三年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协会**”〔4〕，这是一个政治色彩鮮明、争取印度尼西亚独立的团体。

一九一一年，印度尼西亚商人成立了**伊斯兰教商业联合会**，一

九一二年改名为“**伊斯兰教联盟**”，用以对付外国商人和维护印度尼西亚商人的利益。“伊斯兰教联盟”后来成为巨大的群众组织，参加的不只是商人，同时还有几十万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它执行直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政策。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在印度尼西亚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它团结了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它开始研究并在印度尼西亚传播马克思主义。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对“伊斯兰教联盟”起着巨大的影响，在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努力之下，各种工会也组织起来了。

偉大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对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它对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影响更大，这种影响通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的传播，深入到各个工会、知识分子以至参加“伊斯兰教联盟”的数十万工农群众中间去。“伊斯兰教联盟”中的革命派后来还自称为“**红色伊斯兰教联盟**”。

在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革命的领导人建议之下，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名称一致。因此五月二十三日就成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生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5〕。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在殖民主义资本的利润不断上升、而工人的生活则不断迅速下降的情况下成立的。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旗帜下进行的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统治的斗争，一般说来，发展很快。

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方面的不安，殖民政府竭力设法阻挠并粉碎革命运动。荷兰殖民政府采取了通缉、逮捕、流放、驱逐出境等措施来对付革命领导人。反动派

派遣了他們的代理人混进人民团体，从事挑衅，从内部制造分裂。他們严格檢查革命的出版物，一再取締人民团体，采用恐怖手段迫害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人民团体虽然一再被取締，却仍一再崛起。殖民地秘密警察繼續不断地制造挑衅事件，以便搞垮那些在群众中已有相当影响的人民团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时犯了过左的毛病，所以反动派的挑衅阴谋才能够得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种过左的毛病，曾經受到斯大林同志的批評。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对东方民族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中說：“爪哇的共产党人似乎有这种傾向，他們在不久以前錯誤地提出了在本国建立苏維埃政权的口号。这是一种左的傾向，它包藏着脱离群众，使共产党变成宗派的危險。同这种傾向作坚决斗争是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屬国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的必要条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认为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批評，直到目前仍然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也是极有价值的。

殖民地政府的恐怖活动，在镇压一九二六年底至一九二七年初的人民起义〔6〕时，达到了頂点。那个时候，印度尼西亚人民痛苦不堪，加上殖民統治者的挑衅，終于爆发了自发性的起义。起义发生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便設法去进行领导。在几个月的時間內，殖民政府把起义全部镇压下去。一万三千人被捕，其中四千五百人被判处徒刑、被監禁或被处死。另外有一千三百人被放逐到以瘴疾猖獗著称的流放地——伊里安的上利率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流放地回来的大多数人，由于健康情况极为恶劣，无法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事实证明，由于共产党人英勇地起来领导了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人民中間享有良好的声誉。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起义发生后，殖民政府便宣布禁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活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由于损失了很多干部，所以在地下活动中没有能够迅速地积蓄力量。殖民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打击是粉碎整个民族独立运动的开端。一九二七年虽然成立了同样是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但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起义失败之后，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便开始进入低潮。这表现在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也被殖民政府解散。

但是独立运动进入低潮的时期是短暂的。就像晴天霹靂一样，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至五日爆发了英勇的“**七省号**”军舰船员的起义⁽⁷⁾，这次起义是民族独立运动又开始走向高潮的信号。

一九三五年，在自国外秘密返回印度尼西亚的慕梭同志⁽⁸⁾的推动之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重新秘密地聚集了自己的力量。在重新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人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了公开的人民组织，名为“**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这个组织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争取印度尼西亚在政治上、社会经济上的独立。当时日本法西斯主义威胁着世界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是唯一公开提出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政党。

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的成立给了民族独立运动以新的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在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及其他民主政党倡议之下组成了“**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这是要求在印度尼西亚设立议会的各个政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团结了印度尼西亚一切重要的政党。在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的倡议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召开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成立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会议**，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己

发起组织的代表机构，宗旨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争取人民的幸福和荣誉。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会议公开表示愿意同荷兰政府合作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但是，荷兰方面直到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投降日本〔9〕为止并没有接受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要求。荷兰帝国主义就是这样把完全没有武装的印度尼西亚人民交给日本法西斯主义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和民族叛徒的活动

日本占领时期，活动更加受到限制。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包括领导干部在内，被日本人逮捕和监禁，其中有不少是被杀害了。日本人企图利用附敌分子来组织各种民众团体，可是，都受到抵制，不能按照日本的意图进行活动。

日本人成立了军事性和半军事性的组织，驱使印度尼西亚青年为日本的战争服务。有不少印度尼西亚青年被派到前线，死在那里。但是也有不少爱国分子参加日本傀儡军，是为了利用机会接受军事训练并从日本人手中夺取武器，以待时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日本人因多次惨败，所以对印度尼西亚人民采取更残酷的措施。他们加紧驱使人民充当“劳务者”〔10〕，用武力威胁农民按照他们规定的价格出售谷子和牲畜。印度尼西亚“劳务者”死于国外的，将近二百万人。这些“劳务者”死于国外一事，使我们忘不了穆罕默德·哈达硕士带头积极动员“劳务者”出国的那个机构〔11〕。这一切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有些地方的农民和“劳务者”发起了抵制活动并进行武装反抗。

印度尼西亚人民因被迫参加日軍輔助部队在前綫陣亡的，或因在印度尼西亚或国外从事强迫劳役折磨死的，約有五百万人。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來說，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訓，印度尼西亚人民因之对战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是深恶痛絕的。

苦难和侮辱普遍地落到各阶层人民的身上，落到工人、农民、知識分子、青年、学生、手工业主和商人的身上，使得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結起来。

当日本法西斯主义遭到了英勇的苏联軍队沉重的打击，它在滿洲的主力被粉碎（这是使它投降的主要原因）的时候，印度尼西亚人民知道争取解放的时机已經到来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从好些欧洲国家在苏联軍队决定性的帮助下解放自己的范例中，从英勇的中国人民的范例中，学到了宝贵的經驗。印度尼西亚人民，首先是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同那些在日本占領时期多少經歷过革命工作鍛炼而又最积极的青年一道，成功地迫使苏加諾和哈达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成立⁽¹²⁾。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英国海軍上将蒙巴頓勳爵命令留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本軍队維持印度尼西亚的“秩序和治安”。这就等于說命令日本軍队来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鎮压民族独立运动，尽可能地保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人和农民，使用从日本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殊死保卫年輕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他們起初同日軍作战，后来又同英荷帝国主义的軍队作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动員了它的青年党员首先参加那些在革命初期到处蓬勃地建立起来的青年組織。

印度尼西亚軍队和人民英勇地进攻殖民軍队。殖民軍队由于遭到不少的損失和士气沮丧，在許多地方被迫退却了。年輕的共和

国的力量日益加强了。这不仅是因为国内的人民有了更高的觉悟，而且还因为留在国外的印度尼西亚工人同澳大利亚、印度、埃及、荷兰等国工人一道以抵制荷兰輪船的方式給了积极的援助。显然，帝国主义利用軍事方式并没有能够摧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乌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曼努伊斯基建議下，印度尼西亚問題首次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討論。印度尼西亚爭取独立的战士是不会忘記这件事的。

荷兰帝国主义在美、英帝国主义协助之下寻求其他途徑来夺回它在印度尼西亚业已失去的地位。他們采用了过去慣用有效的老办法，在武装威胁和充当其走狗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帮助下进行“和平談判”，进行阴谋和挑衅活动，以便能够簽訂有利于他們的“协定”。荷兰帝国主义者在这一方面也找到了适当的人了，这个人就是当时担任总理的为英、荷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右翼社会党人苏丹·沙里尔。

沙里尔是罪恶的投降政策的鼓吹者。他是一个空談家，并且是一个专门向帝国主义让步的分子。他伪装“左派”，伪装“进步”。他自命为第三种力量的领导人，并且幻想在苏联和美国之間建立“中立集团”，这实际上就是帮助帝国主义的政策。

在沙里尔所制造的妥协和談判的气氛中，組織、动员革命力量的工作被忽視了。革命力量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贊成沙里尔式的談判政策，另一部分則表示反对。在武装力量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就日益削弱，而帝国主义在談判的同时，进行了軍事进攻的准备工作。大批的軍隊由荷兰調到印度尼西亚，他們主要駐扎在荷兰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势的雅加达、泗水和三宝壠⁽¹³⁾。

以樊·穆克和馬克·樊·波尔为首的荷兰代表团同以沙里尔为首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經過了长時間的談判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达成了協議，这就是以談判地点为名的**林牙椰蒂协定**。这个协定是在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表**基倫勳爵**的推动和监督之下簽訂的。林牙椰蒂协定仅仅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在爪哇、馬都拉和苏門答腊事实上的权力。这样一来，荷兰就可以利用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如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小巽他、馬魯古等島嶼，作为进行有关政治、軍事侵略的活动的有力基地。荷兰积极地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事实上控制的地区以外利用民族败类建立傀儡邦以反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这个問題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犯了大錯誤，因为它同意了沙里尔所簽署的林牙椰蒂协定。

荷兰帝国主义除了^在政治和軍事上进行各种准备之外，还繼續寻找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动公开战争的理由。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拒絕荷兰要求在共和国統治地区巡邏的时候，荷兰帝国主义便找到了“理由”。沙里尔接受了荷兰的上述要求，但他遭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强烈反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强烈反对沙里尔的投降企图，导致沙里尔內閣的倒台，一九四七年七月成立了由共产党人領導的以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担任总理的內閣。第一次殖民战争期間，在阿米尔·沙利弗丁政府领导下开展了反抗荷軍的斗争，第一次殖民战争是荷兰貝尔—德里斯政府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下令进行的。如所周知，德里斯是荷兰右翼社会党人的領袖。

荷兰殖民者以为发动了殖民战争就会更容易摧毁共和国。但事实并不如此。荷兰軍隊遭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共和国軍隊的激烈抵抗，荷兰軍隊只能够占領大城市，乡村和山地則控制在印度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和游击队手中，因此荷兰军队可以说是处于孤立的地位。全世界的工人强烈反对荷兰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进行的殖民战争，这表现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态度以及世界工会联合会发给它的全体会员声援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指示上。全世界工人的国际性的声援以及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的努力，迫使安全理事会命令荷兰帝国主义停止进行殖民战争。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的态度是站在荷兰帝国主义方面反对印度尼西亚人民，这种态度表现在它们反对苏联代表所提出的要求荷军撤退至发动殖民战争以前的阵地的提案。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成立一个斡旋委员会⁽¹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委员会对印度尼西亚是完全不利的。这一委员会成立后，美国便公然干预印度尼西亚的内政。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谈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独立运动，同时极力排挤英国的势力，争夺在印度尼西亚和荷兰谈判中的首要地位。为了进行罪恶的备战活动，美国需要印度尼西亚。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美国把“**倫維尔号**”军舰当作印度尼西亚和荷兰谈判的地点。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签订了**倫維尔协定**，这意味着阿米尔·沙利弗丁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仍继续执行沙里尔所开始实行的投降政策。根据**倫維尔协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从大部分位于西爪哇的袋形阵地⁽¹⁵⁾中撤退了约三万五千名的军队。这使荷军获得了发动新攻势的喘息机会。荷军还源源不断由荷兰调往印度尼西亚。

美帝国主义者公开干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内政。他们派遣了霍金斯、甘貝尔等代理人负责摧毁共产党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他们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以便使**倫維尔协定**获得通过，但与此同时，

又在阿米尔·沙利弗丁內閣中組織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反对”这一协定；他們命令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反对”倫維尔协定并且进一步拒絕參加阿米尔·沙利弗丁政府。他們企图通过这种卑劣的作法来推翻阿米尔·沙利弗丁政府而組織一个沒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他們进行了各种恐吓活动。由于缺乏警惕以及由于不了解革命問題就是国家政权的問題，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自願地将已經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政权交出来。代阿米尔·沙利弗丁政府而起的是哈达政府，在这个政府中馬斯友美党领导人占最重要的地位，这个政府……接受并馴服地执行了倫維尔协定。同时为了执行倫維尔协定还組織了一个由馬斯友美党人穆罕默德·罗姆领导的代表团繼續同荷兰进行談判。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就是这样执行其买办资产阶级的任务，成为革命的叛徒以及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由此可見，阿米尔·沙利弗丁政府一方面敢于进行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独立战争，以及制訂进步的劳工法令，但另一方面，由于荷、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和各种阴谋，它又繼續执行了沙里尔的投降政策，并且自願地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政权交給反动派。

反动派掌握政权之后繼續背叛革命和祖国。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霍金斯(杜魯門外交政策顧問)、柯契兰(斡旋委员会美国代表)同以当时任总理的哈达为首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沙冷岸(屬茉莉芬)举行秘密會議。馬斯友美党領袖苏基曼、納席尔、穆罕默德·罗姆等人也参加了这次會議。秘密的沙冷岸會議通过了卑污恶毒的所謂“消灭赤色分子的建議”^[16]。美国破坏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活动，仅仅是它在全世界的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在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遭到打击的同时，其他国家，如印度、緬甸等国也发生

了几乎与印度尼西亚相似的情况。

在美帝国主义日益加强其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压力的情况下，一九四八年八月慕梭同志由国外返回印度尼西亚。慕梭同志随即纠正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组织方面的错误。他指出，假如不对帝国主义采取坚决的态度就会多么严重地危害印度尼西亚革命。慕梭同志的到来燃起了新的斗争精神。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慕梭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自我批评。在这次自我批评中承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组织和政治上犯了错误，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了解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后国内政治情况所发生的变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不了解战后重要的国际形势。因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接着，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承认它过去赞同林牙椰蒂协定的错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努力为废除伦敦协定及一切不是基于平等地位签订的协定而奋斗。此外，在组织方面，纠正的基本点是：一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党，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社会党和印度尼西亚劳工党，必须统一起来，使印度尼西亚只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了在革命中取得农民的支持，即约占全印度尼西亚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的农民的极重要的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改进共产党人在武装部队方面的工作。必须提高人民生活，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这一切都载入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的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一个决议里，这个决议就是被称为《新道路》的决议。印度

尼西亚共产党就是这样对自己在政治和组织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且给长期蒙蔽在谈判并对帝国主义多方让步以致具有投降性质的政策中的群众，指出了新的明确的出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走的新道路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召开的群众大会有数万至数十万的群众参加。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阐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新纲领，并进而号召群众继续进行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独立战争。群众开始认识哈达政府和马斯友美党的真面目，开始了解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走的新道路是赢得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

荷、美帝国主义看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独立运动日益发展，看到哈达政府快要孤立起来，因而感到忧惧。他们根据沙冷岸会议的决议，决定采取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领导的独立运动的措施。

一九四八年八月底，外国的“外交官”在马斯友美党、托派分子、右翼社会党人协助下开始在梭罗、接着在其他几个地方进行挑衅。他们用卑鄙的手段杀害了革命军官，某派军队强占了工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办事处。右翼社会党人及其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托派分子及其所谓“人民革命运动”，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手中的重要工具。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在茉莉芬发生了一个小的事件，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军队内部拥护哈达政府反动挑衅政策的一派同受革命分子影响的一派之间。哈达政府借这个小事件兴风作浪，政府方面并且造谣说什么茉莉芬发生了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事件，说什么共产党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哈达政府还以此为借口动员它的

全部力量来追緝、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领导的統一战綫組織——人民民主陣綫的成員。他們也动員馬斯友美党党员起来追緝、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除对政府这种殘暴鎮压进行自卫外別无他途。在这次茉莉芬事件中約有一万名工人、农民、其他阶层人民及其领导人，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被杀害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工人階級的著名领导人，如慕梭、阿米尔·沙利弗丁、苏立諾、維罗勒諾博士、哈利約諾、沙佐諾及其他許多同志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杀害了。

茉莉芬挑衅事件的目的就是企图粉碎工人运动及其领导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而使独立运动脱离它的革命的领导以至全部瘫痪。以后的事实证明茉莉芬挑衅事件也是发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第二次殖民战争的一种准备。这次殖民战争是为了施加压力，强迫印度尼西亚人民接受卖国的协定，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印度尼西亚方面的哈达、苏丹·阿卜杜尔·哈密同荷兰王国方面的馬塞芬在美帝国主义代表美尔勒·柯契兰监督之下在荷兰签订的圓桌会议协定。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就是这样背叛了民族利益；他們宁愿将印度尼西亚奉献給荷、美帝国主义，自己充当其忠实的奴僕，却不願同共产党人和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我在上面比較詳細地叙述了我們过去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斗争、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斗争和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斗争——的一些重要經驗。我觉得这还是必要的，因为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干部的严重缺陷之一就是不很懂得本階級的斗争史和我們民族的斗争史。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識，他們对斗争的热爱和忠誠就缺乏一个坚固的基础，他們好像跟过去的斗争

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把我们的运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而且愈来愈进步、愈广泛和愈高涨的运动。因此，党一向强调党的干部和党员应该系统地学习我们的民族史和斗争史。

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根据圆桌会议协定，荷兰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了所谓“移交主权”给印度尼西亚的仪式。圆桌会议协定同林牙椰蒂协定、伦维尔协定一样，都是殖民协定，而不是基于平等地位签订的，这表现在屈辱的圆桌会议协定的内容上。

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接受了圆桌会议协定，使荷兰帝国主义得以保持它对印度尼西亚的控制。印度尼西亚变成了在荷兰女王庇护下的所谓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一个成员。

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被荷兰政府所控制。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必须负责偿还荷属东印度欠荷兰及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五十亿盾以上的债务。这就是说，荷兰所支出的用于进行殖民战争和其他镇压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费用必须由印度尼西亚人民来偿付。

根据圆桌会议协定，印度尼西亚政府没有权利独立自主地同其他国家订立条约和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者在工业、商业和金融方面的一切企业，如银行、工厂、矿山、发电站、运输企业、农场等等是不可侵犯的，而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反动政府也是忠实地加以保护的。该协定责成印度尼西亚政府归还所有外国人（日本人和德国人除外）的企业和租让权，恢复外国人所享有的特权并承认这些权利在将来仍然有效。

荷兰官吏继续留在印度尼西亚。同时还规定荷兰军事代表团留驻印度尼西亚，他们留驻的一切费用均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担。荷兰官员的薪金比印度尼西亚官员的薪金高得多。荷兰的民政官员和军事官员还继续控制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机构和军队。此外，荷兰官员还是留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机构中的间谍和破坏者。

为了欺骗印度尼西亚人民，哈达说，圆桌会议协定是意味着“消灭了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但是，圆桌会议协定的规定和圆桌会议协定签订后几年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亲身经历并不如此。

事实上，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对殖民地实行旧式的残暴统治。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帝国主义不得不采用间接统治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残暴的殖民统治被认为是危及帝国主义本身地位的古老方式。因此它们被迫给予殖民地以所谓“自治的权利”，就像在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所发生的那样。

荷兰帝国主义同民族叛徒在美帝国主义监督下所签订的圆桌会议协定确定了印度尼西亚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也就是说，印度尼西亚享有所谓“自治的权利”，但实际上荷兰帝国主义仍然掌握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实权，圆桌会议协定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敞开了大门。

因此，如果目前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的情况和印度尼西亚一般人民的情况，仍然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恶劣，而且有些方面变得更坏，那是不足为奇的。战前人们常用这样的词句来描写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贫困，说印度尼西亚人民是“苦力构成的民族，而且是各民族的苦力”。这一句话所描写的情况迄今依然如故。

除了仍然根深蒂固的荷兰势力外，美帝国主义也竭力在剥削

印度尼西亚的資源和人民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軍事基地等問題上爭奪主要的地位。美国成功地影响了哈达政府以及以后馬斯友美党人的納席尔政府和苏基曼政府。美帝国主义利用这些政府作工具,强迫印度尼西亚人民接受所謂进出口銀行⁽¹⁷⁾貸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旧金山对日和約和共同安全法。美国企图通过这些貸款和协定变印度尼西亚为其原料供給地、工业品銷售市場、投資場所、战争基地以及雇佣廉价軍队的場所。

美国曾經随心所欲地規定了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和錫的价格,并且也規定了印度尼西亚必須向美国购买的东西,当然,这些只能是便利于美国进行剝削和备战的东西。美国已将印度尼西亚拉到它那一边去,使印度尼西亚参加根据旧金山对日和約的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的活动。

一九五一年年中,美帝国主义曾經命令苏基曼政府迫害共产党人并将政府法西斯化。苏基曼政府馴服地执行了美国的命令,并且根据这个命令于一九五一年八月逮捕了两千多名爱国人士和平战士,他們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工会、农会、青年学生团体、妇女团体和和平委员会的领导人等等。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政策不仅使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矛盾趋于尖锐化,而且也激起了反美的情緒。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美国政策的結果,迫使苏基曼政府下台,成立了韦洛坡政府,韦洛坡政府不承认由苏基曼政府签署的共同安全法,并且全部釋放了八月間被苏基曼所逮捕的人士。

共同安全法搞不成了,美国便企图利用所謂技术合作署来束縛印度尼西亚,这个东西实质上也是为了奴役并掠夺落后国家的。美国还力图把印度尼西亚拉进侵略性的太平洋公約。但由于印度

尼西亚人民的反对，美国这一企图也失败了。

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法的领土的一部分，迄今仍直接受荷兰帝国主义的统治。西伊里安是一块面积三十七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地区，那里有丰富的矿产，如石油、煤、铜、铁、铂、铈、镍、铬、金、银、铁、石棉、大理石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西伊里安还有铀矿。虽然印度尼西亚人民强烈地要求收复西伊里安，但是荷兰帝国主义却不愿意交出来，因为西伊里安是荷兰大资本家很有希望获得巨额利润的地区，同时又是美国缔结如太平洋公约之类的侵略性公约所非常需要的大岛。

显然，根据圆桌会议协定而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的所谓“移交主权”是为了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间制造幻想，说印度尼西亚已经获得完全的独立，说“移交主权”是“真实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在荷兰和美国控制下“独立”三年的惨痛事实，迫使苏加诺总统在一九五二年庆祝八·一七独立纪念日七周年的演讲中承认说，移交主权既不是真实的和完全的，也不是无条件的。接着，他说：“因此，我们反抗对我国的殖民统治的斗争还不能说已经大功告成。”他这些话分明是反对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强有力的事实迫使人們不得不承认根据圆桌会议协定的“移交主权”是虚伪的。

半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 经济危机和人民的贫困

印度尼西亚统治集团对我国的建设、工业化和经济繁荣计划的空谈非常之多。但事实上，我国目前是处在不断恶化和濒于崩

潰的經濟危机中。

印度尼西亚一九五二年的生产总额如与一九三八年比較，已經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五至八十五。根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統計局的数字，印度尼西亚一九五一年出超十亿七千七百万盾，而一九五二年头十个月却入超十三亿六千万盾。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輸出品中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橡胶、錫、椰干的价格惨跌所致。而这又主要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禁运和封鎖政策造成的。

根据財政部长苏米特罗的报告，一九五三年国家的全部收入約为七十五亿盾，其中稅收占百分之七十三，其他实际上也屬於稅收的收入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国营企业盈利的收入只占百分之二点五。

印度尼西亚深陷在繼續不断的經濟危机中，与此同时，荷兰資本在一九五一年所获的利潤却超过十五亿盾，这是一九二六年外資在印度尼西亚的黄金时代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数字。

繼續不断的經濟危机自然要使生活水平剧降，而且越降越低。人民在文教方面的发展也就遭到严重的障碍。

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工資很低，由于物价繼續高漲，实际工資不断地下降。根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統計局的数字，一个人的伙食費每月需一百五十五盾四角九分。而同样根据官方的数字，一九五一年矿山、工厂、建筑和运输等部門的工人最低工資每月是一百十七盾或每日五盾二角。因此，一个工人的工資还不够他个人的伙食費，更談不上妻儿的伙食以及其他必需的衣服、住屋等开銷。况且只有矿山、工厂、建筑和运输工人的日薪才是五盾二角；卷烟、印花布、紡織、皮革、印刷、食品、农业等部門工人的工資每日却只有三盾至四盾，而这些部門的工人人数是最多的。工人的最低工資

标准还没有规定，因此资方得以任意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同战前比较，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三十倍至四十倍，而工资平均才增加十倍。

根据官方数字，全印度尼西亚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共有一千五百万人，其中大多数，即约有一千万人，是贫农和无地的农民，其余则是工人和城市贫民。一九五〇年已登记的失业工人达十七万九千五百四十六人，而一九五一年则为二十五万二千六百七十一人。这就是说，在一年中已登记的失业工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失业工人大多数没有向政府登记，因为很难得到政府介绍职业或金钱上的帮助。失业登记所是极不得人心的衙门之一。

约占全印度尼西亚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的地位，并不比过去好些。在印度尼西亚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余，大地主拥有垄断为农民所耕种的土地的权利，大多数农民不可能拥有土地，因而被迫不问任何条件向地主租借土地；农民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这种实物地租占农民收成的很大一部分，使大多数农民贫困化；在地主土地上实行劳役地租制度，使绝大多数农民处于奴隶的地位；最后是债务累累，紧卡着绝大多数农民的喉管使他们处于被地主所奴役的地位。这种封建残余的后果是很明显的：农业技术落后，大多数农民贫困化，国内市场萎缩，国家工业化不能实现。

谈印度尼西亚工业化，如不跟无代价地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的问题联系起来，那就只是空谈而已。工业化的国家不是需要有能力购买工业品的人民吗？只要占印度尼西亚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那末，他们就没有能力购买工业品。显然，在人民仍处在奴隶地位的国家中，工业是不可能发展的。

在半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没有美好的前途。在印

印度尼西亚，人們求知的欲望是很大的。这表现在以下的数字上：战前大学各科约有学生一千人，而一九五三年高等学校学生总数则达一万人。由于设备缺乏和生活困难，这些大学生不可能有良好的学习成绩。有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被迫半工半读。一九五三年年初，进口的教科书价格上涨了三倍。还有一些有关教育的数字：一九五一年年初小学生人数有六百万，等于战前的三倍，但是这仅占要入学儿童的百分之四十，其他百分之六十已届学龄并且愿意入学的儿童，因为学校容纳不下而失学。文盲的数目仍然很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显然，在文教方面，印度尼西亚仍然是落后的。

受圆桌会议协定束缚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并没有保护进展极为缓慢的民族工商业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可能发展它的企业，建立新的工厂，而且在外国资本——荷兰、美国和日本资本的进攻下，连原有地位也无法维持。人民购买力薄弱也是民族工商业凋敝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尼西亚报纸几乎每天都刊载着民族工商业家因遇到困难或企业倒闭而发出呻吟的消息。民族企业的倒闭使失业人数更增加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尼西亚的目前情况就是如此。如果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还是继续不变，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势力没有被铲除，封建主义残余没有被消灭以前，印度尼西亚人民就不可能摆脱贫困、落后、不合理的状况。只要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政权仍然掌握在其利益与外国资本紧密联系着的封建主和买办的手中，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残余就不会被消灭，因为这种国家政权要在印度尼西亚保留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残余。

通过民族統一战綫走向完全的民族独立

吸取了失敗的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起义的經驗教訓，吸取了尚未成功的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的人民革命及殘酷的一九四八年九月茉莉芬挑畔事件的教訓之后，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領導之下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而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印度尼西亚人民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有着輝煌的革命的傳統和精神。

約有六百万人的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从二十世紀初起就成为民族独立斗争的先鋒，現在則更有組織更有紀律地站在为爭取民主、完全的民族独立和和平的斗争的最前列。

印度尼西亚工人約有百分之五十，即三百万人，已經組織起来了。据一九五二年十月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全国代表會議的报告，有二百五十万或占已經組織起来的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工人参加了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这些工人首先是重要企业，如铁路、石油、汽車运输、輪船和碼頭、农場、糖厂等等的工人。而已經組織起来的其他的百分之十五的工人，即有五十万人分屬右翼社会党人、民族主义者、馬斯友美党人、反动的天主教徒和托派分子所建立的工会。基于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會員同非會員工人联合行动所建立的工人統一战綫已經越来越强固了。右翼社会党人、托派分子、馬斯友美党人和反动的天主教徒，力图使工人內部和进步工会內部发生分裂，但是，工人群众要求團結的願望显然远比工人階級及人民的敌人的罪惡的分裂活动更为有力。

一九五〇年除頻繁的小規模的罷工之外，也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如七十萬農場工人大罷工堅持了五十天之久，最後以工人的勝利而告結束。據政府方面的材料，一九五一年的罷工事件共有五百四十一起，罷工人數三十一萬九千零三十人。據估計這些罷工使資方損失三百七十一萬九千九百十四個工作日。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如果同一九四〇年的罷工次數比較起來，那就更加明顯了，一九四〇年僅發生四十二起罷工事件，罷工人數只有二千一百十五人，資方只損失三十二個工作日。罷工一般是由於要求提高工資、反對集體解雇和反對罪惡的禁止罷工條例而發生的。

日益增加和擴大的工人鬥爭已經威脅到殖民主義者的剝削和美國的備戰。這種情況使得蘇基曼政府——殖民主義剝削的忠實保衛者和美國戰爭機器的工具——於一九五一年八月下令大規模逮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儘管頒布了禁止罷工的條例，即根據荷蘭殖民政府的“戰時戒嚴令”制訂的一九五一年軍事管制條例，但罷工事件還是繼續發生。後來，該軍事管制條例為勞工部長德查蘇馬納制訂的緊急法令所代替。根據“德查蘇馬納法令”，工人要罷工，必須在罷工前二十一天通知政府。政府方面有權把這二十一天的期限延長，而且政府在調解勞資糾紛事件中擁有否決權。為了解決勞資糾紛事件，政府成立了仲裁委員會。反動政府的仲裁委員會的決定，當然是有利於資方而不利於工人的。因此，印度尼西亞工人就提出抗議，舉行示威遊行和罷工，要求廢除這個法令。其他的人民群眾也支持工人的要求。議會也對“德查蘇馬納法令”和逮捕被認為違反這個法令的工人領導人的事件提出批評。

除了制訂各種限制工人權利的條例和法令之外，反動派還對

工人进行各种誣蔑，企图使进行斗争的工人在其他人民阶层中处于孤立的地位，从而使工人运动变为软弱无力并使民族统一战线脱离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动派誣蔑说工人的斗争妨碍国家的建设并造成物价高涨和通货膨胀等等。在进行这些誣蔑方面，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右翼社会党人、托派分子和美国的宣传机关美国新闻处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为了反对地主，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数百万农民参加了各种组织。最主要的农民团体组成了“农民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同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及其他进步团体进行良好合作的农民联合组织。

数十万农民参加了“农民统一战线”，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同该战线外的农民团体采取统一行动，该战线领导了数百万农民为减低地租、为取消极繁重的赋税、为废除强迫劳役、为反对印度尼西亚地主和外资农场强占土地以及为无代价地获得土地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此外，印度尼西亚农民也激烈地反抗殖民统治者和印度尼西亚地主所组织的各种恐怖集团。

在城市里，除了有日益进展的工人运动外，知识分子也参加了支持进步运动和和平运动的斗争。他们加强了同各自的专业有关的团体或者投身于和平运动和人民文化运动。印度尼西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使正直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并行动起来找寻出路——独立解放的道路。

青年和学生参加到各自的组织中去，他们继承了二十世纪初叶，特别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以来的革命传统，成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和平的斗争的积极分子。妇女运动同样如此，妇女们在反对封建习俗、反对殖民地剥削，并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日益得到

了进步。青年、学生和妇女的运动继续加强他们同世界民主青年、学生和妇女的联系。

在工商业方面的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民营农场主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工商界的强烈抗议。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不承认美帝国主义所强迫执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要求同一切国家——包括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特别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每年必须输入八十万吨至九十万吨大米，由于橡胶的价格被美国压低而惨跌，因此要求用印度尼西亚的橡胶直接换中国大米的呼声是很强烈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工业家非常希望能够获得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机器。

工人运动的进展鼓舞了其他阶级和阶层也同样组织起来参加争取民主、和平、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在争取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时候，扩大了并提高了它的任务。它帮助了其他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帮助了农民获取土地的斗争，帮助了知识分子、青年、妇女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帮助了民族资产阶级反抗外国竞争的斗争和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民主和和平的斗争。

反动派由于害怕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随之而增长的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由于害怕罢工事件，并相信仅仅用武力和依靠法西斯法令是不能打垮工人阶级的，因此他们建立了黄色工会，准备组成希特勒式的工人战线。这些黄色工会的首脑主要是马斯友美党、右翼社会党和托派的领导人，以及美国新闻处和联邦调查局的代理人。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八月的大逮捕事件等等法西斯措施方面担任重要的角色，他们同警方密切勾结，并在工人运动中充当奸细。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展开了猛烈的斗争，反对沙

里尔分子在农场工会、纺织工会及其他工会中的分裂活动，反对托派分子在糖业工会、电业工会及其他工会中的分裂活动，反对马斯友美党领导人所领导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工会的分裂活动，反对美国新闻处和联邦调查局的代理人所领导的天主教工会的分裂活动。革命的印度尼西亚工人把这一切分裂活动看作是潜入工人队伍中的敌人的勾当。

目前的情况表明，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维护社会经济方面的日常利益的斗争已日益密切地同争取和平的斗争结合起来。帝国主义者的备战，使工人身受的剥削更加严重，工人的生活水平受到更猛烈的进攻，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高涨，赋税日益加重，失业人数日益增多。进步的印度尼西亚工人组织，无论它参加还是不参加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都了解到这一情况，因此始终将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同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争取和平、反对军事化的斗争，为挫败在美国策划下正在准备着的新的世界大战计划的斗争——结合起来。

近几年来，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和其他的民主运动遇到过两次大灾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八月苏基曼政府的极端反动的措施，第二次是一九五二年十月右翼社会党人发动的政变。这两者都是企图使印度尼西亚政府制度法西斯化，企图建立不承认工会和其他人民团体权利的军事独裁。但是，这两次灾难已为人民团结的力量和民主运动的力量所战胜。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这些极端反动的措施的胜利，给印度尼西亚人民，特别是给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带来了信心，只要工人阶级保持警惕并英勇地进行斗争，只要工人阶级能够争取其他阶层的人民参加维护民主权利的斗争，就能够克服法西斯主义的危害。这一经验对于印度尼西亚工人阶

級和全体人民今后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在为争取提高工资、反对失业、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工会权利和社会保险而进行斗争的同时，也英勇地为争取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同人民中最大多数的而且也是深受压迫的农民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盟而斗争。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不断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下列各种斗争的领导和组织者：取消圆桌会议协定，取消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驱逐荷兰军事代表团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对民主国家的禁运和封锁，使印度尼西亚摆脱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约束，同各国建立正常的互利的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拒绝技术合作署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企图压迫印度尼西亚签订侵略性的太平洋公约。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完成它领导印度尼西亚全民族的力量争取印度尼西亚走向完全的民族独立、民主、幸福和和平的任务而斗争。

当美国唆使的苏基曼集团及后来英国和荷兰唆使的沙里尔集团企图取消印度尼西亚仅有的一点点民主自由权利时，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了顽强的保卫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这一顽强斗争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可能团结它周围的更广大的群众。在全国各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民主人士，包括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及其他政党中的进步人士，在反对美、荷、英帝国主义所制造的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一切事实证实了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所說的，共产党和民主政党只有举起了资产阶级所抛弃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才能将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斯大林同志說，“再沒有人会举起这面旗帜了”，他同时强调說，只有共

产党和民主政党才能举起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

这一切事实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的工人阶级更加确信，只有团结，只有团结了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力量才能赢得人民斗争的胜利。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并且在最广泛的人民运动和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完全从荷兰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和粉碎英美在印度尼西亚的侵略政策的保证。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建设新印度尼西亚、完全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保证。这是使印度尼西亚人民有可能建立一个执行人民民主纲领并领导人民走向胜利的人民民主政府的保证。因此，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扩大并巩固这一统一战线，通过人民争取实现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日常斗争来扩大并巩固这一统一战线。

如果没有同时阐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对韦洛坡政府的政策，那么，我的讲话就还不完备。自从一九四八年年初，以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为首的统一战线政府解散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次支持韦洛坡政府，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一次对政府表示支持。正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各种声明和文件中所阐明的那样，党支持韦洛坡政府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完全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把韦洛坡政府看成是一个真正民主和真正进步的政府；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不可能把韦洛坡政府跟哈达、苏基曼、纳席尔等反动透顶的政府等同起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决定政治态度的时候，一向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从实际的社会力量对比出发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经常对社会力量变动不定的对比情况作出估计。根据这一估

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那些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前出現的政府可能有三種態度。第一，如果政府很反动，像哈达—納席尔—苏基曼政府那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便动员全体人民起来推翻这种反动政府，另建一个进步或比較进步的政府。第二，如果政府比較进步，像韦洛坡政府在成立之初那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政府，虽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自己没有参加在內。第三，如果政府是一个包括共产党的民主力量組成的統一战綫政府，像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时期的几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那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然支持政府。

韦洛坡政府，由于反动部长們的壓力，特别是馬斯友美党人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人部長的壓力，最近的表現不再是比較进步的了。为了推动韦洛坡政府中的民主人士，使他們不致进一步投降反动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九五三年五月九日发表一項声明宣称，只有韦洛坡政府接受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的最低条件，即保证实现人民的安全、民主权利、民族經濟的发展，以及实行走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外交政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願意支持它。

在这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三十三周年紀念会上，我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还是同去年的紀念会一样，号召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号召一切民主党派，加强并扩大我們的民族統一战綫。讓我們继承“急进同盟”、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18]、“民族同盟”、政党协商會議等等民族統一战綫的傳統吧！讓我們实现我們民族史上空前强大的团結吧！讓我們繼續发揚我国人民和民族英雄的英勇斗争的傳統吧！讓我們繼續发揚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英勇、团結和革命的傳統吧！

经历过长期艰苦奋斗、走过曲折的斗争道路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为指针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毫无疑问，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 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

这是艾地同志为论述工会工作中几个专门性的问题而写的文章。当时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有过于偏重政治斗争而忽视社会经济斗争的迹象。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的工人运动中一开始就存在着宗派主义的毛病。

文章通过很多令人信服的事例和对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的经验的分析，强调指出工人的日常社会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配合的重要性，而且还着重指出建立巩固的工人统一战线以便争取其他阶层的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性。这样，印度尼西亚的工人阶级就能够完成它领导全民的力量争取建立完全独立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哈达为首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同荷兰政府在荷兰签订了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哈达、苏丹·阿卜杜尔·哈密、保守的伊斯兰教政党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即右翼社会党的领导人就是这样把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可歌可泣的人民革命搞垮了。他们就是这样背叛了革命的共和国，而且在帝国主义的命令下组成了保护帝国主义利益、买办和地主利益的政府。他们公开地站到帝国主义者那边去，而且同帝国主义者一道向印度尼西亚人民进攻，向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权利进攻。

在美帝国主义的监督下，荷兰同印度尼西亚民族叛徒签订的

圓桌會議協定確定了印度尼西亞的半殖民地國家的地位。據說，印度尼西亞享有“自治的權利”，但是，實際上印度尼西亞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實權還是操縱在荷蘭帝國主義的手里。圓桌會議協定為荷蘭和其他帝國主義者在印度尼西亞的投資敞開了大門。

因此，如果目前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的情況，同印度尼西亞一般人民的情況一樣，仍然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那樣的惡劣，而且有些方面甚至更惡劣，那是不足為奇的。戰前人們常用這樣的詞句來描寫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貧困，說印度尼西亞人民是“苦力構成的民族，而且是各民族的苦力”。這一句話所描寫的情況到現在還是這樣。

一

印度尼西亞工人的工資很低，由於物價繼續高漲，實際工資不斷地下降。根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統計局的數字，一個人的伙食費每月需要一百五十五盾四角九分。而同樣根據官方的數字，一九五一年礦山、工廠、建築和運輸等部門的工人最低工資每月是一百十七盾或每日五盾二角。因此，一個工人的工資還不夠他個人的伙食費，更談不上妻兒的伙食以及其他必需的衣服、住屋等開銷。況且只有礦山、工廠、建築和運輸工人的日薪才是五盾二角；捲煙、印花布、紡織、皮革、印刷、食品、農業等部門工人的工資每日却只有三盾至四盾，而這些部門的工人人數是最多的。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還沒有規定，因此資本家得以任意規定工人的最低工資。

印度尼西亚工人工资很低，所以经常挨饿。印度尼西亚工人，和一般人民一样，平均每日食物的含热量只有一千八百五十卡路里，大大低于正常所需的热量。除了吃不饱之外，由于资本家和政府不关心，工人的健康情况是非常恶劣的。据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长所著的《印度尼西亚的建设》一书中说，印度尼西亚平均每六万居民只有一名医生，每五万人只有一名助产士，每两万人只有一名护士，每四十八万三千人只有一名牙科医生，每九十万人只有一名药剂师。因为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岛国，交通非常困难，同时医生和助产士喜欢住在城市，因此远离城市的地区数十万人中才有一个医生。东爪哇调查的结果说明，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每年患疟疾一次。结核病专家威斯奴友多医生指出，战前结核病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所患的疾病中占第五位，但是现在已占第二位，仅次于疟疾。这一位医生还说，印度尼西亚人民患结核病的占百分之二十五，患印度痘的占百分之十五。

全国人口八千万，医院（包括疗养所和麻疯医院）的床位总计只有六万个，其中官办医院的只有二万二千个，其余的都是私立医院的。

工人患病期间的津贴或补助，法律上完全没有规定。有一些大企业，经过工人的斗争之后，资本家被迫发给少量的津贴。小的企业便完全不给。因此，工人患重病也勉强上班，以致有时他们死在工地上，有一家印花布厂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故。

共产党人阿米尔·沙利弗丁领导下的政府一九四七年制定的劳工法规定：在工作中或在战争中受伤丧失劳动力者给予津贴，最高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工人因事故死亡，其遗孀得百分之三十的津贴，每一名孩子得百分之十五的津贴，全部津贴的最高限度

为百分之六十。这一法律目前的执行情况令人十分失望，其原因之一是政府很少配备人员来监督执行。在人民革命年代参加反对荷兰军队的斗争受伤残废的，全国大约一万人。残废者这么多，残废院却只有中爪哇的梭罗一处，该处也只能容纳三百人。对残废者的照顾很差，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独立报》载，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上校邦邦·乌多约说：“如果残废者退休条例这样继续执行下去，残废者只好当乞丐。”

也是由阿米尔·沙利弗丁政府制定的一九四八年劳工法，规定每日七小时工作制。这一劳工法到现在仍然有效。曾到印度尼西亚来的法西斯分子哈马尔·沙赫特，向印度尼西亚政府献计取消这一劳工法并尽量延长工时，以便增加生产。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尤素夫·维比梭诺和右翼社会党人的领导人苏丹·沙里尔之流大事鼓吹沙赫特延长工时的主张。政府对这一劳工法的执行既缺乏监督，私人企业中便经常发生资方违法的事件。他们设法降低工资或者不提高工资，采取一切手段使他们不致因这一劳工法仍然有效而蒙受损失。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认为每日七小时工作制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的具体的果实，因此他们坚决地保卫它。

一九四八年的劳工法还规定女工产前产后各休假一个半月，工资照付。反动派竭力要取消这一规定，但是遭到群众强烈的反对。实际上，对这一法律的执行，目前监督很差，资方违法的事件发生了很多起。许多女工被私营企业的资本家解雇，这显然是因为资本家要逃避这一法令的规定。关于分娩补助费资方完全不管。

关于保证私营企业工人的子女津贴的法令，完全没有。在一

些大企业的工人斗争压力下，政府才被迫责成资方发津贴给那些有三个或四个孩子以上的工人。政府这么规定之后，资本家雇用工人，便主要挑选那些还没有子女的，或者孩子在三个以下的人。

在养老金问题上，政府各部门的工人分为两部分：固定工人约计六十万，他们有享受养老金的权利；但是工资按日计算的临时工大约一百五十万人，约占全体政府工人的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没有享受养老金的权利。政府和私营企业资方大都采用临时工，工资按日计算，因为这是获得极低廉的劳动力的一种方法，政府或资方可以不必付养老金，也不必对工人承担其他义务。私营企业付养老金给工人的还很少见。工人向私营企业要求养老金的斗争，迫使资方讨论养老金问题。资方一向反对工人参加讨论有关养老金问题，据资方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和重大的”问题，工人是不可能参加讨论的。有的私营企业把养老金规定得很低，只有工人原月薪的百分之十左右。资方的这种规定得到政府的支持。工人当然反对这种规定，一般都拒绝按这种规定退休。

印度尼西亚的失业人数日益增大。这是因为垄断企业力图获取最高限度的利润，其方法之一就是尽量地解雇工人，使用现代化机器来代替人力。例如：巴达夫石油公司，一九五〇年的生产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而一九五一年又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但是一九五一年却解雇了一千六百名工人，占该公司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此外，失业的原因也在于卷烟、玻璃、帽、印花布、纺织等等民族企业大量倒闭。例如：北加浪岸（中爪哇）有百分之八十，梭罗（中爪哇）有百分之六十的印花布企业被迫关门。这些民族企业的倒闭，通常是由于无力同进口货竞争、人民购买力很弱和进口原料价格极为昂贵。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

迄今仍然追随美国的禁运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

前战斗人员又扩大了失业的队伍。三十万前战斗中只有百分之十五能够就业或者获得帮助能够继续学习。一九五二年年中，政府把极少量的失业救济金也完全取消了。

根据官方数字，印度尼西亚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其中一千万人是贫农和无地的农民，其余则是工人和城市贫民。一九五〇年已登记的失业工人达十七万九千五百四十六人，而一九五一年则为二十五万二千六百七十一人。这就是说，在一年中已登记的失业工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尽管失业登记所是不得人心的机关，因为许多失业者登记了也没有获得任何的帮助。

关于解雇工人，一九四一年的殖民地法令仍然有效，该法令规定被解雇的工人，即使是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最多可得三个月工资。此外，该法令还规定，资方根据自己不难找到的各种借口，可以解雇工人而不发给任何补助费。因此，实际上这为数极少的补助费，资方可以不发足，或者完全不发而随意小规模地或大规模地开除工人。

种族歧视仍然盛行，印度尼西亚政府还使它合法化，例如：承认欧洲工人每月的工资和物价津贴比印度尼西亚工人高出一千盾。欧洲工人的物价津贴比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基本工资还要高。对于私营企业的印度尼西亚工人，还没有制定每年休假十四天的法令；相反的，欧洲工人已实行每年休假十四天，此外，每四年有六个月回欧洲的假期，工资全部照付。在休假期间内，他们全家的费用及其他的优待，资方都照给。如果欧洲工人有子女在欧洲，他们的子女每两年还可以到印度尼西亚来一趟，费用由资方负担。这

种极端的种族歧视已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并引起了垄断企业工人，特别是石油工人的斗争。

二

工资极低、没有社会保险、民族歧视仍然盛行、失业人数日益增多、工会的各种权利受到摧残，这就激起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继续不断地采取各种行动，进行斗争。根据劳工部公布的统计数字，一九五一年罢工事件共五百四十一起，罢工人数三十一万九千零三十人，损失三百七十一万九千九百十四个工作日。根据官方材料，一九五二年发生劳资纠纷四千零三件，这就是说，比一九五一年多了百分之四十五。事实上，实际发生的次数往往比政府官员登记的次数更多。如果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罢工次数比较起来，一九五一年的罢工次数是大大地增多了。根据荷属东印度政府劳工事务局的统计，一九四〇年只有四十二个企业发生罢工事件，罢工的人数共二千一百十五人，只损失三十二个工作日。

日益增加和扩大的工人斗争已经威胁到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美国的备战。这种情况使得苏基曼政府——殖民主义剥削的忠实保卫者和美国战争机器的工具——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下令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尽管颁布了禁止罢工的条例，即根据荷兰殖民政府的“战时戒严令”⁽¹⁾制订的一九五一年军事管制条例，但罢工事件还是继续发生。后来，该军事管制条例为劳工部长德查苏马纳制订的紧急法令所代替。根据“德查苏马纳法令”，工人要罢工，必须在罢工前二十一天通知政府。政府方面有权把这二十一天的期限延长，而且政

府在調解勞資糾紛事件中擁有否決權。為了解決勞資糾紛事件，政府成立了仲裁委員會⁽²⁾。反動政府的仲裁委員會的決定，當然是有利於資方而不利於工人的。因此，印度尼西亞工人就提出抗議，舉行遊行示威和罷工，要求廢除這個法令。其他的人民群眾也支持工人的要求。議會也對“德查蘇馬納法令”和逮捕被認為違反這個法令的工人領導人的事件提出批評。

除了制訂各種限制工人權利的條例和法令之外，反動派還對工人進行各種誣蔑，企圖使進行鬥爭的工人在其他人民階層中處於孤立的地位，從而使工人運動變為軟弱無力并使民族統一戰綫脫離工人階級的領導。反動派的誣蔑說工人的鬥爭妨礙國家的建設并造成物價高漲和通貨膨脹等等。在進行這些誣蔑方面，馬斯友美黨的領導人、右翼社會黨人、托派分子和美國的宣傳機關美國新聞處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在反動派集中全力以誣蔑或其他分裂活動的方式來孤立和粉碎工人運動的情況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公布了一項關於《工人統一戰綫的任務》的決議。該決議說，如果不把重要企業收歸國有，不實行工業化，不取消殖民主義法令，不實行人民民主綱領，就不可能有國家的建設，就不可能有生產的改組。物價高漲和通貨膨脹完全不是增加工資的必然後果。無止境的物價高漲和通貨膨脹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後果，而不是工人鬥爭引起的後果。即使沒有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只要重要企業還沒有收歸國有，只要這些重要企業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追求利潤的欲望還沒有消滅，物價高漲和通貨膨脹便將繼續成為社會的通病。

反動派由於害怕日益增長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以及隨之而增長的民族統一戰綫的力量，由於害怕罷工事件，并相信僅僅用武力

和依靠法西斯性的法令是不能打垮工人阶级的，因此他们建立了黄色工会，准备组成希特勒式的工人战线。这些黄色工会的首脑主要是马斯友美党、右翼社会党和托派的领导人，以及美国新闻处和联邦调查局（美国特务机关）的代理人。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八月的大逮捕事件等等法西斯措施方面担任重要的角色，他们同警方密切勾结，并在工人运动中充当奸细。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展开了猛烈的斗争，反对沙里尔分子在农场工会、纺织工会及其他工会中的分裂活动，反对托派分子在糖业工会、电业工会及其他工会中的分裂活动，反对马斯友美党领导人所领导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工会的分裂活动，反对美国新闻处和联邦调查局的代理人所领导的天主教工会的分裂活动。革命的印度尼西亚工人把这一切分裂活动看作是潜入工人队伍中的敌人的勾当。

由于反动派在荷、美等帝国主义的命令下，日益加紧进行建立黄色工会的活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上述决议中提到，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假面具必须在各种工人集会上加以揭穿，并须激发工人对这些捣乱分子的愤慨。他们反对罢工的勾当，他们恫吓工人的举动，他们分裂工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背叛行为，都必须及时地加以揭发，使这些不忠实的分子在群众中扎不下根。接着，上述决议提醒说：“最重要的，千万不要使工人群众存有这样的幻想，以为资产阶级政府设立的仲裁委员会会公平地对待工人。”

作为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经常强调说：工人战线必须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最坚强、最团结、最进步和最觉悟的战线。工人战线和农民战线必须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一致争取实现其政治目标——建立一个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工人和农民必须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宗派主义是本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成立工会以来工人运动就已经患了的毛病。关于这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决议说：“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工人阶级中具有战斗性的部分必须铲除宗派主义的毛病和空洞的‘左’倾口号。广大工人群众所不支持的宗派主义和空洞的‘左’倾口号，不仅帮助了敌人，帮助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分子，而且也是团结工人阶级的障碍。”决议接着说，“只有消灭了宗派主义，工人阶级中的具有战斗性的部分才能争取落后的工人群众，才能争取全国人民参加到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来。”

印度尼西亚工人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个决议的鼓舞下，更加积极地整顿和改善他们的组织，更加积极地进行各种斗争。除了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会的中央组织，世界工会联合会⁽³⁾的会员——直接领导下的斗争之外，在各个工厂、码头、矿山、农场等企业，也组织了由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和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以外的工会领导的统一行动。这些统一行动，使工人在要求就业、要求提高工资和争取工会权利的斗争中团结得更加紧密，并以此来反对分裂分子。

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十二日在雅加达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参加的有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全国各地分会的代表、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荷兰总工会代表和澳大利亚工人代表。同时，参加的还有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以外的各个工会的代表。会议除了讨论和通过新的章程和纲领之外，也热烈地讨论了宗派主义的问题，这是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成立之初就患的毛病，它大大地阻碍了全印度尼西亚中

央工会的发展，一般地说，也大大地阻碍了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会议确定，全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必须更多地进行争取工人日常利益的斗争，也必须避免采用空洞的“左”倾口号。

全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全国代表会议的成果使我们大有可能在全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会员和非会员工人之间的统一行动的基础上，在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工人、信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等的工人之间的统一行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人统一战线。会议过后的几个月中，有一些原来没有参加任何总工会的工会，如航空运输工会和米业工会，加入了全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另外有几个工会如卫生工会，宣布退出反动的总工会而不参加任何总工会。

目前，在已经组织起来的三百万工人中，有二百五十万人是全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的会员，三十九个全国性的产业工会参加了全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而已经组织起来的其他五十万工人，分属右翼社会党人、民族主义者、马斯友美党、托派等领导的总工会和不参加任何总工会的工会。

三

目前的情况表明，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维护社会经济方面的日常利益的斗争已日益密切地同争取和平的斗争结合起来。帝国主义的备战，使工人身受的剥削更加严重，工人的生活水平受到更猛烈的进攻，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高涨，赋税日益加重，失业人数日益增多。进步的印度尼西亚工人组织，无论它参加还是不

参加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都了解到这一情况，因此始终将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同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争取和平、反对军事化，为挫败在美国策划下正在准备着的新的世界大战计划的斗争——结合起来。

近几年来，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和其他的民主运动遇到过两次大灾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八月苏基曼政府的极端反动的措施，第二次是一九五二年十月右翼社会党人发动的政变〔4〕。这二者都是企图使印度尼西亚政府制度法西斯化，企图建立不承认工会和其他人民团体权利的军事独裁。但是，这两次灾难已为人民团结的力量和民主运动的力量所战胜。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这些极端反动的措施的胜利，给印度尼西亚人民，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带来了信心，只要工人阶级保持警惕并英勇地进行斗争，只要工人阶级能够争取其他阶层的人民参加维护民主权利的斗争，就能够克服法西斯主义的危害。这一经验对于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今后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在为争取提高工资、反对失业、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工会权利和社会保险而进行斗争的同时，也英勇地为争取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同人民中最大多数的而且也是深受压迫的农民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盟而斗争。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不断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为下列各种斗争的领导和组织者：取消圆桌会议协定，取消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驱逐荷兰军事代表团〔5〕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对民主国家的禁运和封锁，使印度尼西亚摆脱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约束，拒绝技术合作署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多次企图压迫印度尼西亚签订侵略性的太平洋公约。

因此,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完成它领导印度尼西亚全民族的力量争取印度尼西亚走向完全的民族独立、民主、幸福和和平的任务而斗争。

一九五三年五月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建立 一个統一战綫政府

本文和下面五篇文章是艾地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七月第一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內閣成立前后发表的声明。

一九五三年六月初韦洛坡內閣倒台后，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內閣危机。

韦洛坡內閣的組成和倒台給予印度尼西亚人民以意义极为重大的政治教訓。韦洛坡內閣是代表中間力量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第一次领导的內閣。过去，自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以来；一直是代表买办資产階級和地主的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执掌政权。韦洛坡內閣在初期还显示出民主的性质，沒有阻撓人民运动的发展。因此，韦洛坡內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这也就是它能够維持相当時間的原因之一。但是，从組成成分来看，韦洛坡內閣一开头就包含着很多政治上的矛盾。后来事实表明，內閣中的民主分子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气把那些在內閣中破坏內閣的进步措施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和馬斯友美党分子清除出政府，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气抗击內閣外反动派的进攻。韦洛坡沒有滿足人民提出的要求，有些地区甚至还发生蛮橫地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事件。这样，韦洛坡內閣就变得反动了，終于給包括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本身在內的民主力量推翻了。韦洛坡內閣的倒台，证明民主力量比反动力量强大。

关于組織新內閣的問題，艾地同志向新聞記者发表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建立一个統一战綫政府》的声明，接着又发表了进一步闡明这个声明的另一个題为《民族統一战綫內閣是唯一的出

路》的声明，在这两个声明中他着重指出，印度尼西亚的出路就在于建立一个实施进步政綱的統一战綫政府，在这个政府中要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真正代表——参加，而不能容許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买办和地主分子插足其間。在《**組閣人理应交回他們的委任书**》和《**反动派的歇斯底里**》两篇声明里面，艾地同志明确指出要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和馬斯友美党分子参加內閣，就不可能成立人民所要求的反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并拥护議会的民族政府。

內閣危机延續将近两个月，但是，艾地同志在《**建立民族統一战綫政府的时机已更加成熟了**》一文中明白地指出，人民对此絲毫不感到厌烦。人民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他們的要求是：与其組成反动政府，倒不如不要匆匆忙忙地組織新的政府。

曼頁沙哥罗—罗姆（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馬斯友美党）、慕加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布哈努丁·哈拉哈普（馬斯友美党）等組閣相繼失敗，最后，旺梭尼哥罗（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組成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为总理的內閣。在这个內閣里面，沒有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和馬斯友美党的代表，它的組成成分和政綱比韦洛坡內閣的更民主，也更进步。《**民主对法西斯的輝煌胜利**》，艾地同志就是这样估价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第一次任总理的內閣的成立。他着重指出这届內閣是第一次依靠人民的压力和人民的要求下組成的內閣。組閣的过程证明民主力量已經更为强大，同时也证明人民的力量能够迫使反动政府倒台而代之以比較进步的政府。虽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身沒有参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的內閣，內閣里面只有一位部长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代表，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是支持这个內閣。

与反动的哈达政府、納席尔政府、苏基曼政府比較，韦洛坡政府可算是寿命較长的政府，这无非是由于韦洛坡政府在一定限度

內得到人民包括占印度尼西亚人民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的支持。

韦洛坡內閣中的民主分子沒有多大能力反对以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为首的集团的反动政策，事实证明政府繼續不断地执行違反人民利益的各种措施，在这之后，韦洛坡政府就倒台了。

一方面，韦洛坡政府表現了很大的动摇性，而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就利用它的动摇性来使这个內閣变质，使它变成反动，从而使內閣和人民对立起来。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表示将支持韦洛坡內閣时就指出过这点。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这两个买办資产階級政党的反动政策，使韦洛坡內閣不可能执行它在議會中答应实行的全部綱領。

因此，那些促使韦洛坡內閣倒台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政府措施，主要应由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負責。事实更清楚地表明，韦洛坡內閣倒台的基本原因是，馬斯友美党领导人按照日里农場主联合会和东苏門答腊橡胶园主联合总会⁽¹⁾为代表的外国壟断資本家的政策，要繼續用拖拉机鏟毀丹絨摩拉哇和东苏門答腊的其他地区的农作物，并赶走这些地区的农民。因此他們害怕西狄·格达巴蒂的提案⁽²⁾。相反的，不論在政府或議會內外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领导人和其他民主人士都不贊同馬斯友美党领导人对付农民的各种殘酷和野蛮措施。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压力和斗争以及政府中的民主人士的努力，在韦洛坡政府执政一年多時間內，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由于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在政府和議會內外采取非常反动的措施，因此，这两个党在人民中

間日益陷于孤立。相反的，議會內外的民主力量日益團結和强大起来。軍隊中民主爱国分子現已更多地担任重要职务，这是因为他們在击败以右翼社会党人为首的亲荷派一九五二年发动的十·一七政变中卓有功績。印度尼西亚議會通过了进步或較进步的決議，例如渣斯哇第修正案、选举法、倫多奴烏提案、吉宛提案⁽³⁾和最近的、未經議會正式通过的西狄·格达巴蒂提案。尽管还不够完善，但韦洛坡內閣已經采取了具体步驟来取消荷兰軍事代表团。还有同样重要的是，在韦洛坡政府执政一年多的時間內給人民提供了机会，使他們更了解和認識荷、美、英帝国主义以及充当它們的走狗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政策是多么恶毒。

这一切表明，在面临組織新政府以代替韦洛坡內閣的时刻，社会力量对比的形势是有利于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尤其有利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执行战争政策方面以及在經濟、外交、軍事各方面正遭到更多的失敗。

根据上述客观现实，鉴于印度尼西亚民族和人民的善良和真誠的願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現在提出建立統一战綫政府的要求是恰当的，**这个統一战綫政府就是沒有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买办和地主分子参加在內的、因而得到議會內外整个民主力量包括工农力量支持的政府。**这个統一战綫政府有責任执行各民主党派一致贊同的进步綱領。

韦洛坡政府給印度尼西亚人民提供了更具体的經驗，这就是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領導阶层中的反民族分子和政治敗类是人民的敌人和專門从事破坏一切进步和民主活动的家伙。这点應該成为印度尼西亚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的經驗教訓。只有傻瓜才不会迅速地从以往事件中吸取教訓！

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日益陷于孤立和窘境的情况下，他們已慣于进行恐吓和挑衅。他們已无力用政治方式来对待政治問題。对于这一切，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正直的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必須警惕，必須冷静而深入地，但又以坚强的决心和意志与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来进行思考。

印度尼西亚人民，不論是在农村、街道、工厂或任何地方，都必須直接表达他們对目前組織政府問題的意見。总统、組閣人、議會和各政党有責任認真和仔細地考虑人民的意見和意願。

将来的政府必須比韦洛坡內閣更进步！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国内外的力量对比有利于人民和民主。

建立一个具有进步綱領的統一战綫政府！

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于雅加达

組閣人理应交回他們的委任書

目前公眾輿論是：立即組織沒有馬斯友美黨
和印度尼西亞社會黨參加的內閣

馬斯友美黨決定提出穆罕默德·羅姆為組閣人，這是一件政治上的怪事。每個人都知道，韋洛坡內閣之所以倒台，正是由於穆罕默德·羅姆的極端反動的政策。

因此，一開始就可以斷定，只要印度尼西亞民族黨還堅持它的綱領，執行極端反動政策的馬斯友美黨和使韋洛坡內閣倒台的罪魁穆罕默德·羅姆是不可能同印度尼西亞民族黨和曼貢沙哥羅達成協議的，即使怎樣強迫也是辦不到的。

因此，人們的推測是有根據的，他們說，馬斯友美黨提出穆罕默德·羅姆為組閣人其實是馬斯友美黨的一種“策略”，它故意要使組閣失敗，以便失敗後馬斯友美黨“更有理由”重新提出它原來的建議，即組織以哈達為首的內閣。為了馬斯友美黨這種“策略”的利益，已經把非常寶貴的一個星期的時間浪費掉了！

羅姆不能夠接受曼貢沙哥羅關於解決丹絨摩拉哇事件、北蘇門答臘油礦國有化、消滅伊斯蘭教國運動和其他恐怖集團、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印度尼西亞擺脫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約束等原則問題的意見，這再一次證明馬斯友美黨是多麼反動，多麼反民主和反

民族。

十分明显，如果不立即要曼貢沙哥罗和罗姆交回他們的委任书，尤其是如果总统把他們一个星期的組閣时间加以延长的話，那就意味着使馬斯友美党有更多机会来玩弄它对民族利益极为有害的政治把戏。

由于曼貢沙哥罗和罗姆的工作遭到失敗，我們就面临着必須指定新的組閣人这一新的现实。

公众輿論已經认为，馬斯友美党在未来的內閣組織中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政党。馬斯友美党內部的分裂日益加剧，馬斯友美党党员对其相互傾軋的領導人的不信任日益增长，总之，該党本身的危机，已使馬斯友美党变得很弱了。为了克服这个危机，他們一直紧紧抓住他們的护身符穆罕默德·哈达先生。因此，我們已經可以断定，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将会再提出哈达担任組閣人和內閣总理的建議。

但正如我們最近所看到的，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这个建議将会受到各民主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人們往往錯誤地把哈达描写成好像是一个“坚强的”和“清白的”人，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誠然，哈达是一个固执己見和喜欢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这完全不是一个坚强的人所具有的品性，而是与此相反的人所具有的品性，一个沒有远見的独裁者的品性。印度尼西亚人民已亲身尝过哈达和苏丹·阿卜杜尔·哈密所制定的禍国殃民的圓桌會議协定所带来的苦难，印度尼西亚人民不会忘記哈达是使数万人民的生命遭到牺牲的茉莉芬挑衅事件的制造者。哈达是馬斯友美党不公开的領袖，因此把哈达看作是一个无党派人士，那就太天真了。有必要指出这一切，因为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

會黨經常提到他的名字，把他說成是最適合擔任組閣人和內閣總理的“聖人”。

從議會制民主的慣例和社會力量對比的角度來看，在目前情況下，唯一有權利組閣的是印度尼西亞民族黨。因此總統的任務是指定印度尼西亞民族黨擔任組閣人。而對印度尼西亞民族黨來說，為了能夠執行符合於該黨綱領的進步政綱，它就必須要敢于建立一個沒有馬斯友美黨和印度尼西亞社會黨的破壞者參加的內閣，一個民主的部長占絕大多數的內閣。

一九五三年六月於雅加達

反动派的歇斯底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实行的民族的政策已經使人民的敌人产生了歇斯底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民族的政策已經把反动派搞得如此猖獗，以致反动派連要从哪里下手打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成了个大难题。有些报纸想打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但是手法太拙劣，結果反而打到他們自己身上，甚至不自觉地帮助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更得人心。他們試用社論来打击，无效；他們試用漫画来打击，又枉費心机；他們試用短評来打击，也不起作用。各种誹謗已經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駁得体无完肤，很难找到市場了。

他們也采用其他办法。他們写匿名信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暗中散布流言。他們唧唧咕咕地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應該发表許多声明，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声明会使犹豫不定的人逃开。其实犹豫的倒是他們自己，但他們却說別人犹豫来作掩飾。誠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每一項声明都是正中要害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每一項声明都彻底揭露了人民的敌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應該发表許多声明的說法，就是害怕反动派的面具将完全被揭穿的表现。政治不是領導者的私产，而是人民大众共有的，因此必須使人民了解每一新的政治形势。这是对人民非常有益的政治教育。

外国壟断資本集团看到人民要求組織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的民族統一战綫政府，就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进行活动。他們撥了更多的錢，派他們的代理人四处收买不坚定的政党领导人。例如，巴达夫石油公司，它不仅利用金錢，而且还利用巴厘巴板和北苏門答腊的廢铁当作誘餌来引誘不坚定的政党领导人。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居然能够被人用金錢和廢铁收买去，印度尼西亚的命运真是可悲之极！而这就給組織新內閣造成了困难。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短時間內就已能給人民指出，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人民的朋友，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人民的敌人。在人民的敌人的队伍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以馬斯友美党之类的保守的政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之类的右翼社会党为首的这一批政党和人物。人民知道，馬斯友美党所謂的“伊斯兰教”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所謂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它們不外是巴达夫石油公司、日里农場主联合会、东苏門答腊橡胶园主联合总会、农业总辛迪加⁽¹⁾等等的利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民族的政策在短時間內，就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其假面具撕破，这对于今后印度尼西亚政局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面临組織新閣时所执行的民族的政策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把以下现实情况摆在人民的面前：要么組成反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和拥护議会的民族內閣，要么組成由日里农場主联合会、东苏門答腊橡胶园主联合总会、农业总辛迪加、巴达夫石油公司等等外国壟断資本集团所支持的、拥护伊斯兰教国运动并反对議会的馬斯友美党内閣。

目前印度尼西亚人民所面对的問題并不是像一些反动报纸所誣蔑的那样，要共产党政府还是要反对共产党的政府，而是要議会

制的民族政府还是要支持恐怖行为、反民族、反议会、反人民的馬斯友美党政府，二者只能擇其一。在这問題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选择的是一个准备执行議会的決議并願意消灭恐怖集团的民族政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种政策受到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大部分人民的欢迎。总统、議會、組閣人和报社收到的成千成万份的声明，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的明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坚信，印度尼西亚人民将坚决选择民族政府，并将坚决反对目前正由一些幕后的組閣人以訛詐、賄賂、恐吓和挑拨的办法筹划成立的拥护伊斯兰教国运动的馬斯友美党政府。人民也将反对組成一个由哈达领导的馬斯友美党政府，即哈达、沙里尔和納席尔今年六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在都庫(奔渣)⁽²⁾举行的會議中所决定建立的政府。人民之所以要反对这种政府是因为經驗已經教育了人民，这种政府必定是会援助恐怖集团而不会去执行議会的決議的。

只要有良好的願望、老实的态度和忠誠为祖国服务的精神，要把印度尼西亚从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等恐怖行为有关联的骯髒和血污的手中挽救出来，現在为时尚不晚。

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們必須密切注意，以防止出現不負責任的鹵莽行为。人民的觉醒已經使成立拥护伊斯兰教国运动和反对議会的內閣成为不可能了。

調动一切力量組成民族統一战綫內閣，民族統一战綫內閣是印度尼西亚当前的唯一出路！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于雅加达

民族統一戰綫內閣 是唯一的出路

一、虽然慕加多組織新聞的工作沒有成功，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仍然对慕加多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为克服当前沒有政府的状态而作出的認真努力表示贊賞。

二、慕加多在第一阶段的失敗，是因为馬斯友美党的买办分子恫吓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以致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突然退出。第二阶段的失敗，是因为馬斯友美党故意提出一些由于公然維護帝国主义利益和具有压迫人民的政治行徑而为人民所深恶痛絕的人物，甚至还提出了与国家的敌人——“伊斯兰教国运动”有勾結迹象的人物，所以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及其他比較进步的政党不可能接受。

三、慕加多的失敗再一次地說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主張和公众的輿論是正确的，那就是已經不再是非組成以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馬斯友美党为核心的內閣不可了，因为这两个党长期以来就已存在着原則性的分歧。在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方面，根据其綱領，它是反对伊斯兰教国运动，拥护議會；而在馬斯友美党方面，它事实上是拥护伊斯兰教国运动，反对議會。馬斯友美党所要求的虽是以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馬斯友美党为核心的內閣，实际上是馬斯友美党独裁內閣，它不可能执行議會決議，也不可能消灭伊

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等集团。

四、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組成有工人和农民的真正代表参加的民族統一战綫內閣。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促进所謂国内和平，就是說，全国所有的力量团結一致，反抗外国侵略者、地主和民族敗类。这样的政府就是沒有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中拥护伊斯兰教国运动和反对議会的买办和地主分子参加的政府。

五、沒有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参加的民族統一战綫政府一定能够在获得議会多数票（即参加政府各党派的党团和真誠支持这一政府的其他党团和个人的票数）的情况下組成。

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号召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坚持并全力爭取实现自己的要求：組成沒有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参加的，实行进步政綱的，以及願意执行議会決議和願意真正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及其他恐怖集团的民族統一战綫政府。

执行議会的決議！

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及其他恐怖集团！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于雅加达

建立民族統一戰綫政府的 时机已更加成熟了

是把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
的問題明确列入內閣政綱的时候了

布哈努丁·哈拉哈普組織新聞的失敗再一次证明，把“以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为核心的內閣”当作救世主的奇談怪論已經陈旧不堪，再也沒有市場了。馬斯友美党内閣沒有組成，印度尼西亚因而得以摆脱馬斯友美党的法西斯危險，这个党与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和荷屬东印度民政署〔1〕的代表人物相勾結，而且是反議會、反民族、拥护恐怖行为、拥护政变和拥护大逮捕事件的。

印度尼西亚沒有政府至今已超过一个半月了。出乎一部分人的意料之外，人民对这种情况完全沒有感到厌烦，相反的，目前在人民当中出現了这样的想法：与其組成产生圓桌會議協定的哈达式內閣，产生罢工禁令的納席尔式內閣，产生八月大逮捕事件的苏基曼式內閣，倒不如不要匆匆忙忙組成新的政府。因此，对人民來說，問題并不是像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領導人所主張的那樣，只要組成新的內閣就行了！人民耐心地 and 满怀信心地等待和推动建立一个比韦洛坡政府更进步的、至少是能够坚决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

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等恐怖集团并贯彻执行有利于人民的議會决議的政府。

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上，只有現在人民才积极地和直接地参与組閣的工作。人民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通过决議、派遣代表团，等等。这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曾以各种方法和借口禁止人民进行政治活动的殖民主义者是一个严重打击。現在人民开始警惕地监督各政党和政党领导人的一切活动和措施。政党的每一变化，某种偏向的每一迹象，前进一步或后退一步，都会立即为人民所觉察。人民的这种监督，对确实願意进步的政党及其领导人來說，是促使他們更加进步的一种推动力，相反的，对那些原来就对人民存有恶意的人們來說，却使得他們的处境更加困难，并使他們感到恼火。这样一来就使人們更加清楚誰是人民真正的朋友，誰是人民真正的敌人。

要求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及其他恐怖集团的强大的人民压力和强有力的公众輿論，已經使馬斯友美党处在孤立窘迫的境地，据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独立报》的报道，連馬斯友美党的发言人阿布哈尼法医生也不得不承认伊斯兰教国运动是国家的敌人，必須予以消灭。我們知道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問題是明确列入曼貢沙哥罗（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政綱的。但曼貢沙哥罗这个“方案”，竟为罗姆法学士（馬斯友美党）所拒絕。因此，阿布哈尼法的声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馬斯友美党领导方面的立場，这还是一个疑問。如果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确实是被迫把这点当作自己的立場，那末，这就是人民反对恐怖行为的斗争的一个大胜利。这样一来，不願把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問題明确列入內閣政綱的人們就完全沒有理由了。因此，把消灭伊

伊斯兰教国运动問題明确列入未来的內閣政綱中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把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問題明确列入內閣的政綱，就会奠定并确立国家机构和人民为消灭敌人而实行的合作的基础。

关于指定新的組閣人的問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應該指定在执行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及其他恐怖集团的政策方面不被人怀疑的、并願意全心全意执行有利于人民的議會決議的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向新的組閣人建議，應該組成一个有工人和农民的真正代表参加的、拥护議會和反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及其他恐怖集团的民族統一戰綫政府。由于这样的政府只有在沒有破坏分子参加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工作，因此，当然不應該允許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領導人参加，他們在韦洛坡內閣中的所作所为显然是破坏一切进步措施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向人民，首先是向工人和农民呼吁，他們應該繼續全力爭取实现自己的要求，以組成一个认真执行議會決議和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及其他恐怖集团，并具有进步政綱的民族統一戰綫政府。利用群众活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及其他合法活动，使这一要求更强而有力！統一戰綫政府的建立不仅取决于議會內的多数票，不仅取决于民主政党的态度，决定性的条件是人民自己的行动。让人民的敌人在声势浩大的人民行动面前发抖吧！

未来的胜利不屬於恐怖分子，不屬於法西斯分子，不屬於荷兰和美国及其走狗，未来的胜利屬於人民，屬於民主，屬於印度尼西亚。我們應該像我們的英雄和偉人所教导我們的那樣，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

建立民族統一戰綫政府!

执行議會決議!

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及其他恐怖集团!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于雅加达

民主对法西斯的輝煌胜利

更激烈的斗争刚刚开始，人民的
警惕性必须继续提高

当从沙横到馬老奇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听到組成了一个沒有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领导人参加的新內閣的时候，我可以想像得出他們是多么高兴。这种高兴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是在人民的压力和要求下首次組成的內閣。这个內閣的組成使一切关于“以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馬斯友美党为核心”的必要性的奇談怪論都被彻底粉碎了。同样，那些企图强迫組成總統制內閣的人所进行的蹂躪宪法的活动也完全失敗了。这再一次证明，印度尼西亚的命运并不决定于反动政党的领导人，不决定于荷屬东印度民政署的同謀者，也不决定于外国大資本家和地主，而是完全决定于民主政党和民主人士。

新閣的組成决不意味着反对法西斯分子和荷屬东印度民政署的同謀者的斗争已經結束。还差得远！由于执行极端反动的政策而陷于孤立的反动分子将会进行各种罪恶活动，而他們在进行这种种罪恶活动当中是得到外国大資本家的全力支持的。利用金錢和廢铁进行賄賂的行为，目前已經很多，日后将会更加猖獗。同时，在采用政治手段失敗之后，他們将会采用恐怖手段。除此以外，他

們就不会有其他办法。因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組成沒有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参加在內的新內閣，不过是意味着进步和民主势力反对反动势力和法西斯势力的更激烈的斗争剛剛开始。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号召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更加警惕，时刻注意人民敌人的一举一动，注意他們所进行的挑衅、恐吓和詭詐活动。但是，要勇敢、沉着、毫不畏縮地应付这一切情况！那些軟弱的、胆怯的和畏縮不前的人正合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的口味。

今后，新政府所面临的重大問題必須提到工厂、修配厂、机关、学校、城鎮、农村的人民中間去討論。这就能够保证人民对这个政府的进步性給予支持，对它的不够正确的措施提出有益的批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希望新內閣能坚持組閣人旺梭尼哥罗七月二十三日在国家宮所提出的政綱以及有关該政綱的說明，新內閣应尽量吸取前届韦洛坡內閣的經驗教訓。最重要的教訓是，閣員是有可能被外国大資本家收买来采取反动措施，从而使內閣和人民对立起来的。內閣中的民主分子應該始終保持警惕，大胆地采取有利于人民的措施。

新政府應該滿足人民在組閣期間所提出的要求！

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于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农民运动的前途

这篇文章是为了给当时的农民运动指出出路而写的，当时农民运动的表现是农民团体的发展陷于停滞状态，农民斗争还没广泛开展，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领导。

艾地同志在这篇文章里严正地批评了不符合印度尼西亚现阶段革命要求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也批评了一些干部脱离农民群众的工作作风。他指出正确和革命的土地纲领不应是“土地国有化”，而应是“土地归农民”。文章对党员进行农民工作的作风问题也确定了具体的原则。它着重指出干部仔细地对农村土地关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农民进行政治和组织教育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的要点后来都归纳到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土地纲领中了。

印度尼西亚的农民运动，同工人运动比较起来，还非常落后。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中组织起来的大约只有一百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也不过是四、五百万人，约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七。

我们的农民运动这样落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农民没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要求，因而不需要有作为争取实现他们的要求的武器的组织的组织呢？远非如此！印度尼西亚农民，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一样，仍然缺少耕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而各种形式的封建剥削，如波罗哥罗、强迫劳

役〔1〕等等迄今仍然存在。

那末，为什么极大多数的农民迄今还未組織起来，农民的斗争还不广泛、还不普遍、还没有得到良好的领导呢？

許久以来阻碍着农民运动发展的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即：**还没有制訂出正确和革命的土地綱領；党在农民中間的工作未臻完善。**

关于土地綱領

迄今我們还没有正确和革命的、获得农民充分信任的、从而获得农民拥护的土地綱領。自一九四七年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在任抹召开代表大会时起到現在，在大約六年的時間里，我們采用了实际上使农民产生疑虑的綱領和口号，因而这些綱領和口号还不能为农民所了解。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綱領要求“**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搬用了这个綱領并提出“**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党的干部和党员曾經努力使农民相信过去的这些土地綱領。但經驗表明，过去的綱領并不能鼓起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动員群众去实现这些綱領。农民群众对我们的土地綱領表示冷淡甚至往往表示疑虑。

因此，为印度尼西亚农民制訂正确和革命的、获得农民信任的、能鼓起农民积极性并能动員农民的綱領，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首先由即将举行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担負起来，这次會議将要檢查过去的党的綱領并制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新的更正确的綱領草案，以便提交党代表大会。

为了能够制訂正确的土地綱領，首先我們必須切实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封建主义势力到底有多大。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已占

統治地位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封建主义当然已不再是完整地、百分之百地存在着的。目前仍然存在于印度尼西亚的，是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第一，依然存在着大地主对农民耕种的土地的壟断权，大多数农民不可能拥有土地，因而被迫不问任何条件向地主租借土地；第二，农民向地主繳納实物地租，这种实物地租占农民收成的很大一部分，使大多数农民貧困化；第三，在地主土地上实行的劳役地租制度，使絕大多数农民处于奴隶的地位；最后，多数农民負債累累，使他們处于被地主奴役的地位。**

有人认为，一八七〇年土地国有法〔2〕頒布后，印度尼西亚就不存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了，这种看法是非常錯誤的。目前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关系，恰恰证明了依然存在着对农民的封建剝削。事实表明，外国地主和印度尼西亚地主及貴族控制了大量土地，而村社的土地权則逐漸消失，这些土地**事实上**是落到地方长官、高級官員、富有的伊斯兰教界上层分子及其他有錢人的手里。

一八七〇年的土地国有法，即荷屬东印度政府对土地权的确认和声明，完全沒有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实质。这个法令不外是荷兰殖民者为了便于壟断資本家获得农場所需的土地的一种措施。它完全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土地国有化。不論是印度尼西亚的或者是外国的地主依然保持着他們对土地的**实权**。国家对土地的权力只是形式上的，只是法律上的。形式上，壟断資本家使用土地是有期限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土地的使用期限是容易延长的，因此可說是无限期的〔3〕。

封建残余依然存在的結果是：农业技术非常落后，因此，农民

必須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而所获則甚微;絕大多数农民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們沒有或缺少土地,并且遭受到各种封建剝削;国内市場日益萎縮,因为农业生产日益下降,因为农民的收入如与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漲比較起来則太低,以致农民的购买力異常薄弱;国家工业化不可能实现,因为約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沒有足够的力量购买工业品。

事实表明,土地私有观念在我国农民生活当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印度尼西亚的农民只能接受沒收地主的土地并无代价地分配給农民作为他們的私有财产这样的土地革命。这就是农民对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口号和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的“全部土地国有化”口号表示冷淡和疑虑的原因。直接在农民中工作的党的干部馬上就发觉这种口号是不正确的,这也是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从一九五二年初起就不再宣傳“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口号的原故。因此,我們本身的經驗表明,企图使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或企图实现全部土地国有化的綱領并沒有受到农民的欢迎,反而引起农民的疑虑,因为农民认为这是企图拿走他們的土地的一种手段。

根据上述事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就是消灭封建残余,开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并无代价地分配給农民作为他們的私有财产。沒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給农民作为他們的私有财产,完全不是意味着对拥有現代化技术的农場土地也要这么办。这种土地和森林地必須交由国家控制。此外,富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不得加以沒收,而中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則必須受到政府的保护。

把土地分配給农民作为他們的私有财产是否就意味着土地私

有制度是最好的、不可改变的制度呢？决非如此！我們知道，将来，人数最多的阶层的劳动农民会根据自己在土地革命胜利后的經驗得出結論，认为很有必要將他們的小块土地和劳动工具并入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大規模的集体农业組織中来，以便从国家那里取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其他农业机器等的援助。換句話說，我們的劳动农民就这样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农民本身的經驗以及党的領導和教育將使农民觉悟起来，自願地放棄土地私有观念。

由此可見，我們的正确的口号并不是“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或“全部土地国有化”，而是：“**土地归农民**”、“**分配土地給农民**”和“**实行农民土地个人所有制**”。这些口号是最正确的、最合理的，因为除了农民之外沒有別人会比他們更有权利获得土地，原因是耕种土地和世代代用自己的汗水澆湿土地的是农民。提出这些口号，农民就一定不会怀疑我們的綱領，相反的，农民将会竭力拥护它，而这是紧密的工农联盟的保证、强大的民族統一战綫的保证、我們胜利的保证。

关于党在农民方面的工作

党员和預备党员已經习惯并能順口說出这样的詞句：“沒有民族統一战綫，就沒有胜利”以及“沒有紧密的工农联盟为基础，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民族統一战綫就不可能成为强有力的武器。”

在党内也經常談到，在工人和农民中間的工作乃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最重要的和基本的活动方式。但是，这个問題显然还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这一点，我們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比較起

来农民出身的党员是太少了，没有一个党员真正熟悉或者只有极少数党员了解各种土地关系、农民的各种要求和生活情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目前严重的缺点是在农民工作方面。这种情况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从农民中间吸收更多的新党员并且教育他们成为好的党员。在农村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必须努力去了解和真正熟悉各种土地关系、农民的各种要求和生活情况。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党的各级负责人、干部和党员的人数必须增加。

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克服党在农民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只有认真地克服了这些缺点，才能谈得上为建立反封建的工农联盟作了实际的努力，而这意味着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基础。

农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帮助农民争取实现他们的日常要求的斗争。只有通过为实现农民部分的或日常的要求而进行的反对地主、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通过组织和教育农民的工作，农民的斗争才能提到更高的阶段。没有事前进行组织和教育农民的工作，没有事先在农民中间进行细小的、繁琐的、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工作，就把农民的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那就意味着走上严重危害农民运动和整个民族运动的冒险的道路。

革命农民运动进展的障碍之一，就是在农民团体中工作的党员和党的干部中间，还有人同地主保持着思想联系，或者他们本人就是地主。这种党员和干部，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帮助党的工作，但我们近六年来的经验表明，他们是革命农民运动进展的障碍，他们并不坚决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因为剥削农民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对于这种党员和干部，党必须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农民要求土地的利益是不可能和地主的

利益調和起来的,因为我們不能脚踏两只船,一脚踏在农民的船上,另一脚踏在地主的船上,必須使这种党员和干部完全摆脱他們同地主的思想联系,或者放棄他們自己的地主立場。必須逐漸地并有計劃地让那些在保卫农民利益中經得起考驗的好干部去掌握农民团体,同时必須让越来越多的雇农和貧农出身的干部参加到农民团体的领导机构中去。在农民中間,首先是在雇农和貧农中間发展党员,并将雇农和貧农出身的党员培养成为干练的农民的领导人,这是我党非常重要的繁重的任务。

目前还有許多党的各級負責人、干部和党员逃避去农村工作,这种情况也大大阻碍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农村工作較之城市工作更为繁重,由于党员还没有深刻認識到农村工作对党和革命的重大意义。住在农村就意味着远离了城市的繁华生活、远离了各种娱乐、远离了飯館,以及远离了现代化的科学文化中心,等等。住在农村就意味着必須过着非常簡朴的生活,必須适应貧困的和眼光还十分短淺的农民的情况。

只有思想坚强的干部和党员才敢到党的面前来并說,“派我到农村去,因为党需要我到农村。”只有思想坚强的干部才能全心全意地执行党关于到农村去的指示。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同农民建立亲密的关系,才会为农民所热爱,才会亲身体会到他的工作对党和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快乐和进步并不是仅仅在城市才能获得,在农村也能获得。在农村工作期間所获得的宝贵經驗和进行的辛勤学习证明,在农村工作的党员不見得就会落后于那些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和党员。此外,党是十分重視那些在农村中为农民群众认真地頑强地进行工作的党员和干部的。

有些在农村工作的党的各級負責人和干部喜欢这样說,在他

們那个地区沒有农民运动的“对象”或目标。他們說，在那里沒有必須由农民占用的土地，在那里沒有必須向之提出減租要求的地主，在那里沒有必須向之提出減息要求的高利貸者，在那里沒有水利灌溉問題，沒有強迫勞役問題，等等。总之，他們那个地区的农民沒有任何要求，因此农民就无法发动起来，也正因为这样，他們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或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就不能发展。

上述說法自然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疑問：这是不是說那个同志工作地区的农民已經解放了，已經拥有土地而且他們所拥有的土地已經足够了呢？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个同志工作地区的农民的生活已經富足，以致农民再也沒有其他要求了呢？我們向那个同志提出这些問題之后，通常会引起他的思考，因为他知道他那个地区的农民也和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离开富足的生活还很远。于是他自己便認識到，实际上他对各种土地关系一无所知，对自己地区农民的要求与生活情况毫不了解。假如不向他提出上述問題，通常他是不会想到这些問題的。

当我們在农村的干部进行工作并且认真地注意农民的問題和生活之后，他們通常就会了解到，該地区的农民还有很多要求，例如：減租、減低高利貸者的貸款利息、減低国家賦稅的要求，取消积欠的土地稅、取消对农民的強迫征繳、取消波罗哥罗和強迫勞役的要求，将农民耕种已久的荒地变为农民合法财产的要求，将沒有耕种的荒地分配給农民的要求，农民自由决定他們出租給外国农場的土地的租金的要求，消灭恐怖集团的要求，政府給予种子和农药援助的要求，开办农业学校的要求，取消证明书費用的要求，修繕旧的和兴建新的水利灌溉工程的要求和乡村政权民主化的要求，等等，等等。

党的干部和党员的责任是：通过同农民协商来决定什么是某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最迫切的要求。为了实现每一项要求，可以提出口号发动斗争，例如提出：“减租”、“减低贷款利息”、“减低国家赋税”、“取消积欠的土地税”、“取消对农民的强迫征缴”、“取消波罗哥罗”、“取消强迫劳役”、“不得侵犯已为农民耕种的土地”、“将没有耕种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有权决定他们出租给外国农场的土地的租金”、“武装农民，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及其他恐怖集团”、“给农民以种子和农具的援助”、“每一个区设立一所农业学校”、“取消证明书费用”、“修缮旧的和兴建新的水利灌溉工程”、“建立保护人民的乡村政权”，等等口号。这里所列的还没有包括农民日常要求的全部口号。要在这里列出全部口号那是太多了。

我们在上面列出这许多口号，完全不是说要去发动一个争取一下子实现所有上述口号的总斗争。在发动一个斗争以前，必须先要在党的组织内就应该发动什么斗争、提出什么口号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在党的组织内讨论成熟之后，还须要提交农民团体的会议去讨论。如果农民同意了，就应该准备、组织和领导这个斗争。将要发动的这个斗争必须真正为农民所了解，必须真正成为农民本身的斗争，同时斗争的口号必须是最易为农民所接受和理解的。

每一项要求必须和农民团体的实际力量相适应。如果组织还薄弱，要求就不可以提得过高，应限于在尚未强大的组织力量支持之下大致可能实现的范围。组织越有力，提出的要求就可以越高，能够发动的斗争也就越多。在决定提出什么要求时，应始终掌握这样的方针：“小而有效”。

只有在农民中间从事实际的工作，只有领导农民争取实现他们日常的要求，争取实现看起来是细小的、繁琐的和无关紧要的要求，只有这样，党的干部和党员才能同农民建立亲密的关系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只有通过争取实现看起来是细小的、繁琐的和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斗争，农民团体才能日益坚强、扩大和巩固。

只有通过组织和教育农民的工作，农民的斗争才能提到更高的阶段。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农民才能受到教育和动员起来，以致具备成熟的条件来实现“土地归农民”、“分配土地给农民”和“实行农民土地个人所有制”等口号。

只有这样，党才能帮助农民进行反对封建主以取得土地的斗争。这就是建立作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的反封建的工农统一战线的条件。没有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农民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力量。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失败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发动并争取千百万农民群众到革命中来，我们必须时刻记取这一教训。党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四八年茉莉芬挑衅事件中因反动派的打击而遭到重创的原因，就在于农民还没有成为党的巩固的后盾，这也是我们必须记取的教训。

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本问题，只有在革命中同农民结成联盟，革命才能获得胜利。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即共产党必须成为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同时成为农民的领导着。

这就是我们在实现党的当前任务时必须采取的步骤，党的当前任务就是消灭封建残余、开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无代价地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印

度尼西亚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土地革命。

我們坚信，有了革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土地綱領，有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在农民中間进行积极的工作，我們的农民运动将面临一个印度尼西亚农民运动史上空前的光輝灿烂的时期。

民族團結和民族警惕

國內外形勢有利于民主和平

這篇文章是為慶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革命爆發八周年而寫的。這個革命的目標尚未實現。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簽訂的圓桌會議協定恢復了荷蘭帝國主義對印度尼西亞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控制。儘管這樣，人民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制止不了的。艾地同志指出，每年的八·一七紀念日都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為廢除圓桌會議協定而鬥爭的日子。由於共產黨人忠於八月革命的目標，因而他們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列。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警惕性更加提高了，以致沒有任何一個黨派敢公開為圓桌會議協定辯護。反對圓桌會議協定的民族統一戰綫日益擴大，這是反動派阻擋不了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雖然因為民族叛徒簽訂了使印度尼西亞人民感到耻辱的圓桌會議協定而遭到失敗，但印度尼西亞人民仍然把八月十七日看作是每年應該慶祝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節日。到目前為止，八月十七日仍然是印度尼西亞人民最偉大和最重要的民族節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是全體人民反抗殖民主義者的統治的民族團結一致的節日。印度尼西亞人民依靠這種團結一致，拿起武器，為完全的民族獨立、改善生活、民主和持久和平而奮鬥。

在美國帝國主義監督下，荷蘭帝國主義者於一九四九年所強

迫簽訂的圓桌會議協定使印度尼西亞由獨立的和擁有主權的共和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圓桌會議協定成了印度尼西亞實現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任務的巨大障礙。

圓桌會議協定的簽訂，使荷蘭帝國主義者得以保持它對印度尼西亞的控制。該協定規定印度尼西亞是荷蘭女皇庇護下的印度尼西亞荷蘭聯邦的成員，印度尼西亞的外交政策和對外貿易受荷蘭政府控制，帝國主義者在工業、商業和金融方面的一切重要企業是不可侵犯的，荷蘭殖民政府的民政官員和軍事官員繼續在印度尼西亞任職並得到比印度尼西亞官員高得多的薪俸和待遇。這一切事實表明印度尼西亞目前的獨立是多麼不完全和不真實。

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領導下，取消圓桌會議協定的鬥爭愈來愈廣泛和強大，愈來愈多的政黨、群眾團體、科學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支持取消圓桌會議協定的政策。

在要求取消圓桌會議協定的鬥爭堅決地進行了三年半之後，目前再也沒有哪一個政黨、團體或個人敢公開說圓桌會議協定是維護印度尼西亞人民利益的協定了。在人民的壓力和要求下，不論韋洛坡政府或現在的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都被迫在其政綱中列入重新考慮圓桌會議協定和廢除該協定中直接損害印度尼西亞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條款，特別是有關財政和經濟的條款的問題。

圓桌會議協定簽訂以來，每逢八·一七紀念日，印度尼西亞人民都利用這個節日就取消圓桌會議協定問題提出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圓桌會議協定這個詞對印度尼西亞人民來說是意味着苦難和貧困，殖民統治和暴虐。印度尼西亞人民不必閱讀訂成厚冊的、條文冗繁的英國協定，只要根據自己直接的和慘痛的經驗就可以領

会圆桌会议协定的意义。

今年的八·一七紀念日是在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极为有利的特殊情况下庆祝的。

第一，今年的八·一七紀念日是在充满着全人类的极深切和广泛的和平願望（包括西方各大国的願望，战争挑撥者所統治的美国則除外）的国际环境中庆祝的。这是苏联和平政策和苏联政府近几个月来采取的新的和平建議的結果。

第二，这个节日是在今年七月签订了朝鮮停战协定〔1〕的情况下庆祝的。这是全世界和平陣营的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的胜利。这也是苏联政府提出的以和平解决一切国际爭端原則为基础的偉大而卓越的政策的结果。这个偉大胜利之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朝鮮人民軍和中国人民志願軍的坚忍不拔精神、是由于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和平政策、是由于全世界和平陣营的极强大的压力。

第三，这个节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規模建設获得空前成就的情况下庆祝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直接感到中国人民的偉大成就就是他們自己的成就。正直的印度尼西亚人，从教授到工厂、农場工人的領導人和农村农民的領導人，都把目前中国所取得的一切进展看成是在友邦中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应该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榜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使愈来愈多的印度尼西亚人（包括科学家和民主政党领导人）向往中国。他們把中国人民的胜利看作是“东方的胜利”。

第四，这个节日是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团結力量和民主力量比前几年强大得多的情况下庆祝的。这种日益强固的民族团結，使反动派再也不能輕易地在向右轉的韦洛坡政府被民主力量

推翻之后另組反动政府。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日益強固的民族團結，才有可能举行各种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这些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得到各民主政党和群众团体的支持，如日惹、三宝壠、泗水、斗橫、尖美士、棉兰等地有几万人参加，万隆和馬查連加有十万人参加，雅加达有十三万多人参加。这些群众大会要求成立一个实行民主綱領，首先是尊重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所要消灭的議會民主，并认真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²⁾及其他恐怖集团的政府。在数百个城乡居民点、工厂、修配厂等地也举行了提出同样要求的集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日益強固的民族團結，才使持續了五十八天之久的政府危机宣告結束，在七月三十日成立了比韦洛坡政府更进步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这一政府沒有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参加，它答应执行群众大会和人民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

第五，今年的八·一七紀念日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群众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开始更好地受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說和毛澤东思想的指导的情况下庆祝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和党的同情者迅速地增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始起它作为工人階級的團結、工人階級和农民的團結及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統一战綫的鼓舞者和組織者所應該起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完全的民族独立、民主、改善人民生活 and 持久和平而进行的坚决斗争，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极广大的群众中赢得了很大的影响，它更为人民所爱戴，人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忠誠的、坚决的和正直的保卫者。

在回顾印度尼西亚人民独立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获得的迅速而巨大的发展时，印度尼西亚的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人，永远

記住兄弟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列宁式的党在經驗上和理論上所給予的援助。这两个偉大的党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导师，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鼓舞者和推动者。

在回顾印度尼西亚人民独立运动所获得的迅速而巨大的发展时，我們應該回忆起我們的民族英雄和偉人的功績和斗争。我們得感謝他們，由于他們，由于他們在祖國土地上树立的光荣傳統，我們在祖國的独立斗争中才获得了胜利。

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一七紀念日里，我們想起了我們的英雄和偉人的无畏精神、英雄气概和光荣偉大。沒有他們，我們就不会有今天！

国内外的反动派看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胜利大为震怒。他們不願看到印度尼西亚人民夺回因圓桌會議协定而丧失了了的独立。他們仍然想要使印度尼西亚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他們要动員他們的全部力量，并利用他們的每个机会，来粉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独立运动。他們繼續保持他們的制造分裂、在各族之間和宗教界中間挑撥离間、进行恫吓和挑衅的反动的傳統伎倆。

面对着反动派的往往是极其卑鄙齷齪和阴險的各种活动，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須始終保持警惕。我們既要保持警惕又要满怀热情和勇气十足，粉碎反动派的一切图謀。目前的问题是，不是我們打敗反动派，就是反动派啃掉我們！因此，我們必須勇敢！胆怯的人就容易被反动派啃掉，要是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反动派的胜利。

我們警惕地、满怀热情地、勇气十足地繼續进行粉碎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及其他恐怖集团的斗争！我們繼續进行保卫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所要消灭的議

會民主的鬥爭！我們繼續進行取消賣國的圓桌會議協定的鬥爭！
我們繼續進行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民主、改善生活和持久和平的
鬥爭！

在這個激烈而又神聖的鬥爭中，每個共產黨員必須站在鬥爭的最前列。每個共產黨員必須繼承一九二六年人民起義、一九三三年“七省號”軍艦起義、反抗日本法西斯、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茉莉芬挑釁事件期間反抗白色恐怖、粉碎一九五一年八月大逮捕事件以及粉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右翼社會黨人和軍閥的政變等鬥爭中形成的印度尼西亞人民革命傳統。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每一個黨員和同情者都是這個光榮的革命傳統的繼承者！

加强共和国的地位！

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新的一年的基本任务

这是艾地同志为迎接一九五四年写给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新年献词。他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一九五三年发生的、表明民主力量发展的许多重大事件，同时提出了在新的一年里在国内外加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任务。

文章再一次表明了共产党人是竭诚保卫一九四五年宣告成立的共和国，而不是像反动派所诬蔑的那样。

一九五三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愉快的印象。这一年是以人民斗争取得许多胜利，取得国内的或国际性的胜利而告结束的。在这一年里，我们得到了新的力量，精神饱满地来迎接新的一年。

新世界对旧世界的胜利

有哪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不把美国在柏林挑衅事件中的失败和朝鲜的停战，看作是为了拯救人类免于淪入野蛮状态和免于遭到毁灭而进行的人民斗争的辉煌胜利呢？

侵略性的“欧洲防务集团”〔1〕、美国军火大王恢复日本军国主

义的措施，以及美国授意要签订的美巴巴基斯坦协定——这一切都是美国公开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难道不是遭到了全世界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坚决和激烈反对吗？美国大量地散播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种子，但繁荣滋长起来的却是民主和和平的力量。这就是美元或原子弹所不能改变的历史的辩证发展。

斯大林的逝世引起战争挑拨者的各种揣测。他们期望民主和平阵营内部发生分裂与混乱。但是，他们又一次失望了，斯大林逝世后，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却有了新的更高的觉悟，进一步加强团结、加紧工作和提高警惕。

罗森堡夫妇〔2〕遭到杀害——他们的罪状未经证实而且也不可能证实，这只是更加证明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旧世界是如何没有能力通过正常合理的方式去抗拒和平民主的新世界的进展。今年七月底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的成立，使印度尼西亚人民获得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由于统治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依靠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通过会议和游行示威所施加的压力，组成一个与哈达、纳席尔或苏基曼式政府颇不相同的政府是可能的。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带来了 希望并获得了人民的信任

在一定限度上获得人民的支持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已经采取了符合人民愿望的措施，例如，解决了丹絨摩拉哇土地问题、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匪徒及其他恐怖集团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在莫斯科设立大使馆、对西伊里安问题及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问题采取明确的态度、签订了印度尼西

亚和中国的贸易协定、在中央政府几个部和若干机关采取了一些清洗贪污分子和反人民分子的措施、在武装部队内部进行了具有进步性质的人事调整〔3〕、结束了荷兰军事代表团（可惜还没有全部滚出去），以及其他一些措施。

对这样一个刚执政六个月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来说，它所采取的措施是令人兴奋的，而且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这一政府在新的一年里将会采取更进步的、更明确的和更多的措施。

政府在过去六个月里采取的措施，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内外地位。共和国的国内地位已经加强，因为人民已经开始重新信任政府，因为人民感到和看到现政府不同于哈达、纳席尔或苏基曼式的政府的征象。人民看到，在这一政府执政下是有可能争取扩大人民运动的民主权利的。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加强，因为现政府已作出努力来向其他国家表明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像哈达、纳席尔或苏基曼执政时期那样，那时的共和国纯粹是荷兰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尾随者。

但上述说法完全不意味着，我们对现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已经感到非常满意。我们坚信，而且看到这样的可能性：阿里政府是有条件为广大人民的利益采取更多、更明确的措施的。

我们感到非常忧虑的是，政府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建立正常的、有利于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关系，在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免受外国垄断资本剥削和地主剥削方面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态度。政府的这种态度也必将使人民对完全支持政府的措施一事感到犹豫不决。此外，政府的这种态度只能是使勾结匪帮的反对派有机会来操纵政府和政府高级官员。

新的一年任务

基于以上事实，如果政府和人民把下述任务当作自己新的一年任务，那是适当的。这些任务就是：采取更明确的措施来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匪帮及其他恐怖集团；肃清武装部队中发动十·一七政变的法西斯軍閥集团；扩大人民运动的民主权利；制訂有利于工人和农民的劳工法和土地法；清除中央政府各部和各机关中的荷兰“顧問”和“专家”以及贪污分子和反人民分子；密切軍民关系；消除外国壟断資本对重要部門（如碼頭）的控制；实行高度民主的普选；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委员会民主化；更积极地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并在必要时在联合国内外采取主动来維護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在完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同外国的外交关系和經濟关系，并采取具体步骤建立这种关系。

只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願意向人民运动让步，它就会繼續获得人民的支持。政府对人民的让步，并不是政府的一种損失，恰恰相反，它将成为政府本身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力量的泉源。政府对人民的让步以及人民对政府的支持，乃是加强共和国地位的条件。这样，反对派和各种匪帮所掀起的風暴就动搖不了政府的地位。

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所持的批判态度，是数十年独立斗争的教育和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斗争的教育的结果，这种批判态度使人民容易了解政府所采取的各种进步措施，并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措施。但相反的，政府只要采取一次反人民的措施，往后人民对政府的一切措施就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对阿

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來說，重要的是，必須小心謹慎，不要採取損害人民利益的措施，并从上到下对国家机构进行監督，使它們也不採取这样的措施。

印度尼西亚人民必将达到其目的

在进入新的年头的时候，我們坚信，过去的一年打下的基础已为今后更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現在問題在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特别是在于有善良願望和民族意識的領導者們如何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来扩大并加强民族統一战綫，这是实现印度尼西亚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的前提。

經過数十年獨立斗争和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斗争鍛炼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勤勞的、战斗的、英雄的、勇敢的和有高度警惕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必将能够完成他們的上述任务。这样的人民再也不应该受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暴虐統治了，更不应该受卡尔多苏維利約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的匪徒們所建立的伊斯兰教国的統治。

印度尼西亚人民明年所面临的任務简单地說就是如此。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不断傳播 民族团結的理想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雅加达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慕梭大糾正和党粉碎了反动派的各种猖狂的进攻之后第一次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它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各项重大和基本的问题，通过了党的綱領和党章，奠定了建立民族統一战綫和党的建設的基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一致通过了譴責陈舜如主义的決議，陈舜如主义是当时党内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的集中表現。因此，这次代表大会实现了我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組織、政治和思想上的团結和統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大地加速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一般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不断傳播民族团結的理想》一文是艾地同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招待晚会上的講話。他闡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筹备代表大会过程中如何努力最广泛地征求各阶层人民的意見和建議，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能够真正成为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民的斗争綱領，并且达到代表大会的目标，即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

首先請允許我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特地来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招待晚会的朋友们表示欢迎和十分感謝。

在这里，我也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向那些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送来书面贺词的各政党，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社会、文化等团体，以及各界人士表示感谢。时间所限，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招待会上宣读所有宝贵的贺词，请他们原谅。

正如刚才所宣读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收到了各国共产党热情的贺词和贺电，他们希望代表大会获得巨大成功，希望代表大会推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加强印度尼西亚人民力量的工作方面更前进一步，使人民走上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的道路。

此外，正如朋友们在今晚的招待会上所看到的，澳大利亚共产党，即我们最近的邻国之一的共产党，派遣了它的友好代表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大会。

我想，如果我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的名义，对于那些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大会致贺词的外国共产党和派来了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兄弟般的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这是十分恰当的。

如所周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间在日惹召开的，但没有开成，因为在事前发生了民族悲剧茉莉芬事件，接着荷兰又发动了第二次殖民侵略。

在茉莉芬事件和第二次荷兰殖民侵略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可能立即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事先必须把它所有的力量重新集结起来，巩固自己，并促进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以便创造可能召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条件。现在已经过了五年，这些条件已具备了，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现在就召开它的代表大会。

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的欢迎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五个月，已把将要提交代表大会討論的基本文件，首先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用印度尼西亚文和各族文字大量印发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不仅是交给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討論，而且也征求了党外人士的意見、批評和建議。在向党外人士宣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的活动中，已經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約一千五百次，到会人数共有两百多万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征求党外各阶层和人士对它的綱領草案的意見，完全是出于順利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的考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这样的經驗，由于不了解彼此的綱領，或者有时在合作时不了解合作的綱領是什么，因此合作經常不順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努力减少和尽可能消除因誤会而产生的矛盾。要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其他党派之間产生矛盾，那就希望这种矛盾确实是原則方面的矛盾；是政策和綱領方面的矛盾。因此，要尽力避免产生仅仅由于不应有的成見而产生的矛盾。

事实表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受到各阶层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有数以百計的书面或口头意見交给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受到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进步的宗教界的欢迎。他們总的看法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奠定了民族主义者、宗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之間

健康合作的基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消除了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疑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为我国民族团結的发展,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其綱領包含了民主因素〔1〕并獲得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的稳定开辟了新的道路,光明的道路。的确,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中已清楚說明,只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願意执行民主政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准备繼續支持这个政府并給予一切援助。

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一些領導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感到非常遺憾”,因为在他們看来,这个綱領是太具体太合情合理了,所以容易为人民所領会,能够吸引人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制訂綱領草案时尽力設法不采用空洞的詞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掌握这样的原則:如果綱領不能够实行,那就沒有用处。

在右翼社会党〔2〕的領導人中間,有人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是好的,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否能够实现它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作这样的答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会制訂仅仅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自己实行的綱領。我想不論在我国或外国,沒有任何一个政党的綱領仅仅是为了由这个党本身来实行,仅仅由这个党的党员本身来实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同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每一項政策,只有获得組織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

但是,在这里也必須說明,不是馬斯友美党或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所有党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都感到“遺憾”。在讀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和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举行的集会上听了关于綱領草案的說明之后,有不少参加馬斯友美党的农民

和參加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工人或職員，来找共产党人說：“不是馬斯友美党的所有黨員都是买办和地主”，“不是所有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黨員都是反共和反民族的”。他們說，信奉伊斯兰教的农民和社会党領導的职工，不了解和不同意他們的領導人所执行的反共政策和反民族政策，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中所列載的要求也同样是他們的要求。

我所以有必要在这个会上提出这一切，是因为它已使我們更加坚信，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已为我国民族團結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其政綱包含民主因素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能以繼續执政的保证，因为这是我国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的保证。

現在的問題取决于印度尼西亚的优秀儿女在多大程度上能充分利用这个发展民族團結的机会；取决于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維護民族團結的傳統，反对企图分裂和削弱民族團結的任何活动，不論这种活动来自什么人，也不論它是来自国内或国外。

爭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的代表大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称为爭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的代表大会。为什么要这样称呼这次代表大会呢？

我們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为爭取民族独立的代表大会，这是因为我們全体印度尼西亚儿女坚信，我們現有的独立不是完全的独立或真正的独立。現在的独立不是我們民族革命即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所梦寐以求的那种独立。哈达—罗姆—苏丹·哈密同荷兰帝国主义者締結的圓桌會議协定，并不是使我們从荷兰帝国主义

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协定。

相反的，圆桌会议协定，使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合法化并获得了保障，而八月革命曾宣布这种殖民统治是不合法的，并且不再承认它。

这个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把我国的财富如农场、工厂、矿山、运输设备、发电厂、银行等重新交给荷兰或其他外国“业主”。根据圆桌会议协定，印度尼西亚事先如没有同荷兰协商，它一般不能在财政或贸易关系以及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任何措施。印度尼西亚受到在荷兰女王之下的所谓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束缚。不论是民政或军事的荷籍殖民官员仍然以“顾问”或“专家”名义留在印度尼西亚工作，并得到远比印度尼西亚籍公务人员高得多的工资和待遇。

由于印度尼西亚还没有完全独立，由于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不是真正的独立，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责任寻找消除这种不合理状况的道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努力解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基本和重大问题，解决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一切基本和重大问题。

我们称这次代表大会为争取民主的代表大会，这是因为民主问题对于我国的民族独立运动犹如衣食之对我国人民的生存那样必要。我们坚信，印度尼西亚只有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但我们也坚信，为了扩大民族独立运动，我们非常需要民主自由。

与哈达、纳席尔和苏基曼政府比较，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执政期间，民主自由获得了一些保障。有了这一点点的民主自由，人民运动就稍有进展。

最近时期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的进展已使在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处境陷于困难。充当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支柱的政党，即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所处的困境，已使这些政党的领导人瘋狂起来，并且不擇手段地用一切詭計使政权制度法西斯化。他們进行了各种威胁和挑畔，甚至发动了政变。为了同样的目的，即使政权制度法西斯化，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利用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全亚齐伊斯兰教学者联合会(馬斯友美党)^[3]等匪帮来进行恐怖活动。但是，使政权制度法西斯化的一切活动显然都遭到了失敗。他們在民主力量面前碰了壁，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民族团結面前碰了壁。

因此，深入地討論高举民主旗帜的問題和粉碎企图使政权制度法西斯化的各項陰謀的問題，也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民主自由对于发展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对于其綱領中包含民主因素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繼續执政是重要的。

我們称这个代表大会为爭取和平的代表大会，这是因为目前包括印度尼西亚男女在內的全世界人类的最重要問題乃是保卫和平的問題。正因为如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可能不在代表大会中討論保卫和平的問題。除了朝鮮問題尚未获得公正和肯定的解决以外，美国还对日本、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进行軍事干預，考虑到这种情况可能給亚洲和太平洋(因此也就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內)带来莫大的災禍，我們就更應該討論保卫和平的問題。

民族独立、民主和和平是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儿女的目标，因此，这些問題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获得特殊的地位。

傳播民族團結的理想是決定性的因素

我想，如果我在這個招待晚會上、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來表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促進民族團結的真誠願望，這也是恰當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堅信，目前時期，對我國人民來說，具有決定性因素的是在群眾中傳播民族團結的理想。

有許多其他的重要問題，但在目前時期，對我國人民來說，沒有比傳播民族團結的理想更加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數十年以來，我們民族的領導人就傳播了民族團結的理想，但目前傳播這種理想，其重要性是不亞於過去的數十年。因此，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將不斷地在廣大群眾中傳播人民團結和民族團結的理想。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充分了解，目前時期，還有許多印度尼西亞男女，還未能接受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的某些部分，雖然共產黨人認為，現在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是完全符合我國目前的需要的。但是儘管如此，許多事實表明，目前多數印度尼西亞男女是能夠贊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的某些部分的，而且在這個綱領的這些部分，即與其他民主黨派的綱領相一致的部分的基礎上，可以建立強有力的民族統一戰綫，這個民族統一戰綫將確定和爭取實現合乎當前要求的政治和經濟目的。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所指的民族統一戰綫，是團結一切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和社會地位的印度尼西亞男女的戰綫，這一戰綫當然是建立在以下共同願望的基礎上：克服一直籠罩着印度

尼西亞的經濟危機，防止印度尼西亚被美国帝国主义拉去參加侵略性的公約集團，堅持西伊里安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國國土，反對重新武裝日本，肅清反共和國的荷蘭殖民主義者陰謀集團，高舉民主的旗幟和爭取印度尼西亚的完全的民族獨立。統一戰綫是在符合勞動人民和全民族利益的旗幟下，為爭取實現具體目標而開展的鬥爭和為此而建立的鬥爭組織。

印度尼西亚人民本身已經感覺到和體驗到民族團結有着何等巨大的意義。依靠民族團結，印度尼西亚人民就使一九四五年八月獨立宣言有了巨大的力量；依靠民族團結，印度尼西亚人民英勇地抗擊了荷蘭發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殖民侵略戰爭，挫敗了蘇基曼的八月大逮捕事件，粉碎了共同安全法的束縛，打敗了一九五二年“十·一七”政變，推動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的成立，使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有力量反對為外國帝國主義所慫恿和全力幫助的馬斯友美黨—印度尼西亚社會黨的種種進攻。同樣，依靠民族團結，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為粉碎伊斯蘭教國運動、印度尼西亚伊斯蘭教軍、全亞齊伊斯蘭教學者聯合會（馬斯友美黨）集團而鬥爭。

印度尼西亚人民本身的經驗教導了印度尼西亚人民：民族團結具有無比的威力。也正因为如此，印度尼西亚人民堅信，只有通過民族團結的道路和通過在團結基礎上進行的鬥爭道路，才能實現他們所迫切要求的政府政策方面的全面改革。

在即將提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提到：

“民族統一戰綫，無論就其組成成分或者工作方法來說，都是最民主的戰綫。民族統一戰綫團結最大多數人民。所有不願印度

尼西亚遭到外国殖民統治的印度尼西亚男女，應該参加或者拥护这一战綫。只有团結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最大多数，我們才能談得上真正的、广泛的和强大的民族統一战綫。正因为如此，当农民未被爭取到这一战綫里来之前，我們就談不上真正的、广泛的和强大的民族統一战綫，这是因为农民約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沒有参加，就意味着最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民沒有参加，这就成了我們民族統一战綫的极大弱点。”

如果我們想知道我們的民族統一战綫在过去和今天的弱点在哪里，那末，这个弱点就在于还没有喚醒农民和爭取农民到这个战綫里来。因此，除了与各民主政党和团体建立合作关系外，除了在議會内外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爭取农民到民族統一战綫里来。而这是建立广泛的、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民族統一战綫的保证。

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什么不断宣傳民族团結的理想的簡單說明就是如此。在这个工作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許多障碍、誹謗和誣蔑。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信，只有通过广泛的和强大的民族統一战綫，印度尼西亚人民才能解放自己，站立起来，使自己成为受人尊重的人民和民族。

有人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团結的建議是好的，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没身体力行，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打击一些人，如苏丹·沙里尔、納席尔、苏基曼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打击，岂不是会使这些人反对民族团結嗎？”

首先有必要說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打击这些人，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如果說沙里尔、納席尔、苏基曼等先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舞台上不扮演重要角色的話，那末，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就不会去反对这些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打击的对象，不是名叫沙里尔、納席尔或苏基曼的普通老百姓，如果要找叫这些名字的人的話，那在我国的乡村中还是可能找到的。不！他們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們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敌人的政治代表，是荷、美、英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

打击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敌人的政治代表有什么錯誤呢？难道民族統一战綫中也應該包括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敌人嗎？再說，沙里尔、納席尔、苏基曼之流什么时候盼望过民族團結呢？难道我們忘記了这些人在我国民族独立运动史上曾經是民族團結的破坏者嗎？我們必須根据他們自己的行为，把这些人摆在他們应有的位置上，这就是把他們摆在我們人民的民族團結之外。

因此，正是为了民族團結，我們必須彻底揭露任何人的分裂活动和反民族的行为。否則，分裂分子和人民的敌人混了进来，民族團結就将成为空洞的口号。民族團結不是羊和狼之間的團結，而是对人民和祖国怀着善良願望的阶层和人們的團結。

击败破坏團結者的一切陰謀乃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每一个民主人士的責任。批評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領導人的分裂政策，并以真誠和完全友好的态度来爭取信奉伊斯兰教的农民和社会党領導的职工參加統一战綫，乃是共产党人的責任。

还有人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團結的建議是好的，但这种團結是不可能實現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好斗。”

首先有必要說明，如果好斗是指首先打击別人或打击不應該受到打击的人，那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来就不好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揭露納席尔先生的行徑，这是因为納席尔先生頒布禁止罢工条例，首先进攻工人階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彻底揭露德

查苏馬納先生的行徑，这是因为德查苏馬納先生頒布第十六号紧急法令，首先进攻工人阶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彻底揭露苏基曼先生的行徑，这是因为苏基曼先生发动八月大逮捕事件首先进攻印度尼西亚的民主人士和爱国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揭露了沙弗魯丁·普拉威拉尼卡拉先生的行徑，这是因为沙弗魯丁先生实行剪币〔4〕首先进攻人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彻底揭露右翼社会党人的行徑，这是因为右翼社会党人利用各种各样办法来进攻人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彻底揭露穆罕默德·罗姆先生的行徑，这是因为罗姆先生制造“死亡拖拉机”事件无情地进攻农民。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揭露了向人民进攻的人们，以便人民对这些进攻或其他类似的进攻实行自卫，因为这样，就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好斗，难道这是正确的嗎？难道讲出了某一种事情的真相，就意味着好斗嗎？

还有人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团结的建議是好的，但可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是为了本身的利益来利用民族团结。”

首先有必要說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自己的私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利益就是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信，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每一个打击也就是对印度尼西亚民族和人民的打击。历史已經证明，从来没有只是针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由它本身单独承担的打击，同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不会有只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身单独取得和独自享受的胜利。

荷兰殖民主义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对印度尼西亚共产

党的打击，实际上就是对当时我国整个民族运动的打击。同样的，在茉莉芬事件中对共产党人的打击，也就是对整个独立运动的打击。

茉莉芬事件是帝国主义者及作为其支柱的政党，即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制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以便于印度尼西亚同荷兰妥协，同时削弱人民独立运动。下列事实证明了这点：哈达政府同荷兰签订了圓桌會議协定，納席尔政府和苏基曼政府制訂了各种压制人民民主权利的条例。茉莉芬事件对正直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徒絲毫沒有好处。

苏基曼的八月大逮捕事件同样是如此。虽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首要打击对象，但实际上八月大逮捕事件乃是对整个民主运动的总进攻。一九五二年十月間发动的政变同样是如此。如果这次政变得逞的話，那末首当其冲的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但是这仅仅是把其他民主政党的领导人投进牢獄的先声而已。不論是苏基曼的八月大逮捕事件，或者是右翼社会党人策动的十·一七政变，不仅威胁共产党人的安全，而且也威胁印度尼西亚的整个民主运动，威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全国政治生活。

由于有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团結，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所进行的到目前为止使政权制度法西斯化的一切活动已遭到了挫敗。正是这种团結一再保卫住印度尼西亚，使它免受法西斯主义的危害。因此，十分清楚，那种所謂民族团結的理想仅是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身利益的說法，是完全不正确的。甚至在这里还可以这样說，民族团結的理想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以前就已經萌芽。称为“急进同盟”的民族統一战綫組織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即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已經建立起

来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真心诚意，可以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日常政策中看出来，特别是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妇女等方面推行的团结政策中看出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断号召各个阶层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团结起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诚意也可以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的政策中看出来，虽然没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参加这个政府，但是，只要这个政府愿意执行民主纲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支持它。同样，在未来的普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将真诚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在未来的普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仅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到投票箱去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票，而且也投其他民主政党的票。

这就是对于怀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利用民族统一战线来谋取它本身利益的人的简单答复。

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再详尽地提到过去经常加诸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各种卑鄙的诬蔑，例如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推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反民族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破坏者和恐怖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外国代理人等等的诬蔑。这些诬蔑的用意何在呢？进行这些诬蔑的目的是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人民实现民族团结，阻碍民主政党和团体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合作。但是，我可以在这里高兴地說，所有这一切诬蔑如今已经没有市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行民族和民主的政策自然就已驳斥了所有这一切诬蔑。

人民现在甚至已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誰企图推翻共和国，誰是反民族的，誰是破坏者、恐怖者和外国代理人……？人民一方

面提出这样的疑问，一方面冷眼看着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领导人，他们心里說：这些先生才是名符其实的企图推翻共和国者、反民族分子、破坏者、恐怖者、外国代理人，等等。是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批判能力如今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想找到願意再听命于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思想健全的印度尼西亚人是困难了。

这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关于民族統一战綫、关于我們大家共同組織这个民族統一战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信念。

民族团结如今已在踏踏实实地蓬勃发展着。这种民族团结是在工人和农民为維护他們的权利的斗争中，以及全国人民为保卫国家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印度尼西亚工人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在各个工厂、矿山、碼頭、农場、机关等为改善他們的生活而斗争。

印度尼西亚农民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为反对封建剝削残余，反对地主、高利貸者和企图搶夺土地的外国农場主而斗争。我国农民在各个乡村、在爪哇或苏門答腊、在苏拉威西或馬魯古、在加里曼丹或小巽他群島进行着斗争。

我們的民族团结是在不分政治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为击败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全亚齐伊斯兰教学者联合会等匪帮进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为廢除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为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为肃清反共和国的荷兰殖民主义者阴谋集团、为挫敗外国对我国内政的干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我們的民族团结是在全世界人民的斗争到处都获得胜利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在朝鮮、越南、馬来亚、緬甸、印度等国争取民族

独立的斗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民主运动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发展起来了。和平理想所产生的力量，在世界上越来越扩大了。不久前举行的柏林会议和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⁵⁾，便是最明显的证据，它说明和平力量是占优势的，而占了优势的和平力量可以迫使帝国主义者坐到谈判桌上来。

在上述情况下，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依靠我国人民的觉悟并在全世界民族独立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强有力的推动下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它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信，这次代表大会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我国民族统一战线有着辉煌的前途。由于我们将不断地在我国的人民中间传播民族团结的理想，民族团结一定将成为现实。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按照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尽力地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团结而进行工作。

为爭取更大的成就而继续前进!

这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詞。艾地同志在开幕詞中总结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各种重要的事件，特别是有关党的生活和发展的事件，这些事件使党有可能克服各种机会主义錯誤，并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准备了最好的条件。

同志們，自从我們党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在梭罗市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經七年多了。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人民革命，即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中召开的。当时我們党的党员、党的同情者和英勇的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独立战争。

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的客观形势是很好的。难道还有比革命形势更好的形势嗎？但是，当时我們党的能力还很有限，我們党的能力是同一个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应该担负的繁重任务不相适应的。

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們党刚刚脱离达二十年之久的艰巨地下工作状态。当时可以说，党没有有經驗和有理論的干部。党的很多干部在流放地死去或遭到摧殘，被杀害或病死在荷兰殖民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監獄中。同样的，党的中央

委員如巴姆基、苏加雅特、哈吉阿卜杜尔·拉欣及哈吉阿卜杜尔·阿西斯等同志，成了日本法西斯暴行的牺牲者。为了紀念这些英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黨員和勇敢的人民英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他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同志們，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們党在組織上、政治上和思想上还很軟弱。那时的黨員还不到几千人，而且沒有很好地組織起来，而在这人数很少的黨員当中，只有几十个人已經或开始粗淺地知道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一般地說，他們還沒有在革命工作中受过有系統的鍛煉。当时党的組織还是涣散的，而且只散布在爪哇和苏門答腊的共和国地区的一些地方。在共和国地区以外的地方，可以說沒有党的組織，爪哇和苏門答腊以外的共和国地区也是如此。党内生活、集体工作方法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当时对党來說还是完全生疏的。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党执行了改良主义的政策，这就使党的政策不受群众欢迎。右翼社会党人通过社会党和左翼陣綫〔1〕把他們的政策帶到我們党内来了！非无产階級的思想意識在党内占統治地位。托派分子派了他們的代理人混进党内来分裂党。

对于一个其組織、政治和思想情况还是像我上面所說的那样的党，我們当然不可能希望它的代表大会能在解决正在进行的人民革命的各种基本問題方面取得成果。而且的确，我們沒有从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获得这样的成果。

同志們，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經歷了許多事件。这些事件是：第一次荷兰殖民侵略战争，茉莉芬事件，第二次荷兰殖民侵略战争，卖国的圓桌會議協定的簽訂，苏基曼的八月大逮捕事件，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

兰教軍匪帮发动和加紧进行的叛乱，右翼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所操纵的法西斯軍人在一九五二年发动的十·一七政变，殖民法令仍被沿用来控告和逮捕工人和农民领导人。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政党的领导下，曾经对这些侵略、叛卖行为和罪行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在反抗第一次与第二次荷兰的殖民侵略战争中，在反抗“茉莉芬事件”的白色恐怖中，有不少印度尼西亚优秀儿女成了残暴行为的牺牲品。慕梭、沙佐諾、阿米尔·沙利弗丁、哈利約諾、苏立諾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被反动派杀害了。对于他们，对于在荷兰殖民侵略战争或者在茉莉芬事件中牺牲的印度尼西亚优秀儿女，我们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最大的和最崇高的敬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对迄今仍被监禁在牢獄中的工人领导人和人民领导人表示敬意。

同志们，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沉痛事件：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我们敬爱的斯大林去世了。由于斯大林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人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那非常沉痛的日子里，約多同志和我受党委托以我们党的名义宣誓，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将永远忠于斯大林的学说。

我们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领导表示感谢，对斯大林表示崇高敬意。

同志们，自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们党的生活和发展也经历了許多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是：第一，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决议，接受慕梭提出的“大纠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第二，由于陈舜如同志在

党的組織、政治和思想原則上的偏向而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第三，一九五二年年初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會議，这次會議主要是为了推翻极端反动的苏基曼政府；第四，一九五三年十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这次會議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各项基本問題并为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上述各事件是我們党历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每一个事件都使我們党在走向团结和統一、走向列宁式的党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对于党员首先是新党员說来，学习上述各次党的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所作出的決議，是很重要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的代表會議通过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或通常簡称《新道路》的決議，指出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摆脱当时困难局势的出路。《新道路》也为党在組織、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布尔什維克化奠定了基础。《新道路》提到，政治和組織方面的各种原則錯誤，首先是由于党在思想方面的軟弱和在党的領導中缺乏无产階級成分所造成的。《新道路》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了使党具有列宁的党的条件而斗争的第一个步驟。

一九五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是双方尖銳斗争的會議，一方是坚持《新道路》中的組織、政治和思想原則的列宁主义派的各中央委員，另一方是中央委員陈舜如，他口头上承认《新道路》的政治、組織和思想原則的正确性，因为“形式上已由党的會議所通过”，但是他的行动，公开或隱蔽的行动，却反对《新道路》的各项原則。陈舜如同志轉弯抹角地坚持他在西伊里安問題上的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政策，他也轉弯抹角地为坚持繼續保留社会党进行辯护，据他說社会党是为了“收容”那些拥护共产党但“不敢参

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人們。但是最后陈彝如同志这种轉弯抹角的手段使自己轉进了死胡同! 中央委员会决定撤銷陈彝如同志关于西伊里安的书面声明。中央委员会依照《新道路》的決議也决定解散社会党。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这些决定, 陈彝如同志閹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企图遭到了失敗, 他建立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与使用“社会党”的名称的中間階級的政党的企图也遭到了失敗。中央委员会决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唯一的政党, 而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党必須解散。陈彝如同志縮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革命先鋒队的作用的活动已經失敗, 中央委员会中的一些中派分子已經离开了他。《新道路》的組織、政治和思想原則的胜利促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进行改組, 全党在改組后的政治局的领导下, 繼續为建設一个列宁式的党而斗争。

一九五二年年年初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會議作出了各項有关反对苏基曼八月大逮捕事件时期出現的各种毛病——宗派主义、投降主义与冒險主义的毛病的重要結論。代表會議确信, 反对这一切毛病的斗争是为了推翻极端反动的苏基曼政府, 粉碎当时正在西瓜哇和中爪哇猖狂活动的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集团, 建立民族統一战綫, 在全印度尼西亚发展党员和扩大党的組織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党的全国代表會議的各項決議, 特别是关于发展党员和党組織的決議和关于加强理論学习的決議, 已經激起了非常巨大的、自我党成立以来空前未有的积极性。这次党的全国代表會議大大地推动了党进一步的发展, 党在組織、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发展。这次代表大会也大大促进了国内政治的发展, 特别是因为在这次會議上, 根据中爪哇代表的建議, 党提出了

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集团的各种具体办法〔2〕。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是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最后一桩重大事件。这次中央全会已經成功地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各项基本問題，作出了关于党在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方面的任务，关于党的建設和关于对陈舜如主义的态度各项重要決議。中央全会的各项成果已为党中央领导的团结和統一，全党在組織、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团结和統一奠定了基础。这次中央全会以明确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路綫武装了党员和党的各级負責人。

現在我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們將深入地討論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体會議的各种文件和決議。这次代表大会也将通过党章来代替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同时也将通过竞选宣言，作为党对于未来的普选的一项重要重要的准备。

这次代表大会不是在像一九四七年那样的人民革命形势中举行的。但是，不論目前的国际形势或国内形势都显示出对党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存在着可以說无限的的可能性。与一九四七年即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那一年相比較，在引导局势向前发展的方面，目前党的能力已大大地增强了。根据这一切，我确信現在我們所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获得我們所希望的、也是我国劳动人民和所有进步人士所希望的成就。

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我們解决有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重大和基本問題的大会。

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为党更好地建

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和强大的民族統一战綫的工作奠定基础的大会。

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解决有关党的建設的一切基本問題的大会。

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更加密切联系群众的大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为爭取更大的成就而繼續前进！

印度尼西亚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

这是艾地同志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这个总结报告旨在说明政治和组织状况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草案的主要内容。它还包括了有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党的工作经验的重要结论。这些结论成为党的干部执行党的这两方面任务时的指针。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党给了我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作总结报告的荣誉。

自从七年前在梭罗市举行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发生了许多事件。关于这些事件的基本内容，我在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报告过，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数月前在党的机关刊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公报》专号和《红星》杂志上已经全部登载了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准备的文件。这些文件也已经用印度尼西亚文和各族文字印成小册子。同志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研究。不仅如此，我们全党已经漫谈和讨论过这些文件，并且也已经尽力向广大人民传达过。因此，同志们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不仅带来了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意見，而且也带来了直接来自广大人民的看法和批评。这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党员、预备党员和广大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就会更大。我想，如果我

以我們党的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曾經就我們党代表大会文件，特别是就党的綱領草案提出了意見和批評的各阶层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謝，这是恰当的。

在这次會議上，我們可以想像黨員、預备黨員、党的同情者和一切进步人士对这次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每一項決議会感到多么高兴。

中央委员会把各种文件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相信这些文件将会使印度尼西亚革命和我們党的建設的一切基本的和重大的問題清楚起来。有了这些文件，我們就希望代表大会能把黨員和党的各級負責人武装起来，使他們对党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路綫有正确認識。这样做就意味着，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独立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开辟了寬广的道路。

中央委员会认为，对于現在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文件**綱領草案**，有必要先作一些說明。因此，我所作的这个总结报告有两方面作用：**第一**，关于政治和組織情况的总结报告；**第二**，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基本內容的說明。因此，中央委员会称之为《**印度尼西亚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的总结报告的作用就清楚了。关于代表大会的其他文件将另行說明。

一、国际形势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民主战胜法西斯主义而告結束。战后的国际形势是向着有利于人民独立斗争和爭取世界和平斗争方面发

展的。

一九四五年年中，世界帝国主义的地位比战前大大削弱了，这是由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大国已经崩溃，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经济破产，苏联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并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驱逐外国势力和建立本民族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独立斗争在蓬勃发展。

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独立斗争的蓬勃发展，缩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其结果是，它丧失了不少原料供应地，在世界市场销售商品的机会越来越少，工业被迫开工不足。这种情况进一步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

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动荡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宣布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随后又进行了反对在美国帝国主义全力支持下的日本、英国和荷兰军队的激烈战争。

在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帝国主义从数千万战争牺牲者的鲜血和生命中获得了最大的利润。因此，美国在这次激烈的世界大战结束后，便成为一个最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迫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屈从于它的控制和领导。

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先鋒——虽然苏联在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儿女，损失了大量的财物，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依靠自己异常强大的力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苏联人民和军队的力量，不仅能够把法西斯分子从本国驱逐出去和消灭干净，而且英勇地解放了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给这些国家按照各该国人民的愿望以发展的自由。

因此，十分明显，战后世界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另一部分是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在法律上和日常生活中表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再承认帝国主义者和地主是合法的。这一部分世界就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阵营。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的性质是极不相同的。由美国帝国主义控制和领导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充满着各种矛盾和对立的社会，有统治的资本家与被剥削和被压迫工人之间的对立，有帝国主义国家与它的殖民地之间的对立，也有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些对立正激烈地展开着。因此，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并不是一个团结无间的坚固力量，这是由于存在着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和民主的工人运动之间的矛盾，而工人运动则是与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阵营的坚固的民主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更加削弱了帝国主义和战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给千百万人们带来贫困、痛苦和死亡的帝国主义战争。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约瑟夫·斯大林驳斥了那种认为平均利润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的看法。斯大林说：“这是不对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没有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保证，垄断资本主义就会更快崩溃。正因为如此，为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斗争，对帝国主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斯大林说，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

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們破产和貧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奪其他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潤的战争和国民經济軍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資本主义利潤。”

相反的，民主陣营不需要战争，而且沒有蘊藏着战争的因素，它在爱好和平的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正如馬林科夫同志一九五三年八月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所說的，苏联及整个民主陣营不需要战争、不希望战争、沒有战争的意图、而且不同意战争。馬林科夫同志說：“我們仍坚决主張，現在沒有任何爭端或未决問題不能在有关各方互相協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他又說：“美国 and 苏联之間的一些爭执問題也是如此。我們一向主張、現在仍然主張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我們认为，沒有使美国 and 苏联发生冲突的客观基础。两国安全的利益，以及国际安全的利益、发展美国 and 苏联的貿易的利益，都可以在两国之間正常关系的基础上获得保证。”

斯大林在上述一书中說明，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滿足整个社会經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¹⁾这个公式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沒有属于一小撮人的最大限度利潤，沒有危机，沒有由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技术发展的中断，也沒有由危机而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社会主义是最大限度地滿足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扩大、增长和不断完善。

上述的国际形势清楚地表明，維護資本主义压迫和战争的反动力量和全世界爭取一切民族完全独立、民主、和平与社会主义的

人民力量之間存在着尖銳的斗争。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虛伪宣傳經常歪曲事实，他們把目前世界形势描写为仅仅是“不可調和的美苏矛盾”問題，仿佛只有这两个大国与这个斗争有关并卷入这个斗争，似乎苏联也实行美国政府那样的帝国主义政策。全世界右翼社会党人和其他反动派就是进行这样的宣傳，印度尼西亚右翼社会党人、馬斯友美党領導人和其他反动派也进行这样的宣傳。

实际情况并不像国内外反动派所宣傳的那樣。从表面上看来，美国同它控制下的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似乎是良好和融洽的。但是，如果我們仅仅从表面看問題，沒有看到它們內部存在着的各种相互对立的力量，那末我們就錯了。斯大林非常正确地說，虽然西欧国家、日本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都已落入美国的控制，但是，如果以为这些国家将无止境地忍受美国的統治和压迫，以为它們不会設法掙脫美国的束縛，而走上自己的道路，独立发展的道路，那就大錯特錯了。美国同它控制下的国家之間的关系的日常发展，美国控制和領導下的国家对美国的“叛逆行为”日益表面化和日益剧烈的情况，就已证明了这点。这就证明了关于資本主义国家間不可能发生战争的說法是不正确的。从理論上讲来，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間的矛盾当然是比資本主义国家間的矛盾更为尖銳。不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或以后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历史向我們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資本主义国家間的战争开始的。

資本主义世界沒有安定的生活，因为階級的矛盾和对立是不会保证人类过着安定的、和平的生活的。剝削、压迫、冲突、破坏和战争是資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的特征。相反的，国民經济力量与人

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不断增长则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世界的特征。真诚的互助、各民族间的平等权利以及政府和人民间的坚固团结，使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世界成为不可攻破的强大堡垒。

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资本主义阵营而另一方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阵营，这也就意味着存在着两种经济体系和两个世界市场：一个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另一个是由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成的民主世界的市场。

上述两个市场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进程。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越来越受最富有的，因而是最有势力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控制。美国帝国主义者用压制或扼杀其他帝国主义及加紧剥削和压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和人民的办法，使自己富上加富。美国给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所谓“援助”，并没有带来受“援”国和美国之间的美好合作，相反的，甚至引起了反抗和“叛逆行为”。像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那样的反共人物，也提出了“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来反对美国的“援助”政策。艾德礼提出这个口号不是因为他同意共产党反对美国“援助”的政策，而仅仅是根据英国帝国主义本身的经济利益，因为它受着美国“援助”政策的强力压制而不能自由发展。

美国所谓“援助”不是为了恢复和平经济——满足受“援”国人民生活需要的经济，而是用来扩大战争经济和制造大规模的杀人武器。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这种“援助”来控制受“援”国，不仅控制它们的经济和政治，而且也控制了它们的军事。失业、物价高涨、赋税增加、实际工资下降，是帝国主义世界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

同资本主义阵营的情况相反，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阵营各国

在文化、貿易、国民經济建設等方面的真誠和自願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从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巩固和加强了这一陣营各国間的团結。

美国帝国主义利用禁运和封鎖政策，禁止資本主义世界各国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世界建立經济与貿易关系。相反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采取各种具体步驟来恢复和扩大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的正常的国际貿易关系。美国害怕和平竞赛，因此繼續不断对它控制下的国家使用暴力，并且繼續不断地企图挑起新的世界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就是如此，这样的发展显然是对壟断資本家与一切反动派不利的，相反的，却对人民独立运动，民主与和平运动非常有利。

(二)人类和平願望对侵略者的若干巨大胜利

目前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是：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个和平民主陣营，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势、爭取和平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全世界人民热烈欢迎朝鮮停战，这是三年多来和平工作的成果。这是全世界和平运动的一个偉大胜利，这是千百万人民和平願望的胜利，他們的力量已經这样强大，足以迫使侵略者不得不終止其惨无人道的行动。这样一来，美国帝国主义企图征服英勇的朝鮮人民的希望就完全变成一場幻梦。朝鮮人民反对干涉者和李承晚集团雇佣分子的斗争表明了：一个国家忠于民族独立与和平事业，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广泛群众性的勇敢和英雄主义。朝

鮮人民获得了全世界人們的支持。中国人民志願軍在为邻国的独立和世界和平而进行殊死的英勇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与勇敢行为，令人非常感动，人类历史将永志不忘。

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充满着感激和尊敬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和中国人民志願軍的心情欢欣鼓舞地欢迎朝鮮停战。大学教授伯里約諾博士和其他几位印度尼西亚著名人士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庆祝朝鮮停战晚会上的讲话，表达了印度尼西亚人民欢欣鼓舞的心情和对朝鮮人民感激和尊敬的心情。正如其他国家一样，在印度尼西亚，只有极端可恶的反动派对朝鮮停战的实现才不感到高兴。

由于和平世界在朝鮮战线的辉煌胜利，馬林科夫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八月最高苏維埃會議上說：“我們苏联人民热切希望光荣的朝鮮人民的生活在和平的条件下繁荣起来。苏联将帮助朝鮮人民治愈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創伤。政府已决定立即撥出十亿卢布作为恢复朝鮮遭受破坏的經濟之用。”如我們所知，最高苏維埃會議一致通过了苏联政府这个建議。

在朝鮮发生的事情是在世界的东方发生的事情。

在世界的西方，和平的愿望也获得了胜利，挫敗了一九五三年六月美国帝国主义在柏林的挑衅冒险行动。德国挑衅行动的組織者企图粉碎德国的民主力量，粉碎德国人民爱好和平力量的堡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們想把德国恢复成为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把德国变为一个軍事国家，并在欧洲心臟使战争罪魁复活起来。这种情况不容許发生，因此，这种活动必須受到鎮压，而最終确实被鎮压下去了。如果不立即加以鎮压，那末柏林事件就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恶果，不仅会給德国人民，而且会給全世界带来災禍。

一九五三年六月发生的柏林事件仅仅是美国帝国主义挑起新战争的方式之一。

民主与和平运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越多，战争挑拨者的处境就越窘迫，而这就使他們越瘋狂。他們竭尽全力企图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遭到失败。这就是他們以前不断拖延朝鲜停战、在德国和日本建立新的世界战争跳板、在某些国家发动政变或打算发动政变、对民主阵营国家进行挑衅、以及使用原子彈訛詐政策的原因。

侵略集团竭力反对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任何努力。他們害怕国际局势的缓和，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他們将被迫减少他們的軍火大王借以取得超額利潤的軍火交易。他們害怕失去他們非常巨大的利潤。

为了阻止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不仅不从它的占领区，如德国、奥地利、日本、南朝鲜等地撤退它的军队，反而加强了对上述国家的占领，并且派遣它的军队驻扎在英国、法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美国違反了旨在巩固和平的联合国宪章、波茨坦协定及其他国际协定的规定。尤有甚者，美国甚至公然違反了一切和平协定，建立了各种侵略集团，如，旨在准备对苏联发动新的侵略的北大西洋公約集团，旨在复活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备它在欧洲发动侵略需要的所謂“欧洲防务集团”及其“欧洲軍”，以及在亚洲地区建立与北大西洋公約具有同样目的的美澳新安全条約和太平洋公約集团。⁽²⁾ 这些集团都向世界宣布說，它們是具有防御目的的集团，但实际上，它們是同和平背道而馳的。美国在越南战綫上进行活动，它出卖武器給法国帝国主义来屠杀爱好和平的越南人民。美国在伊朗的各种活动造成了伊朗国内十分紧张的局势，最后发生了美国帝国主

义者的代理人、法西斯主义信徒法兹罗拉·萨希迪夺取政权的事件。这一事件是当苏联政府与摩萨台政府正在举行谈判的时候发生的。马林科夫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谈及该问题时说：“我们希望这种谈判能够顺利完成。不久以前，在互利的基础上，两国缔结了关于扩大贸易的协定。苏伊关系能否依据善邻方针、依据扩大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方针发展，那就要看伊朗政府了。”由于害怕这两个国家建立自愿的联系，美国政府就准备并最后下令夺取政权⁽³⁾。

现在十分清楚，在世界和平力量取得进展的同时，另一种力量正从事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活动，为一小撮军火大王和国际政治冒险家的利益服务。他们把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看成是对自己的灾难。他们选择冒险的道路并继续执行侵略政策。各种国际挑衅事件和所谓“冷战策略”及其他花样都是为这一政策服务的。

最近时期的国际形势，简单说来就是如此。最近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民主与和平的进展是非常有利的，但与此同时，反动势力继续不断地并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一健康的发展。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必须更加警惕。我们必须记住，人民的敌人和人类的敌人是不会自愿投降的，相反的，他们将继续干反人民反和平的卑劣和罪恶的勾当。他们无耻地实行各种恐怖和挑衅活动，并反复地搞这些活动，如一九五三年六月柏林发生的法西斯挑衅行动，以及他们进行的扰乱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的经济与和平生活的许多事件。最近，世界帝国主义最大的代理人，即叛徒贝利亚及其散布在各地的爪牙的秘密已经被揭穿。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罪恶活动到处遭到歼灭性打击。扑灭叛徒活动的工作的成就，是对帝国主义者的沉重打击，这就是说帝国主义者失去了他们得力的走狗。不

論是國內的或國際的人民運動必須記取這一切。

到處陷於窮境的反動派，除了採取恫吓、挑釁、破壞、訛詐、恐怖及最後發動政變的辦法以外，沒有其他辦法。我們在国外看到這種情況，在印度尼西亞本國也看到這種情況。因此，對印度尼西亞人民說來，這一切已經不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際問題了。

(三) 印度尼西亞人民爭取和平的鬥爭

上面所說的國際形勢要求各國熱愛民主與和平的人民，包括印度尼西亞人民擔負起艱巨的任務。

印度尼西亞人民對和平與戰爭問題不可以採取“中立”態度。“中立”態度有利於戰爭挑撥者，而削弱爭取和平的鬥爭，因為採取了“中立”態度，我們就不可能動員群眾全力來反對戰爭和保卫和平。

對於以蘇聯為首的和平力量和以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企圖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力量，在印度尼西亞存在着兩種“中立”或“獨立”的態度。

第一種“中立”或“獨立”的態度，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如右翼社會黨和馬斯友美黨的領導人）為了進行欺騙而故意採取的態度。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公開贊同戰爭並公開站在美國方面，他們就會遭到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強烈反對。因此，他們戴上了“中立”或“獨立”的假面具。奉行美國帝國主義的命令而發動八月大逮捕事件的馬斯友美黨領導人蘇基曼、蘇巴佐和維比梭諾，在他們的政府施政綱領中標榜“獨立”的外交政策。右翼社會黨人也高唱“中立”政策、“獨立”政策或“第三種力量”政策來掩蓋他們忠實地為帝國主義服

务。印度尼西亚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馬斯友美党領導人和其他反动領導人的“中立”或“独立”外交政策的意义是什么。我們必須揭穿这种“中立”或“独立”的态度，揭露其真正企图，使人民不致受它毒害。

第二种“中立”或“独立”的态度，是那些由于不了解、由于天真，以为在和平与战争之間能够建立一种神奇力量的人們所采取的。由于不了解或天真而抱这种“中立”或“独立”态度的人，在我国人民包括普通人民中間是很多的。对于这些不了解或天真的人，共产党人必須采取耐心态度來說服他們。我們必須說服他們，使他們認識到这种动摇态度对和平是有害的，对印度尼西亚是有害的。有了这种动摇态度，人民的巨大力量就不可能发动起来保卫世界和平和保持印度尼西亚的和平局面。对由于他們的动摇态度而造成了显然对世界和平和印度尼西亚和平任何有害的后果，必須迅速揭露，并且，對他們显然錯誤的态度，必須批評。〔4〕

正如馬林科夫同志所說的，和平政策絕不是“策略”或“外交手腕”的問題，而是我們在對外政策方面的总路綫，因而是我党目前及今后唯一正确的路綫。

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約瑟夫·斯大林闡明說：“現今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喚起人民群眾去为維護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戰而斗争。”“这个运动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資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維護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5〕因此，和平运动必須成为包括尽可能多的政治派別和信仰的人們的最广泛的运动。

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到，战争对印度尼西亚的威胁比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威胁更大，因为在組織战争力量

时,美国帝国主义首先需要控制其他弱小国家。所以,和平运动首先是为我们自己,为着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

最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全力防止新战争的爆发。我们必须防止印度尼西亚卷入战争。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没有任何国际问题和争端不能在有关各国互相协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我们必须扩大和巩固在朝鲜已取得的和平,要求撤退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外国军队,要求和平统一朝鲜,使朝鲜成为一个由民主的朝鲜全国政府领导的国家。我们必须争取在越南战场上也能实现朝鲜所达到的停战,使爱好和平的全体越南人民能够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和防止目前正在美国帝国主义扶植下的日本和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在反对恢复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宣布与日本人民团结一致,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对他们国家的占领,他们正在为摆脱美国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束缚、争取与一切国家首先是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对日本经济生活极端重要的正常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为争取日本的完全独立而斗争。为了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再起,必须以和平方式把全部德国领土和人民统一在一个民主的德国,它应拥有一个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由德国人自己组成的全国政府。⁽⁶⁾必须立即同这个民主的德国签订和约,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德政策已把这个和约的签订拖延了八年之久。只有这样,德国人民在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大家庭中才会取得它应有的地位。

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印度尼西亚必须争取东西方、世界所有国家间,在平等互利与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自由

的国际貿易关系。为了加强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关系，必須增加各国人民代表的相互往来。

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須支持各国人民爭取完全独立的任何斗争，如馬來亚、菲律宾、緬甸、泰国、印度、摩洛哥、突尼斯、怯尼亚、伊朗等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这是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民族独立对世界和平和印度尼西亚本身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我們必須强烈反对荷兰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法国土西伊里安所采取的无耻政策。荷兰外交部所作的年度报告和朱丽安娜女王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在荷兰議會开幕时所发表的声明中说，荷兰政府沒有看出与印度尼西亚重开有关西伊里安地位的談判的好处。換句話說，荷兰政府不再认为西伊里安是荷兰与印度尼西亚的爭执地区。这就是荷兰帝国主义任意違反它与印度尼西亚签订的协定，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仍然要繼續保持它在西伊里安的旧型殖民主义的最明显的证据。事实上，对印度尼西亚來說，如果荷兰繼續統治西伊里安，西伊里安就成了一支老对准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胸膛的手枪。

如果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能够尽速地恢复如联合国宪章所規定的它的应有作用，那末，爭取和平的一切措施的实现将会更加容易。这个国际机构必須重新成为和平解决一切国际問題和爭端的工具和場所。迄今的事实表明，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国务院的附屬机构，这种情况必須立即予以終止。一位名叫杰伊的英国工党議員，因为看到联合国被美国操纵的情况，在对法新社記者談及关于朝鮮停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問題时说：“英国人民总的說来決定不参加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战争。他們希望联合国成为解决各种爭端和維護法理的讲坛，而不是成为‘反

共俱乐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法新社消息）这位工党議員的話，我們不应把它看成是贊同共产主义，这完全是英国經濟不断受到美国压制而日益陷于破产的情况促使他这样讲的。如果联合国想恢复它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应有的地位，重要条件就是給予代表六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會員国应有的地位，并将迄今仍非法盘踞在該国际机构內的国民党匪帮驅逐出去。

实现人类一切理想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和法国各大国間对一切国际問題能否取得協議。正因为如此，爭取五大国締結和平公約的斗争乃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性的斗争。

如果目前在一定限度內获得人民支持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坚决执行和平政策，坚决执行已經对菲律宾、緬甸、印度等国实行的睦邻政策，并对我們偉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們英勇的邻邦——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执行同样的政策，那末，印度尼西亚人民将获得很大好处。这一外交政策的执行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只有好处，它将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和国际关系中，处于受人尊敬的位置。

目前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一）繼續为爭取和平、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和爭取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而斗争；爭取印度尼西亚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合作以达到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目的。

（二）爭取印度尼西亚与一切国家，在互利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經濟和文化合作，支持各国人民为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

任何斗争。

(三)巩固朝鲜和平的胜利，争取在越南战场也实现在朝鲜战场上所取得的停战；反对复活日本和德国军国主义，反对在德国挑起新战争的挑衅活动。

(四)争取联合国的地位符合联合国宪章，即作为人类争取和平的工具；争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参加联合国，并争取五大国（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和法国）缔结和平公约。

(五)为废除印度尼西亚与其他国家订立的损害印度尼西亚独立与和平气氛的各种条约与协定而斗争。

二、印度尼西亚国内形势

(一)半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带来了不断的经济危机的恶果。克服这一危机的道路是，消除半殖民地的状况并代之以人民民主制度

三年半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断地和不倦地向人民说明，由哈达、苏丹·阿卜杜尔·哈密同荷兰政府签订的圆桌会议协定是殖民地的协定，是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荷兰王国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订立的协定。

起初，有许多人相信哈达所说的，圆桌会议协定意味着“消灭了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但是，久而久之，由于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集团所进行的宣传，由于承担着圆桌会议协定恶果的人民亲身经历的惨痛经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欺骗伎俩就

被揭穿了。最后，全国人民都知道，荷兰王国根据圆桌会议协定向印度尼西亚“移交主权”完全是骗局，它只不过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出大型戏剧而已。

由于圆桌会议协定的签订，荷兰帝国主义得以保持它对印度尼西亚的控制。印度尼西亚变成了所谓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⁷⁾的一个成员。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受荷兰控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法国土西伊里安仍完全为荷兰所统治。重要的经济资源仍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掌握。荷兰民政和军事官员仍然继续控制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机构和军队。

圆桌会议协定已使独立的和拥有主权的印度尼西亚变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这个国家表面上拥有“自治权利”，但事实上实际的权力，首先是经济方面的权力仍然继续掌握在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荷兰帝国主义者手中。

反动派为了蒙蔽人民，作了各种各样的蛊惑宣传，如关于我国的建设、工业化和繁荣等的蛊惑宣传。当印度尼西亚经济仍受到外国垄断资本家控制的时候，这一切都是蛊惑宣传，是毫无根据的吹嘘。这种蛊惑宣传，不是使印度尼西亚愈来愈接近，而是愈来愈远离建设、工业化和繁荣。相反的，目前印度尼西亚正陷入不断恶化和濒于崩溃的经济危机中。

印度尼西亚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可由官方数字和社会中的各种事实得到证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承担了哈达、纳席尔、苏基曼各届政府的财经政策和上一届韦洛坡内阁的苏米特罗政策的恶果，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日向议会所作的政府答辩中宣称：一九五三年头七个月预算赤字已达十六亿盾。据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估计，一九五三

年全年預算超支將約達二十五億盾。這個數目幾乎相當於必須支付國外的“無形支出”的數目，一九五三年這種支出超過二十三億盾。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承認，這一數目的大部分是作為償付過去的外國投資。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自稱，目前為數巨大的支付國外的“無形支出”，是目前印度尼西亞經濟結構和現在仍然沿用的殖民地時期的外國投資政策所造成的後果。除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預算的巨大赤字外，外國壟斷資本還以各種辦法攫取巨額利潤匯往國外！

關於輸出方面，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說，一九五三年輸出下降不是由於輸出數量而是由於輸出價格造成的。這就是說，輸出數量仍然是巨大的，但是輸出價格下降了。這是由於美國帝國主義通過其獨家購買、封鎖和禁運政策而實行殺價政策所造成的。印度尼西亞的輸出品數量，當然也包括輸出品總值，是可以增加得很多的，如果印度尼西亞自由決定其對外貿易關係，如果印度尼西亞不受美國的封鎖和禁運政策的束縛的話。試舉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美國價格壟斷者通過國際橡膠研究小組〔8〕無恥地規定，橡膠價格要到一九五七年才有希望調整。其實，在美國集團市場以外，還有其他國家願意以合理價格購買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國家的橡膠。

輸入政策也嚴重地損害了民族經濟，原因是美國帝國主義強迫印度尼西亞購買不論是品種或價格均由它規定的貨物，外國輸入商仍然保持其控制地位，印度尼西亞盾的貶值和蘇米特羅外匯條例〔9〕。根據圓桌會議協定，印度尼西亞對其一切輸出或輸入都必須支付佣金給荷蘭。

為了轉移人們對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大量剝削和他們把巨額利

潤匯往國外一事的注意，反動派進行了關於合作社的蠱惑宣傳。穆罕默德·哈達碩士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二日在關於慶祝第三屆合作社節的廣播演說中驕傲地說，如果將一九五二年的數目與一九五一年比較，那末就可以看到合作社的數目增加了二千所（總數為七千七百所），會員人數大約增加了十七萬九千人（總數為一百十八萬人），而資金則增至五千六百萬盾以上。哈達的紀念演說過分夸大這一中間階層的合作社的意義。其實，如果與在印度尼西亞沒有被觸動過的外國壟斷資本家擁有的巨額資本相比較，擁有五千六百萬盾資本的數千所小合作社企業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這些合作社的命運是與“和大魚同放在一個小池塘里的小魚”的命運沒有什麼差別的。假如大魚要吞食小魚的話，這些小魚一瞬間就會完全被它吃掉。在不斷受到經濟危機威脅的國家里，合作社是會有什麼前途的，時候一到，它就會為外國壟斷資本所摧毀，尤其是如果這些合作社敢於擴展到外國壟斷資本的經營範圍的話。但是擴展到外國壟斷資本的經營範圍對哈達式的合作社來說是一種幻想。因此，哈達式的合作社並不是克服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它完全是為了轉移人們的注意，以便使人民鬥爭的鋒芒不去指向在印度尼西亞的外國壟斷資本勢力。^[10]

深陷在經濟危機中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是很低的，而且日益下降。印度尼西亞工人的工資很低，而且由於物價不斷上漲，實際工資不斷下降。失業人數愈來愈多。約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印度尼西亞農民，在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壓迫下仍然處在奴隸的、生活貧困和落后的境地。印度尼西亞知識分子處在連續不斷地遭到經濟危機的印度尼西亞，也沒有光明的前途，因為不繁榮的印度尼西亞不可能發展科學和文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敌人扩大其恐怖活动如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11]造成了良机。

上述各种事实使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民，即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日益坚信，必須廢除殖民經濟制度并代之以民族經濟制度。只有完全取消圓桌會議協定，才能廢除殖民經濟和代之以民族經濟，因为圓桌會議協定的基本內容恰恰是关于經濟勢力的問題。因此，印度尼西亚大多数人民确信，建設、工业化和繁荣的唯一道路是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即建立人民民主制度。

(二)民族統一戰綫的发展

在目前情况下，即在必須廢除圓桌會議協定，必須反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干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再次扶植日本軍国主义，印度尼西亚必須退出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必須坚持西伊里安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土，必須粉碎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集团和其他恐怖集团的情况下，工人階級非常迫切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本身的团結。現在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团結已日益强固了。一九五二年三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工人統一戰綫的任务**》的決議，对印度尼西亚工人爭取实现直接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加强內部团結和巩固組織起了重大的鼓舞作用。

在加强团結的同时，工人階級带头組織民族統一戰綫，这一戰綫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应有的发展。所有贊同印度尼西亚获得完全民族独立和維護和平的印度尼西亚男女，不分政治信仰、宗教信

仰和社会地位都拥护这一民族统一战线。

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宣传，说明群众斗争不仅能够保证实现某一经济要求，不仅能够保证达到某一直接的政治目的，而且还能够保证取得更大的胜利。群众斗争不仅能够推动毫无意义的政府更迭——因为新政府仍然实行旧政府的政策（如哈达政府换成纳席尔政府，纳席尔政府换成苏基曼政府）——而且能够促成政治改革，而这是重要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的组成证明了这一真理，而这一件事又推动群众争取更大的政治改革。

印度尼西亚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分男女的利益，都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打败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和其他反动分子在外国的指使下所采取的反人民、反民主、反民族和反印度尼西亚的罪恶活动。我们必须粉碎他们在任何地方，在议会内或议会外通过合法形式或非法形式搞的任何阴谋诡计。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就意味着挫败荷兰、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向我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各方面的进攻。

不能否认的是，目前仍有一些印度尼西亚男女还不能接受我党纲领的某些部分，虽然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我党纲领是唯一的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和将来需要的纲领。但是，已有许多事实表明，大多数印度尼西亚男女目前能够赞同共产党纲领的若干部分，并且在这个纲领的这些部分的基础上能够组成强有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民族统一战线将根据当前的要求决定其政治和经济目的并争取实现这一目的。

我们党建立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一切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的印度尼西亚男女的战线，这一战线当然是建立在以下共同愿望的基础上的：克服一直笼罩着印度尼西亚的

經濟危机，防止印度尼西亚被美国帝国主义拉去參加侵略性的公約集团，坚持西伊里安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土，反对重新武装日本，高举民主旗帜和爭取印度尼西亚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战綫。

在这一共同願望的基础上，民族統一战綫也能够实行有关和平經濟的經濟、財政和社会政策，这种政策能够保证印度尼西亚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能够滿足工人的直接需要，能够把土地分配給无地或少地农民，能够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貿易，能够建筑人民急需的大批住宅。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分男女的全力援助下，民族統一战綫也有責任来維護民主自由，抵抗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一切进攻。最近几年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证明，有了还不是那么强大的民族統一战綫，就能够挫敗一九五一年苏基曼—苏巴佐—維比梭諾政府采取的八月大逮捕事件的法西斯行动，能够挫敗右翼社会党和軍閥集团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发动的政变，也能够推动組成一个共政網較民主的、沒有馬斯友美党的买办、地主分子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买办分子参加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¹²⁾。同样，有了还不是那么强大的民族統一战綫，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和其他恐怖集团的运动就愈来愈发展和壮大。因此，建立起在我国各界人民中扎下了根的并能够动員人民参加斗争的民族統一战綫，将便于提出更能使人信服的证据來說明：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領導人和其他反动領導人关于印度尼西亚成为荷兰王国的一部分或美国的一部分的必要性，关于伊斯兰教国运动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斗争目标是“神圣”的，关于外国壟断資本对印度尼西亚建設有“功績”的說法是何等的荒謬。因此，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領導人及其

他反动领导人对民族统一战线害怕得要死，因为他们知道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里面的人民力量将会揭穿他们的卑鄙齷齪勾当，将会挫败他们反民主和反印度尼西亚的任何行动。

只有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者团结在一起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制订符合印度尼西亚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策，才能保证组成一个愿意执行这一政策的政府。确实，只有在共产党人在强有力的民族统一战线范围内开展能够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广泛的统一行动的斗争的支援下，政治改革才有可能实现。同时，反共政策的维护者如苏基曼、尤素夫·维比梭诺、沙里尔、哈达、纳席尔等将被所有具有民族意识的人们看做是可笑的政治小丑。

民族统一战线，无论就其组成成分或者工作方法来说，都是最民主的战线。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最大多数人民。所有不愿印度尼西亚遭到外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男女，必须参加或者拥护这一战线。只有团结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最大多数，我们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广泛的和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因为如此，当农民未被争取到这一战线里来之前，我们就谈不上真正的、广泛的和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因为农民约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没有参加，就意味着最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民没有参加，这就成了我们民族统一战线的极大弱点。迄今为止，只约有百分之七的农民组织起来。这个数目仍然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首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农民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里来。这就是说，为了争取农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当前的任务就是消灭封建残余，开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地主的土地无代价地分给农民，首先是分给无地农民和贫农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农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帮助农民为

滿足日常需要和部分要求而进行斗争。这样做就意味着組織和教育农民走上更高的斗争阶段。这就是建立工农联盟的根基，而工农联盟則是强有力的民族統一战綫的基础。

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印度尼西亚建設、工业化和經濟繁荣的条件。如果农民貧困、无地或少地，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建設、工业化和經濟繁荣。因此，印度尼西亚建設、国家工业化和經濟繁荣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实现“土地归农民”的口号。

強調爭取农民的工作絕不是說可以忽視城市的工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中間的工作。同样，也絕不是說可以忽視同其他党派和团体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印度尼西亚人民本身的經驗教导我們，在議會內外同其他党派和团体建立各种合作关系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挫敗一九五一年苏基曼发动的八月大逮捕事件，挫敗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右翼社会党和軍閥集团发动的政变，一九五二年組織韦洛坡內閣和一九五三年組織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內閣等就是例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內閣在人民的压力下，答应将执行民主政綱，这个政綱符合人民在各种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中提出的要求。

在学习了一些中国革命經驗的党员中間，有人认为，由于最重要的是发动农民参加斗争，所以所有共产党人必須离开城市并从事农民工作。这种意見当然是錯誤的。首先有必要說明，中国共产党人从未低估工人工作的意义。恰恰相反，他們指出了城市工作的巨大意义，特别是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的时候。其次，我們必須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間在地理条件 and 政治发展方面存在着某些不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須繼續堅持在城市里的工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中間進行工作。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精神和他們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意志，對革命運動是有重大意義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自身的鬥爭經驗已證明了這點。

從上述說明中清楚地看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唯一正確的政治路線是，建立工农聯盟並在這一基礎上建立民族統一戰綫。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根據各種可能性和我黨的能力，我黨的任务就是將兩者同時建立起來，這就是在革命的土地綱領的基礎上建立工农聯盟，與此同時，改善和加強民族統一戰綫，同其他政党和團體建立各種合作關係。

從各方面，特別是從經濟方面的勢力的大小來看，印度尼西亚人民首要的敵人是荷蘭帝國主義。因此，民族統一戰綫首先必須以消滅在印度尼西亚的外國帝國主義為目的。這一戰綫的目標首先必須是，將荷蘭帝國主義者及其武裝力量從印度尼西亚驅逐出去，沒收荷蘭殖民主義者的財產並把它收歸國有，印度尼西亚退出印度尼西亚荷蘭聯邦並宣布印度尼西亚完全獨立。但是，倘若美國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給荷蘭殖民主義者及充當它們走狗的印度尼西亚人以武裝援助時，那末鬥爭的鋒芒就必須指向在印度尼西亚的所有帝國主義，就必須沒收它們的財產並把它收歸國有。

(三) 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的組成是國內統治集團間的矛盾和人民團結的壓力所造成的結果

由於國內統治集團間的矛盾和在人民團結的壓力下，極端反

动的苏基曼政府倒台了，代之而起的是答应采取民主措施的韦洛坡政府。后来的事实确实证明，韦洛坡政府在刚成立的几个月内，采取了若干民主措施。

当韦洛坡政府显然采取了反民主和反民族的措施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全体进步力量便立即停止了对它的支持，韦洛坡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参加这个政府的民主分子的软弱和反动的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部长的政策⁽¹³⁾。由于国内统治集团间的矛盾和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韦洛坡政府终于倒台了。

由于国内统治集团间的矛盾和在人民团结的压力下，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内阁危机之后，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组成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这个政府的政纲比韦洛坡政府的政纲更民主和明确。如同对待未采取反民主和反民族措施之前的韦洛坡政府一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待韦洛坡内阁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的态度是正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给予某一政府以工作机会是有条件的，即这个政府必须给人民运动以发展的机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具体情况和力量对比的分析来制订政策的。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由于希望组成一个更好的政府而不支持现在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因而可能使政府落入极端反动的和必然要残酷地镇压人民运动的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手中，那就是冒险主义。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不把现在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看作是民族统一战线政府或真正进步的政府。

目前印度尼西亚不稳定的形势可能有以下几种发展前途：

第一，在群众的压力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能够向人民作一定的让步，人民运动能够得到一些发展，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因而得以继续执政。

第二，如果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因其内部民主分子的软弱，而采取反民主与反民族的措施，那末它将会重蹈韦洛坡政府的复辙，被民主力量推翻，然后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组成一个更具备条件来采取更民主和明确措施的政府。

第三，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可能利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因执行限制人民运动的政策而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情况，推翻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并组成反动政府代替它。

第四，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利用人民的支持来巩固其地位，因而有可能迫使荷兰作一定的让步。但与此同时，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因害怕人民运动的发展，可能改变它目前的不彻底的政策，并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一道来进攻人民。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警惕，必须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推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向前走，使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愿意向人民让步，以便人民运动能够得到一些发展。但是，如果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向右转，那末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也必须准备对付它。

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的组成是重要的经验教训。它教导人民：通过群众斗争不仅能够实现直接的經濟和政治目的，它还教导人民说：通过群众斗争能够实行政治改革，通过群众斗争能够组成一个比较进步的內閣。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解决丹絨摩拉哇土地問題⁽¹⁴⁾的办法和馬斯友

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企图强迫韦洛坡政府执行的反动政策是不同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关于解决丹絨摩拉哇土地问题的决定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继续推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按照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愿望彻底执行它的民主政纲的各部分。这是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能够长期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道的保证。这也是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及其他反动领导人所采取的反民主、反民族和反印度尼西亚政策将继续遭到失败的保证。

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和其他反动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失败，已使他们愈来愈疯狂。他们同荷兰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集团，同一九五二年发动十·一七政变有关的军阀集团（他们又受到美国在伊朗组织的由薩希迪法西斯领导的政变取得暂时胜利的影响）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对印度尼西亚的具体危险，这种情况就使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爱国者肩负着更重大的责任。

目前党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一）通过开展取消圆桌会议协定、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的斗争来防止印度尼西亚因不断的经济危机而走向崩溃；使印度尼西亚退出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并坚持西伊里安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土。

（二）在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群众中间进行经常的工作，建立工农联盟并改善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

（三）举起为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所企图抛

棄的議會民主旗帜；動員群众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竹矛队、墨尔巴布—墨拉比匪帮和其他恐怖集团。

(四)支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并推动該政府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宪法給人民以民主自由。

(五)提高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加强爱国主义,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反动派的各种挑畔、威吓、恐怖行动和政变,提高政治警惕性。

三、党

(一)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綫 同党的建設的关系

一九五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15],对我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由于一些中央委員在思想上与政治上存在着偏向,在那次會議上,在中央委員中間便展开了批評与自我批評,會議最終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策战胜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策而告結束。同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16]所制訂的党章草案,对于党在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对于提高党的政治水平、对于党内的民主生活、对于党内批評与自我批評、对于加强党的紀律、对于党的思想統一与力量統一,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自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之后,发生了許多事件。这許多事件鍛炼了我們党的黨員、干部和党的領導。我們党得到鍛炼,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扩大党的影响和加紧党的建設。在反动派不断的打击下,党面对着必須解决

的基本的最緊迫的問題是：**第一**，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統一戰綫的問題；**第二**，建設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維克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問題。

一九五一年苏基曼发动的八月大逮捕事件，对于我們党是一次严重的考驗，因为这个事件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选出的政治局开始进行巩固党的工作才只有六个月的时候发生的，是在党与群众，首先是与农民群众的联系还不密切的情况下发生的。党对預备党员、党员和干部进行工作的工作方法的錯誤也給党在对付苏基曼的八月大逮捕时造成了困难，这是由于党内还有許多宗派主义分子，还存在着投降主义分子和冒險主义分子。

当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制訂的正确策略，即使民族资产阶级同以苏基曼—苏巴佐—維比梭諾为首的极端反动的买办资产阶级分离开来的策略，对打击苏基曼的八月大逮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經過加紧宣傳之后，全党和党領導下的群众一致执行了这一策略。当时《紅星》杂志刊登的文章成了对党的干部和党员克服法西斯主义危險的重要指示。党的策略成功了，以苏基曼—苏巴佐—維比梭諾为首的极端反动的政府日益孤立，終于被迫倒台。民族资产阶级稍为向左移动，并且逐漸移到它应处的地位，这就是同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站在一道进行反对买办分子和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

党的政治路綫的正确对党的建設工作和党的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群众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信任日益增长。有一些党员在八月大逮捕事件开始时有些惊慌，因为他们想起“茉莉芬事件”时反动派的暴行，他们以为八月大逮捕事件会重演这种暴行，但后

来他们恢复了勇气和热情。苏基曼制造第二个“茉莉芬事件”没有成功，因为他在民主力量面前到处碰壁。

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指示下，党内民主生活活跃起来了，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小组、支部、党组和党委会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后，所有党的组织都恢复了工作的勇气和热情。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加强党员思想的工作是在八月大逮捕事件时期开始的，在党小组、支部、党组、党委会定期举行了“理论讨论会”，也定期举行了“实际工作讨论会”。目前，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关理论问题和日常工作问题的讨论会在我们党内已成为经常的事情。这个进步对我们党的发展有着无可估价的意義。除此之外，随着党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预备党员、党员和干部的党性不断增强。这种情况过去是不可能产生的，这是因为过去党的领导存在着不一致和自由主义。

在八月大逮捕事件后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一九五二年年年初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深入地讨论了党对苏基曼—苏巴佐—维比梭诺政府的政策、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与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恐怖集团问题、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从思想上加强党的问题、发展党员问题和其他组织问题。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所有议程讨论后所得出的结论指出，为了保证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

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只有解决了当时最重要的组织问题，即发展党员和扩大党的组织问题，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党的工作重点在于建立反对极端反动的苏基曼政府的民族统一战线

綫——才能获得解决。由于当时党员和预备党员为数不过七千九百一十人，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小而少，不可能实现上述繁重的政治任务，即推翻美国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苏基曼政府。

考虑到党要做的工作很多，以致许多干部在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中必须兼任到七种工作，又考虑到党的政策的正确和党内宗派主义分子日益减少，由此而吸引了想参加党的广大群众，因此，政治局制订了发展党员计划。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赞同政治局的计划，在六个月内把党员由七千九百一十名发展到十万名。

发展党员计划使预备党员、党员和干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性。发展党员计划结束时有一十二万六千六百七十一名党员和预备党员，就是说，取得了超额完成计划的成績。在执行这个计划的同时，也解决了组织预备党员和党员的问题、政治教育问题、思想提高问题、干部使用问题和政治警惕性问题。对预备党员、党员、干部和对群众的教育运动，是在一定的计划下进行的。

在八月大逮捕事件期间，党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方面的活动成了民主力量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统治者本身之间的矛盾和民主力量的压力使苏基曼政府倒台，而代之以较进步的政府，即韦洛坡政府。党给这个政府以工作机会，这是为了防止政府不致再度落入苏基曼、哈达等人的手里，使党和其他民主力量有机会发展和加强自己。

在韦洛坡政府期间，党改善并加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做得越好，党就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反过来说，党的建设的工作做得越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也就越好。

过去，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不到一万名，党的组织也仅限于

爪哇和苏門答腊，并且是在其他民主阶级和阶层中间处于孤立的地位，但在一九五二年获得了发展十万多名党员的可能性，党的组织发展到馬都拉、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小巽他和馬魯古，党获得了党外广大民主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党对韦洛坡政府的正确策略改善了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为这一工作开辟了宽广的道路，这个统一战线自从一九四八年年中以来就宣告破裂，这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倒向以哈达、苏基曼、納席尔为首的，对工人、农民和其他民主分子宣战（茉莉芬事件）的买办分子一边。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回到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意味着这一战线增添了重要的力量。如果党不迅速地和正确地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关系，那末，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我們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快。

正是依靠日益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党，才挫败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右翼社会党人发动的政变。“十·一七”政变的失败给民族统一战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带来了新的力量。

由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组成了，这个政府的成员和政纲比韦洛坡政府更进步，因而使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党的发展有了更大的可能性，而这个政府也就获得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支持。

目前党的严重弱点是，党员和干部还没有切实了解各种土地关系、农民的要求和生活。因此，党还不能争取大多数农民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而且农民出身的党员，按比例来说，还非常少。目前，在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大约只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七，

而且农民出身的党员不到百分之五十。八月大逮捕事件时期制订的党的**土地綱領**和党员的工作能力显然还未能大规模地争取和发动农民。这就意味着，我們的民族統一战綫还没有强固的基础，因此一旦处于困难的状况，譬如說，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像一九四八年那样再次不忠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那末，党还没有强大的农民作为靠山。

目前我們的民族統一战綫虽然在斗争中获得了若干胜利，但还没有建立在强固的根基上面。当党还没有正确地在农民群众中間进行工作的时候，当很多农民，首先是貧农和无地农民还没有参加党并成为党的干部的时候，这种情况将会繼續下去。

(二)党的非常紧迫的两項任务

非常清楚，对我们党來說，目前非常紧迫的問題是：**第一**，建立以反封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民族統一战綫問題；**第二**，繼續建設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維克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为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民族統一战綫和建設布尔什維克化的共产党，列宁式的共产党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充分具备了。

甲、建立民族統一战綫問題

自一九二〇年我們党成立以来，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統一战綫经历了若干不同情况和不同时期。

第一个时期(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这是党对于联合

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还是一无所知的时期，当时，党提出的口号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建立印度尼西亚苏维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对东方民族大学学生的演说中正确而中肯地批评了党的这种“左”倾偏向，他说，这是一种“左”的倾向，它包藏着脱离群众，使共产党变成宗派的危险。斯大林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时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五年）。这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期。党采取这一正确的政治路线首先是由于得到了慕梭同志的领导。他在一九三五年从国外秘密返回印度尼西亚。慕梭同志回来，不仅仅能够给党以政治领导，并且在慕梭同志领导下，重建了党。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荷兰殖民政府实行恐怖镇压后，党遭到了破坏，而不能迅速重新集合起来。虽然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活动是非法的，但是，在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之前或占领期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通过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和其他组织，积极参加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仅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也争取了部分的买办资产阶级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后备力量。但是，自从日本军队占领印度尼西亚之后，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可以说整个买办资产阶级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人民抗日力量不怎么强大，他们也幻想日本将会给印度尼西亚“独立”，因此，他们便实行同日本合作的政策。

第三个时期（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这是武装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当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人民革命力量强大之后，便重新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人民革命的强

大力量使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最初几年中采取坚定的态度。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軟弱使党在当时非常好的客观形势下沒有能力进行領導。在这次革命中，党拋棄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独立性，而且沒有重視农民工作，这是革命失敗的基本原因。革命領導方面的軟弱使革命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不断遭到失敗，这些失敗使民族資產階級动摇起来，并終于投到买办分子和帝国主义者方面去。一九四八年八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決議，是当时处于困境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出路。但是，在这个決議貫徹执行之前，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就进行挑衅，制造了“茉莉芬事件”。

第四个时期（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一年）。这是民族資產階級脱离反帝民族統一战綫而投到挑起“茉莉芬事件”的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方面去的时期。民族資產階級跟着投降了帝国主义，贊同哈达、苏丹·阿卜杜尔·哈密、穆罕默德·罗姆所制定的卖国的圓桌會議协定。民族資產階級脱离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使党感到极大困难，这是由于党在农民方面的工作很弱，还不能把农民当作靠山。这种情况迫使党采取这样的策略：爭取時間使民族資產階級回到反帝民族統一战綫中来，并改善和加强党在农民中間的工作。党的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已为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发展所证明。

第五个时期（一九五一年迄今）。这是与民族資產階級的团結日益密切，但工农联盟还未强大的时期。換句話說，党仍然沒有建立强固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党必須大力地反对过高估計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联合而过低估計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工农联盟的右的偏向。这一危險是拋棄党的独立性的危險，是使自己同資產階級溶

化起来的危险。与此同时，党当然也要大力防止“左”的偏向，防止宗派主义，这就是不重视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不全力来维护统一战线的态度。由于买办资产阶级集团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由于目前党的政策首先是针对荷兰帝国主义而不是针对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因此，这就引起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在投靠帝国主义的买办集团中间自然也产生了同样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党的发展和建设，对于党的当前工作，即建立反封建的工农联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党的建设和工农联盟的建立是无产阶级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的保证。

我们从上述各种经验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同样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在一定情况下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全力保持这一统一战线。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党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只是针对某一个帝国主义，那末，在反对该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部分的买办资产阶级也能够作为后备力量。但是尽管如此，买办资产阶级仍然是极端反动的，仍然是力图粉碎共产党、无产阶级运动和其他民主运动。

(二)由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具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便会摇摆和叛变。因此，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时刻注意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情况下不参加民族统一战线，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有重新参加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三)没有农民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强大有力。没有

农民参加，民族统一战线最多只能团结百分之二十的人民，即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农民约占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百分之七十。也正因为如此，强有力的民族统一战线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除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巩固的同盟军之外，为数不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在城市小资产阶级方面的工作，也是重要工作。

(四)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论是同其他政党合作或者是同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意识的人士合作，党不可以与他们溶化在一起。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坚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此，党必须用对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明确认识来武装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同其他政党和阶级建立的统一战线乃是建立在共同要求和共同行动基础上的一种联盟。共产党人在必要时必须批评它的同盟者的反动措施，必须反对他们的动摇态度。与此同时，党必须提醒党员不要犯宗派主义的错误。

我们弄清楚了，我们党必须正确地解决统一战线问题，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和分裂的问题以及作为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的工农联盟问题。

乙、党的建设问题

如果党已经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那末问题是，怎样才能彻底贯彻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并把它变成群众的路线。怎样才能把党指出的各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呢？这就取决于党的状况了。在这方面，中心的问题是党本身的问题，是党的建设问题。

斯大林同志一再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列宁式的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革命理论建立

起来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式的、摆脱机会主义的这样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印度尼西亚土地上消灭掉。换句话说，如果我們要在革命中取得胜利，如果我們要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面貌，把它变成完全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如果我們要参加改变世界面貌，那末，我們就必须有一个像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那样的政党。

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我們就不可能建立这样的政党。只有为先进理論所指导的党，它才能起先鋒的作用。只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才能得到信任，才能引导和率領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要使我們党有充分能力担負起偉大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使我們党有能力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首先，我們党必須在自己的队伍中确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統一，提高全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巩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只有提高全党黨員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我們党才有可能强大起来。只有我們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并信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和领导群众前进，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冲破一切障碍并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們的力量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

只有不断地同党的队伍中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不断地从党的队伍中清除投降主义分子和叛徒，只有不断地维护和加强党的队伍的統一和紀律，我們党才能完成偉大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最坚强的堡垒，是參謀部。如果在參謀部中盘踞着投降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叛徒，那末，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末，党就容易被摧毁，不仅从外面而且从内部被摧毁。

只要党胜而不驕，只要党正視工作中的缺点，只要党敢于承认自己的錯誤并公开而誠懇地改正錯誤，我們党就能完成它偉大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只要党不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只要党不掩盖自己工作上的錯誤和缺点，只要党教导自己的干部从党的工作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并且善于及时改正錯誤，党就将是不可战胜的。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小資產階級国家，就是說，在印度尼西亚，小私有經濟，特别是生产水平很低的个体农业为数还很多。我們党受到人数极多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又有許多党员出身于小資產階級，他們参加到我們党里来就必然会或多或少要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与习气带进来。正是这些小資產階級成为我們党内两种主观主义毛病即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两种主观主义是过去那些在党内錯誤地实行右傾或“左”傾机会主义的人們的思想基础。

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这两种思想同样是片面的。教条主义者仅仅从书本和片断的理論条文出发来观察事物，而不把事物看作是活的、变化的和发展着的。他們把理論变为毫无用处的死的条文，因为他們割断理論同实践和群众的关系。相反的，經驗主义者可能如馬負重那样辛苦地工作，但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一切工作賴以产生的根源，不知道自己工作的目标，也不知道以何种正确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他們的实践只是盲目的实践，因为他們沒有用理論作指导，因为他們忽視理論。显然，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都是不客观的，在这种片面的基础上，这两种思想于一定时期遇到实际問題时便互相联系并在共同点上結合在一起。因此，我們經常看到，我們党內外的“左”傾人物在遇到实际

問題时，便同我們党內外的右傾人物互相联系并在共同点上結合在一起。我們也經常看到同样的一个人自然而然的，沒有經過严重的思想斗争，会突然地从原先的“左”傾走向右傾；或者相反的，从右傾走向“左”傾。

對我們党來說，反对主观主义，即反对教条主义或經驗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种主观主义對我們党的危害性是相同的，最危险的乃是：我們沒有反对和进攻这种主观主义。我們党的經驗指出：党遭到失敗和党内遭受破坏（例如：一九二六年的失敗与破坏，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革命的失敗，反对茉莉芬挑畔事件的失敗及由此而来的破坏），都是由于上述两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造成的。因此，我們党的党员和預备党员凡是染上了这两种毛病的，就必须弥补各自缺乏的东西。有书本知識的人，必須向生动的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学习，要认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自己的經驗带上条理性，綜合性，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論。然后才可以不把自己的片断的局部的經驗誤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义的錯誤。

总之，我們在工作中必須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为指导。斯大林反对脫离实践的理論，他說：“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斯大林也反对脫离理論的实践，他說：“不以革命理論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小資产阶级的狹隘性在政治生活中和在組織上表现为宗派主义，这是由思想上的狹隘性派生出来的。主观主义在思想上脫离党內外的群众，而宗派主义則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脫离党內外的群众。两者是一个东西——小資产阶级的狹隘性——的两面。

为了反对我們党内的主观主义，我們极需做到：**第一**，教育党员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政治形势和估計阶级力量，以此反对主观主义的分析 and 估計；**第二**，引导党员注意調查研究社会与經濟情况，以便由此来确定斗争策略与工作方法，使得我們的同志了解到，对实际情况調查錯誤，将会使他們陷入空想和冒險主义。自一九二九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也就是应用了这两种方法来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的。关于上述两方面的問題，一九五二年召开的我党各級代表會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責成每一个党委会代表向會議作有关各自地区的政治、社会、經濟情况的报告，政治局同意把《**印度尼西亚人民为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争**》（即《**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一文当作紀念党成立三十三周年的报告，这也有着重大意义，更重要的則是提交目前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討論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的決議。这样，我們就可以希望党员和干部今后更了解祖国的历史、政治、社会、經濟和文化的情况。对这些問題的了解，是布尔什維克化的党所必需具备的条件。

大力克服我們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由于历史条件的原由，我們党的大多数党员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因此，为了克服各种錯誤，巩固党的統一，我們必須采取严肃和謹慎的态度，而絕不應該采取自由主义和急躁的态度。我們必須无情地揭露每一种錯誤，科学地分析和批評这些錯誤，以便使我們日后在工作中更加小心，并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在尖銳批評每一个錯誤的同时，我們必須努力使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这样，我們才能正确地执行这样的任务：既純洁党内思想，又保持了同志間的团結。

一九五二年間我党开展了毛澤东同志著作《**实践論**》、《**反对自由主义**》和刘少奇同志著作《**論群众路綫**》学习运动,对于提高我們党思想水平的工作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党的出版工作迅速发展,特别是出版了列宁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将要出版斯大林著《**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馬林科夫同志的《**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苏共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毛澤东同志著《**矛盾論**》等书,将更加提高我們党的思想水平。

为了加强党,我們的任务是:

(一)提高預备党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水平,并使他們認識到党的政治路綫的正确同党的建設的密切关系。

(二)使全党認識党的非常紧迫的两項任务,即:第一,建立以反封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民族統一战綫;第二,繼續建設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維克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三)繼續发展党员和扩大党的組織,吸收更多的农民首先是貧农和无地农民参加党的队伍,把党员和干部安排到更适当的崗位,减少党员和干部的兼职。对党的每一項工作实行更好的监督。

(四)重視党内思想工作,更多地学习列宁、斯大林、馬林科夫、毛澤东、刘少奇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繼續进行反对教条主义、經驗主义、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

(五)更多地研究印度尼西亚历史,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經濟、社会、文化情况,以此作为确定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的基础。

(六)用正确的策略路綫、正确的組織路綫,用明确而簡要地說

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所有重大和基本問題的新綱領来武装党和党的各級負責人,使符合群众願望的綱領成为群众的綱領。

同志們,現在我們从这个总结报告中弄清楚了有关国内外形势和我们党的状况的若干基本問題,我們也弄清楚了关于党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的任务和加强民族統一战綫以及加强党的任务。这样一来,我們也就清楚地了解到作为这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議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的基础是什么。

去年十月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之后,国内外发生了若干重大事件。国外的事件如在柏林召开了四国外长會議,这个會議决定邀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五大国會議来討論远东緊張局势⁽¹⁷⁾。国内的事件有:开始扑灭反共和国的荷兰殖民主义者阴谋集团⁽¹⁸⁾,印度尼西亚政府为坚持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領土和廢除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采取了具体措施⁽¹⁹⁾。这一切事件证实了总结报告內容的正确性,更加证明了日益强大的和平运动可以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到談判桌上来,证明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繼續不断地对政府施加的压力已迫使政府对荷兰殖民主义采取比較明确的措施。

我們大家都認識到,我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关于这点,总结报告已說清楚了。但是,我們也認識到:我們將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在每天的工作和斗争中有偉大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論和毛澤东思想照耀着我們。因为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从苏联和中国这两国偉大的人民和两个偉大的党的經驗中得到鼓舞与示范。

在永远飄揚的列宁旗帜下,同人民团結在一起并相信英雄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力量,我們一定能不断前进一直到取得胜利,取

得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制度对印度尼西亚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胜利。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目标,因此胜利必将属于人民。

关于陈莽如主义

这是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专为解答有关陈莽如主义的各种问题。艾地同志从总的方面，也从组织、政治和思想方面透彻地分析了陈莽如主义。陈莽如主义曾在党内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破坏。为击败陈莽如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我们党内最重要的思想斗争，这个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党的团结，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党在组织、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发展。这篇讲话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清算形形色色的陈莽如主义的重要依据。

有些同志会问，陈莽如主义是不是党内的新毛病？而另一个问题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通过决议之前，党的领导是否有意放任陈莽如主义在党内发展？

对上述问题的答复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举行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在我们党内便展开了反对陈莽如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不论是过去的年代或未来时期，反对陈莽如主义的斗争是我们党内最重要的思想斗争。

一九五三年十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反对陈莽如主义的斗争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已经正式表明了它反对陈莽如主义的态度。这一事件把反对陈莽如主义的斗争引入新的阶段，即：陈莽如主义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央委员会内部的问题，而已经成为全党公开讨论的问题。这就非常有利于动员全

党进行反对陈舜如主义的斗争。这对于加强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团结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

自从陈舜如同志在我们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他曾担任社会党总书记同时又是“秘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后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担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在慕梭同志逝世后而自然成为党中央委员会的首要人物——以来，陈舜如主义就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简单说来，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革命时期直到一九五一年年初，陈舜如主义就已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当然，陈舜如主义大大地影响了党在组织、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发展，从而也影响了革命的进程。

可能有人会说：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的代表会议决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中所批评的在组织、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一切错误，并不是陈舜如同志个人所犯的错误，而是当时党的领导机构集体所犯的错误。问题是，在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当时的错误是党的领导机构集体所犯的错误。把这一切问题提出来，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整个阶级的利益。有一个问题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在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的代表会议通过《新道路》的决议，在党遭受到“茉莉芬事件”的打击，在慕梭同志逝世，在革命遭到失败因而使一些不坚定分子投降之后，在所有尚存的中央委员中间，只有陈舜如同志一个人竭力要恢复《新道路》决议以前的状况。

在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党内，首先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最重要的问题是拥护还是反对《新道路》，就是说，拥护还是反对这个决议所述的组织、政治和思想原则。在一九五一年年初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事实表明，拥护并坚决维护《新道路》的组织、政治

和思想原則的，乃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列宁主义派，而不論在口头上或行动上都反对《新道路》的，則是以陈舜如同志为代表并得到一些中派分子消极支持的取消派，在取消派显然遭到失敗之后，这些中派分子便离开了陈舜如同志。

陈舜如同志抱着竭力要恢复到《新道路》以前的状况的态度，我們由此可以得出总的結論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革命时期直到一九五一年年初，陈舜如主义实际上已經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内部占統治地位，而《新道路》实质上就是对陈舜如主义的揭露。

* * *

在組織方面，陈舜如主义是什么呢？

在組織方面，陈舜如主义就是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变成社会党的尾巴、左翼陣綫的尾巴、后来又把它变成人民民主陣綫的尾巴⁽¹⁾。陈舜如主义縮小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革命先鋒队的作用，取消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組織上的独立性。关于这个問題，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的代表會議提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工人階級的政党和革命先鋒队的作用被縮小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放在不应有的地位，以致使它作为一个政党和組織沒有形成一种重要的力量。”

关于这个問題，代表會議接着指出：“迄今为止三个工人階級政党（公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劳工党和社会党）同时并存，它們都是由秘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領導，都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現在都联合在人民民主陣綫里面，并且是根据共同綱領采取联合行动，因此就造成了整个工人运动混乱的后果。这一情况大大地阻碍了工人階級組織力量的进展，也大大地阻碍了

彻底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扩大与深入。因此，这就給工人階級的敌人很多机会以建立各种各样的伪左翼政党，并盗用那些本来應該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口号来阻碍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的代表會議指出，上述的态度是反列宁主义的态度，而正是由于这种反列宁主义的态度，共产党人在工会方面大大地阻碍了作为民族革命领导力量的工人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

鉴于上述在組織原則方面的各种錯誤，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的代表會議便决定进行根本的改变，其目的是：（一）尽速恢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工人階級先鋒队的地位；（二）尽速恢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优良傳統；（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对民族革命的領導权。

現在十分清楚，陈舜如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上提出的保持社会党作为“收容政党”，即作为收容那些拥护共产党但“不敢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人們的政党的方案，是一个反《新道路》的方案，是在組織方面反列宁主义的方案。

陈舜如同志除了提出需要有社会党作“收容政党”这个理由之外，他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上还提到，工人階級的政党不是永远采用“共产党”的名称，他所举的例子中提到，在德国，有的工人階級政党采用德国統一社会党的名称，在东欧各国，有的采用工人党的名称。陈舜如同志提出这点，实际上就推翻了他自己关于“收容政党”的“理論”。提出了这点，他把社会党当作“收容政党”的真正意图便昭然若揭了。在陈舜如同志的思想里面，这一“收容政党”不外是由拥护共产党但是“不敢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人們所組成的工人階級政党。也就是非印度尼西亚共

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就是否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

沒有一个人否认，在若干国家中，工人阶级政党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有的不用“共产党”的名称，而是采用統一社会党或工人党的名称。这种情况不仅被陈舜如同志利用来证实他的关于把社会党当作“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理論”的正确性，而且也被托派分子利用来证实他們关于把“平民党”当作“正統的共产党”的“理論”的正确性。在这里，在組織方面，陈舜如主义和陈馬六甲主义就結合在一起了。两者同样否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他們的区别仅仅在于：陈馬六甲主义的信徒是在党外明目張胆地提出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主張，而陈舜如同志則是在党内轉弯抹角地提出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主張。在这点上，陈舜如主义比陈馬六甲主义更危險，因为党的公开敌人比党的隱蔽的敌人更容易为群众所識破。

根据某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可以而且有必要采用其他的名称，这是对的。但是，不論陈舜如同志或托派分子陈馬六甲的信徒都不能够而且也不可能正确的答复下列問題：哪一种实际情况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工人阶级政党必須采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名称？哪一种实际情况使得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必須把它的政党称作“社会党”或“平民党”呢？是否这些政党的基础已經那么深，傳統已經那么悠久，以致如果不把这个党称作社会党或平民党就会发生“暴动”呢？事实并非如此。不論社会党或平民党都同样沒有傳統，在群众中間同样沒有也不可能有基础。相反的，正如《新道路》所指出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优良傳統并在印度尼西亚人

民群众中深得人心的政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理应采用的名称，是符合客观的、符合于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的传统和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的实际需要的名称。给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政党以其他名称则是主观的，是不符合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传统和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的实际需要的。

陈馬六甲主义的信徒明目张胆地说，保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名称是不正确的，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名称“已为一九二六年的暴动所破坏”或“为茉莉芬事件所破坏”。陈馬六甲主义的信徒以这种说法来破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良好声誉，并且阻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影响的扩大。陈莽如同志不像托派分子那样采取明目张胆的方式，但其结果则是一样的，同样大大阻碍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影响的扩大。陈莽如同志有时这样描绘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籍“不是随随便便的”党籍，当党员的只有那些“了不起的人物”，并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组织“不是随随便便的组织”。但是，且不问陈莽如同志到底为人们做了什么工作，做了什么组织和教育工作，以便使他们成为不是随随便便的人物、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从而使他们有可能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也不用问他是否认真把党的组织建设成为真正不是随随便便的组织。这一切工作陈莽如同志都没有做过！相反的，他却一贯地阻挠合乎条件的人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且把这些人拉去参加社会党。他这种描绘就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变成神秘的和可怕的，使人们惧怕和远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孤立起来，从而有希望把那些“不敢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人们收容到社会党里面去。这样，陈馬六甲主义和陈莽如主义在方式上的区别便清楚了，而两者的共同点也清楚了，这就是，两者同样阻止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扩大影响，同样是取消主义。陈舜如同志如何言行不一致也就清楚了。

因此，十分明显，陈舜如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存在过的取消主义之間沒有本质上的差别。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議，指斥了取消派，即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孟什維克)的活动，他們企图“取消現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而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甚至不惜以公然放棄党的綱領、策略和傳統为代价的涣散团体”(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号召全党一切組織为无情地反对取消派而斗争。

結論：在組織方面，陈舜如主义是党的一个派别，它要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外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它要建立一个由中間阶级即所謂拥护共产党但“不敢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人們組成的“工人阶级政党”。简单說来，陈舜如主义是党的一个派别，它縮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革命先鋒队的作用，取消党的独立性，也就是在实际上取消党。

在政治方面，陈舜如主义是什么呢？

在政治方面，陈舜如主义是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巨大障碍，并使党的政策在群众中間不受欢迎。正如在組織方面陈舜如主义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过激”，因此必須以温和的社会党来代替它一样，在政治方面陈舜如主义同样认为共产党的綱領“过激”，因此必須以社会党的綱領来代替它。社会党通过“秘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和左翼陣綫(后来是人民民主陣綫)掌握了领导权，乃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沒有制定和执行自己的綱領、真正的綱

領的基本原因。在政治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变成了社会党的尾巴，左翼陣綫的尾巴，后来是人民民主陣綫的尾巴。

在政治方面，陈舜如主义的根源在于，一方面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过高估計反动派的力量。其結果，不能不降低真正的党的綱領，而仅仅实行在現有法律和政权范围内的“大概可能的”政策。实质上，陈舜如主义是和十九世紀末的俄国“合法馬克思主义”相同，这就是披着馬克思主义外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信奉的“馬克思主义”。陈舜如主义利用馬克思主义旗帜使工人运动依附和适应資產階級社会的利益、資產階級的利益。陈舜如主义像“合法馬克思主义”那样，不过是利用馬克思主义，但拋棄馬克思革命学說中最重要的部分，因而正像“合法馬克思主义”那样，陈舜如主义不外是資產階級自由主义。也正是这种从資產階級自由主义来的改良主义政策使社会党接受林牙椰蒂协定和倫維尔协定，并且通过“秘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和左翼陣綫、后来的人民民主陣綫，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接受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政策。

在政治方面，陈舜如主义的合法主义特点也表现在陈舜如同志分析政治問題的习惯中，陈舜如同志分析政治問題首先着重法律上的考虑和根据，而不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和考虑。因此，陈舜如主义使得印度尼西亚工人和人民沉沒在資產階級法律的海洋中，沒有把工人階級引导到现实的政治問題，因而同样沒有把工人階級引导到尖銳的階級斗争的现实。这样說来，是否意味着我們一概反对利用法律根据来证实我党立場的正确性呢？当然，我們不可能采取这种态度。相反的，我們必須正确地利用能維護党的立場的法律根据。我們所反对的是，把法律根据当作唯一的基本理由，

因而使群众脱离政治现实和尖锐的阶级斗争现实。过多和太经常地利用法律条文以维护党的立场，与此同时，却很少或不提出强有力的政治理由，这无异是帮助在群众中培植这样的信念，即资产阶级的法律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好的。

例如，陈舜如同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过题为《苏加诺工学士当总统还不合法》的声明〔3〕。这一声明只是用几句话写成的。内容是说苏加诺工学士因未按宪法第四十七条进行宣誓，所以还不合法，而当时的纳席尔内阁是由这一还不合法的总统任命的，所以，纳席尔内阁也是不合法的。

不久以后，苏加诺总统按照宪法进行了宣誓。是不是说，通过这一宣誓，即并不难于完成的仪式，陈舜如同志就要向群众说：按照宪法总统已算是合法的，从而如果纳席尔内阁是由这一合法的总统任命的，那末纳席尔内阁也是合法的，因此人民必须服从这一合法内阁。如果当时群众听从陈舜如同志的声明，那末群众就会相信，举行了宣誓典礼，一切就是合法的，因而必须服从。他要给群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吗？这是多么好的教育呀！

再如，陈舜如同志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西伊里安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陈舜如同志提出了他的关于“摆脱圆桌会议协定的‘伊里安民主共和国’同尚未摆脱圆桌会议协定的印度尼西亚统一共和国之间结成联盟”的“理论”。这一声明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陈舜如同志相信在现有的法律和政权范围内有这样的可能性：现有的法律和政权将会“准许”和平地建立一个摆脱荷兰—美国的“伊里安民主共和国”。然而，陈舜如同志还根据法律的观点把“完全独立的伊里安民主共和国”和还受圆桌会议协定束缚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结合在一起，使它恢复成为一

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陈莽如同志的这个声明引起了公众对党的愤懑，如果不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来撤销陈莽如同志关于伊里安的声明，那就会使党在民主与爱国的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间大大地孤立起来。

陈莽如同志主观上对法律的喜爱，使他给社会党中央刊物起名为《第三十三条》。其结果，这个杂志没有成为群众性的杂志。群众的感觉是十分敏锐的，他们懂得，第三十三条是写在宪法上的资产阶级的谎言。

一个使人非常痛心的事实是，当陈莽如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期间，即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革命时期直到一九五一年年初的期间，党中央领导的注意力和活动过分集中于议会斗争。尤有甚者，在革命遭受失败之后，陈莽如同志顽固地坚持他的关于“从议会中建党”的“理论”。这种情况使得党员和群众产生了幻想，似乎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斗争形式，是最重要的而且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斗争。这种情况使得党的中央领导没有作自卫的准备以对付可能来临的新的措施和迫害。这也就是党在对付一九五一年苏基曼反动政府的措施时准备不足的原因。

结论：在政治方面，陈莽如主义是党的内的一个派别；它过低估计群众的力量，过高估计反动派的力量，降低党的纲领，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变成纯粹是法律斗争和议会斗争，使工人阶级远离政治问题，而这一切意味着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

* * *

在思想方面，陈莽如主义是什么呢？

在思想方面，陈莽如主义的根源是主观主义。这可从一九四

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革命时期直到一九五一年年初对我们党有巨大影响的两种毛病，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毛病，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毛病中获得证明。这两种毛病的根源在于两种思想偏向，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的，两者都是片面的。

陈莽如主义是教条主义，因为他不论从书本上看到或从国外听到什么就要照样地把它搬到印度尼西亚来，而不顾印度尼西亚现有的条件。没有去进行切实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实际情况的工作。

在一个时期，当一九四七年抵抗第一次荷兰殖民侵略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和党参加的左翼阵线内，有人建议建立工业合作社，即制造豆酵饼、豆腐、酱油等小手工业合作社。这个建议是陈莽如同志那儿来的，事先没有经过党中央领导的讨论，没有讨论工业合作社到底是什么、在印度尼西亚有什么条件建立它、如何建立，特别是如何使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活动不致削弱人民的作战力量，而相反地能够增强作战力量。这是一个人刚读完有关工业合作社重要性的书本后突然地自发地产生的思想，未经实际情况考验的思想，这种思想已经造成大大损害革命的后果。

陈莽如同志关于工业合作社的建议已使许多党的干部谈论工业合作社问题，但是那么多谈论工业合作社的人都并不了解工业合作社是什么、如何建立，以便使工业合作社能够加强革命，不了解它与党的工作关系如何。这种关于工业合作社的片面建议，转移了党员和干部对政治问题的注意。政治问题变成了只是几个高级领导人的问题。而最使人痛心的是，许多关于工业合作社的空谈，已经使党的干部的思想离开了武装斗争的任务，在游击战争中锻炼自己的任务，学习修理破损武器的任务，自己制造武器的任

务等等。而片面地把注意力灌注在制造酱油、豆腐、豆酵餅和培植蘑菇等等方面，其他則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只有工业合作社是最重要的，制造酱油是最重要的，制造豆腐是最重要的，制造豆酵餅是最重要的。

这是不是說我們反对从事增加食品生产的活动呢？絕非如此！我們充分了解到，如果战斗中的軍隊和人民吃的和用的得不到保证，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如果我們不关心人民的直接利益，如农民需要土地，人民需要大米、油、盐、咸鱼、柴火等等，我們就不可能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我們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方法，就是不結合我国革命具体需要，沒有看到某一事物和整个革命活动的关系，首先是沒有看到它和人民武装斗争的关系，而不加批判地搬用外国的經驗。

陈舜如同志的教条主义观点还表現在，他引用了德国和东欧的情况來說明工人階級政党并不是永远采用“共产党”的名称，以此为其社会党辯护。他是根据国外所看到的而不是根据对印度尼西亚的实际情况的分析来作結論的。

陈舜如主义是經驗主义，因为它不重視提高黨員理論水平方面的工作。学习理論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不实际的。重要的不是閱讀书本和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原理，重要的是知道鴨蛋多少錢、大米多少錢、五福布多少錢，以便在知道了所有这些价錢之后我們能够帮助人民爭取他們的利益。人民并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而是要改善生活，要豆腐，要蘑菇，要酱油、豆酵餅等等。这就是陈舜如同志在革命期間經常說的一些話。例如，当干部們問他有关列宁著作的含义时，經常要感到失望。他們經常要感到失望是因为他們得到的答复是該著作的內容并不重

要。陈舜如同志随即把这个问题转向“各种实际问题”的讨论。似乎对于参加革命的党的干部来说，理论并不是实际的问题。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反对实践和反对关心人民的直接需要呢？绝非如此。甚至我们要求有更多的实践和更认真地关心人民的直接需要。我们所反对的就是那种片面的看法，以致低估和忽视作为实际工作指针的理论。总之，陈舜如同志没有使大家树立起理论对于革命斗争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他低估理论的作用，他忽视理论的作用，他有时嘲笑那些要学习理论的党的干部。大约是在一九五〇年年中，一部分中央委员指出出版《红星》杂志的重要性，以便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以便把当时没有感觉到有党的中央领导的全党团结起来。陈舜如同志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却更重视由议会党团出版“综合性”的刊物，这个刊物发表许多有关法律的文章。但幸亏，《红星》杂志即使还有许多缺点也终于出版了，全党感到它是何等的重要，它对于提高党员理论水平和把全党统一在一个中央领导下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两种主观主义思想，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是，我党在这两种毛病之间摇摆不定。主观主义使我党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真正根据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在某一问题上，我党犯了执行右倾政策、改良主义政策的错误，落在更前进了的群众的后头。但在另一问题上，我党犯了“左”倾错误，实行了冒险主义，远远走在还落后的群众的前头。因此，在陈舜如主义占统治时期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既犯右倾又犯“左”倾错误的历史，既犯投降主义又犯冒险主义的历史。

结论：在思想方面，陈舜如主义是主观主义，是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派别，它使党犯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大大地破

坏了党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 * *

有些同志会问：陈舜如同志既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而陈舜如主义又使党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为什么在中央委员会一九五三年十月的会议中仅仅将陈舜如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开除出党呢？通过这一决定的唯一理由是因为陈舜如同志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并保证改正他的一切错误。这是他在宣誓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时说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决定，因为假如一个人承认了他的错误而且保证要改正他的错误，那末就必须给他实现诺言的机会。假如陈舜如同志被开除出党，那就意味着没有给他作为一个党员来改正错误的机会。

简单说来，在总的方面和在组织、政治与思想方面的陈舜如主义就是如此。

清算陈舜如主义！

发揚一九五一年时期!

这是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閉幕詞。在评价代表大会的成果时,艾地同志明确指出,党的无知的旧时期已經肯定地永远地結束了,而新的时期,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时期正在发揚光大。为了巩固和扩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获得的成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号召每一个党员清算一九五一年以前的时期和发揚一九五一年的时期。

同志們,請允許我以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名义向参加我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表示感謝。这届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选出,意味着你們代表了全体党员和預备党员給我們以充分信任,以便領導我們党直至下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同志們,这是非常重要的。沒有这种充分的信任,中央委員會就不可能很好地領導我們党,領導这个日益强大的、工作日益开展的党。

由于我們現在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因此你們所給予的充分的信任就尤其重要。我认为,我應該在这里以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名义宣布,不論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們宣誓将永不辜負你們和全党所給予我們的信任。

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開幕詞中,我曾表示,希望我們的代表大会能够解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重大和基本的问题,希望我們的代表大会能够为党更好地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的工作奠定基础,

希望我們的代表大會解決有關黨的建設的一切基本問題，希望我們的代表大會能夠使我們黨同群眾的關係更加密切起來。

我想，我們黨的全體黨員和預備黨員，是的，我國全體進步人民將感到高興，因為我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已經實現了他們所表達的那些願望。這次代表大會已經解決了印度尼西亞革命的一切重大和基本問題，已經為黨更好地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工作奠定了基礎，已經解決了關於黨的建設的一切基本問題，已經使我們黨同群眾的關係更加密切起來。

解決了印度尼西亞革命的重大和基本問題，這就意味着我們黨和我國革命運動向前推進了幾十年。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代表同志們曾經說過，由於黨中央領導的能力和工作的，我們已經找到了黨的正確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路綫。這只是真理的一個方面。如果沒有下級組織的幫助、黨的幹部和黨員的幫助，黨中央的領導就不可能制定出像我們黨現有的文件。

在這方面有必要強調指出，黨中央的領導之所以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大家確信中央委員會的每一個決定是正確的。為了樹立這種信心，同志們並不顧忌在討論會中有發生意見分歧的可能性。因此，我們今后的方針必須是：中央委員會的每一個決定必須真正地為全體黨員和預備黨員所了解，即使在討論時有發生意見分歧的可能。

同志們在地方上的工作成果和同志們給中央委員會的如實的報告，對於幫助我們黨中央委員會提高能力有着不可估量的意義。在代表大會進行期間，同志們全心全意地並以高度的團結精神進行工作，這種工作對於通過代表大會的各項重要決議有着無比巨大的貢獻。

事实表明，我們代表大会的成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党內的敌人的明证。这使我們更加相信，党內的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分子无论怎样隐蔽，最終必定会被揭露，而全体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警惕性愈益提高，党內的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分子也就能愈益迅速地被揭露并被驅逐出党。

由于我們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功，我們党的无知的旧时期已經肯定地永远地結束了，而新的时期，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时期正在发揚光大。

同志們，我們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決議，乃是如我在上面說过的将使我們党和我国革命运动向前推进几十年的決議。因此，我們已經通过的各项決議将使党和人民的国内外敌人感到震惊和极不高兴。由于我們党的政策，民族的和民主的政策的正确，而使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遭到多次失敗并使他們陷于窘境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屡次已經证明过的那样，国内的反动派在国外反动派的帮助下是会采取殘暴和瘋狂行动的。考虑到这一点，同志們，我着重指出我們党必須进一步提高和不断提高警惕的必要性，我們党必須更加慎重，更加勇敢和更有战斗性。

同志們，如果我說我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党的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的团結的表现，我想这是恰当的。由于有了这种团結，我們的代表大会开得很順利。此外，最重要的是，我們党领导上的团結，乃是全党的团結、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結、全体劳动人民的团結和全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团結的条件。因此，維护与不断加强党的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的团結，对我們党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同志們，我們希望将来党的工作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并怀着这种希望来結束这次代表大会。我們希望未来的代表大会是在比現在更好的形势和在人民的团結和我們党的团結更为强大的情况下举行。我們希望未来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也有未参加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各族代表同志参加。同样的，我們也希望未来的代表大会也有妇女代表同志参加。

同志們，我再一次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表示感謝。同样的，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那些为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安全而貢獻出精力的全体党员和干部表示感謝。

这次代表大会閉幕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民主和持久和平都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圓滿地結束了。因此，它是一个使人永志不忘的事件。

同志們，讓我們共同来信守对党的誓言，讓我們保证来加强我們党的领导的团結，这是全党的团結、工人阶级的团結、劳动人民的团結和全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团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讓我們高呼口号来結束这次代表大会：

清算一九五一年以前的时期！

发揚一九五一年的时期！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

在本文中，艾地同志全面地总结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同右翼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的臆测相反，党在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之后，不是陷于分裂状态，而是在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团结一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重大的和基本的問題，而且也为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党的建設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本文还阐述了代表大会通过的旨在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关于組織机构的各項重要決議。

在雅加达举行的我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經完滿結束了。右翼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臆测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将陷于分裂状态，这显然是完全落空了。他們臆测的根据是中央委员会一九五三年十月关于把陈舜如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他們以为，把陈舜如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将会引起党內的严重分裂。在他們之間的談論中以及在他們的报章上都談到这一点，似乎他們慷慨地給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理論家”称号的陈舜如同志一旦“被开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要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要不是他們以为陈舜如同志“将退出”印度尼西亚

共产党，他們就不会那么慷慨地奉贈这种称号的。

我們偉大的代表大会已經反駁了右翼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的臆測和妄想。代表大会所进行的討論以及大会所取得的成就都证明了，我們党自一九二〇年成立以來，党內的团結，不論是領導之間的团結或者是領導同黨員之間的团結，都沒有像今天这样的巩固。党在組織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团結已日益加强。中央委员会一九五三年十月會議把陈彝如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之后，沒有一个代表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有哪些黨員或預备黨員因此而要求退党的。相反地，代表大会认为，这个事件对全党來說，是重要的經驗教訓，对从各方面巩固党是重要的經驗教訓。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右翼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的臆測是否正确，而是代表大会已經討論并且通过了重要的文件，如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印度尼西亚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党的綱領、党章、党的竞选宣言和《关于陈彝如主义》的报告。代表大会作了若干小修改后，通过了一九四八年慕梭同志的大糾正，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決議；代表大会也通过了党徽和入党誓言。所有的決議，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到党徽和入党誓言，都是經過深入的討論才通过的。各省代表都积极参加了上述討論。可以說，所有的決議都是在充滿信心的情况下全体一致通过的，这再次表明了党內的团結一致。

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省（不包括西伊里安）的代表，他們代表四万九千零四十二名正式黨員和十一万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預备黨員。参加代表大会的还有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友好代表团。

代表大会收到了外国共产党祝賀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希望大会

取得成就的賀电或賀詞。在宣讀賀电、賀詞时，特別是宣讀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賀电时，得到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代表大会还收到了国内的各政党领导人、群众团体以及包括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和內閣总理在內的著名人士等的一千多份賀詞。

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所有党的組織、正式黨員和預备黨員有四个月的时间来研究代表大会的文件和进行准备工作。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全会通过的代表大会文件，如中央委員會的總結报告、党的綱領草案、临时党章的修改意見以及中央全会的一些其他決議，已散发給黨員和公众的，不少于十五万份。我們还把党的綱領草案寄給数百名进步人士和著名人士，請他們提意見和批評。

在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一系列活动中，中央委員會總結报告中关于国内外形势的部分以及党的綱領草案成了許多群众大会和报告会的討論內容。党除了召开主要由工人和农民参加的群众大会之外，还为著名人士組織了特別的會議和报告会，为妇女、青年、中学生和大学生召开了特別的會議。在室內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解答了与会者提出的問題。一般說来，与会者很好地利用了提問題的机会。每次集会或报告会結束时，會議主持人都要求与会者向地方党委会或直接向党中央委員會提出书面意見和批評。向党外人士宣傳党的綱領草案的活动中，举行了大小群众集会約一千五百次，参加會議的总人数超过了二百万人。

在四个多月的時間內，召开了正式黨員和預备黨員會議、黨組會議，也召开了党的基层組織到省一級黨組織的代表會議。在这些會議或代表會議上，除討論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外，还逐級选举了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此可見，参加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們是代表全体正式黨員和預备黨員的意見的，因而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路

綫和組織路綫是經過全党討論和决定的路綫。

代表大会也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财务审查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閉会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會議上，选出了政治局、中央書記处和中央監察委员会，并更深入地討論了党的組織問題和策略問題。

党的代表大会以在雅加达市举行一个約有四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而告結束。参加群众大会的有将近半数是农民，他們来自雅加达郊区，或来自离雅加达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远的地区。

党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政治形势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內閣成立之后，以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等反动政党为首的反动力量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所組成的民主力量之間的矛盾就显得非常尖銳。反动力量处在窘迫的境地，因此經常出現这种迹象，反动力量采取不計后果的行动，重复它們过去經常进行的政变和挑衅。虽然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党员并未参加內閣，但它們还有許多人在国家机关中占据了重要的文武职位。

与日益陷于困境的反动力量相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民主力量一般說来是日益发展。比起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执政时期，工人和农民团体、青年和学生团体以及妇女和文化团体等都有了更广泛发展的机会。这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民主团体的发展提供了可以說是无数的可能性，它使反动派更加瘋狂起来。

在党中央委员会宣布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一九五四年三

月召开之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就大肆活动，企图制造一种气氛，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不可能召开。我们看到，先是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接着是英国驻马来亚总督麦克唐纳来到印度尼西亚。这两名帝国主义世界的大人物的来临，显然是企图加强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反动阵线，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领导人施加压力，破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执政党的合作关系，以便孤立并进而打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国内反动派竭尽全力和费尽心机来诬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挑衅，他们还煽动政府采取箝制民主自由的措施。他们企图重复使原拟在一九四八年召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无法举行的做法，即挑起国内骚乱事件，如“茉莉芬挑衅事件”。他们所进行的挑衅活动，其中包括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1〕于二月二十八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示威游行。他们利用外国农场的卡车，把郊区的许多人运到市内拿着反共亲美的标语牌进行示威游行。其中有许多是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恐怖集团分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次示威游行中，示威群众焚烧了野牛广场附近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军官住宅的家具，他们还残杀了一名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军官苏巴达威查雅上尉。他们希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整个民主力量会轻率地对付他们的这种行动，从而造成一场大骚乱，首先在雅加达造成互相残杀、动荡不安的局面，继而扩大到所有地区。

如果国内局势混乱，政府处境困难，则雅加达、西爪哇和其他各地的所有反动力量便将群起攻击政府和整个民主力量；随后，反动派将以能“安定”混乱局势的“英雄”姿态出现。……而把共产党

人說成是制造一切混乱的罪人。他們认为，这么一来，就将为大規模逮捕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的行动开辟出广闊的道路。但是这些挑撥者失算了，由于人民的觉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警惕，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的挑撥阴谋被挫敗了。

結果是，不仅反动派制造第二次茉莉芬挑衅事件和第二次八月大逮捕事件的阴谋破产了，而且，他們想制造使政府当局禁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的局面也失敗了。然而反动派却利用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动摇性，使政府失策地頒布了禁止一切示威游行的法令。示威游行禁令一頒布，就立即遭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指出，政府这一措施是不公平的，不民主的。因为即使需要禁止示威游行，也不应该禁止一切示威游行，只应该禁止那些制造恐怖和混乱以致造成国内局势紧张的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的示威游行。由于政府借口“維持治安”而頒布的这一示威游行禁令，使原来准备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閉幕后举行的一次大規模示威游行无法举行。

工农联盟和民族統一战綫問題

代表大会所解决的重大的和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工农联盟和民族統一战綫問題。这一問題是筹备召开代表大会期間在党员會議、党組會議和党的代表會議上热烈討論过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所有的代表都就这个問題积极地提供了各省的事例和經驗。总的說来，对所有这些問題并没有重大的意見分歧。

代表大会经过深入讨论后得出结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参加革命。鉴于这一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代表大会规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和争取农民。代表大会也认识到，只有通过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而进行的坚决和彻底的斗争，才能动员和争取农民。建立反封建的阵线，必须使封建主（地主）完全在农民（包括富农）中孤立起来，同时还应该把富农争取到这一阵线中来。

代表大会着重指出，为了切实了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都应该努力去切实了解农村的土地关系，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封建主义势力到底有多大。代表大会的结论是，目前印度尼西亚当然已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但仍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

因此，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是，执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就是消灭封建残余，开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给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代表大会确信，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土地革命。

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不再使用“土地国有化”或“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的口号，而改用“土地归农民”，“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和“实行农民土地个人所有制”等正确口号。不再使用“土地国有化”和“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的口号的原因，在于实行这两个口号意味着剥夺农民现在拥有的土地，因而这种口号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

当然，会有人问：不提“土地国有化”的口号，而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作为农民的私有财产，这岂不意味着取消农业的社会

主义化的可能性嗎？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把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資料掌握在国家手里，因而也就是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嗎？

代表大会的报告說明，土地私有观念在我国农民生活当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印度尼西亚农民除了接受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給农民作为他們的私有财产这种形式的土地革命外，不能够接受其他形式的土地革命。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提出要求“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的綱領，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提出要求“全部土地国有化”的綱領的經驗表明，农民对这些綱領表示冷淡或怀疑。“土地归国家所有”和“土地国有化”这两个口号实际上是相同的，而对农民說来也确实是的，这意味着企图拿走他們原有的土地的一种手段。因此，实行国有化和使农业发展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有必要通过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給农民作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的途徑，而不是采取直接的方式。将来，人数最多的劳动农民会根据自己在土地革命胜利后的經驗得出結論，认为很有必要將他們小块的土地和簡陋的劳动工具并入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大規模的集体的农业組織中去，以便从国家那里取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其他农业机器等援助。換句話說，我們的劳动农民就将这样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然而，确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上述的当前任务，并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忽視对同样要求本国独立和解放的知識分子、城市小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进行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依然有責任繼續进行并改进它在知識分子、城市小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中間的工作。換句話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須建立一个包括各个階級和各阶层人民在內的、目的在于反对荷兰帝国主义并爭取印度尼西亚的完全独立的民族統一战綫。这一民族統一战綫

首先必須針對荷蘭帝國主義，而不是針對所有的外國帝國主義。但是，倘若美國帝國主義和其他外國帝國主義給荷蘭殖民主義者以及充當它們的走狗的印度尼西亞人以武裝援助時，那麼鬥爭的鋒芒就必須指向在印度尼西亞的所有帝國主義，就必須沒收它們的財產並把它收歸國有。

代表大會得出這樣的定論：取得勝利的主要關鍵在於建立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反封建的工农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綫。

因此，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唯一正確的政治路綫是：建立工农聯盟並在這一基礎上建立民族統一戰綫。這就是說，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不是在議會內外同其他政黨舉行會談和會議來建立和鞏固我們所指的作為建立一個人民民主政府基礎的真正的民族統一戰綫。但這也不是說，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就因此否認了在一定的情況下同各政黨建立合作機構並採取統一行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裡只是強調，如果沒有組織和爭取工农群眾參加民族統一戰綫，就談不上什麼真正的民族統一戰綫，當然也更談不上共產黨在這統一戰綫中的領導作用。

其他重要決議

關於組織機構的最重要的改變，首先是給予省一級的黨的領導以更大的權限和機動權；其次是規定黨小組為黨的最小的單位。

一九五一年黨剛剛重建時，黨中央決定，黨中央局只是黨中央領導各縣和大城市黨委會的助手，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黨中央局的

成員是由党中央委派，而不是由下面选出的。这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党中央在建立各地方的党组织时就有了可靠的助手；这样中央委员会就可以同各县、大城市党委会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可以直接了解领导这些党委会的干部。这个决定之所以正确，还由于当时党非常缺乏干部，难于找到能领导省委会或相当于省级委员会的地方干部。

但是，在县、大城市党委会普遍建立、大多数地方干部的水平开始提高之后，党中央局的建制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它不仅不能再推动党在各省的发展，反而妨碍党内的民主生活，妨碍党组织的发展和干部的成长。另外，由于下级党委会的数量已增加，中央委员会已不可能再直接领导县、大城市党委会。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深信，取消中央局的建制而代之以有更多权限和机动权的、由下面以民主方式选举的省委员会，这对于党在各省的发展会有更大的保证。此外，这些省委员会能够用更多的注意力来处理本省内的一个族或几个族的问题。而这自然是对中央委员会的不小的帮助。

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在许多乡村和工作场所的支部，其党员和预备党员人数多达数百人。要召开一个拥有数百人参加的基层组织会议是不容易的，而且也是不妥当的。因此，党的代表大会同意把支部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成员最多七人。党员大会只在小组召开，支部大会则由小组派代表参加。这是一个能保持并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措施。

代表大会关于**陈彝如主义**的决议将非常有助于党员认识党的领导过去在组织、政治和思想上所犯的重大错误。这个决议将大有助于党员进行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将进一

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具体經驗的基础上活跃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它将有助于维护党的独立性的斗争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有关陈莽如主义的决议，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在各个方面团结一致，从而走上更加巩固的团结的新道路。这是全党团结的保证。这样，党的力量就不会再由于党的领导中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而陷于涣散，这样，党的力量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用来打击党和人民的敌人。

代表大会通过了**竞选宣言**，这是党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普选而采取的第一项重要措施。有了这个宣言，党便有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参加竞选，而竞选纲领是根据党的纲领即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制定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竞选宣言根据人民自身的經驗向人民清楚地指出了，谁是人民的朋友，谁是人民的敌人。这个宣言使每一个党员和党的同情者肩负着重大的任务和責任，因为要在未来普选中挫败人民的敌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但是，在制定这个宣言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情况表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有通过未来的普选发生重要变化的可能性。其条件是，党必须改进和加强它在工农群众中的工作，并在这一基础上改进和加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只有党获得了工农群众强有力的支持，只有党同各民主党派建立密切的合作，竞选宣言中提到的人民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在未来普选中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是：党在领导维护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日常利益的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党同各民主党派进行密切合作的能力。

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党员和党组织**

的計劃。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建議是根据这样的事实：不管有没有統一的发展計劃，党员和党组织不論在人数上或地区上必然会得到发展。代表大会认为，按照一定的計劃来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将会好得多。

代表大会认为，一九五二年第一次有計劃地发展党员和党组织的經驗，即称为“新道路时期的党员”的发展計劃的經驗，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并且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良好的效果。但代表大会也根据第一次有計劃地发展党员和党组织的經驗着重指出，第二次有計劃的发展工作，即称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期的党员”的发展工作，只有同在党员中間大規模开展的教育工作配合起来才会对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效果。党特別感到对党的干部进行理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 *

全体代表都认为，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文件将大大推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是的，正如我在大会閉幕詞中所說的，大会所通过的各项決議将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我国的革命运动向前推进几十年。

为什么說它将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革命运动向前推进几十年呢？請想一想，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原来是沒有綱領的，現在已經有了一个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綱領。八月革命已經表明，沒有綱領的革命，就不可能是有領導的，因而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反之，又有哪一个革命运动有了正确的、符合运动本身要求的綱領后而不具有推动力呢？請想一想，有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組織和策略的基本問題，原来都是模糊不清的，現在，由于召开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有这一切都搞得一清

二楚了。請想一想，一个党，三十多年来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冲击，遭到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冲击，而这些思想在最近几年来又以陈莽如主义的形式出現，可是，党过去还不清楚应该通过哪一种途径来肃清这些思想，現在，由于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种途径是找到了。請想一想，一个負有领导人民独立运动的历史任务的党，自成立以来从沒有能滿足需要的党章，在最近几年也只不过有临时的党章，而現在，則已經有了为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正式的党章了。請想一想，一个第一次面临議会和制宪議会普选的政党，在它剛結束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已制定了一个参加上述普选的竞选宣言。如果沒有这一切，情况将会是怎样呢？如果沒有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情况又将会是怎样呢？如果說，沒有这一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运动就要比現在落后几十年，这种說法并不过分。因此，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一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印度尼西亚的进步人士永远不能忘怀的事件，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更是如此。

* * *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決議就是这些。我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代表大会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代表大会已經用能够指导党的日常活动的，能够确定党在各个方面和各省的策略的、明确的決議把党武装起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了所有有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重大的和基本的問題，代表大会已經采取措施使党組織的各項工作得以順利进行，使党在各方面統一起来，使民主力量在未来的普选中取得胜利，并采取措施发展党员和党的組織。

有了党的新綱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各項其他決議，党将以更整齐的步伐朝着偉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美好前途不断前进。

加强民族統一战綫和加强党!

这篇文章是为庆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四周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的第一个生日——而写的。艾地同志在再次强调这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党的紧迫任务的时候，指出了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对于完成这些艰巨任务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四周年紀念日。这是党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即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重大和基本问题的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第一次庆祝党的生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三十四岁了。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献身于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和人民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道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今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有了正确的綱領、策略路綫和組織路綫。

不久前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大会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重大和基本问题，这不仅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向前推进了数十年，而且也把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数十年。这一点加倍提高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为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更美好的前途而斗争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

值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四周年之际，有必要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强调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两

項非常緊迫的任務：第一，建立以反封建的工农聯盟為基礎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綫；第二，繼續建設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這兩項非常緊迫的任務說起來或寫起來是容易的，但執行起來卻不容易。要執行它就必須全力以赴，付出巨大的精力。它要求每一個共產黨人更加積極努力，全副身心投入工作。這兩項任務應該成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活動的基本出發點。印度尼西亞革命的前途，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前途就有賴於這兩項任務的實現。

* * *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所必須建立的民族統一戰綫不是形式上的統一戰綫，而是實在的、具體的、真正的統一戰綫。統一戰綫不是僅僅表現在各政黨和群眾團體的領導人偶然舉行的會議，或者是偶然舉行的有各政黨和群眾團體代表出席的招待會。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所必須建立的統一戰綫不是由各政黨的領導人組成的統一戰綫，而是以千百萬人民群眾為基礎的統一戰綫。

只有共產黨人不停地、不倦地和不斷地改進他們在農民中間的工作，與此同時，改進在工人中間的工作，以人民群眾為基礎的統一戰綫才有可能建立起來。這是建立工农聯盟的條件。這種聯盟必須成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礎。

因此，在工人和農民中間進行工作，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最重要的和基本的活動形式。

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方面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幫助他們為實現自己的日常生活要求、自己的

部分的要求而斗争。宣传和鼓动对于建立统一战线和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依靠宣传和鼓动，统一战线是建立不了的。只有在实现各阶层的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具体的共同纲领的斗争中，才能产生真正的统一战线和政治觉悟。要是在宣传鼓动之后没有接着进行辛勤的日常工作来帮助人民，那么，宣传和鼓动就只不过是空谈而已。空谈是共产党人的敌人。空谈是托派分子和右翼社会党人的必然表现。

因此，要加强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更多地、更认真地、更坚韧地和更顽强地进行工作来帮助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帮助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日常生活要求而斗争。

这是否意味着共产党人不可以积极参加各政党和群众团体的联络机构、合作委员会、协作机构呢？绝非如此！这样的合作机构还是有用的，有时甚至是很有用的。这样的合作机构，使我们更容易进行孤立人民的敌人，以及团结和动员参加这些机构的政党和群众团体所领导的群众的工作。但这是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次要任务。首要的任务是根据共同纲领和共同行动在群众中间建立合作。这是统一战线的关键，是胜利的关键。

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目前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本身的经验教育了他们去热爱统一战线和为统一战线而斗争。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需要统一战线的，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可能建立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是需要的，而且在工厂、修配厂、机关、农场、码头、城市、居民点、街道、农村、山区等地方都可以建立统一战线。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社会主义者等之间也可以建立统一战线。

有了强大的共产党，民族統一战綫才能强固。这是必然的，因为共产党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坚决的，而且只有它才具备领导最广泛的劳动群众的条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有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党，才能成为强大的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目前正在深入到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正在扩大到全国，这是一个事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了現在的綱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了現在所执行的策略路綫和組織路綫，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有了現在的这种工作积极性，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今年年底成为一个拥有一百万党员和预备党员——不是仅仅登了記的党员，而是有組織的并受过教育的党员——的党，那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资产阶级政党开始为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所厌恶和唾棄，特别是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它們經常欺騙蒙蔽人民，并无耻地进行貪污、及其他反对人民的罪恶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觉悟的工农群众和知識分子只信任共产党人，只信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那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因此，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并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組織扩大到全国的問題，并不是困难的問題。困难的是如何巩固这一切，如何使久已参加或新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人們受到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水平和完善地組織起来。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巩固自己，它就会成为軟弱无能的政党。

我們不可能拒絕願意承担一切后果的觉悟了的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我們必須伸出双手来欢迎他們，

因为他们能够很好地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

党只有坚持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才能正确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和同其他政党和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党只有不断地加强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坚持这种独立性。

如果若干年前党的干部为着缺乏对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教育的教材而叫苦，为着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组织党员而叫苦，那么，现在再这样叫苦就不大合适了。虽然教材还不完备，但可用来教育党员和预备党员的现有材料（如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其他兄弟党的文件，其中一些重要的文件已经翻译成印度尼西亚文出版）是足够的。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重要的教材，同时也是组织党员、组织全党的重要武器。

因此，假如党没有坚持它的独立性，没有执行它的独立自主政策，就谈不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为此，党必须加强自己的队伍。党必须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党必须加强它的纪律，这种纪律对一切党员都是一样的。党必须维护自己力量的统一。

这些是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政党在未来普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同样的，这些也是加强党的条件，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为人民所热爱，成为人民的骄傲。

我们必须记住和认识这些繁重的任务，以此来庆祝党成立三十四周年。

八月革命万岁！

这篇文章是为庆祝一九四五年“八·一七”革命九周年而写的。艾地同志在文章里对这次人民革命给了正确的、高度的评价。这次革命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是，它唤醒了印度尼西亚人民，锻炼并教育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他们再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奴役。八月革命的精神永存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中，我国人民运动的一切进展都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取得的。

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没有一九四五年的八月革命，印度尼西亚现在的情况将会是怎样黑暗。可以想像，印度尼西亚人民生活在外国的国旗下，生活在专横的外国统治——它把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的每一进展，即使是极微小的进展，都看作一种大不韪——之下，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不得不遭受的压迫会是多么沉重。可以想像，在荷兰政府只是以印度尼西亚将有自己的政府这种含糊其词而永不兑现的诺言的哄骗下，印度尼西亚人民是怎样生活的。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革命，虽然由于民族叛徒的背叛行为而在一九四八年底遭到失败，但它使外国在印度尼西亚的绝对统治再也不可能恢复了。诚然，我们对八月革命所遭受的失败感到无限的惋惜和遗憾，但由于曾经爆发过伟大的八月革命，印度尼西亚现在的情况已不再是那么黑暗了。目前形势为革命的人民运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八月革命使我們現在的問題比較簡單了，這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依靠八月革命所取得的各种政治权利，来发展和巩固人民的力量。除了有組織和有领导的人民本身的力量之外，沒有其他力量能够弥补八月革命失敗的損失。只有人民运动将来取得的胜利才能实现八月革命的目的。

从八月革命未能达到它本来的目的这个意义來說，这个革命是失敗了。一九四九年底簽訂的卖国的圓桌會議協定，恢复了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統治，又恭請外国壟斷資本家重新前来掠夺印度尼西亚的天然財富和剝削印度尼西亚人民。

尽管荷兰壟斷資本家在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玩弄种种陰謀詭計，使用枪炮和炸彈，并且得到他們在印度尼西亚的走狗的帮助，但他們还是沒有办法使印度尼西亚恢复八月革命以前的状态。

印度尼西亚人民一旦为这样偉大的人民革命所喚醒，并且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革命过程中受过三年的鍛炼，人們就再也不能像革命以前那样来对待他們了。因为革命教育了印度尼西亚人民怎样去掌握自己的命运，革命教育了印度尼西亚人民拒絕任何形式的奴役。

在革命的三年中，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自尊心的認識，以及他們在政治方面、在斗爭精神和斗爭勇气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远远超过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在东印度公司压迫和荷兰殖民統治的三百五十年及日本殖民統治的三年半中所取得的認識和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八月革命給以很高的評价，即使这次革命本身遭到了失敗。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可能忘記革命的青年，他們勇敢地出来促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虽然

当时日本法西斯仍然完全掌握着政权，而这些青年对他们所憧憬的革命又没有具体的纲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青年了解人民的内心感情，了解人民再也忍受不了日本法西斯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战争负担，了解人民心灵上由此产生的痛苦，他们作为人民的发言人，英勇地行动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有觉悟的印度尼西亚儿女对使八月革命遭到失败的民族叛徒感到无比的愤怒，并予以严厉的谴责。

今年的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庆祝自己的八月革命九周年和共和国成立九周年。和往年（特别是去年）一样，今年广大人民群众也将共同庆祝这一革命节日。

在全国各大小城市、工厂、农村都成立了庆祝委员会。各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以及地方政府的代表都参加了八·一七庆祝委员会。为了庆祝革命节日，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宗教政党领导人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等团体领导人之间进行广泛的合作。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地方领导人，未经他们中央的领导人同意，也参加到八·一七庆祝委员会里来。

和往年一样，今年也将举行群众大会来庆祝革命节日，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将发表演说，号召全体人民回想八月革命，回想八月革命中他们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和强大力量，并着重指出八月革命的目的还没有实现。

八月革命九周年是在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已更加有组织 and 更加团结的情况下庆祝的。印度尼西亚工人在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中更加团结起来了。所有参加或未参加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

的政府部門的工会組織，數月前为了爭取“开斋节”額外工資而联合提出共同要求，就证明了这点。这个要求虽然沒有全部为政府所接受，但它所取得的胜利是令人兴奋的。这个事件使政府部門的职工相信了团結的重要性和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維護他們利益的真誠态度。

今年庆祝五一节的时候，除了在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影响下的一小部分工人以外，可以說全体工人都联合起来庆祝工人階級的这个胜利节日。在今年五一节各种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說，在有关要求改善工人生活、維護民主权利、民族团結的重要性和爭取持久和平的斗争等問題上一般都貫穿着明确的路綫。

工人为了提高工資、反对歧視和維護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不断高漲中。

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漸地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八月革命时期的經驗和共产党的教育教导說，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不仅必須为本階級的利益而斗争，而且必須为印度尼西亚人民中所有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損害的階級的利益而斗争。

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逐漸認識到，只有当他們也为整个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只有当殖民統治者和外国老板已不复存在于印度尼西亚，只有当政治和經濟权力已經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政府手中的时候，工人階級才能获得自由。假如在政策上沒有重大的改变，假如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沒有改变，假如不是以工人階級领导的人民的政权来代替帝国主义者和地主的政权，那么，工資的增加及其他斗争的成果都是保不住的。

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对自己的政治作用認識越深刻，全国人

民战胜帝国主义者和地主的保证也就越大。

* * *

八月革命九周年是在农民运动正在广泛发展的情况下庆祝的。我们可以说，全国各省的农民都已开始觉悟起来，在若干省份，农民运动已经较为巩固，因而不易再被击败了。

几十万农民，不论是组织起来的或还未组织起来的，不论是参加或未参加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都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保卫他们在日本占领时期、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革命时期以及在最近几年中所获得的土地。

农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空前积极地投入斗争，保卫他们的土地以免被外国农场主夺走。

当我们想起丹絨摩拉哇（东苏门答腊）农民的妻子和儿女那样毫不畏惧地挺身阻挡想要压平他们的田地和房子的拖拉机时，我们就不能不深为感动。他们的意志是一致的，那就是拖拉机要压平他们的田地和他们居住的房子，就必须先压死他们。丹絨摩拉哇农民的这种统一的意志迫使这些拖拉机不得不退回它们的巢去。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征服哇德斯⁽¹⁾农民的意志。哇德斯农民的妻子和儿女争先恐后地要警察用卡车把他们载到监狱去，让他们和自己的丈夫和父亲一同坐牢。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意志，是因为他们坚信，在印度尼西亚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出这么一笔钱去建筑可容纳印度尼西亚所有农民及其家属的监狱。

博尤拉利与格拉登（中爪哇）农民早已取得反对外国农场主的胜利。外国农场主屈服了，土地又回到了农民的手里。该地区农民是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恐怖集团的一支强大力量。当地政府和

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承认农民在消灭恐怖集团斗争中的巨大功绩。

北苏门答腊、东爪哇和中爪哇等省的印度尼西亚农民像猛虎般地同为了满足外国垄断资本家对土地的需要而被调来进行破坏的拖拉机和国家军警进行了斗争。由于进行了这种大无畏的斗争，以上三个省农民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不仅是这三个省农民的胜利，而且也是其他各省农民的胜利。由于这三个省农民的斗争，中央政府才不得不于今年六月颁布了名为《处理人民使用农场土地问题紧急法令》即一九五四年第八号紧急法令。

这个法令当然有某些部分是占用了农场土地的农民不大同意的。但是，这个法令承认“非法”占用了农场土地的农民有权指定一名或若干名代表同政府和外国农场主进行谈判。这个法令规定，谈判所取得的协议必须照顾到有关的人民的利益。蓄意违反协议的外国农场主，其农场土地权就有可能部分或全部被废除。

该法令的说明部分说，在短期间内处理人民使用农场土地的问题，“不仅意味着保护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且首先是使有关的人民也有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为在这以后他们就可以有计划地安心经营他们的土地”。

根据该法令的说明部分中的材料，爪哇岛农场企业二十万公顷的土地中约有八万公顷或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已为人民所占用。在被占用的八万公顷土地中，有两万公顷是在玛琅（东爪哇）、两万三千公顷是在谏义里（东爪哇）、一万四千公顷是在梭罗（中爪哇）。在爪哇约有两万八千户农民占用外国农场土地。

在苏门答腊约有十二万五千户农民占用了外国农场的土地，其中约有六万五千户是在烟园地区，六万户是在橡胶、油棕园等地区。

因此，根据该法令中的统计数字，已有十五万以上农户或七十五万多人参加了占用外国农场土地的运动。

除了反对企图夺取农民所占用和耕种的土地的外国农场主的斗争之外，农民反对本国地主、反对土王政权（特别是在中爪哇）、反对高利贷者、反对国家工具专横的行为、反对恐怖集团（特别是在西爪哇）等的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不仅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各省是如此，而且在爪哇与苏门答腊以外各省也是如此。

* * *

八月革命九周年是在民族团结日益扩大和巩固的情况下庆祝的，而这种情况是在为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版图和完全废除美国的圆桌会议协定而进行的斗争中产生的。

除了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及其若干卫星组织外，可以说所有的民主政党和群众团体，最近都提出了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版图和废除圆桌会议协定的经济和财政条款的要求。

除了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外，可以说所有的政党都已经表示，如果荷兰政府不愿通过谈判来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或者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时间的策略，它们就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单方面地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可以说所有的民主政党和群众团体都已经表示，它们准备承担因单方面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而引起的任何后果。

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民都已深信：在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西伊里安和维护荷兰帝国主义的经济和财政特权的问题上，美国是站在荷兰方面的。

同样的，荷兰和美国已经进行了恫吓和种种卑鄙的阴谋詭計活动，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它们通过它们在执政党內外的代理人和采取使用金錢进行賄賂的办法，试图推翻在实现民主綱領过程中获得人民支持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

荷兰、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进行了合作，其目的在于挑撥一个政党同其他政党的关系，挑撥某一政党內部各领导人之間的关系，唆使发动軍事政变，煽动反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使共产党人在其他民主政党和阶层中孤立起来，以便将来时机一到，就能够使用全部力量来打垮共产党以及态度坚决的民主政党和阶层。

* * *

八月革命九周年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于今年三月剛举行过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庆祝的。从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身的发展或民族独立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来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次代表大会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問題，而且解决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政治上所面臨的問題。这次代表大会也使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对将要举行的普选作了准备。这次代表大会明确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并爭取农民参加消灭封建残余的斗争，开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仍須繼續改进在工人、知識分子、城市小资产階級和民族资产階級中間的工作。

換句話說，除了着重进行农民方面的工作和重視建立工农联

盟的工作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代表大会的文件，例如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党的纲领、党章、竞选宣言、《关于陈舜如主义》的报告等，是党员和党的干部继续进行和改进党的建设工作及推动印度尼西亚人民独立运动走向更高阶段的工作的重要指针。

八月革命九周年是在日内瓦会议胜利地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和平取得了胜利的国际形势下庆祝的。不论是民主的政党和群众团体或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都是兴高采烈地欢迎日内瓦会议的胜利。

大家都表示，日内瓦会议的胜利是伟大的胜利，必须加以发展和巩固。周恩来、尼赫鲁和吴努所一致同意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认为是发展和巩固日内瓦会议胜利的合理而重要的原则。

印度尼西亚政界所充满的和平精神，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采取了一致的态度，拒绝美国的邀请，不参加将于今年九月间在菲律宾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是为了制订被称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侵略性条约而召开的。

在印度尼西亚人当中，虽然还有相当多的狂热的华尔街代理人，但是，从日内瓦和印度支那吹来的和平的清风以及印度尼西亚人民保卫和平的坚定意志，使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为美国的政策辩护了。

虽然还有人不愿意承认或怀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和平的伟大保卫者这一事实，但是美国是危险的战争挑拨者这一事实他们再也不能掩盖了，而且已经成为公众的看法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亲身经历过战争苦难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是很容易看出

美国“原子外交”所包含的危险的。

* * *

八月革命九周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方面或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获得了巨大进展的情况下庆祝的。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日益孤立，在危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以致毫无出路。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坚决斗争中更加深得人心。日内瓦会议的胜利提高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信，它们是真正争取和平并同情和援助被奴役民族的独立斗争的国家。

最近期间，在人民不断推动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扩大了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红白旗已经飘扬在莫斯科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的上空，不久的将来，印度尼西亚人民将会看到苏联国旗飘扬在雅加达的苏联大使馆的上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开始逐步实现正常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从工人到科学家和民族资本家都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认为，正常关系的建立，是印度尼西亚同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正确步骤。

印度尼西亚人民就是在上述情况下来庆祝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阿隆斯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话是正确的。他向代表大会发表观感说，

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正“处在澎湃的革命浪潮中，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活力和主动性正在获得解放，他们的巨大力量正在高涨中。”

正因为人民的巨大力量是在高涨中，所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责任并不轻。相反地，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正面临着困难的政治形势，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仍有势力，它们仍在积极进行恫吓和种种阴谋诡计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承担起领导人民走向胜利的重大责任。这一事实要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具有极高的警惕性以及极大的勇气和工作热情。

充分信赖具有光荣传统并在伟大的八月革命中受过锻炼的数千万印度尼西亚人民，信赖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国际支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定能够率领印度尼西亚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仅为解放印度尼西亚的无产阶级而斗争，同时也为解放印度尼西亚人民各个阶级而斗争。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通过显示自己的能力、表现自己的坚韧精神和真诚态度，必将逐渐博得其他民主人士、阶层和政党更大的同情和信任。

值此八月革命九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在八月革命之前和革命时期或在最近期间给予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的支援表示感谢。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特别感谢荷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在摆脱荷兰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从来没有感觉到，而且将来也不会感觉到自己同荷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是敌对的。

相反地，在击败共同敌人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荷兰共产党

领导下的荷兰无产阶级和人民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朋友。

印度尼西亚人民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冲昏头脑或骄傲自满，他们将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率领下继续进行艰巨而光荣的斗争，以实现八月革命的目的。这样一天总要到来的，那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印度尼西亚人民巨大力量的洪流的冲击，它将摧毁一切障碍。无论是荷兰的子弹和炸弹，美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或者是民族叛徒的大逮捕和挑衅都阻挡不了它！

八月革命才只不过是将要到来的真正发动的总演习罢了！

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起来，争取解散 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把西伊里安 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

本文和下一篇文章，是一九五四年年中写的，那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荷兰政府正在就圆桌会议协定的几个部分——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问题和西伊里安问题——进行谈判。

《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起来，争取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一文分析了进行谈判时的局势。文章指出人民运动蓬勃发展，一致支持以外交部长苏纳里为首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要求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和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

《苏纳里代表团成功地取消了圆桌会议协定的一部分》一文对上述谈判的成就表示欢迎。《联邦法规》全部废除，意味着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功地取消了圆桌会议协定的一部分。艾地同志指出印度尼西亚取得了这项成就，是在争取主权完整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同时，他指出，荷兰完全不願意讨论西伊里安问题，圆桌会议协定的其他部分还是原封不动。因此，印度尼西亚人民彻底驱逐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而且必将更加高涨起来。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已在六月二十三日动身去荷兰，准备就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问题和把西伊里安划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问题同荷兰进行谈判。人民在雅加达馬腰兰机场举行示威，欢

送代表团。这次示威是由雅加达政党和团体合作委员会组织的，这个委员会由三十二个政党和群众团体组成，其中有各执政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工会、农民团体、青年团体和其他民主团体。示威群众高举的标语和高呼的口号，全都要求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要求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没有参加这次政治示威的有：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天主教党、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党和平民党，它们都是反对党。

合作委员会向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苏纳里约法学士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清楚地陈述了代表雅加达绝大多数人民的各民主政党和团体的要求。声明指出，如果荷兰政府拖延谈判，那么对它唯一正确的回答就是单方面废除联邦。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接受了雅加达市民的这项声明，他说，这项声明使代表团感到更有力量。

但是，如果认为雅加达各政党和人民团体的示威仅仅是表达了雅加达人民的要求，这是十分错误的。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政党和团体在全国组织的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废除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问题和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的问题，经常是大家都感兴趣和热烈欢迎的议题。在六月二十三日，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动身的同一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武吉丁宜组织了一次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武吉丁宜本市的市民，也有来自远离武吉丁宜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的地方的人们。会上，解散联邦和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的问题，受到热烈的欢迎。大会对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启程的消息热情地表示欢迎。武吉丁宜大会举行前几天，即六月二十日，在巴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举行了有七万五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会上，联邦问题和西伊里安问题也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

六月二十五日，荷兰駐印度尼西亚最高专员范·貝兰伯爵就为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和把西伊里安划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的问题而进行的谈判，发表声明。这位荷兰最高专员狂妄地说，政党和团体合作委员会在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临动身前发表的声明是十分令人失望的；他重弹老调说，那个声明是依照“共产党的药方”泡制的。

关于西伊里安问题，范·貝兰说：“我方认为西伊里安——我们称为荷属新几内亚——就是荷兰的领土。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也是民族的问题。”范·貝兰恬不知耻，无视一般通用的地图，居然胆敢说西伊里安是荷兰的领土。范·貝兰愚蠢透顶地指责那些敢于指出印度尼西亚经济还是殖民主义性质的人；他傲慢地说，流进印度尼西亚国库里的各种税款中大约有一半是来自荷兰的企业。范·貝兰说，“目前有另外一种殖民主义对印度尼西亚更加危险，那就是共产帝国主义。”这种说法，不但共产党人，而且每个印度尼西亚民主人士都把它看作笑料。范·貝兰自以为这样“上课”就可以成为一位教授了，他却不知道他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并不高明的小丑。

范·貝兰的话不仅成了天大的笑柄，而且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不但是民主的政党和群众团体，而且连印度尼西亚政府也谴责范·貝兰的说法。雅加达政党和团体合作委员会以及几乎所有的印度尼西亚报纸（作为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传声筒的报纸除外）都严重抗议范·貝兰的行为，要求政府宣布范·貝兰为不受欢迎的人，勒令他从速离开印度尼西亚国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情报部特就范·貝兰的声明发表声明，表示“对印度尼西亚民

族來說，一切殖民統治，不論它叫做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不論它的形式怎麼樣，也不論它是什麼色彩，都是同樣危險，沒有所謂更加危險或不怎麼危險。在這一點上我們不需要任何人給我們‘上課’”。關於西伊里安問題，情報部的聲明指出：“對印度尼西亞人民來說，西伊里安問題就是西伊里安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有沒有獨立的問題。反對在西伊里安的殖民統治，這是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事業。”這就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情報部的聲明的部分內容。

如此看來，荷蘭最高專員公署稱為“共產黨的藥方”的正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民族要求。這又一次證明了共產黨人的利益就是民族的利益，證明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其他民主政黨促使印度尼西亞人民對荷蘭帝國主義採取一致態度的努力獲得了光輝的成就。

范·貝蘭敵視印度尼西亞人民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聲明，荷蘭王國政府外交部竟公然認可，說這項聲明就是荷蘭政府的主張。這件事引起了印度尼西亞人民對荷蘭政府的極大憤慨，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印度尼西亞人民對荷蘭的警惕性。除了反動政黨的領導人以外，印度尼西亞全體人民都處在戒備狀態，準備應付荷蘭猖狂挑釁的態度所可能引起的一切事件。荷蘭這種態度已經使民主政黨和領導人採取更堅決的態度。

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聯盟黨最高領導機構在七月七日的會議上通過決議，對荷蘭極不禮貌的態度表示遺憾，並表示假如談判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聯盟黨將計劃採取單獨行動或者和其他政黨採取共同行動。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聯盟黨主席阿魯季·卡塔威納塔在對記者發表的談話中說，解散印度尼西亞荷蘭聯邦的結果必須是要能夠在財政上和經濟上採取對

印度尼西亚有利的措施，要能够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关于美国对西伊里安问题的态度，阿鲁季说，美国的立场是倾向于让西伊里安继续掌握在荷兰手中。阿鲁季还建议，万一谈判失败，那就取消印度尼西亚对荷兰的债务，限制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银行的活动，不发給荷兰企业输入和输出许可证，严格制定荷兰人入境的条例，使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贸易关系正常化。关于西伊里安问题，他也提出了建议：印度尼西亚政府成立西伊里安省，利用通信的办法在西伊里安进行印度尼西亚公民的登记工作，对荷兰一手制造的“南馬魯古共和国”的领导人提出缺席起诉并对他们作出缺席判决，对西伊里安实行封锁。

差不多在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发表谈话的同一个时候，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曼貢沙哥罗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也向《新报》记者表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仍将继续同任何政党——无论是执政党或是在野党——保持合作关系。关于废除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问题，他说，废除联邦应该使我们能够得到政治和经济利益，如果不能使我们得到这种利益，废除联邦就没有什么好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曼貢沙哥罗说，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仍将争取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

原籍西伊里安的印度尼西亚議員巴巴勒，向报界揭露了荷兰政府继续侵占西伊里安的企图。巴巴勒说，荷兰增加预算，以加强荷兰对西伊里安的统治，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荷兰的预算，用于西伊里安的支出一九五三年共为八千九百五十万荷盾，而一九五四年的支出则有用于“平时需要”的一亿零五百五十万荷盾，用于附加支出的三千一百五十万荷盾和用于投资的二千六百万荷盾。巴巴勒还说，在这次同荷兰的谈判中，千万不要把西伊里安问题撇

开不談。

印度尼西亚人民联盟领导人狄亚巴里博士，这位平时以执政党議會党团代言人的身分出現的人，对《星期新聞》記者表示，我們的代表团不能同意荷兰對我們采取的拖延時間的手段（見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一日《星期新聞》）。因此，如果我們确实已經充分了解荷兰是不願正視現實，而且又不信任印度尼西亚的話，那么最好就結束談判。狄亚巴里接着說：“印度尼西亚在經濟和財政方面还受到荷兰的許多約束，相反地，荷兰在这些方面則沒有受到印度尼西亚的約束。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各个派別和各个阶层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关于西伊里安問題，他說，西伊里安如仍在荷兰手中，这不仅对印度尼西亚同荷兰的关系的正常化是个障碍，而且对維持亚洲的安宁也是个严重障碍。

从各政党领导人的声明和各政党、工会、农民团体、青年团体、学生团体、妇女团体等通过的決議来看，印度尼西亚人民显然是真誠地希望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和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这种真誠願望，是由自己亲身的經歷产生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受到所謂圓桌會議協定的約束已經将近五年了，這項協定規定了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存在，并且把西伊里安繼續置于荷兰的統治之下。

在将近五年的時間里，印度尼西亚人民确实已經自由地升起紅白旗，唱起《大印度尼西亚》国歌，根据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自己組織起来，但是这一切并不表明印度尼西亚人民已經当家作主。外国資本还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的經濟。在这些資本中，荷兰的資本仍然是最大的。工业、商业和金融方面的一切重要企业仍然处在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荷兰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为了保

护这许多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组织了自称为“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等恐怖集团。他们不断加强在西伊里安的武装力量，以致使西伊里安成了一支对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人民胸膛的手枪。在西伊里安不断加强的武装力量和各种恐怖集团是外国资本的卫士，是阻止印度尼西亚人民支配自己的天然资源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大棒。

只要西伊里安还在荷兰帝国主义手中，那末，荷兰为了侵略性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利益，随时都会把这块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法领土出卖给福斯特·杜勒斯。假如发生这样的事，这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的合法领土被一个对这块土地毫无权利的国家用来为他们的侵略利益服务，用来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安全与和平。由于问题涉及荷兰殖民主义的利益和美国战争计划的利益，因此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为收回西伊里安而准备进行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斗争。印度尼西亚人民不但面对着荷兰，而且面对着站在荷兰背后的更强大、更蛮横无理的势力——好战的美国帝国主义。

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要求和对西伊里安的要求，得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日益提高的工人和农民越来越有力的支持。这就保证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不致半途而废，相反地，必将达到目的。

今年三月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不但推动了要求解散联邦和收回西伊里安的斗争，而且也推动了为实现我们民族的其他要求而进行的斗争。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每项决议，都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巩固党、唤起和组织人民群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旗帜下、在红白旗下保卫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锐利武器。

尤其是代表大会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土地纲领，它唤起了遍布全印度尼西亚的农民。在一些原来农民运动还十分落后的省份，例如在苏拉威西、努沙登加拉、加里曼丹、中苏門答腊、南苏門答腊等省，农民对組織起来保卫他們的日常利益和廢除封建制度也产生了新的热情。在一些省份，例如在东爪哇、中爪哇、西爪哇和北苏門答腊，农民运动由于采取了战斗的、有組織的和有领导的行动，而更加巩固起来了。农民的觉醒是異常巨大的民族潜在力量的觉醒。印度尼西亚农民开始看到他們光輝的前途。

再过不久，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将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九周年。如同往年一样，这件事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摆脱外国統治而过独立生活、爭取摆脱各种压迫而自由生活、同其他国家友好与和睦相处的偉大表现。今年八·一七独立紀念日的庆祝肯定要比往年更加盛大隆重，它将进一步加强印度尼西亚人民关于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和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的要求。

在其他国家的人民获得进步的同时，印度尼西亚人民显然也在一步一步地前进，并且依靠日益紧密的团結而越来越接近自己的目标。

苏納里約代表团成功地取消了 圓桌會議协定的一部分

我已經研究了关于苏納里約代表团在海牙談判中所取得的成就的全部文件。因此，我也知道了圓桌會議协定中有哪些部分已为苏納里約代表团所取消，有哪些部分仍然有效。总的來說，我的結論是：苏納里約代表团已經成功地取消了五年前由哈达一罗姆—苏丹·哈密所簽訂的圓桌會議协定中的一部分。客观地說，苏納里約代表团的成就使印度尼西亚在爭取主权完整方面前进了一步。

苏納里約代表团的成就使整个《联邦法規》全部廢除。这就是說，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再也不受荷兰女王的庇护了。此外，由于联邦的解散，对外关系、国防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协定，也就正式取消了。

过去附在《联邦法規》中的財政和經濟协定的“丙”部分（即处理貿易政策方面的关系和“合作”的部分）也正式取消了，“乙”部分（即关于財政关系部分）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和十九条也正式取消了。

苏納里約代表团所能够取消的就是圓桌會議协定的这几部分。苏納里約代表团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切成就，是由于它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因此，印度尼西亚人民能够在印度尼西亚荷兰

联邦已不复存在，以及财政和经济协定的一部分已正式取消的情况下，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纪念日。如果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当政，这种情况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不能梦想到的。

虽然苏纳里约代表团获得了上述成就，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把荷兰帝国主义赶出印度尼西亚的斗争还完全没有结束，因为圆桌会议协定的“甲”部分（即规定荷兰的租让权、许可证和企业等特权的部分）仍然有效。此外，“丙”部分的第十八条（即保证从印度尼西亚转移利润到荷兰的条款）也仍然有效，过去附在《联邦法规》的“丁”部分（即规定印度尼西亚对荷兰的“债务”的部分）也仍然有效。关于西伊里安问题不仅没有达成协议，荷兰连谈也不愿意谈。

我的另一个结论是：虽然苏纳里约代表团获得了重要的成就，但哈达—罗姆—苏丹·哈密所签订的圆桌会议协定中对人民极为有害的部分仍然有效。五年前，一些人的轻率行为使印度尼西亚人民至今仍不得不蒙受其害，这是一个惨痛的经验教训！这就意味着，荷兰帝国主义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首要敌人。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仍然肩负着繁重任务，这就是为废除荷兰的各种财政经济特权、完全取消不应由印度尼西亚负担的对荷兰的“债务”和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而不断寻找办法和坚决地进行斗争。

目前必须动员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全部力量来废除全部圆桌会议协定。为了这一切，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团结，并争取世界所有的民主力量和要求独立的力量站在我们方面，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于雅加达

爭取印度尼西亞一切民族力量 更廣泛的團結

這是艾地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至十日召開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報告明確地指出，在國內外形勢飛速發展的情況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已經成為不論是朋友或是敵人都不能忽視的重要而偉大的民族力量。為了實現國內一切民族力量的更廣泛的團結，他強調指出通過民族的和民主的道路來推動形勢發展的重要性和保證黨內實行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鑒於民族運動中存在着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三種政治思潮的傳統，艾地同志明確地指出，必須努力在具體綱領的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影響下的群眾、民族主義影響下的群眾和伊斯蘭教影響下的群眾之間的合作。明確地指出了這點，使人民群眾受到了教育，當某些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領導人借口“反共”進行分裂活動的時候，他們就不會上當。艾地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向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所作的報告中對印度尼西亞存在着的三種力量即進步力量、中間力量和頑固力量的對比作了分析。這就闡明了民族統一戰線的階級基礎。

同志們，從緊接着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而召開的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到這次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期間內，我們在國內外形勢或黨本身的发展方面經歷了許多事件。

我們黨在政治局領導下致力於進一步推進上述的每一發展。

我們已經努力使自己不致落在事件的后面，而是使自己处在事件当中并引导它的发展。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們党在工作中已經取得了最高限度的成就。不，我們感觉到，在推进事件发展中，我們还有许多缺点，必須加以克服和糾正，才能使今后的工作获得更好的成就。

有一件明显的事是，我們党已經成为不論是朋友或是敌人都不能忽視的重要而偉大的民族力量。党在目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是那么重要，以致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以及他們的走狗党也睡不好，經常說梦話。他們大发雷霆，辱罵和誣蔑我們党，有时他們甚至恐吓要扭断我們大家的脖子。但是有哪一个共产党不是每天都受到人民敌人的怒斥、辱罵和誣蔑呢？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党的作用，每一个想过和平和进步生活的具有良好願望的印度尼西亚儿女——不管其政治、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如何——都不能再忽視了。我們党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間日益扩大和日益生根，它是团结人民这一工作的巨大力量，这个团结对于反对要想在新的世界大战中燒毀世界的每一个罪恶計劃，对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压迫者的势力是很重要的。我們党是爭取印度尼西亚人民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并支配本国的自然财富、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和继承祖先的文化遺產的偉大力量。

国内外事件极其迅速发展，許多事情都要取决于我們党的政策以及党的組織和党员实现这个政策的能力，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會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事实使我們党、党的每个干部和党员都肩負着繁重的責任和任务。对每一个事件都必需作深入的分析，以求得正确的解决。只要我們始終忠实地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針，只要我們全神貫注地对待每个事件，只要我們

始終不忘記我們黨是我國形勢的客觀因素和國內外階級鬥爭的產物，我們就能做到這一切。

戰爭政策和戰爭經濟的破產， 和平政策和和平經濟的優越

同志們，我們目前所處的国际形勢是在充滿各種矛盾的情況下發展着。一方面，我們看到進行大規模軍備競賽、設置軍事基地網和製造更完善的武器的各種活動，看到某個國家採取“實力政策”來強迫其他國家接受軍事條約，故意製造各種借口來阻撓正常的外交和貿易關係的發展。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的北大西洋集團國家就是這樣。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執行着旨在鞏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政策，通過严格的国际監督來大量裁減軍備及禁止生產和使用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如原子彈和氫彈）的政策。這一政策是以這樣的基本原則為基礎的，即在国际關係中沒有任何爭端是不能用和平方式解決的。這一政策是符合各國人民友好合作的利益並有助於團結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力量的，數十年來蘇聯堅定不移地維護這一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人民民主國家也同樣堅定不移地維護它。

為了理解我們現在所遇到的各種充滿矛盾的發展，我們就必須更深入地了解這些事件及其十分深遠的後果之所以發生的真正原因和基礎。這樣一來，我們就能看出社會上各種力量的動向和成長，從而使我們不僅了解目前的事件，而且可以看出人類歷史在最近將來的發展趨勢。

現在威脅着各國人民之間的关系並威脅着人類的美國政策，

是由以軍事工业为基础的美国經濟所决定的，这种經濟主要是生产用于战争的武器和軍需品而不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消費資料。这为《經濟指标》杂志〔1〕一九五四年十月刊载的关于美国政府物資收购和服务費的数字（这是美国自己的統計数字）所证实：一九三九年（战前）在五十二亿美元的收购总值中有十三亿是供軍队的需要；一九四四年（战时）在八百九十亿美元的收购总值中有八百八十六亿是供軍队的需要；一九五三年（战争结束后很久）在六百零一亿美元的收购总值中有五百二十亿是供軍队的需要。从这些数字可以看清楚，即使战争久已停止了，但美国政府收购的大部分（百分之八十六以上）还是为了供軍队的需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美国战争經濟不仅沒有改变为和平經濟，反而加以扩大，它像汽球一样不断被吹大，直到最后受不住內在压力而爆炸和破碎。这种战争經濟給美国壟断資本家带来超額利潤。上述杂志刊载的关于美国壟断資本家的純利的下面这些数字就证明了这点，一九三九年（战前）的純利是五十亿美元，一九四四年（战时）一百零四亿美元，一九五三年（战争结束后很久）一百八十三亿美元。一九四九年美国經濟衰退，使壟断資本家的利潤减少了四十五亿美元以上。但是通过屠杀朝鮮人民，这些减少了的利潤仅仅在半年之內就弥补过来了，这个巨額利潤增加了六十三亿美元以上（一九四八年的純利共計二百零三亿美元，一九四九年共計一百五十八亿美元，而一九五〇年共計二百二十一亿美元）。

其次，让我们看看表明龐大的軍費在美国政府預算的全部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同龐大而不断增加的国家債務的比較的一些数字。（以十亿美元为单位）：

	支出總數	軍費支出	國家債務
1951年會計年度	44.1	22.3	255.3
1952年會計年度	65.4	43.8	259.2
1953年會計年度	73.9	50.3	266.1

從這些數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一九五三年的軍費占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八以上（試比較一下：在同一年，蘇聯只占百分之二十點八，中華人民共和國占百分之二十二點三八，羅馬尼亞占百分之十八）。

壟斷資本家通過他們控制美國政府和國會的代表強制實行軍事訂貨，以供美國軍隊自己的需要或通過所謂“軍事援助”來武裝他們在其他國家的傀儡。這種“軍事援助”是美國給其他國家的各種形式的“援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目的在於影響和約束並逐漸控制和完全統治那些國家，就是說由美國軍隊占領這些國家。逐年數字表明，美國的“援助”政策已經從“經濟援助”轉移到“軍事援助”。“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所收集的數字表明，對歐洲的“經濟援助”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平均每年是十二億五千二百萬美元，而“軍事援助”才不過一億四千一百萬美元，相當於“經濟援助”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一九五三年的情形就完全兩樣了。在這一年內對歐洲的“經濟援助”共計十一億二千六百萬美元，而“軍事援助”則已經達到三十四億六千四百萬美元，相當於“經濟援助”總額的百分之三百以上。

再舉出一個事實，就可以更明顯地看出美國壟斷資本家的戰爭慾望。這個事實就是，美國還堆積着共值一千億美元以上的包括原子彈在內的武器和彈藥，但它的軍事工業却繼續生產更多的武器和彈藥。為了這一切，當然就必須尋找消費者！

美国所进行的“美元援助”完全无助于其他国家实行国民经济建设，恰恰相反，“美元援助”只会引起受“援”国家的经济混乱和危机。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伊朗、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南朝鲜这些靠“美元援助”过活的国家的经济破产和民主的消失。根据《独立报》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报道，美国给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军事援助”将有：三千架飞机，用以购买军备的两亿五千万美元和二十一艘军舰。巴基斯坦陆军将从现在的五万人扩充到四十万人，即扩充到八倍。这一切费用当然是转嫁给受苦受难的巴基斯坦工人和农民。我们大家知道，也就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即在东巴基斯坦，人民以民主的方式在普选中获得的胜利被残酷和蛮横地镇压下去。李承晚驻美国大使梁祐燦承认，“自从‘经济合作总署’成立以来，在南朝鲜就出现了各种调查组，它们到处东奔西跑，但是连一个工厂也没有建立起来。”他说，相反的，“在北朝鲜工业建设工程却很快地完成了。”但愿这个事实能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和领导人的教训，因为在印度尼西亚也还有想望“美元援助”的人，在印度尼西亚也有许多到处奔跑的荷兰和美国的“专家”和“顾问”，在印度尼西亚也有“研究历史的美国留学生”，有“在苏拉威西和馬魯古进行研究的外国植物学家”，有乘坐自己的飞机及水陆两用吉普车自由自在地在印度尼西亚各地游历的外国“武官”，也有喜欢在印度尼西亚高级官员“陪同”下去“打野猪”的外国“武官”。但是，有哪一个工厂已经建立起来，足以表明同这些外国“专家”、“顾问”和调查员的频繁活动是相称的呢？迄今印度尼西亚从美国所获得的“援助”并不是工厂，而是在美国或其他发达的国家内本来就找不到市场的废品。

“美元援助”无助于国民经济建设，而具体的事实是，通过“美元

援助”已經有一百五十萬美國軍隊占領着六十三個國家(包括控制着英國的四十個航空基地和軍事基地的五萬多美國軍隊),已經有三分之一的美國空軍占領着美國領土以外的四十九個國家,並且已經有八十二個設立在別國領土上的美國軍事基地。同時,我們不可以忘記美國計劃占領印度尼西亞九十個戰略地區的這一事實。

美國的戰爭經濟和侵略政策的确已經使一小撮美國人變成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但是它却完全沒有給美國人民帶來幸福。這從失業人數就可以證明:一九五四年一月在美國全失業的共計三百二十五萬人,半失業的有八百三十萬人,失業和半失業人數共達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

同志們,舉出上述事實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了解,美國戰爭政策的根源在於它的戰爭經濟,因此,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同美國聯合在一起就意味着也要承受其戰爭經濟和戰爭政策的破產。

與美國的戰爭經濟和戰爭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社會的基本規律是為廣大人民幸福生活從事和平的和創造性的勞動。在匈牙利(人口不超過一千萬人的國家),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間工業產值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三,從而使它在一九五三年的工業產值比一九三八年的全部工業產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五。其結果直接為匈牙利人民所感受到,他們得到過三次減低物價的好處,工人的實際工資比戰前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七。在東歐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也同樣實行過減低物價和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蘇聯大量的和真誠的援助下已經建立了鋼鐵廠和紡織廠,並且正在建立汽車製造廠、造船廠、發電廠和農具廠。在前幾年十分艱苦的情況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幾次實行降低食品 and 工業品的價格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五,这样一来,工人的实际工资就等于战前实际工资的两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步更是惊人的。一九五三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全部工业和农业产值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一点四,从而使全社会的购买力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苏联一九五三年的工业产值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二,或者大约比一九四〇年的生产多了两倍半。战后苏联实行了七次减低物价,每次物价的减低都意味着苏联劳动人民实际工资的提高。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建成后,和平利用原子能在苏联就变为现实,从而开辟了无限地扩大工业生产的可能性。苏联对外贸易额由一九五二年的二百零八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二百三十亿卢布,即提高了百分之十一,这表明苏联的和平工业生产也有利于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人民。因此,苏联真心诚意地希望进行正常的、自由的和广泛的国际贸易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和平政策的基础是什么。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一定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真理,旨在谋求广大人民幸福和和平生活的大规模建设是与战争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和平政策的根源在于和平经济,同这个经济制度联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参与实现和平和友谊,意味着实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同志们,了解了什么是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政策的基础,了解了什么是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政策的基础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党为什么一向认为举行国际性或区域性的会议——如柏林会议、日内瓦会议、科伦坡会议〔2〕——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党认为国家领导人的会谈——

如產生了非常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周恩來和尼赫魯及周恩來和吳努的會談、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同尼赫魯和吳努的會談、尼赫魯和胡志明的會談、尼赫魯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會談——是重要的。這一切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從而使存在着的各種矛盾不致爆發為新的世界大戰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國際事務方面，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進展。印度尼西亞政府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一起熱烈歡迎朝鮮的停戰和給印度支那帶來和平的日內瓦會議的成就。印度尼西亞政府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一起為廢除禁運和將西伊里安收歸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版圖而奮鬥。同樣，印度尼西亞政府也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一起拒絕了東南亞條約組織這一侵略性條約。我們歡迎現政府的這個進步的對外政策，把它看作是健全思想在我們的重要勝利。

健全思想的勝利使旨在使重新武裝德國這個行為合法化的歐洲防務集團侵略性公約遭到法國國民議會的拒絕。但是，眾所周知，美國並不尊重健全的思想，在歐洲和亞洲都可以看到這點。美國不尊重歐洲人民的感情和思想，它通過西方各國最近在倫敦和巴黎簽訂侵略性的協定來繼續拼湊其侵略性公約集團，這實質上是用另一個名稱來實現歐洲防務集團。美國不尊重亞洲人民的感情和思想，它在馬尼拉會議上繼續拼湊東南亞條約組織。美國不尊重亞洲人民的感情和思想，它積極地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使它成為隨時可以用來控制亞洲的力量。這些事實表明，必須進一步加強我國爭取和平工作。愛好和平的印度尼西亞人民必須更有力地支持和推動印度尼西亞現政府實行它的進步的對外政策。

在科倫坡會議上，印度尼西亞在促使該會議成為鞏固亞洲和平的會議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會議是亞洲人民要求和平

的力量的示威，因为在这个会议上击败了美国企图通过科特拉瓦拉(錫兰)和穆罕默德·阿里(巴基斯坦)把该会议变成美国在亚洲的战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阴谋活动。有关召开亚非会议的安排交由印度尼西亚负责，证明了印度尼西亚在捍卫和巩固亚洲和平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同意亚非会议的召开，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推广已为亚洲三位政府领导人周恩来、尼赫鲁和吴努所同意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尼西亚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一事实，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必须肩负重大的责任。

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解散——这是现政府对外政策的结果——是一个积极的现象，我们党和思想健全的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对此表示热烈欢迎。这是政治上的胜利，是日益强大的人民团结和斗争的结果。但是，正如我们经常说过的一样，仅仅是解散了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这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消灭荷兰在财政和经济方面的势力的斗争，以及把荷兰帝国主义从西伊里安驱逐出去的斗争，要比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斗争严重和剧烈几十倍。为了争取这个斗争的胜利，我们需要有比过去更广泛和更强大几十倍的民族团结。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分男女，不分政治、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必须使自己的队伍更加紧密团结，使自己的团结更加巩固。

通过民族的和民主的道路来推动形势发展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之一是，只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愿意执行有利于民族利益的纲领，我们党就愿意继续支持并全力帮助它。代表大会认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

府是有条件采取比它已經采取的措施更为进步的措施的，党向現政府提出的綱領也是它完全能够执行的，而这个政府想走印度尼西亞民族独立的道路、民主和进步的的道路，就必须这样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分析了目前印度尼西亞的不稳定的形势可能向哪方面发展。印度尼西亞的不稳定的形势可能向几个方面发展，它可能向左或向右发展，它可能通过民族的和民主的道路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但它也可能通过反民族反民主的道路向不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将会出現哪一种发展前途，这取决于整个民主力量，首先是取决于我們党。因此，党在一定时期对我国整个政治形势进行分析并作出結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們就能够始終掌握住情况，进而引导形势向着有利于民族独立和民主斗争的方面发展。

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結束后的形势表明，**民主自由**一般說来比在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以来成立的各届反动政府統治下更有保障。我說是一般的，因为有时候有的中央和地方官員还不能够或故意不願意使自己适应政府給人民团体、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政党活动的机会这一总政策。有了民主自由，即使这种民主自由在各地还受到露骨的限制，民主群众团体也有可能获得迅速发展，并使群众大大地觉醒起来。此外，各民主政党之間的合作也日益密切，中間阶层的“反共”偏見逐漸地减少了。人民运动的发展和民主政党之間的合作日益紧密，是挫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力图重新加强在印度尼西亞的殖民主义地位和推翻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一切阴谋的重要力量。由于人民的这种团结力量，反动派在議會內外进行的各种活动都已遭到惨敗，他們的威信扫地。大印度尼西亞統一党的达朱丁·努尔等人今年十月間試图推翻阿

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并組成获得荷兰、美国、国民党匪帮及其走狗的全力支持的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政府的活动〔3〕，也同样被民族民主团結的力量挫敗了。达朱丁·努尔等人事件的发生，再一次地向印度尼西亚人民证明了，外国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势力还是多么强大，同时也证明了我国的独立多么不完整。但是人民的敌人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敌人迄今所已进行的旨在粉碎民主力量和推翻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阴谋活动还没有发展到頂点。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阴谋活动将会变本加厉。这是由于他們日益窘迫和越来越瘋狂所致。他們将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賄賂、恫吓和挑衅，作为他們发动政变的准备。只要民主力量更加团結起来，民主力量就一定能够打敗这一切。为了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經過坚决的斗争而得来的并由当前执政的集团有意識地給予的民主自由。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須奋不顾身地维护已經取得的民主自由并为获得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繼續奋斗。反动官員侵犯民主自由权利的任何行为都必須給予应有的反击，政府則應該始終站在人民这一方面，如果政府把人民看作是它力量的源泉的話。总之，对侵犯民主自由权利的行为采取不聞不問的态度是不能容許的。

尽管遭到反动官員和政党的不少的阻碍，尽管由于缺乏經驗和正确而坚强的領導而遭遇許多困难，但我国第一次普选的筹备工作还是繼續进行。我們党在喚起人民积极认真参加未来普选的热情这一工作中已經起了而且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哪里有了党，有了拥有力量的党，那里的选民登記工作就进行得順利，反动政党領導人所进行的搗乱和舞弊勾当就立即被揭穿和被挫敗。民主团体和政党的愈益强大，使荷兰、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

狗对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在未来普选中获胜的信心和希望破灭了。因此，他們采取各种办法繼續不断地力图破坏普选，他們在議會內制造各种障碍，并且破坏正在进行的筹备工作。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的达朱丁·努尔派十月間所进行的推翻政府的試图，也很明显地同他們对未来普选的不安有关。对人民和現政府來說，沒有別的态度会比繼續坚决进行一切普选筹备工作并打破妨碍普选实施的一切障碍这种态度更为正确。向企图破坏普选的人們屈服，就是等于向祖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敌人屈服。

恢复治安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的一項极其繁重的任务。如果同过去各届反动政府时期比較起来，目前的治安情况一般地說是有进步的，虽然还必须做很多工作才能完全恢复治安。如果說，过去各届反动政府支持恐怖集团或者对恐怖集团沒有明确的态度，那么，現政府对消灭所有恐怖集团是抱认真态度的。由于政府采取了反对恐怖集团的明确政策，武装部队成員同人民之間的关系也就逐漸好起来，在許多发生騷扰的地方，武装部队成員和人民一道为粉碎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全亚齐伊斯兰教学者联合会、墨尔巴布—墨拉比匪帮及其他武装集团而坚决地斗争。由于荷兰、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以及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过去有許多机会渗入武装部队和扩大恐怖集团，因此，只有政府毫不犹疑地勇敢地对自己的国家机器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治安的工作才能在不太长的時間內取得完滿的結果。由于帝国主义者及拥护他們的政党的渗入，要使武装部队重新成为真正爱国而真心誠意地同人民一道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工具的这一工作就非常困难了。在武装部队里面甚至存在着这样的派系，他們故意放任恐怖集团猖狂活动以抗衡人民的民主运动的

发展,把它說成什么“为了抗衡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但是,即使是这样,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中誕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是有条件不輕易受人煽动,不使自己同人民和民主运动相对立的。到现在为止,經驗证明了,治安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扰乱地方的人民的觉醒,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对当地军队和官員的真誠援助。政府开始敢于镇压荷兰和国民党匪帮阴谋集团的这一措施,对于恢复治安是有重大意义的。对这些集团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明确的措施,其重要性是不亚于对在森林和深山里的恐怖集团所采取的軍事行动,因为这些阴谋集团是我国叛乱分子的一系列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恢复治安工作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对不断地設法进行扰乱来破坏普选和顛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打击。

在經濟方面,我們看到政府已經采取了措施,例如:把全部外汇的百分之八十留給印度尼西亚籍商人(过去是把大部分外汇分配給外国大商人特别是荷兰大商人),政府方面建議把外国工厂产品交由印度尼西亚商人分配,以及对紡織品的輸入实行监督。这些措施相对地說是进步的措施,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措施是不彻底的,是沒有同时进行适当的政治和組織准备的措施,因此就引起了混乱,使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領導人和报纸能够利用这种混乱作为进行煽动和誣蔑的材料。每一項进步措施,不管怎么小,都必須同时进行适当的准备,这是一个經驗。除此之外,每一項措施的好处都必須使广大人民能够感受到,才能获得人民和民主的人民团体的拥护。只有这样才能把誣蔑和破坏活动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并最后将其全部击败。进步的措施,不管怎么小,都是同肃清国家机器內的民族叛徒、反动分子、贪污分子和官僚分子并代之

以願意為人民利益服務的人的這些措施分不開的。在經濟方面的其他更積極而且必須認真注意的措施是：拒絕把北蘇門答臘油田再交給巴達夫石油公司的措施以及同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正常貿易關係的措施。政府掌管北蘇門答臘油田的這一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直接打擊外國帝國主義者並使該油田成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大筆收入的來源的一個措施。因此，政府必須完全放棄對於掌管北蘇門答臘油田的猶豫態度。正常的貿易關係仍亟需進一步擴大，這是使印度尼西亞擺脫各種約束性的“援助”、繁重的債務和“缺乏美元”或“缺乏英鎊”的情況的唯一道路。大規模地和堅決地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就會使我國的輸入和輸出擴大，並使我國工業的發展成為可能；這樣就可以推動印度尼西亞經濟的發展。這是可能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它們對印度尼西亞和對任何國家都沒有抱着帝國主義目的。總之，印度尼西亞政府必須放棄對於建立正常貿易關係的猶豫態度。由此可見，政府在經濟措施方面有了一些進步，但是這些進步同政府官員經常說的“以民族經濟結構代替殖民地經濟結構”的話是不相稱的。如果沒有同時採取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壟斷資本——壟斷資本目前控制着我國一切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並仍然獲得轉移其利潤到國外去的便利——的措施，那麼以民族經濟結構代替殖民地經濟結構的這種談論，不過是空談而已。在目前情況下，採取明確的措施，削減地主和高利貸者及外國壟斷資本家的權利，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廣泛而全面的正常貿易關係，這是減輕經濟困難的唯一走得通的道路，這種經濟困難目前已使廣大人民群眾深受其苦。

在改善工人生活方面簡直沒有採取什麼有意義的措施。勞工

部方面在对待工人的要求时虽然有时也表示善意，从而使罢工往往成为不必要，因为政府在談判中注意到了工人的要求，但是，直到現在为止，灾难性的德查苏馬納紧急法令仍然繼續有效。代替这个紧急法令的法令草案曾經提交議會，但是由于这个法令草案和德查苏馬納紧急法令并沒多大区别，議會里的工人领导人表示拒絕，因此政府不得不把它撤回。德查苏馬納紧急法令至今仍然是用来破坏工人斗争和拘禁工人领导人的大棒。因此，繼續为廢除这一紧急法令而斗争就成了民主运动的任务，特别是工会和我們党的任务。

今年六月間政府頒布了《处理人民使用农場土地問題紧急法令》。这个紧急法令一般地說确实是有利于使用了外国农場土地的农民，但是根据該法令而获得土地的农民为数并不多。数千万农民仍然在渴望土地的情况下过活，在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压迫下过活。在某些地方，驅逐和逮捕农民的事件还繼續发生。这些事实使我們党必須担負起繁重的任务，加紧努力組織农民群众，帮助他們进行反抗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压迫的斗争。正如对工人的工作一样，对农民的工作也是我們党最重要的和基本的活动形式。这个工作就是我們党和整个民族力量获得更大的成就的主要保证。

* * *

綜上所述，最近半年左右，我国政治情况使人民斗争有可能获得各种进展。这表现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在周恩来和尼赫魯、周恩来和吳努所同意的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和建立互利的国际合作。这些进展也表现在国内民主的人民运动日益发展和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进步措施等事实。但是，在国内情况方面，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政府官員

採取敵視民主運動的態度，這也是事實。此外，政府在各方面的措施還說不上是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重要措施。

黨的重要而艱巨的任務是，擴大迄今所已經取得的國內外政策的勝利，進一步發展人民運動和進一步加強黨，幫助和推動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採取更加有利於民族利益的措施。

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關於繼續支持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的政策，至今仍然是正確的。

為了更廣泛的團結就需要 在黨內採取集體領導方法

同志們，和平政策和比較進步的國內政策能否發展，取決於人民的感情和思想狀況；取決於廣大人民群眾有組織地為他們的請求而鬥爭的程度如何。我們不能忘記，除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認識到保衛和平的必要性和國內進步措施的必要性以外，還有數以百萬計的有組織和沒有組織的人民群眾，仍然是擁護荷蘭殖民主義政策和美國戰爭政策的宣傳者和報紙的爭取對象。因此，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號召人民群眾來表達他們的感情和思想，使他們的感情和思想最後獲得勝利。這是為我國爭取和平、改善生活和完全的民族獨立而發動強大的運動和進一步擴大一切民族力量的團結的條件。

一切領導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們的任務，是具體了解廣大人民群眾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各種組織出現的原因何在、這些組織的結構如何、其宗旨是什麼、其領導人的政治傾向是什麼。關於這一切的具体知識將有助於我們找出同他們建立各種聯繫的途徑，以便

进行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即集中比现在还要广泛的一切民族力量。

印度尼西亚现在基本上存在着两种目标相反的力量。一方面是民族民主力量，它要求和平、民族独立以及和睦和文明的生活。我们党是站在这方面，而且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反民族和反民主力量，它保卫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而且成为在我国执行荷兰殖民政策和美国战争政策的力量的一部分，它反对彻底铲除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的努力。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般说来，我国人民是受到三种政治思潮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广大人民中间去的就是这些思潮。现在被人们称为“索斯加”的右翼社会党的思潮，在印度尼西亚是以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为代表，在广大人民当中它的追随者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索斯加”思潮已经没有必要加以注意。

除了具有光辉和英勇的革命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潮外，民族主义思潮和伊斯兰教思潮在我国社会中也有自己的传统。从二十世纪初叶起，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政党就同当时出现的我国民族运动同时开始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所认识。数百年前，从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以来，人们就认识伊斯兰教了。但是，也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叶，人们才认识伊斯兰教政党。各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的政策决定于领导这些政党的人们的阶级。

鉴于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政治思潮在印度尼西亚有传统，外国帝国主义者当然会竭力把他们的人安插到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各种运动和政党的领导地位上去。外国统治者通过他们的人，

力图影响人民，并挑撥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的群众同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群众之間的关系。如果他們不能达到或不能完全达到利用某一民族主义政党或伊斯兰教政党的目的时，他們就分裂这个民族主义政党或伊斯兰教政党。这就是印度尼西亞出現許多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的原因；此外，这些政党的出現也是純粹由于它們的領導人的个人野心所致。

鉴于我国各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有各自的产生过程，而且鉴于这些政党在一定时期內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态度，因此，如果我們把所有这些政党都等同看待，那就錯了。它們是有区别的，而这些区别有时大，有时小。因此，如果共产党人拒絕同一切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政党和領導人合作，那就錯了。与此相反才是正确的。我們必須不停地設法同他們接触，以便在一定的具体綱領基础上进行密切的合作，与此同时，必須揭穿那些維護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利益，以及維護荷兰殖民主义政策和美国战争政策的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及其領導人的假面具。

如果把上述真理用于有組織和沒有組織的群众中，其正确性就更加清楚了。有組織和沒有組織的共产主义影响下的群众完全沒有理由拒絕同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群众，即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的有組織的和沒有組織的群众在一定的具体綱領基础上进行合作。經驗证明，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群众有不少是贊同我們党的。就是那些不贊同我們而且甚至可能反对我們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群众中間，也有很多人看到他們和共产党的群众有共同的需要。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是，共产党的群众同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群众之間存在的共同点，比这些群众的領導人之間的共同点还要多。因此，在許多問

題上彼此进行协商,互相接近和取得協議是可能的,这就是我們所必須采取的办法。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貫注在这方面,作为我們进一步扩大一切民族力量的团結的重要工作之一。我們以此来教育人民群众,使他們不要为那些想利用“反共”口号在我国实行麦卡錫主义〔4〕,并使印度尼西亚重新落入战争和殖民主义的魔掌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领导人所分裂。这就是我国的形势,就是我国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够解决这个問題,那就极有助于我們建立工农联盟和实现我国一切民族力量的更广泛的团結。

对我們來說,共产党及其群众同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及其群众之間的合作,并不像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领导人所經常說的那樣,只是到将来普选結束时为止。我們希望的是,在普选以后也进行合作,不管将来誰获得胜利都好。我們的这种願望是符合于我們共和国“異而又同”(有区别,但又一致)的口号的。

代表印度尼西亚右翼社会党思潮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并不是一个在人民当中有广泛影响的政党。右翼社会党思潮在我国沒有傳統。这个党是按照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一套建立起来的,其影响只限于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間,而这些知識分子中有許多人是怀有野心的,因此他們很同意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安插自己的黨員到政权和其他党派领导机构的重要职位上去。由于混进民政和軍事机构以及資产阶级政党中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黨員为数还很多,因此对于这个党所能引起的危險的可能性是不容低估的,我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就多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說,各反动政党的领导人是受到被安插在它們里面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黨員的鼓励和慫恿的。因此,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在阻碍它所渗入的政党的领导人可能有的进步思想方

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了解這一切以後，是不是我們就拒絕同社會黨和它的群眾進行合作呢？不是的。和對待民族主義政黨和伊斯蘭教政黨以及它們的群眾一樣，我們必須設法同他們接觸，以便在一定的具體綱領基礎上進行合作。我們也知道，共產黨的群眾同社會黨的群眾之間的重點，比這兩個黨的領導人之間的重點還要多。對於在我們若干地方有一定影響的天主教黨和基督教黨，我們基本上也採取以上態度。

有一件事必須提醒黨的幹部，那就是在同各種思潮的政黨和團體進行合作時，我們必須防止機械地利用多數。為了能夠有成效地進行合作，我們就不可以依靠那些在合作過程中肯定会擁護共產黨的任何主張的團體的多數。這不是一種正確的做法。我們必須依靠黨的政策的正確性，依靠共產黨的積極分子的正直、積極性和堅韌性。黨的政策是符合客觀實際的，理應成為每一個具有良好願望的和覺悟的人的政策和主張。因此，最重要的是，合作必須建立在對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標的認識的基礎上。

同志們，建立更廣泛的民族團結是同加強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的工作分不開的。實現比目前更廣泛的民族團結的保證是，我們必須加強在全國範圍內發展黨並進一步密切黨同群眾的聯繫的工作，而且必須不斷地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鞏固黨。這已經成為我們全黨的主張。

根據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所收到的臨時報告，到今年十月底止，我們黨大約有五十萬名正式黨員和預備黨員，他們幾乎遍布全國。根據最近半年來發展黨員和黨組織運動所取得的成果，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發展組織比發展黨員還要難。完成計劃中所規定的黨委會和基層組織的數量，比完成計劃中所規定的黨員人數

还要困难。今年年底我們大家就会看到发展党员和党组织的计划的执行结果如何。党在发展党员和党组织中所获得的成就，首先是由于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路线的正确。党在农民中的工作开始得到改进，这是发展党员和党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使人民对党产生了更大的信任。不仅工人和农民，而且知识分子和学生也愈来愈多地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了。

由于党员和党组织增加了几倍，这就意味着在党的每一个干部面前摆着一项极其繁重艰巨的工作。党的干部对新参加到党的队伍来的大部分人还不熟悉。我们的干部必须了解他们，必须了解他们的来历，必须了解他们参加党的动机是什么。是的，总之，必须了解有关他们的一切。这并不是容易的工作。组织和教育他们的工作那就更不用说，特别是因为在组织和教育方面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并不多。但是，正如庆祝党的三十四周年的文章中所说的一样，党如果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自己，就会变得软弱无力。我们现在只好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我们必须依靠党现有的干部来作这一切。只要党的干部比现在更努力更认真地工作，为组织和教育党员而努力工作，为提高干部本身的理论认识和思想水平而努力工作，巩固党是可能而且是能够做到的。这个工作是繁重的，但是难道有不做繁重工作的共产党员吗？哪里有繁重困难的工作，我们就到那里去。只有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只有进行了艰巨的工作，我们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有了从一万党员发展至十万党员的经验。我们已经总结了这一发展党员运动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目前发展党员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共产党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政党，如果我们以为资产阶级的

思想意識和資產階級的影響只是存在於黨外，那就錯了。尤其是因為有許多新人參加到我們黨里來，而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是帶着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殘余和習氣到黨內來的。此外，黨的敵人當然也力圖打進我們黨內來，以便從內部來破壞黨的組織，腐蝕黨員的思想。這種可能性不論是在過去、現在或將來都是始終存在着的。即使黨沒有制訂發展黨員的計劃，這種可能性也仍然是存在的。只有加倍提高黨員（特別是黨的幹部）的警惕性和加強黨內的思想工作，才能把這些東西反掉。

對於新黨員，首先必須使他們了解我們黨是什麼樣的黨，黨的組織原則是什麼，黨員的義務是什麼，以及了解黨的綱領。必須使他們樹立起關於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關於黨的領導作用和民族統一戰綫的重要性的信念和信心。在這些工作中，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是那些擔負教育新黨員工作的幹部取之不盡的源泉。此外，中央委員會發表的具有全國性質的或省委員會發表的具有一省性質的每一項政治主張，都必須成為對黨員進行政治教育的材料。只有黨的幹部本身真正領會了代表大會的一切決議的內容，使用代表大會文件作為進行的教育的材料的任務才能完成。而這只有在各級黨委舉行了幹部訓練班才能辦到。簡單地說，必須進一步加強這個時期以來所舉行的幹部訓練班，使它們更有計劃和更切合實際。

有一件事情是不能任其繼續下去的，那就是有許多黨的幹部迄今還沒有充分了解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工农聯盟和民族統一戰綫的這些最重要的討論結果和決定。還有許多黨的幹部把工农聯盟和民族統一戰綫理解為形式的東西，他們以為，實現工农聯盟，只要工會對農民的鬥爭或農會對工人的鬥爭發表正式的聲

明表示支援就够了，以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其他政党或团体的领导人在一起开了会和发表了声明就算是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了。对工农联盟的理解不正确，就不能推动党去真正了解农村的土地关系。不了解农村的土地关系，党的干部就不可能向农民具体地指出他们真正的敌人，即地主和高利贷者。干部对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不正确，就不能推动党去改进它帮助和组织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工作。党的成就和我们民族斗争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干部（直至基层的干部）对党所指的工农联盟和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含意有否正确的理解。

市（县）委级以上的党的干部必须养成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习惯。我们今年七月至八月开展的学习列宁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运动的经验表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对党的干部很有帮助，使他们更容易了解他们所面临的一切政治问题，提高了他们的能力，激起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党的干部的这些进步给党的整个工作和全体党员带来了良好的影响。但有某些省份还没有认真开展这一学习运动，这是一个漏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是党的干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就是集体领导的方法。这是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这是我们党章中最重要的规定之一。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善于思考的、独立自主的和生活活跃的组织。只有党员和党的干部忠于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即集体的领导方法，才能保持我们党的这种性质。

我们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哪里没有执行集体领导的方法，我们就在那里看到党的弱点。在组织方面如有薄弱环节，其主要原

因通常不外是沒有執行集體領導的方法。哪里對集體領導方法執行得不够認真，那里的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就顯得軟弱，黨就沒有戰鬥性，同群眾的關係就不密切。由於對列寧主義的領導原則執行得不够認真，因此許多工作沒有人去做，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在黨員中間產生了鬆勁和互相埋怨的情緒。由於沒有執行集體領導的方法，黨章中所規定的黨員權利被剝奪了，黨員的責任感減弱了，領導作用被縮小了，既得的勝利也沒有加以擴大。

為了使我們黨成為列寧式的黨，成為工人階級的戰鬥的、善于思考的、獨立自主的和生活活躍的黨，黨員和黨的幹部就必須忠實執行集體領導的方法，除此以外，就沒有別條道路。只有在黨的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委員會、部門、黨組、支部、小組等等，召開每一個集體的成員特別是集體的領導人的有準備的有計劃的定期會議，這種集體領導方法才有保證。再也不許有“如認為必要時”才召開的會議。這種會議不可以有而且實際上也不可能有，因為誰有權決定有必要或沒有必要召開會議呢？有權決定的只能是那個集體本身，而不是集體的哪一個成員。因此，一個集體有沒有必要開會，那就必須由這個集體本身開會決定。要是開起會來，就不可能沒有需要討論的問題，因為譬如說在一個星期里面，當然會有關於群眾團體的鬥爭、關於政治、關於黨組織的問題，總之，會有需要黨注意、解決和領導的問題。因此，要保證集體的領導，那就首先必須習慣於召開有準備的定期會議。

所有的黨組織都習慣於召開有準備的定期會議之後，我們就走上貫徹集體領導方法的道路，這是從思想上組織上鞏固黨、使黨更有戰鬥性、使黨同群眾的聯繫更加密切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有了這樣的黨，一切民族力量更廣泛的團結就必將成為現實。

联合国沒有通过西伊里安問題 決議案, 暴露了联合国自己 和西方國家的面目

这是艾地同志就联合国沒有通过西伊里安問題決議案一事向記者发表的談話。这篇談話指出了联合国受美国控制的情况，西方國家維護和支持荷兰殖民主义的态度，和对印度尼西亚友好的社会主义陣营和亚非國家的态度。他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國的政府和人民建議，对不願意就西伊里安問題举行談判的荷兰帝国主义采取相应的措施。

联合国大会以三十四票贊成、二十一票反对和五票棄权，沒有通过关于西伊里安問題的決議案。这个決議案的内容，是希望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繼續它們为解决关于西伊里安的爭端的努力。

这个決議案的内容是很溫和的，因为它只包含希望双方举行談判。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沒有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我們可以从这次事件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这次事件再一次地证明了，联合国目前是如何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控制，以致不能作出具体的决定来解决在西伊里安的殖民統治問題并使西伊里安問題和平解决。这种情况，我們已經看到好多次了，关于印度支那的問題就是一个例子。那

么重要的印度支那問題，不是由联合国而是由著名的日內瓦會議来解决的。

第二，就这次事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西方国家的态度是企图把殖民主义永世保持下去。在贊成西伊里安問題決議案的国家中，看不到有美国、英国、法国等等名字。形式上棄权的美国，实际上就是反对关于西伊里安問題決議案的阴谋集团的魁首。

第三，从这次事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朋友。在贊成关于西伊里安問題決議案的国家中，除了有亚洲、非洲国家和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名字之外，也看到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白俄罗斯的名字，也有人民民主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名字。虽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喜欢看到苏联威信提高，但是通过这次事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威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眼中自然就提高了。

第四，从这次事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以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为首的国内的反对派同西方各国在西伊里安問題上的态度是多么一致，多么相同。反对派的尤素夫·維比梭諾及其同伙提出不信任案，从背后打击为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而奋斗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

联合国大会沒有通过关于西伊里安問題決議案之后，是否就意味着我們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的道路已經堵死了呢？完全不是！联合国只不过是我們能够而且必須通过的道路之一。正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駐联合国的代表苏查尔禾法学士所說的那样，我們的命运不是取决于联合国，而是掌握在我們民族自己的手里。为了實現苏查尔禾法学士所說的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我們的任务如下：

第一，我們必須扩大和加强我們的团結，我国各族的团結，我国一切島屿居民的团結，各种派別和政党的团結。現在必須特別注意各族的团結，因为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在議會內外的政治煽动中一貫挑撥离間各族的关系，挑撥离間各地人民同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是他們为恢复联邦(荷兰)时代在政治上所作的准备，是为在爪哇以外成立傀儡国然后和外国一起包圍爪哇所作的准备。他們就是这样地准备应付在未来普选中他們可能遭到的失敗。

第二，巩固亚非国家及其他同情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国家的合作精神和反殖民主义精神。

第三，促使政府支持人民，給人民自由权利，让人民更有力地表达他們对西伊里安和对一般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感情和思想。

第四，促使政府按照各次人民集会的要求，对不願意就西伊里安問題举行談判的荷兰帝国主义，在政治、經濟和財政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此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号召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国外敌人和他們在我們国内的代理人将要进一步采取的措施更加提高警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号召人民斥責反对派挑撥各阶层人民的关系、各族的关系、各地人民同中央政府的关系的各种阴谋活动。

荷兰軍隊在我們馬魯古的若干島屿登陆，这具体地证明了政府和人民必須比过去更加警惕、比过去更加坚决地行动起来。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党的生活》发刊詞

《党的生活》是为代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公报》而出版的，这篇文章就是它的发刊詞。艾地同志在文中強調《党的生活》不仅要繼續担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公报》的任务，刊登党的各种文告和重要文章，而且要着重刊登对开展全党的組織工作、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价值的經驗介紹和总结性文章。为此目的，艾地同志指出，干部提高理論認識和提高思想水平，使自己习惯于閱讀和討論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以及实行作为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巩固党的条件的集体领导方法的重要性。他強調每个干部都要养成写自己的經驗和写总结的习惯，从而使地方性的經驗变成全国性的經驗，使具体經驗变成普遍的經驗。

自从我們的党在一九五一年开始大規模重建以来，許多事实证明，有些党小組、常委会和党組已經有了对党的生活极其重要的經驗和总结。可惜，这些經驗和总结还有不少为一些党小組、常委会和党組所“壟断”。

某些党組織的經驗和总结还没有充分地推广，使它們为全党所共有。这样，这些有价值的經驗和总结对全党的組織工作、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开展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此外，由于这些經驗和总结沒有經過所有党組織的討論，使它們成为全党的經驗和总结，因此它們究竟好到什么程度，符合客观实际到什么程度，也就无从考察了。

以上的事实促使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想出办法，使某些党小组、党委会和党组的经验总结能够成为全党的经验和总结。这就是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公报》改为《党的生活》的主要目的。

《党的生活》除了将继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公报》过去所担负的工作，即刊登党的文告和重要著作译文以外，将着重刊登党小组长、党委书记或党组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和积极分子所写的经验介绍和总结性文章。

关于党的紧迫任务，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党的两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是：**第一**，建立以反封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第二**，继续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关于党的上述紧迫任务，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政治局的报告，其中提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共产党的群众同民族主义影响下的群众和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群众之間存在的共同点，比这些群众的领导人之間的共同点还要多。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互相接近和取得协议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办法。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贯注在这方面，作为我们进一步扩大一切民族力量的团结的重要工作之一。”接着，这个报告又说：“有一件事必须提醒党的干部，那就是在同各种思潮的政党和团体进行合作时，我们必须防止机械地利用多数。”这个结论对帮助我们全党进一步扩大民族团结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关于党员人数和党组织数目的增加，这个报告说：“党如果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自己，就会变得脆弱无力。”接着又

說：“只要党的干部比現在更努力更认真地工作，为組織和教育黨員而努力工作，为提高干部本身的理論認識和思想水平而努力工作”，巩固党是“可能而且是能够做到的”。

关于对新黨員的教育，政治局的这个报告說：“首先必須使他們了解我們党是什么样的党，党的組織原則是什么，黨員的义务是什么，以及了解党的綱領。必須使他們树立起关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关于党的領導作用和民族統一战綫的重要性的信念和信心。”至于对党的干部的教育，报告中說：“市（县）委級以上的党的干部必須养成閱讀和討論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的习惯。”

同时，关于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巩固党的工作問題，在这个报告最后部分所作的結論也很重要：“所有的党組織都习惯于召开有准备的定期會議之后，我們就走上貫徹集体領導方法的道路，这是从思想上組織上巩固党、使党更有战斗性、使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这样的党，一切民族力量更广泛的团結就必将成为现实。”

上述結論当然不是写出来給人家閱讀一下就算了事，而是为了要实行。在执行上述党的极其紧迫和十分重要的任务中，我們的党小組、党委会和党組都会有自己的經驗和总结。他們会遇到許多困难，但是他們也会寻求和找到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他們会把他們为克服这些困难而采取的办法总结出来，会看到他們所作出的总结的执行結果。这样的事例，我們常常可以从會議上的报告和討論中听到。如果把这些經驗和总结发表出来，那对全党是有用处的，会帮助我們党的全面发展。

由此可見，只有在具有直接經驗的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切实

认真的帮助下，《党的生活》編輯部的目的才能实现。因此，为了达到《党的生活》出版的目的，我們号召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把自己的經驗和总结写出来，寄給編輯部。

不少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大願意写文章，因为他们沒有写作的习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文章不被刊登或不受編輯部重視。这当然是不对的。习惯是要經常去做才能养成的。不动笔試一試，那就永远不会写。

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会写文章。最重要的条件是，只要写的是真实的东西，是在党的組織、教育和政治方面确实經歷过的东西，实事求是，既不要縮小，也不要夸大。至于文字可能写得不好，那末編輯部就有責任帮助他。

有了《党的生活》，我們將使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善于写作，我們將使地方性的經驗变成全国性的經驗，我們將使具体的經驗变成普遍的經驗。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使党小组活跃起来

使我们党从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
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组织

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还有许多党员没有组织在小组里进行工作这一情况而写的。文章阐明把党员组织在小组里进行工作的必要性，以便使每一个党员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改善生活、民族独立和和平的斗争中能够真正地成为积极分子。

艾地同志关于小组领导工作方法的指示，目的在于使小组能够推动党的基层组织，使大多数党员能够活跃起来。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组织。

我们党现在已经成为自哥打拉夜（在亚齐）散布到杜瓦尔（在伊里安附近的卡伊岛）的政党，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我们党在各地召开的群众大会，群众都踊跃地和热烈地参加。这点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万隆的群众大会会有五十万人左右，棉兰的群众大会也有五十万人左右，而最近梭罗的群众大会却达到了一百万人左右。和各反动政党不同，我们党禁止各级负责干部虚报参加群众大会的人数，因为虚报就是欺骗自己，结果吃亏的也正是自己。

简单说来，印度尼西亚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广泛和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它散布得广，影响大，支持者也多。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共产党不仅是一种运动，共产党首先是一种**組織**，而且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組織。我們党是共产主义組織，**每一个黨員**都是按照党章的規定組織起来，并按照党章的規定进行工作的。作为共产主义組織，我們党應該是一个最良好、最严密、最积极和最**有紀律的組織**。

我們在为党的每一个进展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不要忘記反問一下自己：我們党除了已經成为强大的运动之外，是否也已經成为强大的組織呢？这个問題的答案，將使我們始終記着我們党还存在着严重缺点；并将推动我們党，使它从一个强大的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組織。

直到現在还有这样的情况；一般地說，已經在党的一个組織中工作的人（像党章第五条所規定的那样），只是党委会和党組的成員。大部分黨員（特别是預备黨員）还没有在党的一个組織中**积极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大部分黨員还没有按照党章組織起来参加工作**。我們大多数黨員是在小組里而不是在党委会和党組里，难道不是这样的嗎？

我們希望党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爭取改善生活、民族独立和平的斗争的积极因素。这就是說，**每一个黨員**都應該成为积极分子，不仅仅是党委会和党組的成員才成为积极分子。而这样說的意思不外就是要求我們必須使大多数黨員生活在其中的党小組活跃起来。

如果全体黨員已經成为积极分子，如果整个党的組織，特别是成千成万的小組已經活跃起来，我們才能够說，整个的党已經真正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的积极因素。这就說明了为什么使党小組活跃起来的問題是使我們党活跃起来的工作中**最重要和有决定**

性的問題。

小組能够活跃起来嗎？参加小組的新党员不是还有許多人是文盲或者“不懂政治”嗎？党的干部的心里往往产生这样的疑問，也往往无意中把这些疑問說出来了。

同志們，如果我們沒有信心使編进小組的新党员在政治上积极起来，我們为什么接受他們入党呢？有些同志怀疑我們党章第五条的規定，为什么沒有把“会讀書会写字”也列为入党的条件！他們已經选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党，为什么我們还說他們“不懂政治”呢？他們选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党，难道他們不是已經有了正确的政治态度嗎？他們考虑了一切后果，然后作出决定，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才是他們唯一的道路。

我們必須而且一定能够使小組，也就是使大多数党员活跃起来。这是有我們的党章作根据的，而且还有若干地方的事实作根据的。当然，使小組活跃起来，不同于使党委会或党组活跃起来，因为后者的成員比較进步，受过較多的鍛炼和教育。我們在促使小組活跃起来的时候，必須注意小組里的新党员的情况。

不識字的党员，首先当然是要他們識字。可以專門为党员开设扫盲識字班，但是，也可以責成不識字的党员参加党为一般群众开办的扫盲識字班。在受到党的监督、认真地履行党员的义务的条件下，他們也可以参加政府部門开设的扫盲識字班。

小組必須根据小組成員共同的决定，召开小組的定期會議。

首先必須向新党员解釋的，就是党章第五条的規定：

“凡年滿十八岁的公民，同意党綱、党章，参加党的一个組織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党的決議，并繳納基金和党費，参加党的会

議和訓練班以及閱讀黨刊者，均得為本黨黨員。”

這篇短文，要特別談談關於實行“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的問題。黨的幹部經常不能解決的問題是：應該分配給新黨員什麼工作，才能使他們感覺到自己是在過黨的生活，感覺到自己是在黨內的重要因素，感覺到自己對黨有用而且確實是有用的。

當然，黨不應該把新黨員所不能勝任的工作也分配給新黨員。如果分配給新黨員不能勝任的工作，他就會感覺到自己沒有能力，認為自己在黨內不是重要而有用的因素，最後就會認為自己無需留在黨內了。那麼，新黨員一定能夠勝任的並確實需要他們去做的究竟是什麼工作呢？

黨章的總綱說：“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要求而鬥爭。”

在新黨員參加的最初幾次小組會議上，可以分配給新黨員（包括不識字的黨員）所能夠勝任的並且確實需要他們去做的工作，這就是“用心傾聽人民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可以分配他們去傾聽同住一個居民點的人們的呼聲，一起工作的人們的呼聲，鄰居的呼聲，他們那些當職員、警察、軍人、小販等的親戚們的呼聲；傾聽這些人對日常生活、對我國的水災、對伊斯蘭教國運動—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軍恐怖集團、對軍警的橫行霸道、對地主的殘酷行為、對馬斯友美黨最近的集會、對馬斯友美黨黨員在公共做禮拜的場所的煽動言論、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活動、對其他政黨的活動的呼聲，和他們對人民所感受和思考的其他一切事物的呼聲。每一個黨員有責任最廣泛地傾聽人民的呼聲。

各個黨員將他們所聽到的呼聲向小組會議匯報。會議開始

时，小组长应该提醒大家，汇报必须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能写的小组长必须将汇报的要点记录下来。不能写的小组长可以请其他能写的党员帮忙记录，如果连这样的人也找不到，那么小组长就必须牢牢地记住汇报中的主要部分。这些汇报必须记录或者记住，因为还需要处理并向支部汇报，以便呈报上级党委会。这样一来，**上级党委会**根据下级组织的汇报就可以了解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迫切需要，等等。这样的汇报当然比道听途说的和偶然听到的更可靠、也更完整。

党小组不仅必须了解各党员是否执行了“用心倾听人民的呼声”的任务，而且还必须知道这个任务是怎样执行的，执行的方法是否完善。如果觉得某一个党员所采用的方法不很完善，其他的党员就应该提出批评，最后由小组进行讨论并作出结论。

汇报完了，小组对党员在执行任务时所采用的方法也作出了结论，那么，小组就必须对所听到的呼声决定它应采取的态度，并且必须决定它应采取的措施，例如：号召邻居互助合作修理桥梁；向居民组织建议派代表团就街道的卫生工作和当地政府交涉；找那些喜欢恶语伤人的法西斯美党党员，同他们谈话，使他们在居住和工作的地点能够同邻人和睦相处；把地主的残暴行为转告当地农民组织的领导；把资方的无理措施转告当地工会的领导等等。小组所不能解决和处理的问题，应该上报支部委员会，如果支部委员会也不能解决，就上报区委员会等。

要使小组活跃起来，小组长和支部委员会的作用很重要，所以区委员会开办支部委员和小组长训练班这一任务是多么重要，这是很清楚的。这种训练班应该把活跃小组的问题列为主要课程之一，也应该把学员的经验当作讨论的材料。

小組已經建立了好几个月，定期的小組會議也已經开过十多次或几十次，原来不識字的黨員也已經开始會讀會写了，这样的小組就應該开始討論我們黨是什么样的黨，黨的組織原則是什么，黨員的義務是什么和黨的綱領是什么等問題。必須使他們樹立起關於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關於黨的領導作用和民族統一陣綫的重要性的信念和信心。應該把黨對各種政治問題的態度作為黨小組成員的政治教育的材料。所有這些工作應該是在不間斷地執行“用心傾聽人民的呼聲，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的任務的情況下進行。

有些黨員可能會說：小組會議是經常開的，但是出席的人不齊。如果只有少數人到會小組會還開嗎？答复是：如果到會的已經有三個人以上，就必須開會。如果這三個人都不是小組長，便從這三個小組成員中選出一人來主持小組會議。這次人數不齊的小組會議的各項決議必須傳達給沒有到會的各個小組成員，同時問明他們不到會的原因，還必須通知下次會議的議程和地點。

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使小組活躍起來的工作不只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而且也是一項可能做到的工作。根據黨章，這是可能做到的；根據黨在幾個地方的經驗，這也是可能做到的。這種工作固然是需要耐心和經常的領導，但是，除了這樣做之外，沒有別的办法可以使黨小組不至成為僅僅是一個收黨費和動員群眾參加黨的群眾大會的機構，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把黨小組擺在應有的地位上，使它成為該小組所在的支部的政治領導的積極貫徹者。

使黨小組活躍起來就是使大多數黨員活躍起來。這是使我們黨從一個強大的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唯一途徑。要實現這一點，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控訴茉莉芬事件

这是艾地同志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雅加达地方法院审判庭上所作的关于茉莉芬挑衅事件的辯护詞，这个辯护詞实际上已經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的辯护詞，它在我国政治历史上是令人永志不忘的。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辯护詞已經把辯护变成控訴，不仅在我国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国际上也有重大意义。艾地同志彻底揭穿了反动派的挑衅活动，指出了反动派的手上沾滿鮮血，并揭示了这样的真理：应当和必須受到控告的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是反动派。

苏普拉多法学士在上述审判庭的抗辯詞和辯护詞以及印度尼西亚人民通过写信打电报对艾地同志受审提出的抗議和用捐款来声援，表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多么密切。

我維護我党的尊严

尊敬的地方法院院长先生！

首先我向法院院长先生表示感謝，感謝他良好地指揮了审理我的案件的工作。我也向出席旁听的各位表示感謝。

我相信，注意这次审判的，不仅是大厅內我們这些人，而且还有法院外的千百万群众。我国的城乡居民、工厂和农場的工人、机关职员、海边漁民、青年、学生、艺术家和知識分子，总之，印度尼西亚社会各阶层都注意它。

人們把成千上万封的信件和电报寄給雅加达地方法院，同时把副本寄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单位，从这一点我們就可以看到人們对正在审理的这一案件的极大关心。

千百万人心情紧张地看着这次审判庭将怎样判决我的案件，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才跟法庭打交道的。

我当然不可以而且也不願意影响这次审判，但是，我有必要表达我的感想和意見，我认为，法庭对我的案件的判决，将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用来衡量这个地方法院到底有多少分公正的尺度。

在我讲到我的辯护詞的主要部分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我认为奇怪的几个問題，要求审判庭加以注意。

如所周知，在我本人知道有傳喚我到雅加达地方法院的事以前，几家报纸和通訊社却已經发表了雅加达地方法院傳喚我的消息。我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才听說，地方法院傳喚我，但是，直到今天，我本人还没有看到这张傳票。据說发出傳票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并且要我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到雅加达地方法院出庭。但是，奇怪得很，尊敬的院长，九月十一日的安塔拉通訊社的新聞稿，九月十三日的《南針报》，九月十三日的《永恒报》和九月十三日的《竞报》都已經登載了关于傳喚我出庭的消息。

起初，我以为这些消息只不过是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前战斗人員联合会攻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当时馬斯友美党及其卫星团体和报纸正在利用“茉莉芬事件”作为他們的无敌武器来猛烈攻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我并不是进行控告，但当时我的确猜想雅加达地方法院或檢

察署已經有意或无意地帮助了馬斯友美党进行反共活动。因为，我当时想，我本人还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不是从雅加达地方法院或檢察署，安塔拉通訊社和我上面提到的报纸从什么地方得到法院傳喚我的消息呢。我对檢察官，或者对达利·穆迪阿拉先生本人，基本上沒有感到什么不高兴，但是，当馬斯友美党利用极其卑鄙齷齪的手段实行反共政策时，就不能消除我对馬斯友美党党员或同情者的达利·穆迪阿拉先生本人的怀疑。

尊敬的法院院长先生！

我被傳喚到庭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表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紀念茉莉芬事件的声明。因此，构成本案的声明显然同茉莉芬事件有关。正因为这样，我要在这里郑重地表示，对我來說，談茉莉芬事件并不是什么称心愉快的事情。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是不願談起这桩使人痛心的事件的。几个月前，我在議會第二次講話中曾經說过，我不高兴談起茉莉芬事件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使我回想起在这次事件中牺牲了的許多同志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第二，它使我回想起在我国民族团結营壘中出現过极大的分裂的时期。

此外，我知道，如果我談起茉莉芬事件，很多人会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會想起在事件发生时他們优柔懦弱的表現；或者会想起他們的罪过，因为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杀害了自己的战友，杀害了还不知是否有罪的領導人和同胞。我所讲的是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和那些还有良心的人，而不是那些到今天为止还希望再来一个像过去茉莉芬事件那样能够痛飲共产党人鮮血的庆功宴的人。我所讲的有良心的普通人，主要是指在茉莉芬事件发生时还在武装部队里的子弟兵和同胞。我深知，他們中間有不少人是仅仅因为盲

从或奉上級命令而参加了“追剿紅色分子”。

我知道，現在有不少普通人在得到有关茉莉芬事件真实情况的說明之后，就会对他們的行为感到懊悔。是的，我可以高兴地說，那些由于不知情而参加“追剿共产党人”的人当中，現在有不少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不再抱有什么成見，并且保证自己不再充当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发动內战的工具。

总之，我不喜欢談起茉莉芬事件。但是，今天我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茉莉芬事件的态度声明而被傳喚到庭，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在必要时才談一談茉莉芬事件。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要激怒人，不是为了要使人家回想起他当时意志薄弱的情景，也完全不是为了要使人家回想起他的罪过。我这样做是为了維護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为了維護在茉莉芬事件中牺牲了的我們的同志的尊严，为了維護在茉莉芬事件問題上拥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严。总之，人家經常就茉莉芬事件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进行誣蔑和誹謗，在这里我維護我的党的尊严，維護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严。

对我的起訴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庭审判时，达利·穆迪阿拉檢察官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題为《以內部方式来紀念茉莉芬事件！》的声明（載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向作为当事人的我宣讀了起訴书。我被控違反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第二百零七、第三百一十和第三百一十一各条。我被控誹謗和攻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穆·哈达碩士。

我拒绝对我的一切控訴，因为我不认为我是那样做的，而且那样做对我并没有什么好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这一声明没有一个字提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穆·哈达碩士。而提到的是在这篇声明发表时已經下台的政府，并且我把这个政府称为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由于这篇声明并没有写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穆·哈达碩士的字句，因此，这篇声明不可能构成对任何一个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本人的誹謗。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把誹謗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的控告加在我身上，这是不可能的。再者，我的辯护詞的有关法律部分，将由我的律师苏普拉多法学士来陈述〔1〕。

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开审时，我曾經說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的声明，不是旨在誹謗，而仅仅是为了公众利益和防卫的目的。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三款，在一月二十七日开审时，我也曾經表示准备請证人来证明茉莉芬事件确实是挑衅事件，同时证明在这一事件中哈达—苏基曼—納席尔等人的手上确实是沾滿鮮血的。我准备这样做，获得了我的律师苏普拉多法学士先生的支持，但法庭却不同意。檢察官表示反对我提出請证人作证。

檢察官对我提出請人作证的拒絕，其結果是，檢察官撤消了他具有“更加从屬”性质的控告，即違犯第三百一十和第三百一十一條的控告。因此，这就剝夺了我通过证明这个声明的发表真正是为了維護公众利益和防卫目的来免除一切对我的控告的机会。

尊敬的法院院长先生！

現在加在我身上的刑法条款剩下两条，即第一百三十四条和第二百零七条。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我被控以“蓄意誹謗国

王或女王陛下”；根据第二百零七条，我被控以蓄意利用文字在公众面前“誹謗在荷兰或印度尼西亚的政权，或在那里所設立的公共組織”（一九五〇年国家出版局翻譯出版的刑法）。基本上說来，我被控犯了誹謗罪。

在上次一月二十七日开庭审判时，我曾經說过，当我在写构成本案的那篇声明时，絲毫沒有想到那篇文章将被认为含有誹謗之意。我說，我写那篇声明是为了公众利益和为了防卫的目的。

我說是为了公众利益，这是因为发表那篇声明的目的，除了是旨在防止当时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前战斗人員联合会等正在准备进行挑衅行动之外，它也是旨在向公众說明茉莉芬事件的真相，以駁斥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敌大量散播的流言蜚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有必要使公众不仅只听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敌所作的有关茉莉芬事件的說明，而且也听一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方面的說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敌所作的有关茉莉芬事件的种种傳播，是歪曲事实，是欺騙和誣蔑。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方面必須向公众提供真实的說明。

那个声明是为了自卫而不得不发表的，这是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敌正在攻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关于这种攻击，我請本庭法官先生讀一讀一九五三年九月四日的《永恒报》，該报刊载了日惹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前战斗人員联合会的要求，其中在“鉴于”部分提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集团的共产主义分子在茉莉芬发动了叛乱，并根据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指示，宣告成立一个由慕梭和阿米尔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說什么“这次叛乱是对印度尼西亚国家和人民的大背叛和大罪行”。在“議决”部分說印度尼

西亞伊斯兰教前战斗人員联合会建議并要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把九月十八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集团的共产主义分子在茉莉芬发动叛乱的日子定为国丧日”，和“下令全国人民下半旗志哀”。

一九五三年九月四日的《永恒报》还說，要在九月十八日举行所謂“哀悼游行”，游行时要“充滿严肃的精神”并击鼓表示哀悼和悲痛。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的《南針报》登載了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大雅加达市分会关于茉莉芬事件的声明，这个声明提到“自从共产主义分子在茉莉芬夺到政权之后，价值数亿盾的国家财产被搶走了，他們在那儿建立了苏維埃政权并进行清洗。当时他們犯下了空前的暴行。无数的伊斯兰教学者、国家公務員、軍人和伊斯兰教徒遭到慘无人道的杀害”。根据《南針报》說，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也要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采取日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前战斗人員联合会所建議的措施（請閱一九五三年九月四日《永恒报》）。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的《永恒报》刊登了不民主的“民主保卫者联盟”〔2〕的声明。这篇声明内容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前战斗人員联合会和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的上述声明，基本上是相同的。

因此，十分明显，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声明发表前几天，在各报上事先已經散播了利用茉莉芬事件作为武器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攻击。这些攻击能够产生两种可能性：第一，公众能够受到印度尼西亚共党政敌有关茉莉芬事件种种說法的影响。其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黨員和同情者会由于这些誣蔑而感到憤怒，并采取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领导本身所希望的步骤。为了防止这两种可能性，所以便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声明。这样做，我觉得，我党已经为公众利益和防卫而采取了措施。从下面我将作的说明里将清楚地看到，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前战斗人员联合会在有关茉莉芬事件方面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指责，完全是一种造谣诬蔑。

尊敬的法院院长先生！

如果把传唤我到庭受审的这一案件当作刑事案件，那么，我要提出抗议。比现在正在审理的这个案件具有更鲜明的政治性的案件是不多的。这个案件是政治案件。构成本案的，是一个政党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治声明。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政治案件。它是一个政治案件，因为正是在马斯友美党及其卫星团体和报纸利用茉莉芬事件作为它们自认为是无敌的武器向共产党人大举发动攻击的时候，这个已经迟误的案件也给搬出来渲染一番，然后又把它提交法院。它是一个政治案件，因为这个案件是关系到千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利益，他们已经发来了成千上万封信和电报，对这个案件发表了他们的感想和意见。

检察官起诉书的主要部分说，我故意用文字来诽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穆·哈达硕士，因为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声明中写了挑衅、残暴、“有功”、沾满鲜血和“英雄行为”的字眼。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声明并不是为了诽谤而发表的。有一件事是对的，这就是这篇声明是用明确的、令人信服的、严厉的词句写成的。这些词句是严厉的，因为它表述真理。每一个不愿意承认这些词句所表述的真理的人，将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些词句

的严厉。

此外,对我们和人民所不喜欢的行为,我们不能够使用含糊的和隱晦的詞句来表达我們真实的感想和意見。我們是被迫使用严厉的詞句来对付敌視我們的人的,因为他們首先对我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我們的詞句的严厉表明了我們內心的坚决,这是重要的,这是我們在面临着慣于对我们采取强暴手段的敌人而得以生存的条件。

我們使用**挑衅**的字眼是由于我們所指的确确实实是**挑衅**;我們用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殘暴**这个詞句,是由于我們认为那个政府确确实实是**殘暴**;我們說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发动內战“**有功**”,是由于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发动內战,确确实实对他們的集团和階級“**有功**”;我們說哈达—苏基曼—納席尔等人的手上沾滿**鮮血**,是由于我們所指的确确实实是这样;我們提到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在消灭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方面的“**英雄行为**”,是由于我們所指的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在他們的階級和集团的眼中确确实实是“**英雄**”。我們使用严厉的詞句不是为了誹謗,而是为了說明确实存在的和已經发生的事实的真相。如果我們所指的人是“阿米娜女士”,那末,我們就不会把她叫做“图尔先生”;同样,如果那种行为本来是**挑衅**、本来是**殘暴**、本来是沾滿**鮮血**的,我們就不会說它是戴上絲手套作出的行为。难道說,如果有人把本来是“图尔”这个人叫做“图尔先生”就是誹謗嗎?根据我的想法,如果把“图尔先生”叫做“阿米娜女士”是錯誤的,如果把一种**挑衅**,一种**殘暴**和沾滿**鮮血**的行为叫做戴着絲手套作出的行为或亲切友好的行为,則同样是錯誤的。不,院长先生,茉莉芬事件确实不是友好的行为,确实不是戴着絲手套作出的行为。

我們把一九四八年一月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六届內閣称为哈达—苏基曼—納席尔內閣或政府。这并不意味着，我們不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六届內閣中，除了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派之外，还有其他党派人士。我們知道这届內閣中还有民族主义政党、天主教政党、右翼社会党等等的人士参加，正如我們也知道穆·哈达碩士和馬斯友美党人在这届內閣中担任着最重要的角色一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六届內閣实质上是穆·哈达碩士领导的馬斯友美党内閣。这个內閣自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成立以来，它就完全执行了馬斯友美党的政策，而茉莉芬挑衅事件是执行馬斯友美党最重要的政策，即追捕和殘杀共产党人的政策，而这个政策迄今仍然是馬斯友美党领导人員的政策。

茉莉芬事件本来就是挑衅事件

我說，茉莉芬事件就是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的挑衅事件。

我还記得，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初，即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初在梭罗发生綁架事件之前，印度尼西亚国民軍第四师师长苏达尔多上校被人卑怯地从背后枪杀了。許多人推測，苏达尔多上校的遭毒手的原因，就在于他是屬於不贊同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当时企图实行所謂軍隊“整編”的高級軍官之一。当时有許多軍官反对将印度尼西亚国民軍进行哈达政府式的“整編”，因为如果实行这种“整編”，就意味着把印度尼西亚国民軍中的人民成分排斥出去。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所进行的关于苏达尔多遇难的偵查工作到底作得怎么样，迄今公众仍然不知道。正因为如此，如果

許多人得出結論說，对苏达尔多上校的杀害是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执行它的“整編”政策的一种特殊方法，我并不感到奇怪。

許多梭罗市的居民不仅不会忘記苏达尔多上校遇難的事件，而且也不会忘記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两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黨員斯拉末·維查雅和巴尔第約同志被綁架的事件。关于茉莉芬挑釁事件，我感到有必要指出在梭罗发生的若干事件，因为正如苏加諾总統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的演讲中所說的那樣，他說，**梭罗事件和茉莉芬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相反地，是一整套的行动。**

斯拉末·維查雅和巴尔第約同志被綁架的事件，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下午六时由政府情报机关一个名叫阿利普·哈尔多約的人到斯拉末·維查雅同志家里而开始的。阿利普·哈尔多約对斯拉末·維查雅同志說：“**注意，現在哈达政府将肃清所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包括左派人士，我手中已有了这个計劃**”。一个政府情报人員竟然坦白地說出这样的話，我本人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当我知道斯拉末·維查雅平时是阿利普·哈尔多約私人的亲密朋友和此后事情发展的过程之后，这种奇怪的感觉就消失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和阿利普·哈尔多約所說的話是一致的。

当斯拉末·維查雅同志要求把哈达政府的肃清計劃給他看时，阿利普·哈尔多約說：“老兄，这里不成，**onveilig**（不安全。——艾地注）。在那边，在明沙杜餐館（即在瓦隆伯冷十字路口西边梭罗州政府对面的一家餐館。——艾地注）吧。等一下，在我进入餐館前，我在瓦隆伯冷十字路口等候。請你先从瓦隆伯冷十字路口去巴尔第約家（在苏迪罗普拉街。——艾地注）去找他。然后我們三个人（指斯拉末·維查雅、巴尔第約和阿利普·哈尔多約。——艾地注）从瓦隆伯冷十字路口到明沙杜餐館去。”

阿利普·哈尔多約和斯拉末·維查雅按照上述約定乘坐阿利普·哈尔多約早已准备好的三輪車离开斯拉末·維查雅的家。到了瓦隆伯冷十字路口时，他們两人一齐下車。斯拉末·維查雅徒步去苏迪罗普拉桑街巴尔第約的家里。这两位同志从巴尔第約的家里出发，向阿利普·哈尔多約等候他們的地方走去。但是，奇怪的是，他們同阿利普·哈尔多約見面后，阿利普·哈尔多約并不帶他們往西走，而是攙着他們两人往北走，在上述十字路口往北約有五十公尺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卡車，沒有頂篷，后門关着，所以只能看到坐在車里的士兵的头部。在他們离卡車約五公尺时，坐在車內的士兵就打开剛才关着的后門一起下了車。斯拉末·維查雅和巴尔第約同志受到枪托毆打，被紧紧地綁起来，然后被推上了卡車。而阿利普·哈尔多約却安然无事，甚至和其他綁架者一起大笑起来。这件事发生在当天的下午六时半左右。

从上述事情发生的地点，斯拉末·維查雅和巴尔第約同志被送到达錫馬图糖厂，那里是一个部队的司令部。在这个部队司令部里，在被捆绑的情况下，他們一直受到拷打和粗暴地审問：“你們是梭罗的好汉，哼”，“你們是人民民主陣綫的头子，哼”，等等。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晚上八时，大約有五个武装士兵把斯拉末·維查雅同志的双眼蒙住并把他从拘留所帶到一个审問的地方。在这次审問中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些問題：“你知道你現在在哪里嗎？”“你要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梭罗市委员会领导人名单和人民民主陣綫的組成人員告訴我們。我問你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梭罗市委员会领导人名单和人民民主陣綫梭罗分会的組成人員，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梭罗市委员会的領導人和人民民主陣綫書記处的成員。”

上述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对两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斯拉末·維查雅和巴尔第約进行綁架的，并不是一般土匪，而是政府当局本身。这种綁架不是普通的綁架，而是政治性的綁架，因为被綁架者不仅口袋里的东西被搶去，而且还問起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梭罗市委員会领导人名单和人民民主陣綫梭罗分会的組成人員情况。可能有人会說，这是某一个地方政府当局采取的措施，中央政府并不知道。这是謊言。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在梭罗市卫戍司令部把斯拉末·維查雅和巴尔第約同志与苏哈尔曼中校和印度尼西亚国民軍的軍官普罗佐苏托托一起，移交給日惹市卫戍司令部，并关在日惹塔努勒桑官方設立的集中营之后，事情就更加清楚了，他們是被政府当局綁架的而且中央政府也是知道的。他們在塔努勒桑集中营里遇見被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逮捕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人士。这种事实和阿利普·哈尔多約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对斯拉末·維查雅所說的話是一致的，他說：“哈达政府将肃清所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包括左派人士。”說明中央政府知道他們被綁架的事；另一个证据是，在拘留期間，他們曾經受到最高檢察署官員的审問。

在拘留期間斯拉末·維查雅和巴尔第約同志等人被准許寄收家信。这个事实和上面所列举的各种事实，駁斥了梭罗市长桑苏里查經常所說的話，他說：“我不知道，而且政府也沒有計劃綁架他們。”在被綁架者的妻子儿女到梭罗市政厅示威，要求桑苏里查对他們的丈夫和父亲被綁架一事負責时，他多次向被綁架者的妻儿說这一句話。

尊敬的法院院长先生！

我列举上面的事实，是为了证明苏加諾总统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的讲话中所說的話是如何正确。他說：梭罗事件和茉莉芬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相反的，是一整套的行动。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使公众了解我們共产党人为什么說茉莉芬事件是挑衅事件，說明我們用“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的挑衅事件”的詞句，不是为了誹謗，而是为了指出事情的真相，指出事实。

在斯拉末·維查雅和巴尔第約同志被綁架和受迫害后，接着又发生了好几起性质相同的事件。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埃斯馬拉·苏肯少校、苏达尔多上尉、沙巴第上尉、苏拉第上尉和慕尔約諾中尉五位印度尼西亚国民軍軍官遭到綁架。他們是被阿利普·哈尔多約和駐在梭罗的斯兰帕丹的一支部队綁架的。这些被綁架的印度尼西亚国民軍軍官的下落，迄今毫无消息。唯一无可置疑的結論是，綁架他們的政府当局已經把他們杀害了。虽然苏第尔曼总司令曾下令爪哇宪兵司令部查究綁架这些軍官的罪犯，但他們終于被杀害了。

誰应对这种綁架和杀害事件負責呢？我以为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当时执政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就是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我有必要提醒大家，这五位軍官同被卑怯地杀害的苏达尔多上校一样，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殖民統治时期、日本殖民統治时期和我們民族革命时期的爭取独立的战士。他們是印度尼西亚爪哇族优秀的儿子。他們受到他們的士兵的爱戴。

我要再举出一桩在梭罗发生的綁架事件。我在上面提到的苏哈尔曼中校，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当他接受上級給他的任务，要他向阿利普·哈尔多約詢問有关被綁架的五位軍官的問題时被捕的。苏哈尔曼不幸也被綁架了，被投进了梭罗的斯兰帕丹

的營部，后来经历了許多慘痛的和不愉快的遭遇后，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同斯拉末·維查雅、巴尔第約和普罗佐苏托托等人一道被移交給日惹市卫戍司令部，并被关进塔努勒察官方設立的集中營。

尊敬的院长先生！

由于在梭罗发生了各种綁架事件，苏第尔曼总司令便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批准了当时担任第四师师长的苏阿迪中校接替苏达尔多上校的职位，以便采取措施平定梭罗的騷乱。根据总司令的許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向进行綁架的那一营部队发出最后通牒，其基本內容是：**如果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十四时止，五位被綁架的人还没有釋放出来，进攻就要开始。**这个最后通牒向全梭罗市散发，接着在梭罗軍区司令斯拉末·利亚第少校指揮下举行了軍事演习。在最后通牒期滿之前，即在十二时半的时候，执行第四师所給予的任务到駐在斯兰帕丹的軍隊营部，准备与該部队进行談判的苏达尔諾少校，一下卡車就遭到枪击，苏达尔諾少校和他的几名卫士當場牺牲。

那一营部队对上述最后通牒置之不理，結果在九月十三日十四时正第四师指揮下的軍隊同綁架的軍隊之間发生了战斗。

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但在九月十三日十八时总司令突然下令停火。上述停火令下达时有民政和軍事官員在旁作证。第四师遵守这一停战令，但另一方的軍隊則繼續活动占領梭罗市。其結果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十八时第四师指揮下的軍隊同綁架的軍隊又发生了战斗。

后来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件，即中央政府居然宣布进行綁架的軍隊一方是正确的，相反的，苏阿迪中校及其指揮下的軍隊

則被中央政府指为“騷乱者”。中央政府通过电台广播和散发传单，号召人民帮助进行綁架的军队。这支军队被认为負有正式任务的军队和負有粉碎被政府指为所謂“騷乱者”的第四师军队的責任。中央政府任命卡托·苏布罗多上校为中爪哇軍区司令，而第四师师长苏阿迪中校及其部队繼續遭到追击。

尊敬的院长先生！

关于梭罗事件讲这些就够了。我不必再繼續讲下去，因为它使我們回想起当时我們社会中所发生的极大的分裂，这不仅是政治界中間的分裂，而且也是我們民族革命最重要的工具——武装部队中間的分裂。

虽然关于梭罗事件我列举的事实不很多，但是仅仅这些就足以了解当时政治和軍事緊張状态的背景，足以了解茉莉芬挑衅事件的背景。

上面我已經說过：梭罗事件和茉莉芬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相反地，是一整套的行动。茉莉芬事件不过是梭罗事件的繼續。梭罗的綁架事件和謀杀事件所引起的武装部队內外的尖銳矛盾蔓延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中爪哇和东爪哇的整个統治区。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沒有能力而且也不願意采取措施来緩和这些矛盾。

自从在梭罗发生对苏达尔多上校的恐怖杀害事件之后，在茉莉芬，人們也深深感到武装部队內外矛盾的尖銳化。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晨，铁路工人維罗苏达摩走向他工作的車站时，被一个士兵开枪击毙。維罗苏达摩的遗体安葬在奥罗奥罗温波村，参加送殯的有铁路工会茉莉芬分会和許多茉莉芬

居民。在举行葬礼时，一些政党和群众团体代表对这种残暴的杀害表示抗議。

在击毙铁路工人事件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一名軍官虐打茉莉芬市政厅一个工人的事件。自治区工会要求打人的軍官向工人道歉。他們的要求沒有实现，因此在自治区工会领导下工人举行了靜坐罢工。在实行罢工斗争之后，有关的軍队方面表示願意派一名軍官作为代表来进行談判，但这次談判也沒有結果。自治区工会将这个问题轉交给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茉莉芬分会处理。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茉莉芬分会支持自治区工会的决定。在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要求下，再次举行談判，談判結果是，有关的軍人答应向工人道歉。

我們可以从上述各种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結論，当时茉莉芬情况是何等緊張。当在梭罗发生在阿利普·哈尔多約协助下軍队进行綁架和殘杀事件的消息傳到茉莉芬之后，这种緊張状况就更加严重起来。这种緊張状况的頂点是，在陸軍内部各部队之間发生了战斗，即不同意上述暴行的第二十九旅同西利旺仪师和机动警察部队之間发生了战斗。这次战斗发生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由深夜一时开始至九月十八日早上八时結束，其結果是，第二十九旅解除了西利旺仪师和机动警察部队的武装。在这次战斗中，第二十九旅第十一营的沙巴里中尉和宪兵队的查雅上尉牺牲了。

在上述混乱的形势下，茉莉芬州州长沙馬迪昆这一位地方长官正好到日惹去，不在茉莉芬。茉莉芬市市长当时正在病中，因此沒有去工作。副州长显然不能控制局势。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在人民民主陣綫内的各政党和拥护人民民主陣綫的群众团体要求茉莉芬市副市长苏巴尔第同志在州长回来之前暫时代行州长职务。

各左翼政党和群众团体要求苏巴尔第同志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苏巴尔第也是一个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当时他有勇气出来控制时局。推举苏巴尔第担任临时州长一事，分明也得到苏曼特里中校（茉莉芬軍分区司令）、茉莉芬州副州长西达尔多同志、茉莉芬市市长普尔波西斯沃罗等人的同意，他們各人都签名表示同意。各重要机关，如：铁路局、邮电局、电力煤气局等的领导也表示贊同。

各党派和人民团体除了对推举苏巴尔第担任临时州长表示贊同外，还推动茉莉芬地方政府的领导向日惹中央政府报告茉莉芬发生的事情，而且应先发电报給中央政府作临时报告，要求中央政府指示进一步应当采取的措施。茉莉芬地方政府曾打电报給总统、內閣总理、国防部长和內政部长。除了打电报外，茉莉芬地方政府也設法派遣送急信的信使将有关茉莉芬发生的事情的消息和书面报告送給中央政府。

就是这一事件，即把苏巴尔第同志原任副市长升任临时州长以便控制茉莉芬的混乱局势的事件，中央政府加以夸大，而且中央政府竟把这一措施称为“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措施，“实行軍事政变和建立苏維埃政权”的措施，等等。根据这个事件，在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全权負責的情况下，苏加諾总统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发表演說，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来消灭“搗乱分子”，指的就是消灭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他們的同情者。

为了更清楚地說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民主陣綫沒有制定计划在茉莉芬夺取政权，我有必要指出，当軍隊中間发生战斗和解除武装的事件时，当推举副市长苏巴尔第同志担任临时州长时，慕梭、阿米尔·沙利弗丁、哈利約諾等同志都不在茉莉芬。当时慕梭同志一行人正在执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訪問全国各地的計劃，

而且剛好到普禾達第地區。慕梭同志一行人是在九月十八日半夜才到達茉莉芬。慕梭同志是應人民民主陣綫茉莉芬分會領導的要求而到茉莉芬的，這是因為茉莉芬局勢緊張。慕梭同志是十分贊成迅速把茉莉芬所發生的事情報告中央政府並要求中央政府对今后的措施給予指示的人之一。

從上述說明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政敵說“印度尼西亞共产党在茉莉芬奪取政權”，“印度尼西亞共产党在茉莉芬建立蘇維埃政權”等等，完全是無中生有。正是根據這些理由，我敢說《永恒報》、《南針報》和《競報》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初所刊登的有關茉莉芬事件的消息是造謠誣蔑。為了駁斥這種謠言和誣蔑，印度尼西亞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發表了聲明，即被構成本案的聲明。

印度尼西亞共产党不可能在茉莉芬發動政變並建立蘇維埃，這不僅是因為這兩種步驟違反共产党人的理論，而且也違反慕梭同志從國外回來後提出的建議。我還記得，當時慕梭同志向印度尼西亞共产党中央委員會建議，由印度尼西亞共产党寫信給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亞民族黨的中央領導機構，以便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印度尼西亞共产党中央委員會接受了慕梭同志的這一建議，並給這兩個政黨寫了信。由卡斯曼·新哥弟墨佐法學士簽署的馬斯友美黨中央領導復信中拒絕了印度尼西亞共产党提出的關於團結的呼喚。我還記得慕梭同志和蘇加諾總統在日惹總統府會晤的情況。當時蘇加諾總統要求慕梭同志協助加強國家和推動革命車輪順利前進。慕梭同志肯定地回答說：“這本來就是我的責任。我回來就是為了把事情搞妥。”（見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出版的《革命者》雜誌第三卷第十四期）此外，我還記得一九四八年八月由慕

梭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中通过一个题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决议，我同时附上这个决议。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决议中并没有实行政变或建立苏维埃政府的纲领。

因此，尊敬的院长先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在茉莉芬实行政变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再者，在茉莉芬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搞政变，也不是撒播苏维埃的种子。在茉莉芬发生的推举苏巴尔第担任临时州长这一件事情，是左派为了控制当时局势的一项建设性的措施。

如果不是小题大做，用魔术师的手法把极小的牛虻变成大象，如果左派的良好意图不被中央政府故意曲解并把它当作给共产党人抹黑的良机，从而借此“理由”动员一切国家力量来追捕和消灭共产党人，那末，流血的茉莉芬事件是不会发生的。

也有人喜欢把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茉莉芬发生的事情同他们所谓为了“在各地引起骚乱”的“人民民主阵线纲领”联系起来，或者同他们所谓“动员所有盗匪组织，在白天和黑夜大力进行袭击和盗窃活动”的人民民主阵线纲领联系起来。如果要把茉莉芬所发生的事情同那种他们所谓“人民民主阵线纲领”联系起来，那末，我在这里可以回答：真正的人民民主阵线纲领同挑衅者大力传播的伪“人民民主阵线纲领”是大不相同的。人民民主阵线中央书记处当时曾经在日惹几家报纸上对伪造人民民主阵线纲领事件发表过声明。此外，人民民主阵线中央书记处曾就上述伪造事件向日惹警察局提出控告。人民民主阵线梭罗分会书记处也曾就上述事件向梭罗警察局提出控告。人民民主阵线中央书记处通过邮局把人民民主阵线纲领寄发给人民民主阵线各地方分会，因此它丝毫

沒有秘密的性质。

* * *

尊敬的院长先生！

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中央政府号召所有政府工具来消灭我們共产党人之后，在内政部长苏基曼宣布对共产党人进行“圣战”之后，当时慕梭同志并没有命令我們成群結队地到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机关那里，引頸讓他們宰割，或者讓他們枪毙。不，慕梭同志在他的演讲中答复了中央政府，命令我們共产党人进行英勇的抵抗。我們不投降也不求饒，因为我們完全没有过错。梭罗的綁架和謀杀事件生动地告訴了我們，有人要痛飲我們的鮮血，正如被綁架和被謀杀的印度尼西亚国民軍軍官的鮮血被人痛飲一样。我們不願意受到这样的对待。可以痛飲我們的鮮血，但事先必須經過同我們战斗。

我們共产党人就是这样来回答糾集了所有的力量来消灭我們的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的。在反抗的斗争中我們失败了，因为我們本来就无意进行反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战争。我們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是旨在反抗荷兰殖民軍隊。但是，相反地，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却糾集了所有的力量来消灭共产党人，后来证明这种措施得到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欢迎和帮助。（参閱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樊·穆克答荷兰通訊社記者問和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斯普尔中将答路透社記者問，《关于茉莉芬事件的白皮书》〔3〕也轉載了上述两篇答記者問，見該书第 17 頁）

但是，在我們遭到失败的同时，我們也給人民以这样的教育：共产党人無論处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他們的立場，仍然站在人民一边，人民不願忍受像在梭罗发生的印度尼西亚国民軍

軍官所遭到的那樣的殘暴行為；即使為了堅持這種態度，共產黨人必須冒犧牲生命的危險。

在反對哈達—蘇基曼—納席爾政府當時所進行的追擊和剿滅活動的鬥爭中，慕梭同志將成為我們永遠的驕傲。我，作為馬來族的人和作為忠實的印度尼西亞男子，向這位偉大的爪哇族男子和英勇的印度尼西亞人民英雄鞠躬致敬。慕梭是每個共產黨人和每個愛國者的榜樣，他作出了一個共產黨人和一個人民的子女應該怎樣為維護人民的理想和真理而犧牲的榜樣。凡是具有像慕梭同志一樣的崇高精神和偉大勇氣的人們是多麼幸福呀，他們是有權站在最高山巔的山鷹。他們將永遠活在印度尼西亞人民心裡，印度尼西亞人民是可以完全信賴他們的。

從梭羅所發生的事件中，如對蘇達爾多上校的謀殺，對斯拉末·維查雅和巴爾第約同志的綁架，對印度尼西亞國民軍五名軍官的綁架和謀殺，對蘇哈爾曼中校的綁架，對茉莉芬鐵路工人的謀殺，對茉莉芬市政廳工人所施的暴行，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挑釁分子的活動範圍是多麼廣泛。但是，即使如此，他們並沒有能夠獲得用來追擊和屠殺共產黨人的合法根據。

他們對共產黨人的追擊和屠殺並沒有合法的根據。他們能夠利用的唯一借口就是人民民主陣綫茉莉芬分會提出的由蘇巴爾第副市長暫行州長職務的要求。但這是非常可笑的，因為推舉蘇巴爾第同志擔任臨時州長是得到當時負責管理茉莉芬地區的軍政要員的同意的。沒有比把這個事件稱為“推翻國家”的措施更令人可笑的，尤其是把這個措施說成是“實行政變並建立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是工、農、兵代表會議。把當時臨時州長蘇巴爾第領導下的茉莉芬地方政府說成是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作為最高權力機

关，这是不合乎情理的。苏維埃是社会主义国家即生产资料不可能再为私人占有的国家的人民代表會議。把当时临时州长苏巴尔第領導下的茉莉芬地方政府說成是拥有把所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計劃(何况是实施这个計劃)，这也是不合情理的。

由于上述的說明，我提供证据来证明茉莉芬事件是一个挑衅事件的任务就暫告完成了。应对上述挑衅行为負責的，就是当时执政的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

沾滿鮮血的手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南針报》刊登的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的声明中提到：“自从共产主义分子在茉莉芬夺到政权之后”，就犯下“空前的暴行”。該声明接着說：“无数的伊斯兰教学者、国家公務員、軍人和伊斯兰教徒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这是危言聳听的和歪曲事实的。空前的暴行不是开始于所謂“共产主义分子在茉莉芬夺到政权”，而是开始于苏达尔多上校遭到惨杀和印度尼西亚国民軍五位軍官在梭罗遭到綁架和杀害。为了駁斥这种对事实的歪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声明中指出，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犯下残暴行为，而是哈达—苏基曼—納席尔等人的手上沾滿了鮮血。可能那些有关的人听了我們所用的这些詞句是感到不舒服的，但是这些詞句是正确的。

在說明梭罗事件时，我已經指出有关印度尼西亚国民軍五位軍官被哈达政府当局綁架和杀害的情况。这一流血事件导致了其他的流血事件的发生，即第四师指揮下的軍队同在阿利普·哈尔多約帮助下进行綁架的軍队之間的战斗。

我不想再引用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上述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情况。我只想举出雅利安和馬吉冷这两个地方发生的屠杀事件作例。只举出这两个例子，不是意味着我就不谈其他地方如瑪琅、諫义里、巴蒂、不流老、連旺、古突士、普禾达第、熾布等地所发生的残杀事件。我只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节省时间。同时，我认为这两个例子是有代表性的，它充分地反映了一个自称为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的工具在其他地方实行的暴行。

尊敬的法院院长先生！

关于在**雅利安**所发生的事件。雅利安是在梭罗州加郎阿惹县拉龙区的一个村庄。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半夜，根据军队的命令，由加郎莫佐村大约二十名居民所挖掘的用以埋葬阿米尔·沙利弗丁法学士及其他十个同志的土坑尚未挖好。根据命令，这个将要埋葬十一个人的土坑，深度应为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当时**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穿着白底蓝条的睡衣，绿色的长裤，手里拿着一包筒裙包着的东西；**馬魯多·达魯斯曼**同志穿着褐色外衣和白色长裤；**苏立諾**同志穿着浅衫和筒裙；**黃义发**同志穿着白裤、白衬衣和已髒的白外衣；其他同志有**沙佐諾、哈利約諾、苏卡尔諾、佐哥苏約諾、卡丹哈第、罗諾馬尔梭諾**和**特·芒古**。

在等待人们把坑挖好时，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对着那里的一个印度尼西亚国民軍上尉問道：你們要把我怎么样？

那个上尉答道：我是軍人，服从命令和遵守紀律。

坑挖好了之后，就叫挖坑者离开，只留下其中四个人，后来证明是利用他们来进行填坑工作。

接着一个中尉說軍区司令**卡托·苏布罗多**上校下达了一项关于枪毙十一个人的命令。

阿米尔同志問道：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害我和我的同志們？

那个中尉答道：我只有服从命令。

阿米尔又問：你是否已經認真考虑过？

中尉：不必多說。

佐哥苏約諾插着說：我不責怪你，但这样做将使国家遭到損失。

中尉命令他的士兵把枪装上子彈。

阿米尔同志在走近中尉时，差点絆倒，接着他拍拍中尉說：給我們一点時間唱歌。

中尉答道：可以，但要快！

苏立諾插着說：我可以寄信給我的妻子，让她知道这件事嗎？

中尉：可以，我沒意見。

接着，同志們便写信。写完后，就把信一封一封地交給中尉。

交了信以后，十一个人共同高唱《大印度尼西亚》国歌和《国际歌》。

唱后，阿米尔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为你而死！

苏立諾同志高呼：我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你，我是为了你！

后来这十一位英勇的人，一个一个地被开枪打死了，最先是阿米尔·沙利弗丁，接着是馬魯多·达魯斯曼、黄义发、佐哥苏約諾等同志。

我們从上述事件中可以知道，武装部队成員是根据上級的命令，在这一事件上，是軍区司令的命令而开枪射击的。对这一切应負責任的，不是那些在接到命令后把子彈装进枪膛并枪杀阿米尔等同志的士兵；而应負完全的責任的，是当时执政的政府，哈达一苏基曼—納席尔政府。

直到現在，不論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或被杀受害者的家屬都沒

有接到关于对上述十一位爱国者的审讯和判决的通知。唯一正式的，但不是发给每一个牺牲者家属的函件是，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由二級警监申布·慕尔約諾签署的梭罗州警察局长的公文，里面說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二十三时半政府依軍法将上述十一人判决。而对于軍法判刑的訴訟程序如何，則完全沒有加以說明。

根据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梭罗州警察局长的公文，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由阿·曼·丹文南法学士先生和慕迪第奧夫人同志通过議会向政府提出质問如下：

(一)上述函件中所說的“政府”指的是誰？

(二)政府是否可以依軍法判刑？

(三)什么地方的法庭审判这十一个人？

(四)法庭的判决书的内容如何？

(五)檢察官(軍事檢察官)的起訴书内容是什么并且是根据刑法(軍法)的哪些条款？

阿·曼·丹文南法学士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議会的发言中再一次提出了这些問題。

現在談談**馬吉冷**的流血事件。这一事件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始的。那天下午六时左右，格都州軍分区司令官沙尔比尼到軍事拘留所，并宣布他得到任务来保护那些因某种原因被拘留的人。他說，受他保护的人可以不必担心，他保证給予良好的待遇。他是在几个被拘留的人面前这样宣布的，因为当时被拘留的人还不多。被拘留的人当中有前社会部长苏普罗佐先生和根达尔县长苏加尔摩先生。

果然，在軍分区司令官沙尔比尼宣布后約一个星期的時間內，

他們的飲食和香烟供應都得到保證。但是，久而久之，待遇就越來越壞，尤其是把七十五個被拘留的人關在蘇普羅佐和蘇加爾摩先生的拘留室之後，情況就更壞。看守加強了，吃的東西很少，以致引起抗議，甚至進行絕食鬥爭。在被拘留的人的要求下，才准許家屬寄送食品到拘留所。

在拘留期間，向被拘留的人提出了這樣的一些問題：他們是不是企圖以暴力推翻政府的組織的成員，他們是不是進行各種犯罪活動的組織的成員。這些問題是同偽造的人民民主陣綫活動綱領一致的，而這個偽造綱領事件曾由人民民主陣綫向警察局提出過控告的。對這些問題簡短的回答是：不！有的則說，他們是具有合法地位的社会党或其他政党的黨員。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同蘇普羅佐和蘇加爾摩先生關在一個拘留室里的人被集合起來。拘留所所長通知被拘留的人應準備遷移。被拘留的人被分為甲、乙、丙三組。丙組的人可以回家去，乙組的人被遷往馬吉冷郊外的曼杜集中營。而甲組的人全都是人民民主陣綫馬吉冷分會的會員，共四十一人（其中有一名是婦女），被遷往馬吉冷監獄。當局對那些被遷往馬吉冷監獄的人的審問還沒有完竣。

兩名年輕的看來態度還是友好的士兵押送這四十一人往監獄去。如果這四十一人想要逃走，當時並不困難。但是，由於他們感到沒有犯罪，所以他們認為沒有必要逃走。當被拘留的人分散走的時候，押送的士兵並沒有生氣。而且在到達監獄之前，蘇普羅佐先生和另一位被拘留的人要求押送的士兵允許他們回家一會兒，以便向家人告別。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們在沒有人看守的情況下在家里停留了一會兒。後來，蘇普羅佐先生和另一位同志向

家人告别后没有人押送自己到监狱去。我有必要举出这一事实以便再一次表明，被拘留的人民民主阵线人员丝毫没有感到自己是犯罪的，因此他们对逮捕他们的政府机关一点也没有产生怀疑。

到了监狱之后，四十人被关进两间牢房，但跟来的那一位妇女没有被关进去。监狱前后警卫森严，由武装部队看守，一挺机关枪对准着牢房。大约下午五时，见到四个人抬着一大包炸药，放进一间牢房里。大约六时半，把小偷和刑事犯等“一般的”犯人搬出监狱。晚上九时左右，上述四十名被拘留的人被迁进监狱中部的一间牢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晚，馬吉冷监狱里面和周围都很黑暗。有一小队军队拿着火把，划破了黑暗。他们带着卡宾枪。约在晚上九时半，牢门被打开，被拘留的人一个个被拉出去。到了外面，他们的手被反绑起来并被关进另一间房子。有一个人在被绑的时候抗议说：“不经审判就要杀我们，这真是无法无天。”还有一个人，当他的双手被反绑起来的时候，问道：“这是要干嘛？”这个问题得到粗鲁的回答：“不许开口！”接着这个发问的人就被关进牢房里，而在那里已经集合着双手被绑着的朋友。他们被迫面向牢房墙壁盘着腿坐着。四十个人分关在三个牢房。当时，有些荷兰军队已进入了馬吉冷市。

听到部队指挥官在说话：“这些都是匪徒。”后来他下令：“准备！”在每个人的后面，相隔一公尺半，站着一名拿着卡宾枪的士兵。听见枪上膛的声音后，指挥官下令说：“以国家的名义……射击！”就是这样，只是用“以国家的名义”的一句话，未经审问完毕的人们就被判决枪毙。他们许多人的头壳破裂，脑浆迸流。在向所有的人射击完毕之后（但其中有的射击不大准确），用大锁把监狱

的門鎖起來。

不久，從監獄的窗門投進了裝着汽油和粘液的瓶子。他們設法從監獄外面放火燒監獄，火已開始燃燒起來，已燒到本來準備好放在牢房門前的柴堆。但是，放火的人和劊子手倒了霉，天下雨了，他們的力氣白花了。

同樣，關於上述四十人被判處死刑一事，我借用阿·曼·丹文南先生的質問：什麼地方的法庭審判這四十人？法庭的判決書的內容如何？檢察官（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書內容是什麼，並且是根據刑法（軍法）的哪些條款？

到目前為止，人民知道的是：他們未經審判就被殺害了。我們可以說，格都州長沙拉蒙、軍分區司令沙爾比尼和格都警察局長蘇卡爾佐應對這一事件負責，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他們是按照上級的命令做這一切事情的。正如在雅利安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一樣，應對馬吉冷監獄屠殺事件負責的是哈達—蘇基曼—納席爾政府。這些執政者的手是沾滿鮮血和腦漿。

弄清楚了上述雅利安和馬吉冷這兩起屠殺事件，也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聲明中所用的“沾滿鮮血”的字眼完全沒有誹謗的意圖，它只不過是概括了事實的真相。這樣也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茉莉芬事件中哈達、蘇基曼、納席爾等人的手上確實是沾滿鮮血的。

在我結束關於在茉莉芬事件中那些人的手上沾滿鮮血的說明之前，我有必要指出，在雅利安、馬吉冷、瑪琅、諫義里及其他許多地方的殘酷的屠殺是在蘇加諾總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發表演說之後進行的，他在演說中說，**死刑的判決必須由中央政府決定，所有刑罰必須根據法庭判決。**同時我也有必要指出，根據印度尼西亞

中央国民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即当时我国的临时议会的决定，授予苏加诺总统三个月的全权的有效期限只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为止。我上面所说的屠杀事件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之后，**在苏加诺总统手中不再掌握全权之后**发生的。我指出这两件事进一步说明了，这些屠杀事件的的确确是无法无天的行为，而且应由哈达—苏基曼—纳席尔政府负全部责任。

院长先生，不应该忘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是依据尚未证实的消息进行的。这点从总理穆罕默德·哈达硕士要求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授予全权而发表的演说中就可以看出来，他说：“也流传着消息说——不知是否确实——慕梭将担任篡夺来的共和国的总统，而阿米尔·沙利弗丁法学士任总理。”不错，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依据**不知是否确实**的消息，但是死了的人确实已经死了。

我們应当像保护我們的眼珠一样 维护民族团结

尊敬的法院院长先生！

现在已经到我结束我的辩护词的时候了。

我在我的辩护词的开头已经说过，对我来说，谈茉莉芬事件并不是什么称心愉快的事情。在这个审判庭前，我不得不谈及这一悲惨的事件，一个自称为依据法律行事的政府实行的绑架和屠杀事件。为了维护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维护在茉莉芬事件中牺牲了的我们的同志的尊严、维护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关于茉莉芬事件的立场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严，我不得不发言。

根据我上面的說明，我在我的辯護詞的开头所說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的声明仅仅是为了公众利益和防卫的目的这一句話的含义，也就十分清楚了。在这个声明发表的前几天，由于《永恒报》和《南針报》刊登了各种誣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言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良好声誉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良好声誉就被損害了。現在，已經十分清楚了，“空前的暴行”并不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开始的，而是由政府当局在梭罗实行綁架和屠杀开始的。現在，已經十分清楚了，“空前的暴行”并不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的，而是**针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的。

許久以来，在馬斯友美党这样做之前，我們每年就把九月十八日当作哀悼日来举行紀念的。如果政府决定十分庄严地紀念每年的九月十八日并下半旗表示全国人民的哀悼，我們是同意的。

我們必須在每年的九月十八日举行紀念，追悼在雅利安、馬吉冷、諫义里、瑪琅、巴蒂、熾布和其他許多地方殉难的烈士。

我們必須在每年的九月十八日举行紀念，追悼慕梭、阿米尔·沙利弗丁、哈利約諾、苏立諾、維罗勒諾和其他許多人民英雄，他們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具有民族意識和流着民族热血的印度尼西亚儿女的心中。

我們必須在每年的九月十八日举行紀念，追悼在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实行內战政策中牺牲了的武装部队成員——我們的子弟兵和同胞。

我們必須在每年的九月十八日举行紀念，追悼在茉莉芬事件中殉难的人。

我們必須在每年的九月十八日表示哀悼，使我們始終記住，我

們必須警惕并一貫采取坚决的态度来反对任何挑衅。

我們必須在每年的九月十八日表示哀悼，使我們始終記住，我們不願被分裂，我們必須像保护我們的眼珠一样維護我們的民族團結。

只要我們團結，除了我們的敌人和所有殖民主義分子之外，沒有人会受到損害。

尊敬的法院院长先生！

我已經讲了話，我已經表达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現在我希望你表达你的思想和感情。我提出这个希望，是因为思想和感情是人所共有的，我相信你也是这样。

亚非国家在万隆开始集体創造自己的历史

这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万隆举行亚非二十九国会議前夕艾地同志同安塔拉通訊社記者的談話。亚非会議一致譴責了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它誕生了以“达沙希拉”(即十項原則)而著称的万隆精神,这十項原則反映了亚非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团結精神。

这次会議的成功证明了,亚非各国人民已經站起来,为掙脫殖民主义的枷鎖和爭取自己民族的独立而共同奋斗。艾地同志正确地指出,亚非各国人民通过这次会議开始**集体**地創造他們自己的历史。

問：你对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議,有何感想?

答：我想,我的感想与那些能够正确評价这一重要的偉大的而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儿女的感想是一样的。

一方面,我对这次会議能在印度尼西亚举行而感到自豪。我要是把这种正当的自豪感隱藏起来,那就不适当。不管高兴不高兴,贊成不贊成,这一事件无疑将会提高印度尼西亚的威望。但尤为重要的是,亚非国家通过这一事件开始集体地創造自己的历史。这将对人类的安全、进步和文明的一个不可估量的貢獻。

另一方面，我感觉到，为了实现这次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美好理想，作为东道主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所肩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印度尼西亚政府要使这次会议成功的诚意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这次会议重要性的认识，是开好这次会议的保证。

我谨以这种心情向所有出席亚非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团员蒞临印度尼西亚表示欢迎和表示祝贺。

問：你是否相信亚非会议将会取得成就？

答：在长满脓疮随时都有可能破裂那样充满着新的世界大战危机的情况下，各国愿就和平、友好和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商谈而共聚一堂，这件事本身就是个成就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会不会取得成就，而是怎样使健康的意见能够在这次盛大的会议上尽量地提出和讨论。

即将在万隆聚会的各国，虽然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不同，但在原则上却或多或少地全都有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需要。因此，我相信这次会议将会获得使那些不愿了解亚洲和非洲人民思想感情的国家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就。

問：亚非会议的召开，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样，意味着印度尼西亚政府大量浪费金錢？

答：要是人们认为有必要为婚宴花钱，那就不必为将有各国参加的一同讨论约占全世界四分之三人口命运的会议所必须支出的经费而吵吵嚷嚷。依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所需的经费开支并不会达到在雅加达或万隆扔下一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损失的千分之一。

問：你对亚非会议抱有什么希望？

答：我希望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将成为亚非国家集体创造

他們自己歷史的一個重要開端，作為這兩大洲對世界和平和文明的貢獻。

我相信，要是所有國家都忠於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那就會為亞非各國之間以及世界各國之間在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提供無限的可能。這個信念便是我所抱的希望的基础。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及其发展

这是艾地同志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扼要地叙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展的历史，指出它从成立到一九五五年的历史是经历了許多动荡和牺牲的历史，然而也是英雄的历史。虽然这个讲话只是簡要地叙述了党的历史，但是基本問題都包罗无遗了。它为我们了解党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这个讲话也分析了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失敗的問題，并且对我们当时应该怎样领导八月革命的問題作了总结。

这个讲话强调指出，党绝对有必要为扩大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的建设和使党布尔什维克化而竭尽全力进行工作。同时讲话中也指出党的这两项基本任务是互相密切联系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因此，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

三十五年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政党的誕生。这个党的发展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的历史发展，是进行推翻反动政权并建立以大多数人民的联盟——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的斗争的历史发展。唯有这样的人民政权，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三十五年的历史，并不是平静与和平的历

史，而是经历了許多动蕩、許多艰險、許多錯誤和許多牺牲的历史。但也是英雄的、令人兴奋的、有許多經驗教訓和很多成功記載的历史。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三十五年来的发展可以分述如下：

一、党的成立和反抗第一次白色恐怖的斗争（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

二、二十年地下斗争和反法西斯統一战綫（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

三、八月革命和反抗第二次白色恐怖的斗争（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

四、統一战綫的扩大和党的建設（一九五一年——……）。

（一）党的成立和反抗第一次白色恐怖的斗争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相結合的产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成立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客观必然的事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誕生的，是在印度尼西亚有了工人階級，成立了工会和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之后誕生的，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誕生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

斯大林在其所著的《論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的說明使我們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乃是时代的必然性，他說：

“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国内十多亿居民施

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設铁路，設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无产阶级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资本主义的障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斯大林所说的这一段话，完全符合二十世紀初期在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情况。由于二十世紀初期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迅速增加，殖民资本不得不在印度尼西亚经济生活中实行巨大的改变。它不得不建立原料加工工业，如制糖工业和橡胶工业，不得不建筑码头，鋪設铁路，設立修配厂。因此，帝国主义虽然努力保持封建关系，但也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倾向渗入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去。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其中包括无产阶级。这形成了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的新的基础，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成立的。沒有組織的和不断遭到失败的农民暴动，现在已为有組織的并领导农民及其他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所代替。

关于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诞生之前成立的各种工会和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可作如下的叙述：一九〇五年成立了一个铁路工会，名为国营铁路职工会。一九〇八年成立了铁路电车工会，这是一个战斗性的铁路工会。但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已经要求建立不仅仅局限于工会斗争的組織。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三宝壟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这是印度尼西亚和荷兰革命

知識分子的一个政治組織，其目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工人和人民中間傳播馬克思主义。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改組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关于一九一七年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怎样推动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我只想借用毛澤东同志的一段話來說明，毛澤东同志說：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問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立表明，印度尼西亚先进分子迎接偉大的十月革命炮声并不落后。換句話說，印度尼西亚先进分子和革命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大众及时加强了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新的革命战綫。从而，印度尼西亚爭取独立的斗争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粉碎資本主义的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任务，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对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号召中，已經說清楚了。

列宁說：“你們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沒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須根据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須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資本而是中世紀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

列宁这一号召說明，东方的共产主义者，也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者，不仅必須依靠“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而且在运用的时候必須根据“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特殊情况”，列宁这里說的特殊情况就是指农民。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新兴的阶级即必须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什么工人阶级必须担负领导者的责任呢？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虽然数量不多（约有六百万人是雇佣劳动者，其中约有五十万是现代工人或无产阶级），但它与农民是不同的，因为工人阶级代表新的生产力；工人阶级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具有坚决的斗争意志，因为这一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主义的压迫和资本主义的压迫。由于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它是最有纪律的阶级，由于没有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是最坚决的和大公无私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必须担负领导的责任。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立——随后它即成为反对荷兰帝国主义卓越的战士——不仅受到印度尼西亚工人和农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受到其他人民阶层的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样也受到军队和水兵群众的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展得非常迅速。

不久，共产党人就在工人运动联合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工人运动联合会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三宝壟召开代表大会时，有二十二个工会代表参加，代表七万二千会员。共产党人的影响首先是通过战斗性的铁路电车工会而扩大的。这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优良传统的开端。

一九二〇年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发生了多次罢工，这些罢工一般是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这些胜利鼓舞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和斗争热情，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认识到组织和纪律的重要性，并向工人和一般人民揭露了殖民劳工条例和殖民政府的腐败。

工人运动所获得的进展，使政府感到忧虑，尤其使它忧虑的是，共产党的影响日益扩大。政府设法去影响伊斯兰教联盟，并加

深共产党人和伊斯兰教联盟之間的矛盾。工人运动联合会内部的改良派获得荷兰政府的支持，因而加深了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的矛盾。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日惹的哥达克特召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大会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三十八个县委会，拥有党员一千一百四十人，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下屬組織”人民同盟⁽¹⁾拥有四十六个分部，盟員三万一千人。如果和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九百人相比，一九二四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有党员一千一百四十人，那已經非常多了。

这证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即使遭到来自荷兰殖民政府的巨大阻碍，仍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人民同盟的迅速发展，表明了农民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热烈拥护，因为人民同盟的成员主要是农民。

但是，党并没有能够把群众对党的广泛的同情和人数众多的党员巩固下来。党确实曾經作了重要的工作，来唤醒人民反对荷兰帝国主义，但是，党没有能力来巩固它所已經获得的成就。

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所犯的基本錯誤，就是他們成了“左”傾口号的牺牲品，没有努力弄清情况，企图一举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消灭封建主义，摆脱荷兰統治，粉碎所有的帝国主义者，推翻反动政府，消灭富农，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这一切自然就使得真正的敌人和可能成为敌人的人结合起来反对党。这使党本身陷于孤立并大大地削弱了党。党没有充分引导党员去关心同工人、农民及劳动知識分子的日常需要有关的細小的、繁瑣的实际工作，其实只有在这里，只有在这种工作中，党才能把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圍。当然，从事这种工作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不

是沒有困难的。但是，要密切党同劳动人民群众的联系，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正如《印度尼西亚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一九五四年三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所說的，在第一个时期：

“党对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还是一无所知……，当时党提出的口号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建立印度尼西亚苏维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对东方民族大学学生的演说中正确而中肯地批评了党的这种‘左’倾偏向，他說：这是一种‘左’的倾向，它包藏着脱离群众，使共产党变成宗派的危险。”

党染上的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毛病，确实已使党变成一个宗派，使党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孤立起来，并使残暴的殖民政府便于粉碎我们的党。斯大林說得非常正确，他說：“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的必要条件。”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們深深地体会到斯大林同志这句话的正确性。

至于党的建设工作，当时党的领导还不可能认真地去注意它。党内沒有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教育，机会主义分子钻进党的领导机构并占了統治地位，党还不懂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集体领导的方法。这种情况使党在理論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很軟弱。

在党脱离群众和党的组织还非常軟弱的情況下，印度尼西亚的危机越发加深，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降低，人民对政府进行的无组织的反抗也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殖民政府不断进

行挑衅，如解雇罢工者、逮捕农民、封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或人民同盟举办的学校，禁止工人的报纸出版、逮捕工人领导人等等。特别是为了对付农民，荷兰组织了各种恐怖集团，如勃良安的“綠色同盟”。这一切导致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爪哇人民起义和一九二七年年年初苏門答腊人民起义的爆发。起义爆发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即挺身而出，以便尽力领导起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立即出来领导这次人民起义的态度，是正确的。

起义进行期间和起义之后，党的各种弱点显得十分突出。例如党的领导对于起义沒有一致的意見，对保护党的干部和领导机构的工作沒有准备，各地方之間的行动沒有相互配合，城乡之間的斗争沒有相互联系等等。除此之外，还有陈馬六甲这种人，当时他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在起义开始之前他沒有采取明确的措施，而在起义爆发之后却又指責这次起义。更严重的是，正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面对着殖民政府及其走狗的白色恐怖的时候，他和他的集团竟公然实行了托派分子的作法，建立新的政党——印度尼西亚共和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內部的分裂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原来已經困难的工作更加困难起来，而且便于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內部和在一般的民族独立运动內部实现其分裂政策。

数以千計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和各級負責人被追緝和判刑，其中有的被絞死。有許多人被流放到伊里安利辜的沼澤地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中只有几个能够安全地逃往国外，其中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員慕梭同志。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許多党员和各級負責人，虽然他們入党的時間并不长，但一般党性都很强。他們毫不后悔，含笑地走向絞架

或接受监禁、流放的判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决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和各級負責人在当时的殖民政府面前所表现的英勇态度，提高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争取独立的真正战士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威信。这增强了印度尼西亚被压迫人民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

一九二六年的起义，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革命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是，这次起义向印度尼西亚人民指出了，荷兰是可以被弄得手足无措的，殖民统治是可以被摇撼的，这种统治不是千秋万世的，这是人们所不能忘记的。因此，一九二六年起义对于提高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觉悟有着异常重大的意义。

这一切的结论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还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还不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和社会情况以及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特点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规律。其结果是：党不懂得印度尼西亚人民客观的基本要求，即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自由。此外，党的领导没有认识到，为了实现这些基本要求，就必须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不了解这一切，当时党的领导就产生了错误的想法，认为“农民在一切斗争中是不能信任的”，认为“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工具”，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反对一切资本主义”，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口号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建立印度尼西亚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在这个阶段中，虽然党的組織是发展了，但是沒有巩固下来。沒有能够使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坚定起来，沒有給予他們必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沒有来得及把党内的活动分子造成为党的中坚。在面临挑衅和第一次白色恐怖的危急情况下，在党的領導中掌握实权的分子未能領導全党来挽救党。

总而言之，在第一个阶段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两个基本問題上沒有經驗，即：（一）統一战綫問題，和（二）党的建設問題。

（二）二十年地下斗争和反法西斯統一战綫 （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

一九二六年起义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便被荷兰殖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能够再从事合法工作，又由于被左的口号所吸引，因此，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領導下的革命群众便轉而欢迎左翼民族主义政党——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除了参加各种群众团体外，还有許多参加了这个左翼政党。但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没有建立新的中央領導，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和党员的活动沒有获得良好的領導。

自从一九二六年起义失敗以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显然，荷兰殖民政府不仅鎮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領導下的革命的群众組織，而且对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也实行鎮压，如进行各种挑衅、阻撓它的一切活动、放逐它的領導人等。

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左翼民族主义政党遭到殖民政府打击

的时候，主要力量盘踞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统一党⁽²⁾内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便趁机加强他们同荷兰政府的合作。他们集中力量从事他们所谓“积极性的”工作，即建立合作社、学校、商会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在若干地区甚至在乡村中扩展了他们的工作。荷兰乐于称他们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分子”，因为他们的活动和荷兰政府的利益没有冲突，也正因为如此，荷兰政府给了他们必要的方便。

但是，独立运动的低潮为时不长。世界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广大人民的贫困、紧缩开支、增税、集体解雇等等，妨碍了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和荷兰政府安然合作下去。来自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急进呼声越来越响亮。这个危机时期一般称为“不景气时期”，或如印度尼西亚农民所称的“困难时期”。

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犹如晴天霹靂，爆发了“七省号”军舰水兵的暴动，这次暴动受到许多国家的工人的热烈欢呼。这一事件对于重新激起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斗志具有重大作用。后来在一九三三年的七月，爪哇铁路工人准备罢工，荷兰政府在印度尼西亚改良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阻止了它的爆发。

在各个地区连续多次发生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其中大多数是无组织的个人行动，但这证明反抗的斗志正在增长。可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未能很好地重建其中央领导，因而荷兰能轻而易举地镇压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人民的反抗。

自从一九三二年以后，从事地下工作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以十八条纲领为其行动的基础，十八条纲领包括：印度尼西亚完全独立，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取消上利辜集中营，保障罢工权利和

示威游行权利，同工同酬，反对各种降低工資的措施，由政府救济失业者，土地归农民并沒收帝国主义者、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土地，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等等。这个綱領是在法西斯分子(国社党人)在德国执政之前制訂的。

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德国法西斯分子在希特勒领导下粉墨登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談到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时說：

“……不仅应当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做是工人阶级軟弱的表現，看做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結果，而且应当把它看做资产阶级軟弱的表現，看做资产阶级已經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統治，因而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現，看做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在和平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找到摆脱現狀的出路，因而不得不采用战争政策的表現。”

換句話說，为了对付深重的經濟危机，为了对付尖銳化的資本主义总危机和更加革命化的劳动人民群众，当权的资产阶级便求助于法西斯主义。

帝国主义者竭力利用法西斯主义把**全部**危机的負担轉嫁到劳动人民肩上。他們奴役弱小民族、加紧殖民压迫和发动新的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力图以此来解决市場問題。他們摧殘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并向世界无产阶级堡垒苏联发动軍事进攻，想以此来阻撓革命力量的成长。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中提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且是兽性的沙文主义。它是一种政治匪帮的政体，是一种

对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的革命成分实行挑畔和迫害的制度。它是中世纪的野蛮行为和兽性行为，它是对于其他民族的肆无忌惮的侵略。”

由于法西斯分子在德国的执政所引起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印度尼西亚政局的影响是重大的。苏联把斗争首先引向建立反对侵略国家的和平统一战线。一九三五年八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一项纲领，目的是建立人民阵线和人民政府，以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这就意味着有必要在共产党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分子之间建立更广泛的合作。

为了传达这个反法西斯的政治路线，慕梭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从国外返回印度尼西亚。慕梭同志不仅仅传达了新的政治路线，同时重新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聚集起来，并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但是，慕梭同志在印度尼西亚不能久留，必须立即再度离开印度尼西亚，因为荷兰政府已经发觉了他的行踪。这样一来，慕梭同志没有机会为党的建设做很多工作，以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在没有强有力的指导方针的条件下建立列宁式的党。

在若干左翼民族主义者和若干共产党人的倡议下，成立了合法的人民组织，**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的成立，给予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以新的力量。在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及其他一些民主政党的建议下，组成了**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这是旨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议会，并向荷兰政府建议共同合作反抗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威胁亚洲人民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各个党派的统一战线。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印度尼西亚政治联

盟在雅加达召开**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非政党性的团体如工会及其他社会团体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代表大会上，議會問題成为首要的議程。代表大会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議會是发动人民力量对付法西斯主义危險的重要条件。后来，該代表大会的領導者决定将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會議**，作为代表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的机构。这是成立議会的准备。但是，荷兰政府对这一事实置之不理。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會議向荷兰提出的共同合作对付日本法西斯侵犯的建議，到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荷兰投降日本为止，荷兰一直不加理睬。

各政党和团体的領導人之間的广泛合作，由于沒有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使爭取成立議會的要求遭到失敗，使逼迫荷兰政府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道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人民运动也遭到失敗。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没有成为一个在群众中生根的能够团结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會議作出的各項決議从未有群众斗争如示威游行或其他斗争来配合，以便对荷兰殖民政府施加有分量的压力。

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反法西斯統一战綫不够强大，所以日本军队能够占领印度尼西亚而沒有遭到抵抗，不仅沒有遭到荷兰军队的抵抗，而且也沒有遭到人民运动的抵抗。人民不論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对反抗日本法西斯都缺乏准备。結果，初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在日本占领初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員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有許多被日本逮捕，有的还被判处死刑。

在日本占领之后的几个月，印度尼西亚人民根据切身的经历才认识到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和兽行。在人民中间，反日情绪越来越普遍，反法西斯的组织在各地建立起来，而且有许多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和干部领导的。当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整天是在日本暗探追缉之下过生活。日本当局对共产党人的追捕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由于组织不严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常常为日本当局所逮捕。但是，即使如此，日本的残暴手段也平息不了人民的反抗。到处发生暴动，如新雅巴那、南安由与三宝壟等地的暴动，而且在保卫祖国军中间也发生了暴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谏义里和勿里达的保卫祖国军的暴动。

关于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前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这样说：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指日本占领之前的。——迪·努·艾地）不仅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也争取了部分的买办资产阶级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后备力量。但是，自从日本军队占领印度尼西亚之后，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可以说整个买办资产阶级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人民抗日力量不怎么样强大，他们也幻想日本将会给印度尼西亚‘独立’，因此，他们便实行同日本合作的政策。”

但是由于反日情绪的高涨，特别是在农民与军队的暴动事件发生之后，日本的走狗对其主子效忠的程度就越来越降低了。最后，有不少高踞要职的人士与地下的反日运动建立了联系。印度尼西亚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反抗日本的斗争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此一切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人民的反日和反荷情绪高涨，虽

然党由于执行坚定的反法西斯政策而享有很高的政治威信，虽然国内外的形势对于发动革命非常有利，但是党面临一九四五年八月爆发革命时，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党沒有把它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关于統一战綫的經驗总结出来，而且在党的建設問題上仍然是沒有經驗的。此外，党也沒有武装斗争的經驗，而这种經驗对于处在革命中的党是非常需要的。

(三)八月革命和反抗第二次白色恐怖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八月革命中所处的情况是这样的：党还没有总结有关統一战綫的經驗，在党的建設方面仍然沒有經驗，在武装斗争方面也沒有經驗。

在群众及其代言人——年輕的革命领导人，其中包括日本占領期間领导地下組織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的推动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告成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独立宣言体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荷兰統治的年代从未熄灭过的而在日本占領期間日益高漲的要求独立的願望。

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农民、进步的青年和学生，看到欧洲許多国家在法西斯軍队被击溃之后从帝国主义統治下解放自己的榜样，并受到中国人民偉大的解放斗争的鼓舞，从而認識到发动一次已为历史所規定的革命的可能性。在独立宣言发表的时候，除了已經遭到失敗的日本軍队以外，在印度尼西亚（西伊里安除外）再沒有其他国家的軍队。印度尼西亚人民正确地利用了这一良好的形势。

工人、农民、进步的青年和学生坚决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他们最初抵抗日本军队，接着抵抗英国军队，在两次殖民战争中又抵抗荷兰军队。

虽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这一斗争使爱国者流了许多鲜血，虽然荷兰帝国主义采取了种种旨在粉碎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但是共和国仍然屹立着。

荷兰雇用了英国和美国顾问，依靠充当其走狗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帮助，经历了长久的过程，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采取阴谋和挑拨的手段，以大炮和炸弹为后盾签定了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协定，这一切充其量也只能削弱共和国。

以苏丹·沙里尔为首的右翼社会党人自革命初期即已控制政权，他们在迎合荷兰以大炮和炸弹为后盾的“和平谈判”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压迫，当时不可能拥有一支充分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学说的队伍。

八月革命是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外国帝国主义是革命集中打击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则给革命以支持。

关于革命时期（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的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这样说：

“当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人民革命力量强大之后，便重新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人民革命的强大力量使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最初几年中采取坚定的态度。”

但是，总结报告接着说：“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软弱使党在当时非常好的客观形势下没有能力进行领导。”

关于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总结报告說：

“在这次革命中，党抛棄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独立性，而且党沒有重視农民工作，这就是革命失敗的基本原因。革命领导方面的軟弱使革命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不断遭到失敗，这些失敗使民族资产阶级动摇起来，并终于投到买办分子和帝国主义者方面去。一九四八年八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決議，是当时处于困境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出路。但是，在这个決議貫徹执行之前，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就进行挑畔，制造了‘茉莉芬事件’。”

一个极其有利的情况是：在革命初期，可以从澳洲和欧洲弄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书籍。但是，这些理論书籍都是外文的，主要是英文和荷文，因此能够学习这些理論书籍的干部非常有限。当时党的领导中掌握实权的人，对于把理論书籍譯成印度尼西亚文的工作，注意非常不够。虽然如此，有了这些理論书籍，自学这些书籍的党的干部中間就有可能产生出党的骨干。虽然人数还不可能很多，但这却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一次有可能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有理論修养的骨干，而这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繼續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在革命时期，党的手里有了一批武装力量，但是不能掌握住这批力量。党的干部非系統地研究了軍事科学与革命战争的科学。在政府中几次担任国防部长的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学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經驗以后，曾为下面这种思想的胜利进行了斗争：游击战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种正确的斗争形式。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那些軍事领导人輕視游击战争的思想。尽管一方面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使他的思想取得

了胜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在贯彻这种思想时却遇到了各种阻碍,因为受到那些轻视游击战争的人的反对,因为缺乏有素养的军事干部,而没有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建设党的政策更增加了他的困难。

当时党在学习中国革命经验中所犯的基本错误之一,就是党仅仅致力于了解中国革命与印度尼西亚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但没有致力于了解其不同点,没有看到印度尼西亚的特殊条件。

根据中国的经验,对于像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来说,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战争根据地并在这些地区组织人民解放军,是争取完全的民族解放的正确斗争形式之一。但是这种斗争形式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像中国那样广泛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它的特殊条件。

最有利于游击战争的条件是,广阔的地区、远离城市与交通线的广阔的山区和森林区。印度尼西亚仅仅具备这些条件的一部分。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解放了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以后,才有了可靠的后方。他们背靠苏联以后,蒋介石再也不能包围中国的革命力量。而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敌人包围的危险以后,就处于可以有计划向蒋介石军队发动进攻的地位。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不具备这些条件。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由许多岛屿组成的国家。人民解放军没有友好的邻国可作依靠。

指出上述的实际情况是否意味着在印度尼西亚就不能进行游击战争呢?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为了使游击战争的方法在印度尼西亚现有的条件下能取得更大的效果,我们应当做的是,把游击战争的方法与敌占城市的工人革命斗争以及经济和政治总罢工斗争

結合起来。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条件下，所有的铁路、公路、航海、航空等交通運輸部門的工人罢工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无产階級在这些部門的总罢工可以大大地削弱革命敌人的力量，这样，就意味着給予游击斗争以有力的援助。在八月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极不重視在荷兰占領区組織工人和领导工人斗争的工作。

除此之外，八月革命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沒有加强在荷兰武装力量中間的工作，在这些武装力量中間有不少是农民和工人的子弟，是可以把他們爭取到革命方面来的。其实在敌人武装力量中間加强革命工作可以大大地削弱敌人的力量，而且这也意味着对游击斗争的重要援助。

因此，八月革命时期的游击战争是可以扩大并巩固起来的，只要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把三种斗争形式結合起来的工作基础上来解决这个問題。这三种斗争形式就是：农村的游击斗争（参加者主要是农民）、荷兰占領的城市中的工人革命斗争和加强在荷兰武装力量中間的工作。

武装斗争的失敗和武装力量內部革命精神的松懈，經常会导致統一战綫和党的建設工作的后退。在反动分子操纵下，若干部分的武装力量起来反对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以后，八月革命失敗的迹象也就显露出来了。

在八月革命快要失敗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八月的會議上，根据慕梭同志的建議，通过了一项名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決議，为当时面对艰难处境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指出出路。

《新道路》的決議提醒党注意在八月革命期間被忽視或完全沒有执行的最重要的任务。

关于統一战綫問題，決議指出，在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忽視了建立民族統一战綫，作为反帝民族革命的武器。虽然后来他們开始認識到民族統一战綫的重要性，但共产党人尚未真正懂得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的方法。三年来建立了几种民族統一战綫，但是始終全都停留在紙面上，只是各团体或领导人之間的协商會議。如果这一民族統一战綫领导人間稍有分歧，这一民族統一战綫就会陷于解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相信，目前工人階級政党不能单独完成这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須同其他党派合作。共产党人必須努力團結其他党派和团体的成員。这种團結唯一的形式就是民族統一战綫。”

关于共产党人在建立民族統一战綫中必須采取主动的問題，決議說：

这种主动性“絕對不是說，共产党人强迫其他党派或个人来参加，相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須耐心地努力使誠实的人們相信：获得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为所有进步的和反帝的人民所支持的民族統一战綫。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須确信，沒有民族統一战綫，胜利就不会到来。”

关于武装斗争問題，《新道路》的決議說，必須特別重視这种斗争。对武装斗争必須給以特別的重視，是因为荷兰帝国主义繼續不断地在加强軍事力量。決議接着又說：

“军队是最重要的国家政权工具，必須特別加以注意。军队是保卫我国民族革命亦即保卫劳动人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工具，对军队的干部与士兵必須給予符合于这种任务的特别教育。军队必須与人民團結并为人民所热爱。军队必須由进步的干部来领导。自然，首先必須把反动的与反革命的分从军队的干部中清洗出

去。”

決議批評了这种态度：忽視給予一般劳动人民（工人和国家公務員），特別是軍隊和国家警察人員以生活保障，以致他們的生活发生困难。

关于党，決議說，共产党人的基本錯誤，在于縮小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这种作用，这就是它是理应掌握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权的唯一的力量。針對这个錯誤，《新道路》決議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决定建議：“三个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目前参加了人民民主陣綫的、并根据共同綱領采取联合行动的政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社会党和印度尼西亚劳工党。——迪·努·艾地），尽速合并成为一个工人階級的政党，这个政党仍沿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个历史性的名称……”

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以苏丹·沙里尔为首的右翼社会党人的反动政策的問題，《新道路》決議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右翼社会党人的政策，犯了两个錯誤：

第一个錯誤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懂得革命学說，即“現代反帝民族革命已經成为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必須与世界上其他反帝力量，即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緊密地联系起来……”

第二个錯誤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沒有充分認識到在苏联神速进入滿洲全境之后，苏联同英美帝国主义之間的力量对比。当时，事情已經很明显，苏联在亚洲大陆上的地位是非常强固的，它牽制着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帝国主义的大量兵力，从而給印度尼西亚人民造成了发动革命的良好机会。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人却过高估計了荷兰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力量，而过低估計了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其他反帝陣营的力量。”

上述決議說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改变政策，坚决要求廢除林牙椰蒂协定和倫維尔协定，这两个协定实际上已成为領導者們和人民大众中間各种混乱的根源。拒絕林牙椰蒂协定和倫維尔协定也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方面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評。

上述決議總結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八月革命中所犯的原則性錯誤，是由于党在思想上的薄弱。因此决定黨員必須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責成每一个共产党人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論，并在工人和农民中間举办訓練班，以使用这种办法使他們能够經常將理論与实践密切联系起来。理論不与群众結合，不能够形成力量；相反地，理論一与群众密切結合，就能够形成极为强大的力量。

这样一来，《新道路》決議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統一战綫、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設等方面更好地进行工作奠定了基础。《新道路》的決議是对党内外机会主义的无情判決。它是拯救正在危險中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重要步驟，是建立列宁式的党的第一个重要的步驟。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新政策使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新高潮有可能到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召开了許多次群众大会来闡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新綱領，参加大会的达数万以至数十万人。群众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的繼續进行独立战争来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号召。当时执政的反动政府和反共的馬斯友美党的假面具开始在群众面前被揭穿。群众开始懂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指出的新道路是贏得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

由于害怕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新高潮，荷兰和美国帝国主义及

充当其走狗的印度尼西亚人加紧活动并确定步骤，企图粉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运动。

一九四八年八月底，在梭罗发生各种挑衅事件，后来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同样事件。革命軍官被用卑怯手段杀害。工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許多办公处为某些部队所强占。右翼社会党人、托派分子和馬斯友美党是帝国主义实行反共政策的积极帮手。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在茉莉芬发生了贊同当时政府的反动和挑衅政策的部队同坚决忠实于革命的部队之間的冲突事件。哈达政府歪曲了事件的真相，捏造說，在茉莉芬发生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共产党人建立苏維埃国家的事件。政府根据这种捏造的借口号召所有的国家工具来追捕和杀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党员和同情者。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白色恐怖，这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荷兰政府白色恐怖的翻版。但是，第二次比第一次更残酷、更凶狠。馬斯友美党党员也被动員来追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除了拿起武器全力为反对猖狂的白色恐怖而实行自卫之外，别无其他道路。

茉莉芬挑衅事件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荷兰发动新的殖民战争的一种准备，而这一切又是迫使印度尼西亚向荷兰帝国主义进一步投降的准备。果然，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不久便实行停战，随后在荷兰举行了圓桌會議。

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的反荷战争期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包括从哈达政府監獄放出或逃出的干部和党员，英勇地站在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前綫。这一事实使人民看清，“茉莉芬事件”期間反动派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誣

蔑多么荒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荷兰军队的英勇抵抗提高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人民中間的政治威信，这就使政府不可能宣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非法。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王国签订了卖国的圓桌會議协定。在談判期間，美国把美尔勒·柯契兰安置在荷兰，作为专门向双方发出指示的人物。

关于茉莉芬挑衅事件之后(一九四八年)至馬斯友美党政府即苏基曼內閣下台(一九五一年)期間的統一战綫的情况，在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說道：

“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反帝民族統一战綫而投到挑起‘茉莉芬事件’的哈达—苏基曼—納席尔政府方面去……。民族资产阶级跟着投降了帝国主义，贊同……卖国的圓桌會議协定。民族资产阶级脱离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使党感到极大困难，这是由于党在农民方面的工作很弱，还不能把农民当作靠山。这种情况迫使党采取这样的策略：爭取時間使民族资产阶级回到反帝民族統一战綫中来，并改善和加强党在农民中間的工作。党的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已为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发展所证明。”

由上述一切所得出的結論是：

八月革命(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已經遭到失敗，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面临这次革命时还没有总结出它在統一战綫問題上的經驗，而且在武装斗争問題和党的建設問題上也沒有經驗。

这次革命虽然失敗了，但是它已經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了統一战綫的經驗。这次革命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供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的重要經驗：在一定情况下，这个阶级能够参加革命并采取坚决的态度站在革命方面；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

它会动摇和叛变。因此，无产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一贯地不断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到革命方面来，但也必须防备他们背叛革命的可能性。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党的前进或后退以及革命的前进或后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党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反过来，党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前进或后退以及革命的前进或后退。

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过程中，党不可以放弃它的独立性，并且不可忽视最可靠的、为数最多的同盟者——农民。

这次革命也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经验，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更加了解印度尼西亚社会情况、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有可能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把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

在革命中，武装斗争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这也是一个经验。党的发展，除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一战线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前进和后退对统一战线和党的前进和后退是有极大影响的。

《新道路》这一决议已经总结了革命时期的经验，虽然还不完整。《新道路》这一决议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的第一个重要的步骤。

“茉莉芬事件”已经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更加警惕和更加具有战斗性。

(四)統一战綫的扩大和党的建設 (一九五一年——……)

这个时期是从拟定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草案的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开始的。这个党章草案发到各下級組織之后，就在党内引起了广泛的討論。沒等到代表大会批准这个党章草案，全党就已一致表示願意用它作为日常党的建設工作的准則，而在試行这个党章草案过程中所取得的实际經驗，可作为修改党章的材料。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草案的討論和試行大大地推动了党的发展，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水平，活跃了党内民主生活，开展了党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强了党的紀律、思想和力量的統一。党开始明确并开始实现它的两项基本任务：建立統一战綫的任务和建設党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在苏基曼(馬斯友美党)反动政府执政时进行的。

因为国外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已經意識到正在成长的人民革命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險，他們已經看到“茉莉芬挑衅事件”显然並沒有能够“扼杀”革命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以他們就瘋狂起来并再度制造阴謀，以图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次不是在梭罗或茉莉芬发动挑衅事件，而是对丹絨不碌的警察派出所进行一次“襲击”，接着苏基曼政府就宣称这是“共产党的襲击”！大約两千名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被逮捕并被关进監獄。但是由于人民的压力，他們坐了几个月監牢以后，全部都被釋放出来，一个人都未能解到法庭去审判。苏基

曼(馬斯友美党)的八月大逮捕的失敗，表明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运动已經重新兴起并且有了力量。

一九五二年初，还在八月大逮捕事件的形势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召开了**全国代表會議**，深入討論对苏基曼政府的政策。代表會議決定必須建立反苏基曼政府的广泛战綫，努力爭取民族資產階級，来推翻苏基曼政府。关于当时在西瓜哇和中爪哇大規模地进行恐怖活动的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集团，代表會議认为，这些集团是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工具，它們企图把人民革命运动箝制在城市和农村的反动力量之間，从而使反动派能够粉碎革命运动并完全控制全国。代表會議決定动员党的全部力量，与国家工具和其他民主政党团体一道，共同粉碎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恐怖分子集团。除此以外，代表會議通过了許多重要決定，来从思想上和組織上加强党。为了使党能够实现当时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代表會議決定发展党员。

由于人民的民主运动連續不断施加的压力，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日益左傾以及国内統治集团間的矛盾的結果，苏基曼政府終於被迫下台。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成立了韦洛坡(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政府，它的政策的进步方面受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在韦洛坡內閣中，也有馬斯友美党人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人担任部长。因为担任部长的馬斯友美党人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人采取了反人民的措施，所以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自己在內，推翻了韦洛坡內閣。在人民更强大的压力之下，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成立了沒有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参加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政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政策的进步方面。

这一个其政策有进步的方面并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所支持的政府的成立，证明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出现了高潮。这表明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力量，在国内外反动力量面前日益团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一定限度内是能够发展的。

在这个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在这次全体會議中提出了党章草案的修正案，起草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草案、向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和关于陈莽如主义的決議。陈莽如主义是党内机会主义派别，他们要把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到《新道路》決議以前的情况。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拟出了将要提交代表大会的各项建議，以解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所有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三月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其目的是解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所有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改善党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解决党的建設的所有基本问题，并密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群众的联系。这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所起草的各项文件。此外，还批准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竞选宣言并决定发展党员和党组织。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在分析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情况之后，确定了目前印度尼西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关于这点，綱領指出：

“如果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还是继续不变，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統治沒有被推翻，封建主义的残余沒有被消灭以前，印度尼西亚

人民就不可能使自己从貧穷、落后、不合理的情况中解放出来，就沒有力量对付帝国主义。当我国的政权仍然掌握在与外国資本密切勾結着的地主和买办的手中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統治和封建殘余就不会被消灭，因为他們要在我国保留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殘余，因为他們最害怕印度尼西亚人民。”

“如果印度尼西亚要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繁荣的和先进的国家，最基本的問題就在于改变封建主和买办的政府，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即人民民主政府。”

关于人民政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說：

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工人階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統一战綫的政府。鉴于我国經濟的落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这一政府不应是无产階級专政的政府，而应是一个人民专政的政府。这一政府不应实现社会主义改革而应实现民主改革。它将是一个能够团結一切反封建和反帝力量、能够将土地无代价地分給农民、能够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政府；它将是一个能够保护民族工商业免受外国竞争、能够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消灭失业的政府。总之，它将是一个能够通过民主与进步的道路来保证民族独立和发展的人民政府。”

但是，摆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的出路和建立人民政府的道路何在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回答道：

“出路在于改变帝国主义者、地主階級、买办资产階級和人民之間的力量对比。出路在于喚醒、动员和組織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群众。”

关于工人階級在改变这一力量对比中的作用，綱領說：

“工人階級必須领导全体人民的斗争。为此目的，工人階級本

身必須提高其积极性,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一支强大的和有觉悟的力量。工人阶级不仅必須为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而进行斗争,而且也必須将自己的任务提高到更广泛的和更高的水平。它必須帮助其他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必須帮助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帮助知识分子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竞争的斗争,帮助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只有当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觉悟的、政治上成熟的、有组织的、并能够领导全体人民的斗争的力量,只有当人民把工人阶级看做是自己的领袖的时候,印度尼西亚人民才能获得胜利。”

根据对印度尼西亚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分清了革命中的真正朋友和真正敌人。同样根据这一分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担负起重要的任务:建立一切革命的民族力量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必須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它必須是最广泛的,而且是在群众革命斗争中产生的。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建立一个人民政府,打败革命敌人即帝国主义者、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条件。

为了建立真正的民族统一战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首要的任务是争取农民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关于这点,在向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說道:

“……为了争取农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当前的任务就是消灭封建残余……农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帮助农民为满足日常需要和部分要求而进行斗争。这样做就意味着组织和教育农民走上更高的斗争阶段。这就是建立工农联盟的根基,而工农联盟则是强

有力的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础。”

关于議會斗争問題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韦洛坡政府及后来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支持問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說道：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它在議會中的工作不是党的主要工作、議會斗争也并不是唯一的斗争形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忽視普选和議會斗争，也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迄今为止的历届政府或对今后在人民民主政府組成前将要执政的政府采取同一的态度。

上述綱領說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策的根据是馬克思主义对于具体情况和力量对比的分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参加并将繼續最积极地参加議會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充分了解它的政治責任，它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議會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过去的历届政府并不是采取一視同仁的态度。在一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政府并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它，在另一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政府，在又一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政府。”

議會斗争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支持，其目的也必須是为了扩大和加强民族統一戰綫。

正如向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所說的，建立統一戰綫的任务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一个紧迫任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个紧迫任务是繼續建設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关于这点，代表大会要我們記住斯大林同志的話：如果我們要

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我們就必须有一个列宁式的革命党。

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那就不可能建立那样的党。只有为先进理論所指导的党，才能起先鋒的作用。只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党才能引导和率領工人階級和其他广大的人民群众。

代表大会还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有不断地同自己队伍中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完成它偉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以此为依据，代表大会同意并批准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委员会會議关于陈舜如主义的決議。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陈舜如主义的专门決議并作出結論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革命时期直到一九五一年年初，陈舜如主义实际上已經在党内占統治地位”。代表大会确认：

“在思想方面，陈舜如主义是主观主义，是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派别，它使党犯了右傾和‘左’傾的錯誤，并大大地破坏了党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代表大会提醒我們說，党取得胜利时，切勿驕傲，党必須經常正視工作中的缺点，党必須敢于承认錯誤并公开而誠懇地改正錯誤。只要党不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只要党不掩盖自己工作上的錯誤和缺点，只要党教导自己的干部从党的工作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并且善于及时改正錯誤，党就将是不可战胜的。

由于印度尼西亚是小資产階級国家，就是說，在这个国家里，小私有經濟为数还是很多，因此小資产階級意識，即主观主义有它牢固的社会基础。因此代表大会确认，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对党是非常重要的。两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对党的危害性是相同的，它們可能使党犯右傾或“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党

只有教育党员利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政治形势和估計階級力量,引导党员去注意調查研究社会和經濟情况,才能反掉主观主义。

为了把广大劳动群众团結在党的周圍,党必須引导党员去关心同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識分子的日常需要有关的細小而繁瑣的实际工作。从事这种工作并不是輕松愉快的,不是沒有困难的。但是,要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并使党不致再成为“左”傾口号的牺牲品,这是唯一的道路。

以上扼要介紹了有关党的建設的决定。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第二个紧迫任务也就清楚了。这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从自己的經驗中学会如何建設党,如何使自己成为列宁式的党。

关于統一战綫問題和一九五一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統一战綫工作,党代表大会已作出如下結論:

“……这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結日益密切,但工农联盟还未强大的时期。換句話說,党仍然沒有建立强固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党必須大力地反对过高估計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而过低估計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的右的偏向。这一危險是拋棄党的独立性的危險,是使自己同资产阶级溶化起来的危險。与此同时,党当然也要大力防止‘左’的偏向,防止宗派主义,这就是不重視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統一战綫的政策,不全力来維護統一战綫的态度。由于买办资产阶级集团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由于目前党的政策首先是針對荷兰帝国主义而不是針對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因此,这就引起了帝国主义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而在投靠帝国主义的买办集团中間自然也产生了同样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參

加的統一戰綫的建立，对于党的发展和建設，对于党的当前工作，即建立反封建的工农联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党的建設和工农联盟的建立是无产階級在民族統一戰綫中掌握領導权的保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悠久的历史，并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針，在党内清算了一九五一年以前的时期。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功，党的无知的旧时期已經肯定永远地結束了，而新的时期，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时期正在发揚光大。

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召开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关于进一步扩大統一戰綫的决定，使这个新时期得到了发展。根据对印度尼西亚政治情况的分析，这次中央委员会會議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成为朋友和敌人都不能忽視的重要而偉大的民族力量。根据对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和政党情况的分析，中央委员会决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須积极努力同其他政党，特别是同各民族主义政党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政党合作。关于这个問題，上述決議說：

“对我们來說，共产党及其群众同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及其群众之間的合作，并不像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领导人所經常說的那樣，只是到将来普选結束时为止。我們希望的是，在普选以后也进行合作，不管将来誰获得胜利都好。我們的这种願望是符合于我們共和国‘異而又同’（有区别，但又一致）的口号的。”

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的决定是有关集体領導方法的：

集体領導“是从思想上組織上巩固党、使党更有战斗性、使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这样的党，一切民族力量更广泛的团結就必将成为现实。”

以上所述清楚地表明,三十五年来,党的建設和布尔什維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綫以及党在解决統一战綫的問題上首先是处理党和民族資产阶级的关系上是否正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反之,党越布尔什維克化,党的政治路綫就越正确,党在解决統一战綫問題上首先是处理党和民族資产阶级的关系上也就越正确。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忠于它英雄的和爱国的历史,学习以印度尼西亚优秀儿女的生命换来的經驗,并以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針,繼續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在目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持不懈地竭尽全力为扩大和加强民族統一战綫而工作。此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将坚持不懈地繼續竭尽全力进行党的建設和使党布尔什維克化的工作,这是民族統一战綫得以維护和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爭取民族統一戰綫在普選中的勝利

開展批評、提高黨的思想水平的任務

這是第一次議會普選前夕，艾地同志於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為了維護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民主原則，艾地同志號召大家防止反動政府的建立，同時爭取民族統一戰綫在普選中的勝利。他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競選宣言明確地提出了修改意見，並指出了黨在各个方面大力開展活動的重要性。他還指出，要使黨的工作獲得成就，其條件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提高黨的思想水平，這樣做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次議會普選的時刻日益逼近了。這就是說，我們臨近了我國人民政治鬥爭的歷史性時刻。將來選舉的結果不是會大大影響我國的政治發展嗎？它將大大地影響印度尼西亞人民為保衛民族獨立、保衛和平、維護民主和鞏固全民族一切力量的團結的鬥爭。

未來的普選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不是這樣，帝國主義者就不會糾合在一起並同我們國內反動派建立“神聖聯盟”借以推翻阿里—阿里芬內閣，從而使普選遭受失敗或至少使普選不能在獲得人民支持的阿里—阿里芬政府執政下舉行。因此，十分明顯，最近阿里—阿里芬內閣倒台〔1〕，不僅是由于國內反動派的力量，

而且也是由于外国策划的政治陰謀造成的。

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表明，一方面存在着重要的迹象，显示人类爭取和平和爭取在各国过幸福生活的斗争已經取得了进展。自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間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召开以来，这种进展表现在下述重要事件上：在万隆成功地召开了亚非會議；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四大国同奥地利簽訂了奥地利恢复独立条約；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尼赫魯总理訪問莫斯科，苏联和印度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苏联邀請阿登納赴莫斯科，以便討論建立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間的外交、經濟和文化关系的問題；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四大国政府首腦會議取得成就；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举行談判。此外，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的成就和在洛桑举行的世界母亲大会的成就也是爭取和平的斗争取得进展的明证。

上述事件表明了全世界人民为保卫和平和各国安全的意志愈来愈坚强；說明了各国可能也必須和平共处的論断是多么正确；說明了苏联是多么真誠地努力緩和國際緊張局势、促使国与国間的关系正常化、防止原子战争、消除发生原子战争的可能性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

亚非會議的举行和成就，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和周恩来的联合声明，印度尼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簽訂关于双重国籍問題的条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間的經濟和文化关系愈益改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参加爭取和平的各种国际會議，签名反对原子战争的人約达三百万，这一切表明，印度尼西亚人民爭取和平、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力量更加强大了。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正直的人們要求和平的善良願望，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抗拒和反对。侵略集团使用各种阴谋詭計阻撓人們要求和平和过安宁生活的願望的實現。他們已經并且繼續竭力把遭到全世界人民譴責的軍事条約，如北大西洋公約、东南亚条約組織等强加給人民。

阿里—阿里芬政府在人民的坚决拥护和推动下，得以拒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加入东南亚条約組織。但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沒有加入，并不等于說参加这一軍事集团的国家就会因此罢休。在印度尼西亚，它們通过另外的途徑来实行东南亚条約組織的方案。东南亚条約組織国家通过各种顛复活动、通过帝国主义者同我們国内反动派建立“神圣联盟”的途徑在印度尼西亚实行他們的方案，它首先是旨在推翻阿里—阿里芬政府，他們认为实现了这一着就为把印度尼西亚拉进东南亚条約組織开辟了道路。这种“神圣联盟”的建立，同一九五五年二月在曼谷举行的东南亚条約組織理事會會議的決議的精神是一致的，在美国的倡議下，該會議公然贊成訓練亚洲人充当特务从事秘密活动的計劃，作为美国在亚洲各国进行日益猖狂的間諜活动的一部分。

但是，东南亚条約組織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的联盟，和它們在其他地方建立的一样，是一种“强盜集团”，由于他們各自企图树立自己的势力，而陷于彼此互相傾軋。这点在阿里—阿里芬內閣倒台后，就看得很清楚了！原来被认为是“神圣”的联盟已經变成爭夺权力的激烈冲突，他們各自都希望自己手下的好汉和打手得胜。“反对派合作”机构虽然已經改名为“組織合作”机构，仍然不能保持一致，他們爭相使自己突出，按照各自的主子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总之，他們除了需要“神圣联盟”来摧毀印度尼西亚

人民的力量之外，彼此還互相爭奪最重要的職位——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職位以便為他們的主子的經濟利益服務鋪平道路。

但是，在印度尼西亞不僅僅存在着外國操縱的各派反動勢力的衝突，而且還存在着從印度尼西亞人民內部產生出來的不斷發展的符合客觀因素的力量，這就是人民在保衛民族獨立、防止戰爭和法西斯主義中團結起來的力量。這一力量是會讓印度尼西亞落到外國傀儡手中去的。當決定由誰掌握政權的時刻快要到來的時候，反動派的“神聖聯盟”就陷於四分五裂，與此相反，人民力量，為了拯救印度尼西亞免於陷入大崩潰的災難，他們就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他們的意志也就更加一致。

由此可見，防止建立反動政府的問題和爭取民族統一戰綫在即將到來的普選中獲得勝利的問題，不僅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對付馬斯友美黨—印度尼西亞社會黨的問題，而且也是印度尼西亞全國人民的問題，是印度尼西亞整個民主力量對付各種外國勢力及其傀儡，對付東南亞條約組織國家及國內反動政黨和反動集團的勢力的問題。

上述情況表明，印度尼西亞人民進一步加強和擴大團結的任務，是多麼合乎客觀實際，是多麼需要，又是多麼必要。只有由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組成統一戰綫，只有這樣的統一戰綫力量才能夠擊敗外國傀儡奪取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的職位的一切陰謀活動。

為什麼民族統一戰綫必將獲得勝利

民族統一戰綫意味着民族獨立、和平、民主、生活改善和人民

的团结。因此，从印度尼西亚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角度来看，民族统一战线在未来普选中取得胜利是需要和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维护和发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民主原则。只有这样，我们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红白旗才能够继续在空中高高地飘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维护红白旗不致被玷污，或被换上其他旗帜。

相反的，如果取得胜利的不是民族统一战线，那么殖民主义者、战争挑拨者、法西斯分子和分裂分子就会进行各种活动来摧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玷污我们的国旗。

印度尼西亚人民将长期不会忘记自一九四八年末到一九五二年苏基曼政府倒台时为止的以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为首的反动派执政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印度尼西亚人民不会忘记一九四八年的内战和大屠杀，不会忘记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罢工禁令、一九五一年八月大逮捕事件、共同安全法战争条约的签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集团的猖狂活动、人民的纸币被剪成两半、不亚于阿里—阿里芬内阁时期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行为，以及其他各种事件。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切，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一切在其他形式下重演。

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也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即获得人民支持的韦洛坡政府成立初期和获得人民支持的阿里—旺梭（后来是阿里—阿里芬）政府时期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取得是依靠了人民的团结和力量。在上述政府执政期间，一般地说和在一定程度上说，民主自由得到了保证；认真地执行了和平政策；宣布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集团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敌人，并全力进行剿灭；对颠覆分子和反民主分子采取了措施；草拟了

廢除印度尼西亞荷蘭聯邦的法令草案(同樣,解決雙重國籍問題的法令草案、地方政府法草案、代替德查蘇馬納罷工禁令的法令草案等也都在草擬中);政府繼續經營北蘇門答臘的油礦;在現有的能力範圍內認真進行把西伊里安收歸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版圖的鬥爭,等等。為了克服圓桌會議協定、破壞活動、官僚主義和貪污行為所造成的更加惡化的經濟狀況,阿里—阿里芬政府努力增加糧食生產,而且開始擴大同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關係。

另一件可喜的事是,在阿里—阿里芬政府期間,人民為保衛民族獨立和制止戰爭的團結也有了發展,這表現在:各個地方建立了合作機構,成立了全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大會,派遣了和平、友好和文化等代表團出國。我們有必要列舉這一切,以便證明黨直到最後的時刻仍維護阿里—阿里芬內閣的政策是正確的,以便使人們了解這一政策受到絕大多數人民擁護的原因是什麼。

黨之所以經常批評阿里—阿里芬政府,是因為這個政府有一些措施還不堅決,以致不能改變財政和經濟方面的惡化狀況,而反民主分子、顛復分子、破壞分子和貪污分子仍然能夠為所欲為。反對派利用政府這些弱點動搖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并把一部分武裝部隊的領導人拉過去。當然,阿里—阿里芬政府的積極方面,反對派是故意不看見的。

總之,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利用若干地方國家機構採取的限制人民運動的措施和政府若干方面不堅決的措施從中取利。相反的,由於政府堅決執行進步的外交政策,反對派從這方面打擊政府的陰謀就不能得逞。對今後執政的民主政府來說,這是一個經驗和教訓。對我們黨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

阿里—阿里芬政府已經在七月二十四日交回了委任书。这个政府倒台，不是由于議會內票数的对比，而是由于議會外的因素，武装部队的因素所造成的。对我们來說，这是一个經驗教訓，反动派到了穷途末路又害怕人民运动的发展，就会无耻地拋棄資產階級民主的旗帜。这就是說他們已經准备从不公开的資產階級专政制度，走向公开的資產階級专政制度，走向法西斯制度。他們想通过实行这种制度把危机所造成的負担全部加在人民身上，因为实行这种制度，就意味着取消人民維護自己的权利以及发表感想、意見和表达願望的权利。他們已經不能够再利用議會制度和旧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来重新执政了，因此就拋棄了民主的旗帜。他們的声明就十分露骨地表現了这点，在声明中，他們渴望建立不向議會負責的政府，渴望建立在刺刀“批准”下的政府。

对反动派力图建立不向議會負責的政府，我們党和我国所有民主力量如何答复呢？我們的回答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道的全体劳动人民只同意建立向議會負責的政府，同时根据現有的力量对比，努力爭取建立比阿里—阿里芬政府更好的政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沒有反对过更換政府，只要接替的政府是更好的。对阿里—阿里芬政府的更換也是如此。根据一九四八年底以来的經驗，比阿里—阿里芬政府更好的政府不可能是由反民主的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領導的政府。

我們之所以維護議會民主制度，不仅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比公开的資產階級专政制度更好，而且也因为这种制度同人民群众爭取日常利益和实现部分要求的斗争直接有关。正因为这样，共产党人必須把自己的政治态度向群众解釋清楚。已經有許多例子证

明我国人民群众也能够利用議會作为一种斗争形式，以爭取他們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如果建立起不向議會負責和不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政府的話，这种斗争形式就会被取消。

从上述实际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党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是什么。第一，防止建立反动政府和努力爭取建立比阿里—阿里芬政府更好的政府。我們所說的目前形势下“更好的政府”，就是指由更进步和更能干的人組成的像阿里—阿里芬政府那样的政府，俾能保证实行政府民主綱領。第二，爭取民族統一戰綫在未来的普选中贏得胜利，为建立一个一切民主力量坚决拥护的民族联合政府准备条件。

只有实行上述任务，我們才能够維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民主原則。这就是保卫我們民族独立、維護和平、維護民主和巩固团結的任务。这个任务符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也符合目前情况下我們党的綱領。

我們修改竞选宣言的原因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結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紧接着未来普选結束后的时期的政治任务，深入地討論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竞选宣言。六月二十四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公布了它的题为《**通过即将到来的普选成立民族联合政府**》的決議。

政治局上述決議明确地指出，“**民族联合政府不是人民专政的政府**”，还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要求的民族联合政府的綱領，不是人民民主綱領，而是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要求基本上一样的綱領。**”

上述決議，可能引起这样的問題：“这个決議是不是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決議有抵触？”“难道这不是意味着我們后退嗎？”“我們在普选中的口号是什么？”和“怎样看待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竞选宣言？”

我們知道，一九五四年三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些文件，其中有一篇就是竞选宣言。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这一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为依据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決議加速了党的发展。这一点，从党员和党组织的发展，从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和政治威信的提高，都可以看出来。

关于“这个決議是不是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決議有抵触？”的問題，对于这个問題的回答是：既是也不是。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政治局決議同代表大会通过的竞选宣言有矛盾，从这个意义上來說，可以被看作是有抵触的。但是，这个決議是符合代表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的，从这个意义上來說，它不仅沒有抵触，而且是符合代表大会的決議的。

說六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決議是符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这有什么证据呢？它的证据就在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清楚地指出：

“人民民主政府将是一个与过去的历届政府不同的完全新的政府”，“出路在于改变帝国主义者、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間的力量对比。出路在于喚醒、动员和组织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群众。”

綱領还指出：“只有一个建立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

聯盟為基礎的、并經過最廣泛的人民運動和群眾的革命鬥爭而建立起來的民族統一戰綫，才有可能使印度尼西亞人民建立一個將執行人民民主綱領并引導人民走向勝利的人民民主政府。”

因此，建立人民民主政府需要什么條件就十分清楚了，而這些條件我們還必須繼續創造。

關於議會鬥爭，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說明：

“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和其他國家人民的鬥爭歷史，都同樣地證明了要達到建立人民民主政府的目的，僅僅依靠議會鬥爭是不夠的。”同時指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認為它在議會中的工作不是黨的主要工作，議會鬥爭也並不是唯一的鬥爭形式”，雖然“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已經參加并將繼續最積極地參加議會鬥爭”。

由此可見，六月二十四日政治局的決議并不違反代表大會的決議，相反的，它正是改正了違反黨的綱領的競選宣言。

我想，我們有些同志要問：競選宣言是代表大會通過的，難道這樣做事先不需要經過代表大會討論嗎？我認為，必須把這個問題提交下一次代表大會，這是肯定了的。但是，如果代表大會的某一項決議從理論上和實際生活上看都是錯誤的，尤其是它顯然是違背黨的綱領的，而黨的領導却長期置之不理，留待下一次代表大會解決，這是不正確的。

關於“難道這不是意味着我們后退嗎？”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在這裡不存在后退的問題，而是改正錯誤的問題，每一項改正錯誤的工作都意味着前進。不錯，但是同我們在競選宣言中向人民許下的諾言比起來，我們這樣修改還不是后退嗎？當然，人民民主政府比民族聯合政府更加能夠保證人民的利益。但是，

当我们面临普选时，应该提出普选后就可能立即实行的纲领，同时我们也并不停止宣传，说我们的目标比这还要远大。我们的任务是，在说明我们党的纲领同民族联合政府的纲领的共同点的同时，说明这两者的区别，即党的纲领更能保证广大人民的利益。

关于“我们在普选中的口号是什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必须使我们在未来普选中的口号符合民族联合政府的纲领。这样一来，我们在普选中的口号就是具体的行动口号。因此，这些口号将变成唤醒、动员群众和把群众组织到党的周围的力量。

关于“怎样看待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竞选宣言？”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六月二十四日政治局的决议公布之后，这个竞选宣言就不再作为未来普选的竞选宣言了。但是，是否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这个竞选宣言没有其他用处呢？这一份文件可以当作向新党员说明人民民主制度的材料，因为它写得比较通俗又带有论战的性质。

对各级党委会和党组在讨论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决议时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就是如此。

此外，在这里必须指出，如果我们研究了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次中央全会的决议不是根据竞选宣言的精神，而是根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最主要文件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精神。这就表明了，我们党实际上感觉到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错误”已经相当久了，但是，却没有立即加以讨论、系统地予以阐明，并作出决议。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不是以竞选宣言的精神为依据，

这一点可以从这次會議的报告里看出来。报告說：“共产党及其群众同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及其群众之間的合作，并不像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领导人所經常說的那樣，只是到将来普选結束时为止。我們希望的是，在普选以后也进行合作，不管将来誰获得胜利都好。我們的这种願望是符合于我們共和国‘異而又同’（有区别，但又一致）的口号的。”

在我們表示到普选后也还要同“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教政党及其群众”合作这一願望时，大家可以想像到，我們所指的是哪些政党。

因此，我們必須修改竞选宣言的原因現在就十分清楚了。中央政治局通过六月二十四日的決議这一措施已經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決議中的一个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決議变为符合客观实际的決議了。因为它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所以一定会进一步推进党的工作。这个決議除了大大有助于党团結全民族的力量之外，还引起了党的干部討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論的高度的积极性。因此，政治局这个決議絲毫沒有削弱党，而是正好相反。执行和討論这个決議，除了可以巩固統一戰綫之外，还会加深党对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認識，提高党的思想水平，提高党的領導在党员和人民中的威信。

有一小撮托派分子說：“看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不断犯錯誤，現在自己又改正自己了！”他們沒有意識到，这一句話就等于說共产党人是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确，我們共产党人从未停止，将来也不会停止改造自己，因為我們要求工作越做越好。要做到这一点，条件就是要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这是共产党人和托派分子之間的重要区别之一。

在党的工作各个方面大力开展活动

正如上面所說的，为了爭取民族統一战綫在未来普选中贏得胜利，我們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成立反动政府。

防止成立反动政府的任务，同爭取民族統一战綫在未来普选中贏得胜利的任务是一致的，而且是分不开的。如果普选能在不是反动的政府执政下举行，民族統一战綫的胜利就会更有保证。反动政府不仅会設法推迟普选，不仅会推翻以民主方式組成的各級选举委员会，而且还会干出各种反民主勾当以击败民主集团。

如果有人以为，成立反动政府只是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害，而对民族主义政党、伊斯兰教政党及其他維護民主原則的政党无害的話，那就錯了。反动政府的确会把它的主要打击锋芒針对它們最害怕的民主堡垒——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但是，这只不过是粉碎其他民主堡垒的开端而已。由此可見，整个民主力量积极防止成立反动政府并积极爭取組成一个比阿里—阿里芬政府更好的政府，它的組成成員更好并且在执行进步綱領方面更坚决的政府，是多么符合客观实际，多么合理的事。

只有党大力开展各个方面的活动，大力开展組織和动員群众、巩固党的組織和提高思想水平方面的活动，防止反动政府的成立和爭取民族統一战綫在普选中贏得胜利的工作，才有可能完成。消极疲塌正合法西斯主义的口味。必須用大力开展活动、增加勇气和提高警惕来防止和反对法西斯主义。

在任何情况下，我們必須坚持这样的看法：正确地确定我們前途的决定因素是我們的工作，即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支持我們提出

的維護民族獨立、民主、爭取和平和改善日常生活的綱領的工作。只有群眾自己行動起來，才能使他們參加這個鬥爭，這是使他們相信這個綱領的正確性的條件。因此，我們必須正確地制定和實現一定的具體要求，並且開展與廣大群眾的利益有關的和得到群眾支持的鬥爭。

反動派不斷地設法利用各種集會、報紙和小冊子使人民對團結漠不關心，反動派還譏笑為爭取團結而作出的任何努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就是向人民指出並使他們相信，團結是可能的，是能夠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列舉印度尼西亞人民鬥爭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和目前現實生活中的團結的範例，借以證明不分宗教信仰、政治主張、民族和社會地位而團結起來反對貧困和不平等現象，是必要的，可能的，是能夠實現的。

我們必須向人民指出我們已經擁有的團結形式，即各種大規模的群眾組織以及過去和現在我們黨同民族主義政黨、伊斯蘭教政黨及其他民主政黨的合作。馬斯友美黨—印度尼西亞社會黨的領導人時常說，由於宗教、思想意識、政治、民族和社會地位的不同，人民是不能團結的；我們必須使人民深刻地認識和体会到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危害性很大的。正是因為有上述的不同，所以才會產生如何使人民團結起來的問題，而提出這個問題是由於抱着這樣的信念，團結問題是一個客觀需要和必然的問題。

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團結問題不僅僅是對於美好的目標用紙寫一寫或口說一說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團結是一種需要，是一種工作方法和鬥爭方法。我們深信，為了實現團結，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是對團結的必要性的認識，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夠大大增強群眾的力量和本領以反抗敵人和擊敗敵人。

使群众能够团结起来的共同点是很多的，如：过低的工资、资方蛮横的态度、高利贷、重得要命的地租、物价高涨、由于战争而遭到无谓死亡的威胁、恐怖集团的威胁、对民主权利的箝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有害的条例，以及其他等等。我们就是在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上来建立群众的团结的。

现在反动派分裂民族团结最常用的武器就是宗教，似乎共产党人在世界上存在的目的就是破坏宗教和妨碍信仰宗教的自由。其实，这种诬蔑的伎俩只是襲用荷兰殖民主义者和日本法西斯过去的手法，所以人民很容易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机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把这类诬蔑驳斥得体无完肤，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以为这类诬蔑“无所谓”，那就大错了。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大力加强活动，用我们日常的行动来回答和证明：共产党人并没有进行反对宗教的斗争，我们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改善日常生活的纲领并没有向任何宗教挑战的意思。

我们必须使群众确立这样的认识，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打的不是宗教而是“反共”的旗帜，我们竭尽全力反对这些政党的反民主政策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反共”政策是实现人民团结的最大障碍，“反共”政策实际上是为了阻挠和摧毁整个爱国民主力量。

许多国家发生的事件和我国的经验都证明，即使在共产党被取缔及其领导人被投入监狱或杀害之后，“反共”政策也没有停止过。随着“反共”政策而来的，必然会采取粉碎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政策。没有参加共产党的正直的爱国者和民主人士，也给加上“共产党”的罪名而加以逮捕。在荷兰殖民统治时代，没有参加共

产党的印度尼西亚独立战士不就是給加上“共产党”的罪名而被捕和被放逐嗎？这些事实不仅表明共产党人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光荣地位，而且表明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或任何方面的“反共”政策反而会为民主战綫的建立創造条件，除此之外，别的后果是不会有的。現在就要取决于我們党到底有多大能力向群众和向民主政党的领导人說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真理，这是发动民主力量的条件。

反动派經常用來分裂民族团結的另一种武器，就是造謠誣蔑，他們誣蔑說，似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不是民族的一部分，似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外国，受“北京”和“莫斯科”控制的。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和我們国内的反动派很明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很密切，因此它是最重要的民族力量。正因为他們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們要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其他民族力量分离开来，因而使民族力量变得軟弱无力。我們必須向人民证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我們本国形势中客观存在的因素，通过这个途徑來同这种制造分裂的造謠誣蔑作斗争。我們必須用合情合理的言論和日常的行动來证明这一点。

我們党的政治路綫的正确性、我們党的日常活动和我們党对群众的领导都将证明，这些造謠誣蔑的家伙实际上正是代表外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的。人民会清楚地看到，“莫斯科”（苏联）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沒有必要在印度尼西亚扶植什么“代理人”或“买办”，因为这两个国家沒有需要控制其他国家的經濟，也沒有必要控制印度尼西亚的經濟。但是，正是那些未曾受过造謠誣蔑的家伙攻击的、在印度尼西亚拥有大量投资的荷兰、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者，才需要在印度尼西亚扶植代理人或买办。这些

代理人或买办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分裂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力量。群众会从这些事实和他们亲身的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给共产党人加上“外国代理人”的罪名，实际上只不过是為了掩飾这些造謠誣蔑的家伙自己的行徑。

再說一次，我們的任务就是使群众确立这样的認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我們本国形势中客观存在的因素。我們党斗争的历史是一部英勇爱国的历史，这一事实将大大有助于我們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我們在大力开展組織和动員群众的活动的工作的同时，忽視巩固組織和提高思想的工作的話，那么这个工作就不可能很好进行。关于这方面的任务，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通过的決議已作了明确的規定。我想借这个机会只着重談談几个問題。

关于組織問題。在我們成功地发展了党员和党的組織之后，最重要的是要使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和每一个党的組織成为党的決議的积极的执行者。要做到这样，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在一切党委会、党组和党小组中实行集体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必須特別注意使党小组活跃起来的問題以及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問題。我們党是否能够从目前这样一个强大的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組織、一个强大的党，在这个党内每一个党员和党组都是党的政策和其他決議的积极执行者，这个問題能否解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使党小组活跃起来的問題。这是使我们党成为人民运动以至群众团体的基层組織的骨干的条件。

在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我們強調了集体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我們的經驗表明，只有同时开展批評討論，集体的工

作方法才有重大的意义。正如上面所說的，要使我們越来越好，其条件就是要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要发展工人階級的党，要发展人民运动，就必须开展批評。对于每一个批評，我們都必须說一声：“欢迎”。因此，我們必须互相批評。这不仅证明我們是强大的，而且也证明我們还想要更加强大，因为通过批評，我們进行工作和斗争的本領也就更大。在党内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人民就会更加信任我們，因为他們知道党的領導人是真心誠意的，这些領導人认真地研究所有的問題，并且从全体人民的需要和任务出发，寻找解决的办法。

党在帮助农民为爭取日常生活需要、为实现他們的部分要求的斗争方面还存在着的巨大的弱点，我們对此不可以熟視无睹。党在工人、知識分子和人民内部其他階級、阶层方面的工作也是这样。党在爭取和平和維護人民的民主自由的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在同其他政党和团体合作方面，我們的干部除了容易“給融化掉”之外，还經常表現机械生硬。

我們还經常看到，党的干部像机器似地、不用全部精神和热情来进行工作。像机器似地、不用全部精神和热情来工作，这除了把官僚主义作風帶到党的机关、群众团体的机关和使党的各級負責人染上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風外，别的結果是不会有。这样进行工作是不可能有效果的，而这样进行工作的干部不可能是創造性的。

我們必须善于发现我們自己的每一个錯誤和缺点，把錯誤和缺点弄清楚，并加以糾正。我們是在集体組織中这样做，在集体組織中展开批評討論。但是，光是这样当然还不够。要发现錯誤和缺点，我們就要有广泛的理論知識、政治才干和組織能力。只有当

我們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知道应当如何进行工作的时候，才可能做到这点。这首先是对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干部來說的。我們必須更多地閱讀、学习和討論。为着这一方面的需要，党已經出版了日报、小册子和其他出版物。

我們反对教条主义。因此，对党的每一个政治主張和工作結果必須进行深入的集体討論。所有的共产党人必須这样做，大家都可以并且必須参加有关党的決議、決議的执行情况和工作結果的討論。这是党始終积极、对它所进行的工作始終具有明确的認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这样，党才有能力完成它所担負的任务。

批判竞选宣言的討論会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說明展开批評討論能够使党更团结和更坚强，因为在討論中就把我們的实际經驗同經典著作里的理論結合起来。从这些討論会中，我們深深地感到，党的团结决定性的基础就在于思想意識的純洁性和对我們的学說的基本原理的認識，这也就是我們政治路綫的依据和确定工作的执行方針的依据。

由此可見，只有我們不断地开展批評和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爭取統一战綫在未来普选中贏得胜利和貫徹党的其他決議的工作才有可能实现。無論党处在什么情况下，这一点必須作为我們的方針。这是加强党的紀律性和保持党内紧密的共产主义团结的条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这样，在党和群众处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更是这样。

維護和巩固統一戰綫的勝利

這篇文章是艾地同志對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議會選舉初步計算結果的分析，這次選舉是以統一戰綫的勝利和馬斯友美黨—印度尼西亞社會黨聯盟的失敗而結束的。艾地同志在分析中，對第一次普選作了正確的評價，並指出，印度尼西亞人民的任務是通過建立一個執行反殖民主義政策的、尊重民主權利的、得到一切民族力量擁護的民族聯合政府來維護和巩固統一戰綫的勝利。

根據報紙公布的統計數字，特別是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的數字，人們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經過九月二十九日進行的議會選舉，將會出現四大政黨，即印度尼西亞民族黨、伊斯蘭教師聯合會、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馬斯友美黨。而且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爪哇島，馬斯友美黨取得第四位，就印度尼西亞全國來說，印度尼西亞民族黨很有可能取得第一位。

許久以來成為馬斯友美黨最親密的伙伴的印度尼西亞社會黨，遭到了慘敗，因此今後馬斯友美黨—印度尼西亞社會黨聯盟將會變成軟弱無力的聯盟。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伊斯蘭教師聯合會這兩個臨時議會中的小黨，通過這次選舉成為大黨了。

根據以上的事實，已有可能就最近的議會選舉的初步計算結果進行分析。

普选的进行情况证实了人民的組織能力和共和国武装部队維持治安的能力

最近举行的議會选举，尽管有很多障碍，但一般說来，它进行得还是順利的。从这个事实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組織能力已經达到了比較先进的水平。人民的这种組織能力出乎国内反动派和国外帝国主义者的意料。他們当初幻想，各級选举委员会沒有能力，普选可能引起混乱，这些幻想已經破灭。各阶层人民的这种組織能力，对組織今后各項建設工作和其他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最近举行的普选也显示了国家工具的能力，特别是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力量，并且表明了由人民团体产生的各級选举委员会同国家工具合作的可能性是多么大。共和国武装部队在維持普选的治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下于他們在过去反对荷兰殖民侵略的斗争中所建立的英雄业绩。

在保卫普选的成果方面，共和国武装部队也是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的，尤其是考虑到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对这次議會普选的结果是很不高兴的，那么情况則更是这样。

我們大家除了應該向各党的选民表示謝意以外，还應該向共和国武装部队致敬。

民主党派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最近举行的議會选举的目的，不外是为了爭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胜利，为了击败馬

斯友美黨—印度尼西亞社會黨的反團結、反民主和反共的聯盟。扼要地說，就是為了爭取反殖民主義統一戰綫的勝利。這一點可以從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競選活動和競選綱領中所提出的口號中清楚地看到。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目的是爭取民主黨派的勝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鞏固和擴大反殖民主義的民族團結、為制止伊斯蘭教國運動—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軍集團的恐怖活動、為保衛和發展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民主原則、為改善國家經濟狀況和改善人民生活以及為保衛世界和平開辟寬廣的道路。

印度尼西亞人民在最近舉行的普選中是不是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呢？是的，印度尼西亞人民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奉行團結政策和民族民主政策的黨派擊敗了反團結、反民主和反共的馬斯友美黨—印度尼西亞社會黨聯盟。

與馬斯友美黨—印度尼西亞社會黨不同，一切民主黨派，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印度尼西亞民族黨、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聯盟黨和伊斯蘭教師聯合會，在他們的競選演說中強調民族團結，強調各黨派和各階層之間實行合作的重要性，強調恢復治安和反對荷蘭殖民主義的重要性，強調保衛共和國民主原則和世界各國之間實行互利的合作的重要性。馬斯友美黨—印度尼西亞社會黨領導人則完全相反，他們的演說著重於挑起人民之間的衝突和敵對，旨在慫恿伊斯蘭教國運動—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軍恐怖集團，而不觸犯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馬斯友美黨人領導的“反共陣綫”和“反平民陣綫”的存在，說明他們沒有容忍的精神和對民主的無知。

印度尼西亞人民也像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具有忍讓的精神，

热爱团结，应该享有民主权利。因此，最近的选举结果表明，絕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拒絕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政策以及它們的做法。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盟所以被那些遭到它們仇視并且在这次議會选举竞选期間受到它們全力攻击的党派彻底打败，基本原因就在这里。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胜利說明 伊斯兰教影响的群众傾向民主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胜利，确实是非常引人注意的。其实这是自然的。因为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已有数世紀的傳統，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本身也有数十年的傳統。但是，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胜利并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傳統。

我們經常听到人們說，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在宗教問題上“保守”、“不够民主”或者是“不够現代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干预这些問題。但是，明显的是，在政治問題上，特别是在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在这次議會选举竞选期間所发表的演說中，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表现了容忍的精神，表示願意实现民主，执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的政策。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在参加阿里—阿里芬內閣期間，也表现了具有实现民主和执行民族的政策的心愿。这种政策，比起馬斯友美党的好仇視、煽动人民互相敌对的反团结的政策、反民主和反民族的政策，无疑地更符合伊斯兰教的群众的心愿。

有人认为，馬斯友美党影响下的伊斯兰教的群众轉向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这件事，证明伊斯兰教的群众更加保守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在阿里—阿里芬內閣时期所采取的

政策，以及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在竞选演說中所提出的政策，完全不是保守的政策；相反地，是表明伊斯兰教师联合会願意同各民主党派合作，也願意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合作，自然，这种合作是以不損害伊斯兰教的利益为条件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政治問題上，我們看到，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要比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民主而且更有民族性，因此，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得到大量的选票这一事实，证明伊斯兰教徒群众是傾向民主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把伊斯兰教同印度尼西亚的特点結合起来的作法和它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比馬斯友美党在宗教方面的“現代主义”和該党适应外国壟断資本利益的政策，更能够吸引伊斯兰教的群众。

只要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能够执行它在阿里—阿里芬內閣时期已經实行的、在竞选中它的领导人提出的反殖民主义的团结的政策和民族的、民主的政策，尤其是如果它能够对利用伊斯兰教作掩护的恐怖集团采取明确的态度，那么，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就会成为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和最大的伊斯兰教政党。

同样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和白尔蒂伊斯兰教党只要能够忠于它們的傳統和民主、进步的政策，那么，它們作为伊斯兰教政党将来也会取得重大的进展。

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胜利证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殖民主义精神是强烈的

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在竞选中利用“反貪污”和“反对特別許可证”的口号企图打倒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这种企图

沒有得逞。印度尼西亚人民充分懂得，上述口号完全不是为了消灭贪污，而更多地是为了掩盖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维护外国壟断資本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恐怖集团的事实。

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是至今存在的最老的民族主义政党，就它的傳統來說，它是反对殖民主义的。經驗表明，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认为，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它必須同一切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党派（包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行合作。一直到最近，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仍旧保持它的反殖民主义的性质，阿里—阿里芬內閣时期的反殖民主义政策就是证明，万隆亚非會議的召开，更证明了这一点。亚非會議制定了反殖民主义政策、和平政策和亚非各国之間互利合作的政策。

在阿里—阿里芬內閣时期，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表明，它的政策同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政策有着重大的差别。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在这次議會选举中所以能够成为最大的政党，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只要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忠于民主和反殖民主义傳統，坚决执行在万隆亚非會議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能够清除自己队伍中的贪污分子，那么，它今后就会繼續是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政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民族团結政策的胜利，而且也证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劳动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有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但是其中有二

十年（一九二六——一九四五年）的時間，它因為被殖民政府宣布為非法而被迫從事地下活動；近一些年來，特別是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五一年，它經常遭到反動政府的嚴重打擊，但是這次議會選舉結果，它卻一躍而成為大黨之一。這是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黨員和幹部忠於他們的理想，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綫，由於它忠實和真誠地保衛勞動人民羣眾的日常利益，並且不斷地為勞動人民的團結和全民族的團結而進行鬥爭。

為了參加這次議會選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曾提出具體的綱領，將來參加新議會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就要為實現這一綱領而奮鬥。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希望羣眾監督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看他們在為實現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競選中向羣眾提出的綱領而進行鬥爭方面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爪哇許多城市和爪哇、蘇門答臘工人集中的地區獲得了大量的選票，這證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工人羣眾有着密切的聯繫。與此同時，在農民和婦女中間的工作，特別是東爪哇和中爪哇以外的地區的農民和婦女的工作，必須引起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充分和認真的注意。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所執行的反殖民主義政策、和平政策、保衛和發展共和國的民主原則的政策和民族團結的政策，不僅能夠爭取幾百萬工人和農民來選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而且還爭取到國家公務人員、知識分子、藝術家、軍隊和警察等方面的選民來選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失敗 意味着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失敗

不論是歐洲或是美國的帝國主義報紙都毫不隱諱，他們對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聯盟的失敗感到傷心和失望。他們的好漢，即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沒有在新的議會中得到多数的席位，這是出乎它們意料之外的。這兩個党失敗的消息傳出以後，在印度尼西亚經營的外國壟斷企业的股票價格急遽下跌。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戰爭聯盟的国家已經對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聯盟的失敗表示失望。

根據以上的事實，毫無疑問地可以肯定，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確實是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的外國壟斷資本的利益。外國帝國主義者所表示的憤怒和失望的情緒進一步揭開了這長久以來遮掩着這兩個政党的帷幕。

這樣，人們就清楚地知道，在最近的議會選舉中幫助馬斯友美党的伊斯蘭教國運動—印度尼西亚伊斯蘭教軍集團究竟是扮演什麼样的角色，而且也更清楚地知道，執行破產的經濟政策的蘇米特羅(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究竟是扮演什麼样的角色。

更令人信服的是，最近的議會選舉的結果是以帝國主義者的失敗而告終，目前臨時議會中的買辦階層如哈蔡林派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和民主派議會党團⁽¹⁾都落選了。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右翼社会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人的失敗並不意味着他們在印度尼西亚政治舞台上就立刻不起作用了。他們通過在新的議會中所得到的少數席位，依靠他們進行各種陰

謀和威脅的“專長”，將繼續在幕後操縱馬斯友美黨，混進其他黨派和武裝部隊中去，分裂工人運動和人民的團結。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馬斯友美黨進行“反對共產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的勾當時還非常需要右翼社會黨人這種“專長”的幫助。

新議會成立後需要建立什麼樣的政府

在種種跡象表明馬斯友美黨不會再是第一大黨以後，馬斯友美黨的領導人不是糾正他們不受人歡迎的反民主和反團結的政策。相反地，在駐雅加達的某些外國使館的唆使下，在快要完蛋的右翼社會黨人的慫恿下，馬斯友美黨的領導人野心勃勃地繼續執行他們的反動政策，現在他們提出了“建立伊斯蘭教集團的統治”或者是“建立宗教集團的統治”等口號。他們仿效荷蘭殖民主義者和美國帝國主義者，試圖用“共產主義危險”來嚇唬他們周圍的人。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證明他們已經建立和正在建立的反動集團是正確的。

他們並不是不知道，他們繼續這樣做的結果將會造成“宗教戰爭”或“內戰”的形勢。正是由於他們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積極進行這種活動，因為印度尼西亞局勢的混亂，將直接有助於荷蘭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對印度尼西亞進行干涉。假如出現了這樣的干涉，他們希望能在印度尼西亞政治舞台上重新擔任主要的角色，重新恢復右翼社會黨人的地位。

他們提出“建立伊斯蘭教集團的統治”或者是“建立宗教集團的統治”的口號，借口是為了“防止共產主義危險”，為了在未來的制憲議會會議中制訂“伊斯蘭教憲法”。他們企圖拉攏伊斯蘭教政

党和其他宗教党派的领导人，跟他们一道来宣布共产党人与平民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为“異端”，并加强他們的“反共陣綫”和“反平民陣綫”。

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这种制造各种集团的活动，危害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民主原則，危害到建国五原則，而且是和我們共和国的“異而又同”的口号相抵触的。

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的反民主、反团結和反民族的政策，只有反殖民主义的团結政策以及保卫和发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民主原則的政策能击败它。对于这种政策，現在已經到处有人提出問題：新的議會成立之后，最好建立什么样的政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主要的敌人是荷兰殖民主义在經濟、政治、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殘余势力。为了全部消灭荷兰殖民主义这种殘余势力，必須团結全国的力量。为了这个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来沒有拒絕同任何党派合作，也从来沒有拒絕同馬斯友美党合作。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以便动員全民族的力量来打击荷兰殖民主义，所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最好成立这样的政府：

由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领导的，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党及其他党派和阶层参加的，实行阿里—阿里芬內閣的反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联合政府。有了这种联合，政府实际上就沒有反对派，整个民族力量就可以用来反对国外的敌人和进行国内的建設。

如果目前取得胜利的民主党派繼續忠于他們在这次議會选举

的竞选演說中所說的一切，那末在新議會成立后建立的政府，它所采取的措施一定会比过去的阿里—阿里芬內閣更进步、更坚决。这是可能的，而且應該努力促其实现。

維護和巩固統一戰綫的胜利！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日于雅加达

保卫一九四五年宣告 成立的共和国！

这是艾地同志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上的講話。这个講話总结了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議會普选的重要經驗，同时指出了党的任务就是巩固党和統一战綫在这次普选中的胜利，作为爭取党和統一战綫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制宪議會选举中取得胜利的步驟。为爭取党和統一战綫在制宪議會选举中的胜利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为保卫一九四五年宣告成立的共和国的斗争。

同志們！中央政治局这次會議是一次特別會議。中央政治局前一次會議決定，如果情况允許的話，我們應該召开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來討論九月二十九日議會选举的結果这样一項重要的政治事件，并作出政治上正确的估价。但是，我們一致認為，由于选举制宪議会的投票日期（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已經很逼近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正在忙着領導省委員會或相当省一級的委員會，因此我們沒有可能召开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为了完成不可能召开的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的政治任务，才召开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而在雅加达的中央委員會委員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也参加了这次會議，这就是我們这次會議之所以特別的地方。

各地关于党在議會选举期間組織和動員群众的經驗的報告，

大部分已經送交中央委员会書記处。中央委员会書記处同党中央选举委员会和若干省委会的代表們一起討論了这些报告，作了总结，并且根据总结制定了爭取党在即将举行的制宪議會选举中取得胜利的新指示。

关于选举的结果，同志們都知道，我們党已經成为四大政党之一了（其他三个政党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馬斯友美党）。尽管計票工作还没有結束，現在已經可以肯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沒有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就在爪哇和苏門答腊击败了馬斯友美党，这两个地方是我国两个最重要的大島，居民占我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在八千万人口中占六千三百万），选民占已登記选民总数百分之八十（在四千三百一十万零四千四百六十四名选民中占三千五百九十九万四千八百六十七名）。我們党在印度尼西亚全国名列第四，这是由于我們党在爪哇和苏門答腊以外的地区的发展，只不过是最近的事。虽然，事实上我們党的組織已經遍布全国，連加里曼丹內地、努沙登加拉和馬魯古的小島也都有我們党的組織，但是这些地方的居民大概最近几个月才第一次看到我們党的标志。

簡單地說，議會选举的结果，进一步加强了我們党在議會內外的地位。我們党在議會中的席位将增加一倍以上（目前在临时議會中拥有十七个席位）。全国各地的占有有效选票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六百多万选民投錘子镰刀的票，这一事实是对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奇談怪論的最好回答。据他們說，印度尼西亚不是共产党的肥沃土壤，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大多数信仰宗教”，或者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深受傳統习惯的束縛”。我們肯定，他們并不相信他們自己編造出来的奇談怪論，因为他們也知道，沙皇时期的

俄国人民和蒋介石时期的中国人民也是信仰宗教和受傳統习惯束縛的，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觉醒了，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們散布这种奇談怪論只是为了誣蔑，好像共产党人就是“宗教的破坏者”和“傳統习惯的破坏者”。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选举中所得的票数表明，对于那些掠夺石油、橡胶、錫、咖啡及其他农产品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血汗果实的人的奇談怪論，印度尼西亚人民已經开始采取批判的态度了。

統一战綫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表明，印度尼西亚不仅是动植物的肥沃土壤，也是独立、和平、民主和团结等美好理想的肥沃土壤。印度尼西亚也是永远抱着美好理想的共产党的肥沃土壤。相反地，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盟的失败证明，印度尼西亚不是反人民的政策、维护殖民主义的政策、通过支持美国战争政策来謀取利潤的政策以及反民主和反共的政策肥沃土壤。

从我們党在这次議会选举中所获得的成果来看，完全沒有悲观的理由，正如沒有过分乐观以致得意忘形的理由一样。我們只有更加努力工作，开展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政治斗争，进行宣傳鼓动，正确地闡明問題，团结、动员和组织人民进行斗争。为此，必須努力爭取一切共产党人和一切民主力量都来参加这项偉大的工作。

第一次議会选举是民主的真正表現 和民主的偉大胜利

同志們！我国的普选是在国际局势已經大为緩和而人民的生

活也大为安定的情况下举行的，这种情况是和平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亚非会议、一九五五年七月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这些重大国际事件的必然结果。和平力量十分强大，它不会轻易地让美国统治阶级侵略集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焚烧世界。摩洛哥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发动的殖民战争的斗争，以及中东阿拉伯国家人民反抗美国和英国的干涉和侵略的斗争，都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正在不断高涨的明证。正是这种反对战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精神正在鼓舞着世界各国人民。

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在反对战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精神日益高涨的同时，战争挑拨者和殖民主义者也更加疯狂起来。朝鲜、印度支那、德国和最近中东的动乱不安就是帝国主义者仍然在疯狂地破坏和平、破坏人民团结和镇压独立运动的明证。他们破坏我国的普选的活动和勾结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邦派政府的活动，也是他们扩大战争集团、干涉别国内政和镇压独立运动的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制止了他们企图破坏我国第一次普选的阴谋活动。尽管这样，我们在努力维护和巩固人民在这次普选中所取得的胜利的时候，还应该保持警惕。

同志们！我国第一次普选是民主的真正表现，而且我们也必须把它看作是民主的伟大胜利。大家知道，普选前，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竭力破坏普选，其手段之一就是推翻阿里—阿里芬政府。他们通过议会以外的手段推翻了阿里—阿里芬政府，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破坏普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具有选举权的人投了票。我国的选举法和投票那一天的实际情况表明，这次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的和秘密的性质。对于像我们这种还没有得

到完全独立的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成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和其他过去支持阿里—阿里芬政府的党派，在几个月前联合起来，有效地保卫了议会民主制度，反对了建立不对议会负责的政府，他们获得了大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选票，这就标志着民主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在不久前拼命设法废除议会民主制度和破坏普选的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盟失败了，这就证明了反民主党派的失败。简单说来，最近的议会选举清楚地说明，印度尼西亚人民所选择的是民主。

在指出上述事实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忘记普选并不是达到人民革命目的的万能钥匙。还有一些党的干部和党员过高估计了议会斗争，他们认为，通过这次普选就能够成立一个愿意执行人民民主纲领的政府。党的纲领已经指出这种想法的错误，在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一次受到了批判。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通过普选进行一次新的革命，而只是为了争取更加广泛的民主自由，为了争取成立一个不至对人民运动采取残暴措施的民主政府。简单说来，即争取实现这样的局面：使保卫民族独立、和平、民主和改善生活的人民运动有可能发展。我们所建议的民族联合政府并不是革命政府。我们的同志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不了解党的纲领。他们一定会因为普选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而感到失望。

在竞选运动中，我们有时也引用苏加诺总统的话说，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将成为审判者”。我们并不认为这一句话是意味着，投票选举议员的那一天会使人民上台执政去审判他们的敌人。我们对“人民将成为审判者”这一句话的意义的了解是有一定限度的。它只不过是说，在投票选举议员那一天，人民就要对不

是经过人民选举而是由于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才成立的临时议会下判决。在这个意义上，印度尼西亚人民，包括武装部队的成员，确是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成了审判者。由圆桌会议协定而产生的临时议会正在等候解散的时刻，过去靠荷兰统治势力盘踞议会的殖民主义代理人大部分必须滚开。这一次普选的结果，过去那些在议会中支持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的人，支持外国干涉的人和支持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战争条约的人失败了。

普选是重要的。不错，很重要。但是，不管怎么重要也不能代替革命的作用。在普选中，人民表达他们的意愿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温和的民主方式。如果我们希望革命以温和的民主方式表现出来，那就错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人民通过温和的民主方式所作的表示的重要性，那也是错的。我们大家都看到，这种表示已经给了我们党新的地位，同时也为人民运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我们在上面说过，这次普选的结果，是统一战线和我们党取得了胜利，简言之，民主党派取得了胜利。这是目前的事实。但是，根据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己的经验，如果我们认为现在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其他政党在任何情况下和在任何时候都将继续执行民主政策，那就错了。我们希望并努力使这些政党继续执行民主政策。但是，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析和确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的时候，也分析和确定了这些政党的性质；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情况下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本质上摇摆不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会动摇，就不

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既然我們了解这一点，我們就應該經常估計到，在一定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可能不參加統一戰綫，但在另一種情況下他們又可能參加統一戰綫。我們要注意和引導今后的發展，了解并認識這一點是重要的。我們必須誠懇認真地為團結而努力，同時不忘記對其他黨派損害團結和損害人民的政策提出必要的批評，才能够很好地執行我們的統一戰綫政策。為着達到擴大和加強統一戰綫的目的，我們一方面批評它們，同時也願意接受它們的批評。對損害團結和人民的其他政黨採取緘默的態度，是不利於團結的。

普選的結果证明了，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所作的結論之一是正確的。這個結論是：“一般說來，我國人民受到三種政治思潮即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的影響。已經滲透到廣大人民中間去的，就是這些思潮。現在被人稱為‘索斯加’思潮的右翼社會黨思潮，在印度尼西亞是以印度尼西亞社會黨為代表，在廣大人民當中，它的追隨者並不多”。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印度尼西亞社會黨失敗了，就認為右翼社會黨人在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就立即消逝。他們還是要繼續執行他們滲入和控制其他政黨的政策、分裂人民運動的政策、反民主和反共的政策。這一次普選的結果，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人民群眾是分屬哪些組織的。這將有助於我們具體了解廣大人民群眾是怎樣組織起來的，產生這些組織的原因是什麼，它們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它們的目的是什麼，它們的領導人的政治傾向是什麼。知道這些情況，對於改進建立統一戰綫的工作，對於進行聯繫，以便實現合作，以便把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都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

我們在十月十日發表的分析議會選舉的臨時結果的聲明中已

經指出了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政治意义，同时也指出了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集团失败的政治意义。现在，这种胜利和失败的阶级性质是什么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胜利的阶级性质和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盟失败的阶级性质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胜利，另一个是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领导人的买办资产阶级政策的失败。我們有許多同志还不怎么了解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取得胜利的阶级性质。要弄清这一点，我們应该重提一下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我国社会的結論。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关于我国社会的結論中有一段說：“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說在印度尼西亚，小私有经济，特别是生产水平很低的个体农业为数还是很多。”如果在衡量社会力量的时候不把这个事实估計在內，那就錯了。一个政党，可能它的組織并不怎么完善，它的領導人也显然不尽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在竞选期間它代表大体上“既不左也不右”而要寻找“最保險”的“中間路綫”的阶级思想和情緒，这种政党是能够爭取到許多选民的。我們的同志在衡量社会力量的时候常常忽略这个客观因素。因此，他們就不能够理解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取得胜利的原因。事实上，正是这个因素促使我們党給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如果我們党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那么，就必须尽量把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团结到党的周圍来。

民主力量在这次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不仅为建立統一战綫展开了新的前景，而且也为我们党发展党员和发展組織展开了新的前景。我們现在具体地知道党的选民在哪些地方很多，在哪些地方

很少，在哪些地方完全沒有。根据我們对这一切情况的了解和分析，我們制訂了新的工作方案，同时訓練新干部并指派一些有經驗的干部去領導这一方案的实施。

当我们說应该把这次选举的結果看作是民主的真正表現和民主的偉大胜利的时候，我們千万不要忘記这种民主的表現的局限性，从准备阶段或是投票那一天的事实来看，或者是从总的情况来看，只要政权仍然在反动党派的手里，选举就不可能是真正民主的。外国和我国选举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的选举法虽然比較进步，但是，这一选举法的实施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損害我們党的。中央选举委员会、許多省的选举委员会和省以下的主持选举的各种委员会中，沒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这就减少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这个比較进步的选举法施行的监督权利。此外，在西瓜哇，有許多地方投票后，选票沒有当众計算而是直接交給上級委员会。

执政党的条件要比共产党好，它們在国家各种机构中的政治势力为它們提供了許多便利，并且有助于它們通过不正当的方法来增加选票。它們随心所欲地利用政府机关的財物，利用作为政府官員的“势力”，花样百出，詭計多端，虽然違禁，却未能依法惩办。

执政党拥有他們的一些人，他們可以利用这些人来取得选举基金。事实表明，其他党派一般不向党员或群众募集竞选費用。我們不仅不会因此丧失信心，而且相反，我們确信，我們采用的办法是最正当的，它表明我們党的成就和其他政党的成就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反动党派企图誣蔑我們党，說我們党也跟它們一样賄賂选民。但是人民不会相信，因为人民知道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用的正是人民捐出来的錢。如果人民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取得胜利是由于正直，那不是偶然的。人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或亲眼看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是怎样从农民一直到艺术家，从工厂工人一直到学者那里获得竞选所需的经费和人力的支持。

此外，共产党人所不可能作而且也不可以作的一切，其他党派都随心所欲地作了，例如利用清真寺、教堂、宗教机关等等。它们通过这一切来恐吓和迫害选民。它们利用这一切来猛烈攻击敌对政党。它们还答应让那些愿意投票选它们的党的人进天堂。为了拉拢选民，它们不强调当选后要立即付之实施的具体纲领。例如，马斯友美党就少提改善人民经济状况的具体口号，而更多强调抽象的口号。不但这样，马斯友美党还利用它们所能利用的一切东西，从古兰经的经文直到人粪，来攻击它的敌对政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像马斯友美党那样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利用，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决不因此而妒嫉。在将来的选举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仍将提出人民可以监督其实施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来参加竞选。此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进行斗争，使宗教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不致被用来加剧人民中间的矛盾，并从中取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希望对人民怀有善意的、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党派，在阐明宗教教义时，尽可能使宗教和信仰不同的全体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事实表明，在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恐怖集团还在活动，而人民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展开有力的抵抗斗争的地区，如西瓜哇、亚齐和南苏拉威西的某些地区，马斯友美党就取得了胜利，而民主党派却不能不败给马斯友美党。这也是选举法的实施多么不民主的明证。

有些政党，它们的党员中有许多是地主、高利贷者、雇主和房

屋出租者，这些政党对选民，特别是对那些同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选民进行了恫吓。他们威胁选民，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同情者说，谁要是不投地主、高利贷者、雇主和房屋出租者的政党的票，他们就要退佃，没收他的财产，把他解雇，把他从租用的房子赶走。有时，他们还雇用一批打手，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这些打手带着威胁的眼光，摆着威胁的架子在投票站附近摇来晃去，监视人民。

这就是不久前举行的选举中间，民主表现的局限性的一些证据。虽然统一战线和党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这些事实。由于这种局限性不管在哪个国家，在什么时候，都是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应当不断地向人民说明这种局限性，而且我们还应当不断地为争取更加民主的选举而继续斗争。

毫无疑问，如果选民能够真正自由地投票，而且人民的平等权利受到尊重的话，我们党所得到的选票显然会比目前多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还没有包括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进行选民登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情者，也没有包括那些由于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拦路而不能参加投票的人。

但是，尽管如此，这次选举还是民主的真正表现，而且我们党取得了胜利。这是重要的事实。它将为我国政治斗争的发展创造新条件。这一事实也将为我们党的发展创造新条件，为我们党的工作创造新条件，为使我们党能够争取大多数工人和劳动人民，为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同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党派的群众之间的合作，共同为发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创造新条件。简言之，为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巩固党创造新条件。

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在政治和生活方面有所改变

同志们！这一次普选的结果不仅证明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具有高度的民主的警惕性和觉悟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对现政府和目前的恶劣状况的不满情绪多么强烈。这不仅能够从大批选民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票这一点得到证明，而且也可以从大批选民投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票和伊斯兰教群众中大批选民厌恶马斯友美党这一事实中看出来。马斯友美党一向以伊斯兰教政党著称，它在议会中的席位比其他伊斯兰教党派席位的总和还多了几倍。厌恶马斯友美党的伊斯兰教群众大都投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或白尔蒂伊斯兰教党的票，这几个党在伊斯兰教群众中的威信在阿里—阿里芬内阁时期已经大大提高。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和白尔蒂伊斯兰教党在新议会中的席位肯定的要比它们现有的席位多。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在爪哇，可是爪哇选举的结果，马斯友美党竟居于第四位，这是出乎许多人的意外的。

这就证明，在人民已经“领教了”马斯友美党的政策的地方，马斯友美党的选票就不多。这就是伊斯兰教群众对领导现政府的马斯友美党不满的明证。

哈蔡林派的大印度尼西亚统一党和民主派议会党团的成员（联邦派分子），在目前的布哈努丁·哈拉哈普内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这次却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从这一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群众对现内阁和现状的强烈的不满情绪。此外，印度尼西

亚社会党在新議會中的席位，肯定要比它在临时議会的席位少得很多，这一事实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不滿情緒的表現。

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普选中，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确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溫和的民主方式表示了他們的不滿。在普选的临时結果的数字公布的时候，人民对布哈努丁·哈拉哈普內閣的不滿，就清楚地表現出来了。人民群眾一听说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在某个地方的选举中遭到失敗，不禁兴高采烈。另一方面，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一听到失敗的消息，連原来准备好的牛羊也不宰杀了。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原来准备举行的祝捷舞会也取消了。因为人民不让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盟得胜，执政党的领导人和报纸便大发雷霆，咒罵人民愚昧无知。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看到反对党取得胜利，忿恨发怒；而大多数人民見到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忿怒，却笑逐顏开。

选举的結果不仅证明了人民不滿現政府，不滿現狀，不滿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邦派分子，而且也清楚地表明人民要求改变政府，改变現狀，特别是要求改变他們的悲惨生活。我們可以具体地說，这次选举的結果证明，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改变临时議會，改变布哈努丁·哈拉哈普內閣，改变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匪帮騷乱所引起的混乱局面，改变成百万人失业和半失业的現象，改变工資过低的現象，改变破产了的財政政策和經濟政策，改变亲荷兰殖民主义和东南亚条約組織的外交政策，改变农民地租負擔很重的現象，改变水利灌溉管理不善的現象，改变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飞漲的現象，改变房租高昂的現象，改变学童缺乏校舍的現象，等等。

大約百分之七十的选民由于希望改革，投了印度尼西亚共产

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以及其他政党的票，因为选民信任它们，认为它们能够改变现状。今后，只有那些能够在国家政治方面进行变革和走新道路的政府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只有肯为建立这样一个政府而斗争的政党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将来，如果有这样的政府，它没有能力改善情况，不能够朝着新的政治方向走，那么，这个政府以及支持它的政党就会使人民感到失望，就会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

选民愿意在烈日下或大雨中站几小时的队，主要不是因为他們要欣赏他們所要选的政党的标志，而是因为他們相信，如果他們所选的政党执政，就能进行改革，使恶劣的情况完全好转，或者至少稍为好转。馬斯友美党的选民也大多抱有同样的希望，因为在竞选时，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除了向他們保证死后可进天堂以外，还保证在他們活着的时候改善他們的境况。馬斯友美党的选民当然不会要求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让他們进天堂，因为，这样一来，他們就必须先死掉。但是改善生活的确是他們的要求，这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白尔蒂伊斯兰教党和其他党派的要求一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竞选綱領中清楚地列举了各种具体項目，向人民說明共产党员当选后要做哪些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竞选綱領是一个保证改变现状的綱領，例如：它要求給予人民和人民团体以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保证工人有保护他們合法利益的一切权利和自由；改善农民的情况，責成地主减租，把荒地无代价地分配給无地农民和貧农；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集团；使乡村和地方政权民主化；肃清政府各部門中的民族叛徒、舞弊分子和贪污

分子；努力提高稻谷产量和保护民族工业；增設学校；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要求政府执行彻底的和平政策，等等。

保证改变目前情况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竞选綱領，仍然是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必須遵守的准则，是他們在議會内外行动的指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竞选运动中向人民提出了一个綱領，它将坚决为实现这个綱領而奋斗，决不后退一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人民希望情况好轉是很正当的。

人民对布哈努丁·哈拉哈普內閣表示强烈的不滿，要求更換政府，成立一个能够走上新道路政府，所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意見：爭取組成一个能够执行过去阿里—阿里芬內閣反殖民主义綱領的广泛的民族联合政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意不提出新的或更高的綱領，而提出以阿里—阿里芬內閣的綱領为基础，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阿里—阿里芬內閣的綱領已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白尔蒂伊斯兰教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所贊同，所以，这是最方便和最合理的途徑。此外，阿里—阿里芬內閣的垮台不是由于議會不同意它的綱領，而是由于議會以外的因素——陆軍因素。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党和其他政党是否能够同意这个广泛的民族联合政府的組成成分和反殖民主义綱領，这要看它們自己。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团結的願望是这样的强烈，它执行团結政策是这样的坚定不移，所以它不反对同馬斯友美党一道参加这样的政府，这个政府的綱領是以曾經在印度尼西亚执行过的反殖民主义綱領为基础的。

根据这几年来来的經驗，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是

坚决执行保护外国資本和維護伊斯兰教国运动的政策，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馬斯友美党执行反殖民主义政策的誠意有多大。但是，这一点还不至成为什么障碍，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政府，对馬斯友美党执行保护外国資本和維護伊斯兰教国运动的政策的可能性是一种有力的約束。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政府，它就可以不仅在政府之外，而且在政府之内对不坚持执行反殖民主义政策的政党提出批評。經驗证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怀疑馬斯友美党是有理由的，所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成立一个有馬斯友美党参加而沒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不可能执行进步的綱領，不可能促使情况好轉，因为馬斯友美党的政策是支持外国資本和支持伊斯兰教国运动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議成立广泛的民族联合內閣，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知道絕大多数人民希望改善目前的状况，而只有成立一个反殖民主义的、保证民主权利并执行真正保卫和平的外交政策的統一战綫政府，才有可能改善状况。自从八月革命失敗以来，人民体验到，过去的好几届政府的組成成分，如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合組成的納席尔內閣、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联合組成的苏基曼內閣、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合組成的韦洛坡內閣、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联合組成的阿里—阿里芬內閣、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邦派联合組成的布哈努丁·哈拉哈普內閣，都沒有能够带来状况的改善，特别是人民生活状况改善的轉变。总之，在新議會选出之后，必須要有新的政府組成成分来創造新的局面。一般說来，这就是絕大多数选民，不論是平民或軍

人，在投票时所抱的希望。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如果組成民族联合內閣，社会中最重要政治思潮，如伊斯兰教、基督教、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都有代表参加，这样，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頁，印度尼西亚人民这种新形式的团结将会迅速地加强起来。如果实现了这一点，印度尼西亚人民没有一个阶层会受到損害。受損害的只有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它們的走狗。

近来，特别是在組織新內閣有关的問題上，有人喜欢談起建立排斥共产党的、若干党派間的“国内和平”。这种国内和平，至少对投共产党的票的六百多万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不友好的，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种子，要是继续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为伊沙·安夏里（馬斯友美党人）式的“反共陣綫”。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国内和平”的鼓吹者，实际上是反共陣綫的鼓吹者。这就是說，他們的行动違反保护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的临时宪法。这种行动如果继续下去，他們就非成为內战的鼓吹者不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执行团结的政策。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执行团结的政策，在反对排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国内和平”方面也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更加真诚地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奋斗，并将更加努力争取实现各族人民不分宗教、思想意識、政治見解的民族大团结。为了这个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执行教育人民的政策，使人民不会被唆使来互相敌視，使人民拒絕在“国内和平”的幌子下进行筹建反共陣綫的活动，使人民坚决地争取实现全民族各种力量的大团结，以便真正地肃清殖民主义残余，真正地为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版图而斗争。

巩固党的胜利和統一战綫的胜利

我們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就，是我們党过去到現在工作的必然結果，是执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規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的結果，是我們党的团结政策和依靠人民的政策的結果，是人民支持这种政治路綫的結果，是我們党为各劳动階級的切身利益而不断进行斗争的結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胜利全靠它的团结政策以及它同人民的密切联系，这是确实的，党外許多正直的人士也承认这一点。

胜利能够巩固下来，这才算是胜利。如果不把胜利巩固下来，就不仅会白費精力，而且会反胜为败。巩固胜利是一項非常艰巨的任务。只有当我们精力充沛、意气奋发、热情愉快和忘我无私地进行工作的时候，我們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为了巩固胜利，我們必須总结我們的經驗。总结經驗是将来取得胜利的关键。我們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是：我們取得胜利，是由于我們执行了正确的政策，是由于我們始終不渝地为建立劳动群众和党之間的密切联系而努力。我們知道，只有通过反对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障碍、反对不合理現象和反对贫困現象的日常斗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总之，胜利的关键在于：使我們党成为一个真正新型的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全国范围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巩固的党。

作为一个成年的共产党，我們党必须具备共产党应当具备的一切条件；目前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获得成就的时候，不論这种成就是多么大，我們决不可对党内仍然存在的某些弱点熟視无睹。

忘了弱点的人就会驕傲，驕傲的人就必然会懈怠，懈怠的人就容易給人家打敗。

我們到处可以看到党的干部和党员思想上还存在着弱点的現象。他們为选举所得票数多少所左右。他們听到党得票多了，就欢喜若狂，乐观到极点；但是一听到党得票少了，就仿佛沉到了海底里去，悲观得很。第一种情况可能使他們今后低估其他政党的力量，而第二种情况可能使他們觉得今后一切都是漆黑一团。当他們談起党得票的数字很大的时候，便把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捧到天上；而当他們談起党得票的数字很小的时候，就怨天尤人。他們不是从实际出发以共产主义者的敏銳目光冷靜地观察一切問題，加以研究、討論，从而作出結論。我并不是說像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多，但是确实有这样的干部。这样說，絕不意味着我們同意党的干部和党员对党得票多少采取漠不关心、不聞不問的态度。因为这完全不是党员所应有的态度。这种人是党內的“外人”。

有一个地方，党得票的数字居于領先(第一位)地位，当地党的負責干部感到高兴，其中有一个就說：“这就证明了党的团結政策的正确性。这就证明了，这个地区的其他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对我们党进行攻击，我們采取不还击的态度是正确的。”在另一个地方，党的票数不是居于領先地位，当地党的負責干部就不大高兴，其中有一个就說：“这就是党的团結政策的錯誤，它不允許我們在这个地区还击其他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对我们党的攻击。”这是两个例子，两者所得的結論都是錯誤的。

同志們！对于其他党派攻击我們党的政策，党什么时候禁止过我們給以还击或反击呢？在竭力爭取团結的同时，还必须敢于批評那些在口头上表示願意同我們合作，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

破坏团结和危害人民的人，难道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么？党经常提醒我们的是：在进行还击或反击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所做的事不能越出团结政策的范围。这就是说，当我们进行批评的时候，不应该激动，不应该意气用事，以致跟他们一样去破坏团结和危害人民。我们已经找到许多种在团结基础上进行批评的方法。没有批评的团结政策是走向灭亡的团结政策。我们的团结政策是走向新印度尼西亚的团结政策。在执行团结政策中，只有采取批评的方法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但是，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次选举中取得胜利，原因就在于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是切实认真地去组织和动员选民的。

民族主义政党、基督教政党、伊斯兰教政党和其他政党在民主道路上的任何进展，我们都必须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当这些党派的成员的言论同他们的行为有矛盾的时候，当他们提出的基本论点同他们作出的结论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种矛盾指出来。例如：他们说，为了“完成民族革命”，为了收复西伊里安，必须建立广泛的民族团结；但是，实际上他们做得比较多的是破坏民族团结，他们不是把他们的追随者的注意力引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而是引向反对所谓“共产主义危险”。实际上，他们不是努力把人民的一切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团结起来，而是努力实现排斥共产党的“国内和平”。排斥共产党，也就是排斥反对殖民主义的英勇坚决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没有共产党的“国内和平”，不是民族团结，而是把社会力量分裂为二的勾当。这样一来，不但西伊里安不可能归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版图，而且整个印度尼西亚将会落入荷兰和美国（在它们的印度尼西亚国内走狗的帮助下）的控制。又如：他们标榜和高谈为人民谋幸福的必要性，但在行动上

却違反他們自己的言論。如果工人提出要求和采取行动爭取工資稍为提高或者爭取社会保險改善一些；如果农民要求耕种荒地或者减租，他們就加以反对，至少不积极予以支持。他們标榜和高談人民团结的重要性，但是，在行动上，却分裂工会和农会。

总之，我們希望，不但我們自己的行动，而且我們同盟者的行动，都同自己的言論一致，同大家都认为是真理的基本論点一致。

我們党在爪哇和苏門答腊以外的地方得到的选票不多，全国合計起来，我們党在爪哇和苏門答腊的优势，就不能保持了，我們有一部分同志对此可能感到不大愉快。当然，对爪哇和苏門答腊以外各地党的干部和党员，我們的同志是不会提出什么責备的。那些地区的同志，在組織經驗和政治經驗很有限的情况下，已經为爭取党的胜利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我們必須了解，我們党的組織在那些地区建立的时间不长，在社会中扎根还不深，許多地方的人民知道我們党的标志，只是近几个月的事。我們党比較发展的地区必須把上述事实看作是推动力，更加努力工作来弥补前述地区的不足，同时提供具体的帮助，特别是干部力量的帮助。仅仅重視自己地区內党的发展，譬如說爪哇地区內的发展，这样狹隘的思想，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我們党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一个地方不足，必須由其他地方来补充，每一个党员必須具有在全国范围內互相支援的精神。

上面所說的这些事实向我們提出了下述巩固党的任务：

第一，必須更加注意思想教育，而且必須从党的干部的思想教育开始。在一些討論会和課堂上看不到主持人和讲课人高度热爱党热爱人民的精神，这种死气沉沉的主持會議和讲课的方式，必須停止使用。缺乏党性的討論会和訓練班，不可能有什么成果，也

不可能提高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讨论会和训练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和讲课人热爱党和热爱人民的精神。其次，必须把集体领导当作唯一正确的领导方法；而要实现集体领导，就必须召开有充分准备的、有批评精神的定期讨论会。领导必须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党内的民主必须进一步加以发扬。必须克服有成绩而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同样，也必须克服由于失败而产生的丧失信心和心灰意冷的情绪。

第二，党的纲领和政策必须成为全体党员的纲领和政策，即为全体党员所真正了解。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必须在各级党组织中组织深入的学习和讨论。高级干部必须养成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习惯。各级党委员会必须拟订和阐明学习计划，并领导和监督它的执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全体党员了解党的纲领和政策，这是使全体党员积极参加贯彻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的条件。

第三，必须进一步发展党员和党组织。这是领导各个地区和全国的革命运动的条件。我们在保持高度警惕性的情况下把党的门敞开来吸收新党员，特别是从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妇女中吸收新党员。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是更好地进行保卫农民日常利益的工作的条件，到现在为止，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发展人民群众组织。要发展人民群众组织，首先必须通过团结人民群众为保卫他们的日常利益而进行斗争。各级党委员会必须实行经常的领导和监督，各个党小组必须成为当地的积极因素和具体领导者，只有这样，上述的一切才能实现。

同志们！这些就是巩固党在这次普选中取得的胜利的任务。

只有执行这些任务，今后才能继续取得新的胜利。而且只有执行这些任务，我们才能巩固统一战线胜利。

在巩固统一战线胜利方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提一提。

在党的干部中，还有人喜欢提出这种主张：如果党中央委员会同其他政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商谈，签订协定，规定双方从上到下都有义务做什么，不做什么，岂不很好。这种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其他党派的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之间经常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分歧。提出这种建议，是由于不知道我们党同其他党派进行合作的关键何在。我们的经验表明，同其他党派的协商一致和合作必须建立在政治行动的基础上，从政治行动中产生出来，在政治行动中加以改进，例如：在要求解散荷兰建立的各邦的时候，在要求成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的时候，在要求政府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集团采取坚决政策的时候，在要求解散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时候，在几个月前保卫岌岌可危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时候，以及在目前要求解散布哈努丁·哈拉哈普内阁的时候，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我们党同其他党派订立了合作纲领，可是没有以政治行动为基础，也不是从政治行动中产生出来，因之纲领一直是停留在纸面上，丝毫没有履行，这也是我们多次经历过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党的干部中，还有人在同其他党派进行合作的时候，仍是喜欢抽象地讨论哪一个要求更进步的问题，因之经常出现因我方坚持更进步的要求而使合作垮台的情况；有的时候，这种更进步的要求也明文规定下来了，然而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他们的要求是进了一步，但是情况并没有进展。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讨论哪一个要求更进步，而是应该根据一定的情况决定更加合

适的要求。就是说，我們提出的要求，必須是能够把运动向前推进的，是能够提供新发展的可能性的。就是根据这种观点，所以我們建議成立一个执行阿里—阿里芬內閣反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联合政府。也就是根据这种观点，所以我們在領導群众的經濟斗争中采用“要求虽小，但要有成效”的口号。

我們可以根据十分丰富的經驗得出这样的結論：光是有好的綱領是不够的，还必須有保证这个綱領能够实现的社会力量；而且，只是知道和指出这种社会力量在哪里也还是不够的，我們必須去团結这种社会力量，把它发动起来。

总之，在巩固統一战綫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的时候，我們必須坚决执行民族統一战綫政策，以实现我国人民一切社会、政治力量的合作。我們这一切工作都是通过合理、民主和具体的途径进行的。在执行团結政策的时候，我們應該避免作出那些使应当团結的人认为不得当和荒唐的行动。

因此，这就更加清楚了，我們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統一战綫，以便维护我国的民族独立、保卫和平、维护民主和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这次选举的结果已經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了更好的新的可能性。团結政策是实现印度尼西亚人民迫切要求和长远目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們迈着坚定的、勇敢的新步伐，繼續执行我們的团結政策。

全力爭取党和統一战綫 在制宪議会选举中的胜利

同志們！享有选举权的印度尼西亚人民不久将走到投票箱前

投票选举制宪議會議員。这就是說，我国人民和我們党正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我們必須努力工作，爭取党和統一战綫在即将举行的制宪議会选举中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民主性质和反殖民主义性质能否保持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制宪議会选举的結果。

党要在即将举行的制宪議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基本上取决于两件事：第一，党的政策要正确；第二，要作好动員群众爭取党的胜利的組織准备工作。

关于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大家都知道，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間召开的第二次全体會議上成立了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起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确是还没有拟出一部完整的宪法草案，但是已經就重要的基本問題作出了結論，而且这些結論已經获得党中央政治局的同意。

基本上來說，在确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将来的制宪議会中爭取制訂什么样的宪法方面，“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党中央政治局規定的根本原則是：保卫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宣告成立的共和国（簡称：保卫独立宣言的共和国）。

保卫独立宣言的共和国，意味着包括維護主权屬於人民、人民通过議会行使主权、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些原則。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以提出保卫独立宣言的共和国，是因为独立宣言的共和国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时期中已經证明它是保卫民族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斗争工具，是維護全国各族人民不分血統、性別、宗教、哲学和政治信仰的团結的重要斗争工具。保卫独立宣言的共和国就是保卫一个尊重各种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的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在制宪議會中坚决保卫能够团结絕大多数人民的独立宣言共和国的一切因素，其中包括紅白国旗、《大印度尼西亚》国歌、除各族語言以外作为共同語的印度尼西亚語、“異而又同”的共和国国徽。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决保卫其疆域包括前“荷屬东印度”所屬全部領土的統一的国家。在这个統一的国家中，各族享有最广泛的自治权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坚持临时宪法中旨在清除殖民經濟的有关經濟方面的条文的内容。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設想，在制宪議會竞选运动中，人們会紛紛議論，将来宪法将規定我們的国家是“建国五原則国家”呢，还是“伊斯兰教国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爭取哪一种呢？如果“建国五原則国家”指的是独立宣言的共和国，那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爭取的是哪种国家就很清楚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希望像馬斯友美党领导人所主張的那样，用“伊斯兰教国家”或“伊斯兰教国运动国家”来代替独立宣言的共和国。

某些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喜欢說，他們既不同意成立“伊斯兰教国家”也不同意成立“共产国家”。根据这种說法，可以推出这样的結論：仿佛有一派人——当然他們指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打算要建立“共产国家”。关于这个問題，我們曾經再三闡明，而且还要繼續闡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目前或将来都不打算建立“共产国家”。在共产党人的詞典中沒有“共产国家”这个術語。因此，在未来的制宪議會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爭取在印度尼西亚成立一个“共产国家”。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不希望建立“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国运动国家”、“基督教国家”或“平民主义国

家”，或者建立任何不同于“建国五原则国家”——指独立宣言共和国——的国家。明确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希望建立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集团的政权，而是争取建立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的政权。

共产党宣传员在制宪议会竞选运动中应该掌握的方针，简单说来，就是如此。这样，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来在制宪议会中要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愿意同旨在保卫独立宣言的共和国的任何党派或个人建立统一战线，这个共和国的主权属于人民，保证一切公民有平等的权利、有私有财产权、有信奉他们所喜欢的宗教和其他信仰的自由权。这种保证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的人民革命期间显然是存在的。

为了改善动员群众的组织准备工作，我们必须从议会选举期间组织和动员群众的经验中很好地吸取教训。我们在使争取选民的工作落实，使党的选民坚持立场，改善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动员党内和同情党的艺术工作人员，寻求和采用切实可行和有效的办法来募集党的选举基金，以及其他等方面，有很多经验，我们必须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的质量，这是取得更大成绩的条件。经过总结得出的定论，一经定为今后的工作方针，就应当认真地执行，执行中要经常加以领导和监督。

反动政党特别是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盟在各个地区遭受了失败，国内的反动派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将采取威胁和挑衅的办法来制造紧张局势。他们将有组织地利用所谓“共产主义危险”来影响舆论，使人民忘掉真正敌人——已经变成美帝国主义附庸的荷兰殖民主义。他们将变本加厉地为非

作歹。这一切都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和干部保持更高度的警惕性和战斗性。

同志们！让我们全心全意地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让我们全力以赴地来争取党和统一战线在即将到来的制宪议会选举中的胜利。这是保卫我国民族独立、保卫和平、维护民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重要斗争。只要依靠英勇伟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我们相信，我们党和人民必将在保卫独立宣言的共和国以及保持和发展这个共和国的民主性质和反殖民主义性质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注 釋

克服我們的弱點

〔1〕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逮捕事件**——荷蘭殖民政府殘酷地鎮壓了印度尼西亞人民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爪哇和一九二七年年初在蘇門答臘所發動的起義以後所進行的大逮捕。數以萬計的人民遭到監禁、流放或絞殺。關於這次起義的意義，參閱本卷《**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誕生及其發展**》和本書第二卷《**十一月十二日和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鬥爭**》。

一九三六年的逮捕事件——一九三五年慕梭同志秘密回國活動後，荷蘭殖民政府逮捕當時從事地下工作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幹部和荷蘭警察認為曾經同慕梭同志有過聯繫的人。

茉莉芬挑釁事件——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在茉莉芬發生了贊同哈達政府的反動和挑釁政策的部隊同堅決忠實於革命的部隊之間的衝突事件。哈達政府借此誣指共產黨人已經奪取政權並建立了蘇維埃國家，進而動員一切力量追緝、逮捕和殺害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黨員和同情者。茉莉芬挑釁事件實際上只不過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荷蘭殖民戰爭的準備，以便逼迫印度尼西亞向荷蘭帝國主義進一步投降。

關於茉莉芬挑釁事件，參閱本卷《**控訴茉莉芬事件**》和本書第二卷《**一九四八年茉莉芬事件和一九五六年蘇門答臘事件的對照**》。——第2頁

〔2〕 **慕梭同志**——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起義失敗後被迫出國。一九三五年慕梭同志秘密返回印度尼西亞。在他的領導下，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間由於荷蘭殖民政府的恐

怖镇压而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无法立即再次聚集力量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又重新建立起来，并且有了反法西斯的正确政治路线。不久，慕梭同志再度被迫出国，直到八月革命后才在一九四八年回国。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的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以后在反抗茉莉芬恐怖挑畔事件的斗争中牺牲。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一九四八年八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会议根据慕梭同志的建议通过的决议。党过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存在着弱点，因之不能把革命领导起来，决议对这些弱点提出了批评并指出克服的方法。**《新道路》**决议是党纠正“左”的和右的偏向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坚强的党的基本方针。——第2页

- [3] **禁止罢工条例**——纳席尔政府在战时戒严情况下颁布，一九五〇年废止，但是，代替该条例的德查苏马纳第十六号紧急法令也同样是反动的。——第3页
- [4] **《我们的责任》**——《红星》杂志第七卷第五期的社论，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出版，第127页。——第3页
- [5] **《红星》**杂志第七卷第五期，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出版，第129页。——第3页
- [6]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争取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的纲领》**——《红星》杂志第七卷第六和第七期合刊，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出版，第166页。——第5页
- [7] **政党协商会议**——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在雅加达成立，参加的有十一个政党。政党协商会议的章程对宗旨、会务和会员等都作了规定。关于会务的条款规定，要时刻认真记住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在真挚友好和开诚布公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关于决议的问题，章程规定，只有经全体会员一致通过的决议才对全体会员有约束力。
- 政党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提出的要求有：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印度尼西亚摆脱圆桌会议协定的束缚，保证人民享有民主等等。——第5页
- [8] **樊德不拉斯**——曾在荷兰殖民政府时期任东爪哇省省长。他假装信奉伊斯兰教以骗取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好感，暗中监视反抗荷兰帝国主义的战士。——第6页

- [9] 麦苏基烟草仓库纵火事件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走狗自己搞的，但是他们却诬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制造借口以镇压印度尼西亚的进步运动。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警惕，这一挑衅阴谋并没有得逞。——第6页
- [10] 苏基曼—維比梭諾政府——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納席尔政府倒台后成立的政府。在这一任內閣里，馬斯友美党的头面人物苏基曼、尤素夫·維比梭諾等人在实行反动政策方面起最重要的作用。苏基曼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发动大逮捕事件，企图以逮捕的手段消灭进步力量。——第8页
- [11] 麦苏基事件——見注九。
- 丹絨不碌事件——反动派雇人戴上有鋸子鑷刀标记的紅色領巾襲击丹絨不碌的警察派出所。苏基曼政府以此为借口发动八月大逮捕事件。人民保持警惕，揭穿了反动派的恶毒意图，被捕的人一个也没有能提交法庭审讯。
- 茂物事件——夜市場纵火事件，其目的和丹絨不碌事件、麦苏基事件等相同。——第10页
- [12]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9页。——第12页
- [13] 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一九四六年在日惹成立，一九四七年在瑪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成立之日起，它就领导全国工人进行反对荷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它的会员共二百六十万。——第17页
- [14] 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成立，总会設在雅加达。它的綱領的内容是举办农具合作社和保卫农民已占用的土地。开始时会员一万五千人，后来增加到十二万人。在荷兰占领区，特别是西爪哇进行活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宣布解散，并入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
- 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日惹成立。合并前，它有会员二十四万人，遍布全国各地，是最大的农民团体。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印度尼西亚农会并入后，日見发展，現有会员約三百五十万人。——第17页

[15] **人民青年团**——革命青年組織，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在革命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原名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曾积极参加反抗荷兰的武装斗争。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在雅加达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改名人民青年团。

印度尼西亚觉醒妇女会——进步的妇女团体，一九五〇年在三寶壟成立，一九五四年在雅加达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改名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协会。——第 19 頁

[16] **殖民战争**——荷兰殖民主义者为进攻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发动的战争(第一次軍事冲突)和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发动的战争(第二次軍事冲突)。——第 23 頁

[17] **德朗古罢工**——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組成的統一行动指揮部领导的农場工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农場工会会员)大罢工，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开始，七月三十日結束。这是八月革命后第一次規模最大的罢工，获得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支持。因为遭到哈达反动政府的镇压，罢工被迫发展为武装反抗，最后工人取得胜利。德朗古是一个小鎮(区政府所在地)的名字，居民大部分是农場工人。——第 23 頁

[18] **农民統一战綫**——一九五二年由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和印度尼西亚农会組成的中央联合机构。它制定了一项共同綱領，使农民在反对地主的反动行动和殖民地条例殘余的时候，能够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一九五三年前述三个团体合并后，这一联合机构也就撤銷了。——第 26 頁

走人民的道路

[1] **五月二十日**——民族觉醒节。印度尼西亚第一个民族运动团体——至善社在一九〇八年这一天成立，它标志着印度尼西亚民族形成的过程。它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过程的最初阶段的历史里程碑。——第 34 頁

[2] **輕視和侮辱印度尼西亚民族**——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荷兰人准备庆祝摆脱法国殖民統治一百周年紀念日，借此名目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地区要

人民捐款。基·哈查尔·德宛达拉、吉多曼貢古苏莫博士等人认为，这是对荷兰統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侮辱。——第 35 頁

〔3〕 **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这是联合印度尼西亚和荷兰革命知識分子的政治組織，它的宗旨是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特别是工人中間傳播馬克思主义。从一九一四年五月該联盟成立之日起，馬克思主义就开始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运动結合起来了。——第 36 頁

〔4〕 **政党协商會議章程**——見《克服我們的弱點》一文注七。——第 38 頁

〔5〕 **圓桌會議**——在海牙召开。由于这次會議的結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哈达和苏丹·哈密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同荷兰政府簽訂了一項不平等的殖民主义协定。圓桌會議协定恢复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荷兰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經濟的控制，让荷兰繼續統治西伊里安，从而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禁运——美帝国主义强行禁止印度尼西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貿易，苏基曼反动政府的外交部长苏巴佐（馬斯友美党人）对此表示同意。

旧金山对日和約——外交部长苏巴佐同美帝国主义訂立的条約，它使印度尼西亚变成外国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場、投資場所和美国的軍事基地。

共同安全法——也是由外交部长苏巴佐同美国訂立的“互助”条約，目的和旧金山对日和約一样。人民强烈反对这两項条約，結果苏巴佐倒台。——第 38 頁

〔6〕 **德查苏馬納第十六号紧急法令**——納席尔內閣的劳工部长德查苏馬納制定的一项关于調解劳資糾紛的紧急法令，对工人斗争的限制极严，因此人們称它为“变相的禁止罢工条例”。——第 39 頁

〔7〕 列宁：《馬克思學說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 583 頁。——第 40 頁

〔8〕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 33 頁。——第 41 頁

〔9〕 **“印度尼西亚革命中央职工会”**——一九五一年由平民党成立的工会联合会。——第 41 頁

〔10〕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立。它的领导人包括英、

- 国的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人第根和克利等人。这一組織贊成馬歇尔“援”欧計劃，它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要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第 42 頁
- [11] 一九五一年八月挑畔事件——苏基曼政府为消灭民主运动而发动的挑畔和大逮捕事件。請參閱本卷《克服我們的弱点》一文。——第 42 頁
- [12]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 295 頁。——第 43 頁
- [13] 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成立一个摆脱圓桌會議協定約束的民族联合政府》。載《紅星》杂志第七卷第六和第七期合刊，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出版，第 165 頁。——第 46 頁
- [14] 《紅星》杂志第七卷第六和第七期合刊，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出版，第 189 頁。——第 52 頁

民族統一战綫及其历史

- [1] 利辜流放地——荷兰殖民政府鎮压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人民起义后在伊里安設立的流放地，四周都是原始大森林，是瘴蚊丛生的地方。因此，被流放到利辜的革命战士，很多人死去了或是身体搞垮了。——第 60 頁
- [2] 契約工人刑罰条例——荷兰殖民政府关于处罚契約工人的一种規定。工人因不堪折磨而拒絕繼續工作或者逃离工地者，根据一八八〇年的規定，雇主可以任意处刑。工人因此死亡的，达百分之三十。由于人民的反抗和世界輿論的压力，这一条例在一九四一年取消了。——第 60 頁
- [3] 尽管大战的火焰已經延燒到印度尼西亚境内，荷兰还是拒絕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合作，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宁願不进行什么抵抗就把印度尼西亚拱让給日本法西斯。——第 61 頁
- [4] 民族同盟——旨在集合全民族一切力量以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抵抗荷兰帝国主义进攻的民族統一战綫組織，一九四七年在日惹成立，主席沙佐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秘书曼貢沙哥罗（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同盟内部各党派和群众团体間的矛盾使得这一組織不能發揮什么作用。——第 64 頁

- 〔5〕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的联合声明**——民族觉醒节四十周年时，各党派和群众团体在日惹发表的声明，宣称建立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第64頁

国内出现了自圆桌会议以来 未曾有过的大好形势

- 〔1〕 **党的政治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这是指政治局在一九五二年末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派遣艾地和約多同志組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友好代表团出席荷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決議。

从上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遭遇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害怕的。艾地和約多同志原从荷兰駐印度尼西亚代表机关取得了必需的入境签证，但是当他們到达阿姆斯特丹机场时，却一反慣例地被拒絕入境，因而不得不又离开荷兰回国。——第66頁

- 〔2〕 **荷兰军事代表团**——荷兰根据不平等的圆桌会议协定而派到印度尼西亚充当印度尼西亚国民軍“顧問”的荷兰军事代表团。代表团的全部經費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負担。經過印度尼西亚爱国人士的頑强斗争之后，这个军事代表团终于被迫离开印度尼西亚返回荷兰。——第67頁

- 〔3〕 **熾布和北苏門答腊的油矿收归国有**——这些企业原屬巴达夫石油公司，革命时期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财产。圆桌会议协定签订后，馬斯友美党的头子們，像穆·罗姆(韦洛坡內閣內政部长)，力图把这些企业归还巴达夫石油公司，但是遭到了人民的坚决反对。最后，議会根据人民的一致願望，同意将熾布和北苏門答腊的油矿收归国有。——第68頁

- 〔4〕 **十·一七政变**——这是右翼社会党人利用軍閥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在雅加达发动的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一次政变。他們包圍了議會大厦，搗毀了家具，企图解散議會。他們在总統府前也架設了大炮。这次政变终于被爱国的民主力量所击败。——第69頁

- 〔5〕 **埃及的納吉布的做法**——埃及軍人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发动政

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统治，纳吉布是这一次行动的领导者之一。
——第69页

民族光荣和民族意识

〔1〕七省号军舰起义——荷兰政府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起把印度尼西亚和荷兰水兵的军饷降低百分之五，一九三二年元旦起又再降低百分之五，因而引起水兵的不满。荷兰政府并未就此罢手，还进一步计划从一九三三年元旦起再把军饷压低百分之七。当时，水兵当中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军饷还不到荷兰人的一半。尽管这样，军饷的降低却使他们更加团结一致地为反抗降低军饷的计划而斗争。一九三三年元旦，荷兰水兵协会和印度尼西亚水兵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对降低军饷的计划提出抗议。

荷兰政府知道“七省号”水兵的斗争精神最为旺盛，所以，命令“七省号”驶离爪哇，以便能够实行降低军饷百分之七的计划。

可是，荷兰政府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虽然军饷实际只减少百分之四，不是按原计划降低百分之七，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泗水还是爆发了大示威表示反对，荷兰政府逮捕了很多人，但二十九日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示威，示威者同荷兰殖民政府人员发生了冲突。“爪哇号”、“厄费逊号”、“毕亨号”、“松巴号”等军舰的水兵接到消息后，也一致拒绝执行任务表示响应。

当时，“七省号”已经开到奥勒勒（在哥打拉夜）。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晚上八时至九时左右荷兰军官到哥打拉夜的亚齐俱乐部参加舞会，就在这个时候巴拉吉、鲁曼比、哥沙等水兵在船上开会，决定起义控制军舰，立即开回泗水抢救被捕的同志。

在鲁曼比、苏吐梭、亨特立、巴拉吉、卡威拉朗、波斯哈等人的领导下，水兵们当晚控制了军舰，二月五日星期日，“七省号”启航开向泗水。当时在哥打拉夜的荷兰水兵也表示支持这一斗争。

二月十日上午九时，“七省号”开到巽他海峡。荷兰政府向“七省号”发出最后通牒迫它无条件投降。水兵们坚持斗争，拒绝投降，因而遭到荷兰政府飞机的轰击和舰队的围攻。最后，“七省号”英勇爱国的水兵

被俘；他們遭到慘無人道的酷刑，犧牲者很多。——第76頁

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

- [1] **东印度公司**——荷兰的資產階級通过这一公司壟斷了印度尼西亚香料的貿易。东印度公司对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封建王朝和人民发动了殘酷的进攻。为着掠奪香料和維持壟斷權，东印度公司派出舰队像海盜一样，到处搶劫、大規模屠殺居民。他們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各島嶼特别是班达島把居民赶尽杀絕，把香料作物全部砍除。东印度公司初期重要人物之一——楊·比·庫恩总督，手段最为毒辣，为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实行殖民統治奠定了基础。东印度公司成了荷兰資產階級資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东印度公司開設了二百年，所得的利潤異常惊人，荷兰商业資本从印度尼西亚掠奪的財富共达荷幣八亿盾。东印度公司在一八〇〇年解散，以后由荷兰政府直接統治印度尼西亚。——第80頁
- [2] 列宁：《亚洲的覺醒》。《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68頁。——第82頁
- [3] **国营铁路职工会**——成立于一九〇五年，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个現代工会。只有国营铁路的職員才得为會員，但不分民族。領導人都是荷兰職員。它不是一个战斗性的工人組織，不能滿足工人的要求。铁路电車工会——一个战斗性的铁路工人組織——一九〇八年在三寶壟成立之后，国营铁路职工会的會員很多轉入铁路电車工会，国营铁路职工会因之解体。——第82頁
- [4] **印度尼西亚协会**——印度尼西亚留荷学生的組織，一九〇八年成立。最初名为东印度协会，一九二二年改名为 *Indonesische Vereniging* (印度尼西亚协会，荷兰文名称。——譯者注)，一九二五年起改名 *Perhimpunan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协会，印度尼西亚文名称。——譯者注)。这是一个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組織，目的是爭取印度尼西亚的獨立。印度尼西亚进步的領導人，有不少早年就是这个組織的重要成員。——第82頁
- [5]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建議下成立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組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后即加入第三国

际。作为国际組織，第三国际在各地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领导了全世界发达的国家和落后的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运动，并使它们紧密地联系起来，互相支援。后来，形势有了变化，各国共产党在本国經受过斗争的考驗并成长起来了，共产国际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解散。——第 83 頁

[6] 見《克服我們的弱點》一文注一。——第 84 頁

[7] 見《民族光榮和民族意識》一文注一。——第 85 頁

[8] 見《克服我們的弱點》一文注二。——第 85 頁

[9] 見《民族統一戰綫及其历史》一文注三。——第 86 頁

[10] “**勞務者**”——日本語，即勞工。在印度尼西亞，勞務者是指那些被強迫無償地為日本法西斯政府服役的人。他們中備受摧殘致死的，以及日軍借口“保守軍事機密”故意殺害的，共二百万人左右。——第 86 頁

[11] 指“勞務協會”，專門從事征集并分派“勞務者”到印度尼西亞各地或緬甸、泰國等國去，以滿足日本法西斯戰爭的需要的機構。——第 86 頁

[12] **宣布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成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向盟軍投降。消息傳來，有些人半信半疑。但是，那些在日軍占領時期就已經參加愛國革命組織、從事抗日活動的人，却感到很興奮。他們立即準備從日軍手中接收政權，建立獨立和主權完整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下午，艾地同志在芝敬尼的印度尼西亞學生代表會宿舍和一些同伴見面，並要住在甲汶西里的威卡那召集一次會議。十九時正，會議在比徑山街的細菌研究所舉行，出席的有：威卡那、艾地、海魯·沙勒、佐哈·努爾、巴佐諾、阿曼沙、古斯南達爾、達威斯、蘇洛托·貢托、蘇巴地奧、蘇比安托、馬爾托諾等人。會議決定印度尼西亞應該立即宣布獨立。為了實現這一點，會議決定派威卡那、艾地、蘇巴地奧和蘇洛托·貢托把會議決議通知印度尼西亞各方面的領導人。當晚二十時正，他們到達比徑山東街五十六號加諾兄的住所，由威卡那代表大家發言。當加諾兄正在同這些青年代表商談時，哈達、蘇巴佐、伊哇·古蘇馬蘇曼特里、佐約普拉諾托、巴·地羅等也來了。經青年代表們再三敦促，蘇加諾表示他一個人不能作主，必須先同其他一些領導人商量。青年代表們便請加諾兄先同其他的領導人商談。後來，哈達代表參加商談的幾位領導人出來轉達他們的結論說，青年們的建

議考慮不周密，會造成很多傷亡和損失，因此，他們不能接受。當時，哈達還諷刺青年代表們說，他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曾經容易“頭腦發熱”，後來年紀大了，頭腦也就冷靜起來，無論什麼問題，都要作“周密的考慮”；哈達這一段話是否也是那幾位領導人一致的意見，可就不得而知了。威卡那回答說，既然各領導人的意見是這樣，要是人民自發地行動起來，青年們可就不能負責。代表們把幾位領導人拒絕青年決定的消息帶回到在芝敬尼街七十一號召開的青年和學生的會議上，那時已經是二十四點了。到會的還有另外一些組織的代表，如慕哇地醫生、尤素夫·貢托、蘇卡尼和辛基等人。會議決定必須把蘇加諾和哈達帶到冷加士登洛去，這樣，在討論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任務時，就可以避開日本人。會議結束後，派蘇吉普托醫生、尤素夫·貢托和蘇卡尼三人到加諾兄和哈達的家里去。第二天清晨四時三十分，他們便把加諾兄和哈達帶到了冷加士登洛。當時，駐在冷加士登洛的保衛祖國軍，在烏馬爾·巴山的指揮下已經擺脫日本法西斯的束縛，冷加士登洛實際上已經形成一個獨立區。十六日早晨起，加諾兄和哈達就同各個組織的青年代表在冷加士登洛討論有必要對當時要求立即獨立的人民進行領導的問題。

與此同時，迎接將於次日宣告成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準備工作也在雅加達市內進行。八月十六日上午十時正，青年代表們同保衛祖國軍和“兵補”的代表舉行談判。此外，在艾地、魯克曼、西狄·格達巴蒂、蘇哥、貢地宛·慕爾約諾、約諾、沙姆蘇丁、哈那非等人的領導下也正進行着動員雅加達和附近各地人民群眾的工作。另外還安排了人力，準備散發宣布獨立的消息，和發動各地區響應。為此，在十六日下午十六時正在新氣街阿慕南托的家里舉行了會議。出席的有：西狄·佐約蘇卡托（現已去世）、威達塔、卡托班多約、蘇約諾、巴·地羅、阿慕南托、伊努·格達巴蒂、松多羅、烏頁·埃芬第等人。

青年組織、保衛祖國軍和“兵補”三方面談判的結果，一致同意在人民的支持下採取武裝行動，摧毀日本軍事政權，把雅加達接管過來作為共和國的首都。武裝行動將首先由保衛祖國軍和“兵補”在八月十七日晨一時正開始。可是由於準備不夠，特別是由於城區里有一部分人猶豫不定，所以這一計劃沒有實現。準備停妥，就要沖入市區的群眾等候很久，還是看不到原來約定從市區內發出的信號。原來，在預定起事前

四个钟头，即十六日二十时十五分的时候，保卫祖国军的通讯员送到大团长卡斯曼·新哥第墨佐的决定说：“必须有上级命令，保卫祖国军才能参加武装行动。”第二次计划和第三次计划也未能实现。武装行动不能实现的原因有二：第一、武装力量的领导机构内部，没有坚强的革命核心；第二、城区内外的活动配合得不好。虽然日本法西斯的威风已经打垮，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还不得不是在日军的刀光剑影下宣布的，它的原因就在这里。

后来，加诺兄确信日本已经投降，而他本人是得到人民群众和青年支持的。这样，他就表示愿意签署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号召人民立刻同时行动起来。加诺兄已经首肯，哈达便难于退缩，只得同意加诺兄的决定。独立宣言要在雅加达签署和公布，因此，青年们在八月十六日二十二时正把加诺兄和哈达送回雅加达。二十四时正他们到达雅加达市内，立即起草宣言。独立宣言拟就后，于八月十七日晨二时正正式签署，在场的有各爱国主义组织的代表。此后，雅加达及其他各地开始了武装斗争，以保卫独立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主权，反抗以“盟军”名义行动的日本军队，反抗美国支持下的英国军队和荷兰军队。

本来，选定伊加达广场为公布宣言的地点。当时任副市长的苏维利约命令下属为此进行准备。他的下属布置准备活动都是通过电话进行，以致为日本宪兵队获悉，所以，全部计划临时改变。要到伊加达广场集合的“先锋队”等组织和工人群众等接到通知后，便改到比径山东街五十六号参加宣布独立的仪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上午十时正，加诺兄宣读了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参加这一仪式的有一部分雅加达的市民。在“同盟通讯社”工作的工人印刷了很多份独立宣言，在雅加达全市散发，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电讯部门的铁路工人把消息发到全爪哇各地去，在“同盟通讯社”工作的工人又利用通讯社的电台向全世界拍发消息。广播电台的工人也播送了消息。这样，全世界便知道，依靠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力量，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在东南亚建立起来了。——
第 87 页

- [13] 荷兰没有能力对付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当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队代表盟军负责到印度尼西亚解除日军武装的时候，荷兰采取“跟进来”的办法把军队派进印度尼西亚。由于使用了这种诡计，荷兰

就能够进入雅加达、三宝壟和泗水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和城市。——第 88 頁

- [14] **斡旋委员会**——荷兰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发动第一次殖民战争进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因此一九四七年八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成立一个斡旋委员会，由美国、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各派代表一人组成，所以，又名三国委员会。事实上，这个委员会不是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而是更多地为荷兰殖民主义者效劳，而在这方面美国代表最有“功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美国军舰倫維尔号上谈判时，斡旋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格拉罕博士还威胁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团說，如果印度尼西亚不接受荷兰的要求，那么美国将不反对荷兰强行使用武力解决糾紛。

荷兰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后，一九四九年一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斡旋委员会改为联合国印度尼西亚委员会，委员还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比利时人。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一月在荷兰的海牙召开圆桌会议举行谈判的时候，这个委员会，尤其是美国代表美尔勒·柯契兰給荷兰帮了很大的忙。——第 90 頁

- [15] **袋形障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八月革命时期处于荷兰占领区包围中的共和国的地区。——第 90 頁

- [16] **“消灭赤色分子的建議”**——“茉莉芬事件”就是这个“建議”的产物，很多印度尼西亚爱国志士在这一事件中牺牲了。——第 91 頁

- [17] **进出口銀行**——全名叫“华盛顿进出口銀行”，是美国政府控制其他国家经济的工具。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二日苏基曼政府和这家銀行訂約，获得貸款一亿美元。貸款附有严重損害印度尼西亚利益的苛刻条件。例如：其中規定用这笔貸款购买的一切物资，必須由美国輪船承运；在第一个五年的期間內，印度尼西亚每半年必須向进出口銀行提交报告一次，詳細开列所收到的款項、設備、原料、給养，以及服务项目等援助的使用情况，而进出口銀行对这一切有权进行监督。——第 97 頁

- [18] **“急进同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中旬成立的民族統一战綫組織，参加的有：伊斯兰教联盟、至善社、英苏林德党，“巴巽丹”和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等。

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成立的民族統一战綫組織，参加的有：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伊斯兰教

联盟党、至善社、“巴巽丹”、苏門答腊协会、巴达維亚人联合会、印度尼西亚讀書会等。苏加諾工学士、古苏莫·烏多約和譚林等都是这一机构的领导人。

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一九三九年五月成立的民族統一战綫組織，参加的有：大印度尼西亚党、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巴巽丹”、米納哈沙联合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党、印度尼西亚天主教政治联合会等。成立初期的秘书处由阿比古斯諾（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譚林（大印度尼西亚党）和阿米尔·沙利弗丁（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等人組成。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在印度尼西亚成立議會”，組織民兵准备抵抗日本法西斯。——第 109 頁

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为爭取自身权利而斗争

- [1] “战时戒严令”——荷兰殖民政府的法令之一。在战时戒严情况下，一切权力完全集中到軍事当局手中。到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时期，哈达政府在一九四八年茉莉芬挑畔事件时第一次沿用了这一法令，后来納席尔政府在一九五二年又沿用它来鎮压革命运动。——第 117 頁
- [2] **仲裁委员会**——根据第十六号紧急法令而成立的調解劳資糾紛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政府、工人和資方的代表組成，但是劳工部长有最后决定权。后来，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議會通过的劳資糾紛調解法，才組成新的委员会来代替这个委员会。——第 118 頁
- [3] **世界工会联合会**——最大的进步的國際性工会联合組織，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巴黎成立。到一九五七年間，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有八十二个国家的工会，會員共一亿零五百万人，总書記是法国工会的领导人路易·賽揚。世界工会联合会在綱領中規定，維護各国劳动人民經濟社会利益和民主权利，反对战争，坚决为全世界工人的团結而斗争，等等。它在联合国經社理事会享有甲級諮詢地位。——第 120 頁
- [4] 見《國內出現了自圓桌會議以來未曾有過的大好形勢》一文注四。——第 122 頁
- [5] 見《國內出現了自圓桌會議以來未曾有過的大好形勢》一文注二。——第 122 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建立一个統一战綫政府

〔1〕 **日里农場主联合会**——十九世紀末叶外資烟草企业主成立的 壟断 組織。一九五二年十月它并入东苏門答腊橡胶园主联合总会。

东苏門答腊橡胶园主联合总会——全北苏門答腊的橡胶园主和油棕园主的联合組織，它一般地决定工資、工人劳动条件、农場的技术等問題。荷兰、英国、美国、比利时等外国資本主义大企业都参加了这个組織。

一九五二年烟草园主也参加了东苏門答腊橡胶园主联合总会。一九五七年底荷兰农場被接管后，改名为北苏門答腊农場企业联合会。——第 126 頁

〔2〕 **西狄·格达巴蒂的提案**——在議會中提出的要求把韦洛坡內閣內政部长穆·罗姆撤职的一项提案，因为他制造了丹絨麻拉哇恐怖事件：警察开枪射击农民，造成死亡，以及用拖拉机压毁农民的作物。——第 126 頁

〔3〕 **渣斯哇第修正案**——对韦洛坡政府（财政部长、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人苏米特罗·佐約哈第古苏摩）提出的一九五三年股份公司稅則草案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的目的是通过把小企业的稅率定低、把大企业的稅率定高的办法来保护民族企业家。表决結果，議會以五十九票对四十一票通过了这项修正案。

倫多奴烏提案——一九五三年二月九日提出的提案，要求政府尽速在一九五三年在苏联設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使館。

吉宛提案——就韦洛坡內閣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公布的新进口条例而提出的提案。这项提案的内容主要是請政府尽速把有关法令草案提交議會审議，以便代替过去仅仅由部长制定的各种条例。議會以九十七票对零票通过了这项提案。——第 127 頁

反动派的歇斯底里

〔1〕 **农业总辛迪加**——爪哇农場主的联合机构，主要是商定工資、雇用工

人、配給工人物資、糾紛和進出口等問題。後來，這一機構也處理爪哇以外沒有加入任何機構的一些農場的有關問題。一九五七年年底荷蘭農場被接管後，這一機構改名為印度尼西亞大農場企業聯合會。——第 133 頁

- 〔2〕**都庫（奔渣）**——雅加達市南面離市區約九十公里的山區休憩勝地，反動派常常在這個地方開會。——第 134 頁

建立民族統一戰綫政府的時機 已更加成熟了

- 〔1〕**荷屬東印度民政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荷蘭人跟在盟軍後面進入印度尼西亞，這是當時荷蘭為重新統治印度尼西亞而建立的殖民政府所採用的名稱。——第 137 頁

印度尼西亞農民運動的前途

- 〔1〕**波羅哥羅**——農民必須向鄉村公署人員交納賦稅的一種形式。例如：農民買賣牲畜、房屋等，必須交納一定的現金；宰殺牲畜時，必須奉獻一部分肉類；婚喪喜慶宴請客人時，必須餽送食物等。

強迫勞役——使農民處於奴隸地位的勞役地租制度，名目很多，例如：替鄉村公署人員服役，護送和接待政府的客人，修繕或興建道路、堤堰、房屋等等，這一切都是無償的強迫勞役。——第 144 頁

- 〔2〕**土地國有法**——宣布和確認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亞全部土地的所有權的法令。——第 145 頁
- 〔3〕這種期限通常規定在各種合同里，像“長期租借權”的有限期限是七十五年、“地面建築權”的有限期限是三十年，但這些期限僅僅是形式上的規定，實際上可以隨意延長。——第 145 頁

民族團結和民族警惕

- 〔1〕**朝鮮停戰協定**——打着聯合國旗號的美國軍隊在朝鮮作戰約達三年之

久，在它显然沒有力量繼續侵略朝鮮人民以后，才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同朝鮮人民軍和中国人民志願軍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第 156 頁

- [2] **伊斯兰教国运动**——一九四八年三月成立的以伊斯兰教作幌子的地主恐怖組織，它的目的是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宣布成立所謂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国，同时把他們的武装集团定名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卡尔多苏維利約领导的这个运动，得到外国农場主的全力支持，荷兰殖民軍的杀人魔王，如荣斯拉赫、斯密特、波士等人充当了这一运动的头目。——第 157 頁

加强共和国的地位

- [1] **“欧洲防务集团”**——几个西欧国家在美国指揮下簽訂的条約，以西德作为核心力量，目的在于复活德国法西斯軍事力量，滿足侵略需要。——第 160 頁
- [2] **罗森堡夫妇**——朱利叶斯·罗森堡和伊斯尔·罗森堡，夫妇二人都是美国公民。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战争歇斯底里和反共高潮的情况下用电刑把他們处死。橫加在他們身上的罪名是盜物原子秘密供給苏联。这一沒有根据的誣告和野蛮的杀害案，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怒和抗議。——第 161 頁
- [3] **武装部队內部具有进步性质的人事調整**——指撤換那些同一九五二年“十·一七”政变有关的軍官，取消參謀总长这一职位，后来改用海陆空三軍參謀长联席會議制。——第 162 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不断傳播 民族团結的理想

- [1] **包含民主因素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綱領**——这个綱領包括如下規定：
——修改恢复治安政策，俾能采取明确措施和发动人民力量；
——立即举行制宪議會和議会的普选，努力实行地方自治，直到最低一

級行政区；

——尽速地使西伊里安归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

——执行独立的和为了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

——把建立在《联邦法規》基础上的印度尼西亚荷兰关系改为一般的国际关系；

——努力把不能在內閣中解决的一切政治分歧提交給議會作出决定。

——第 168 頁

〔2〕 **右翼社会党**——这是人民对沙里尔和苏米特罗·佐約哈第古苏摩等人领导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叫法，苏米特罗·佐約哈第古苏摩目前領導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約章”集团的叛乱。这个党仅仅是名义上叫做“社会党”，但实际上拚命保护帝国主义分子。——第 168 頁

〔3〕 **全亚齐伊斯兰教学者联合会(馬斯友美党)**——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在穆·道特·貝魯领导下成立。一九五三年九月全亚齐伊斯兰教学者联合会背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动叛乱，并且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合并。見《**民族团結和民族警惕**》一文注二。——第 171 頁

〔4〕 **沙弗魯丁实行剪币**——这是把紙币剪成两半，严重損害人民利益的措施。这一措施是哈达政府財政部长沙弗魯丁·普拉威拉尼卡拉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实行的。荷兰人資本家从这次剪币中获利至少五亿印度尼西亚盾（当时印度尼西亚盾和荷盾的比率是一比一），而人民所受的損失則至少十五亿盾。

这次剪币使印度尼西亚盾的汇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与采取剪币措施的同时，当时还实行了所謂外汇证制度，这个制度規定进口商必須支付申請进口貨物总值的百分之二百的进口附加金，这样就使得印度尼西亚盾的汇率只等于三分之一荷盾。

沙弗魯丁后任印度尼西亚銀行行长，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間，他繼續保护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資本的利益。当他的罪恶政策将要被揭发时，他便逃跑去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約章”集团的“总理”。——第 176 頁

〔5〕 **柏林會議**——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苏联、法国、英国

和美国的外交部长在柏林举行的會議。这次會議就裁軍原則問題和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召开日內瓦會議問題達成了協議。

日內瓦會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會議，并且就結束印度支那殖民战争問題達成了協議。——第 180 頁

为爭取更大的成就而繼續前进!

[1] **社会党**——由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领导的革命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 (PARSI) 同苏丹·沙里尔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人民党 (PARAS) 合并而組成的政党。这次合并为苏丹·沙里尔瓦解社会党开辟了道路。一九四八年二月苏丹·沙里尔从社会党分裂出去，另建印度尼西亚社会党 (PSI)。

左翼陣綫——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社会党、印度尼西亚劳工党、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运动协会 (梭罗) 組成的联合組織。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年初改为人民民主陣綫，它的會員团体也有所增加，如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等革命群众团体也参加了。——第 182 頁

[2] 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在中爪哇利用“伊斯兰教教徒軍”和慕那瓦尔少校领导的四二六营的名义发动叛乱。后来根据中爪哇反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的斗争經驗，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就被宣布为必須坚决予以消灭的国家敌人。消灭他們的有效方法是，动員人民参加，才能在短時間內扑灭这种叛乱。——第 186 頁

印度尼西亚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

[1] 关于斯大林对現代資本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的表述，有必要明确指出的是，不論是在壟断前的資本主义时期或者是壟断資本主义或現代資本主义时期，作为基本經濟規律的剩余价值規律仍然有效。只是它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在壟断前的資本主义时期，剩余价值規律主要是

通过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表现出来，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是通过高额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表现出来。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现已修改补充如下：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最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第 192 页

〔2〕 **美澳新安全条约**——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订立的侵略性条约。

企图在亚洲地区订立的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的太平洋公约——美国帝国主义领导下在亚洲订立的侵略性公约。——第 197 页

〔3〕 **伊朗夺取政权的事件**——一九五一年伊朗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摩萨台担任内閣首相。在他执政期间，伊朗把英国帝国主义控制的石油企业即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帝国主义者反对这一国有化措施，并力图使摩萨台政府撤销它。国内动荡不定的结果，亲帝国主义的伊朗国王被迫逃往国外。美国帝国主义在反对摩萨台的同时，与伊朗的买办分子合作排挤英国，并取代了英国的地位。一九五三年八月法西斯主义分子法兹罗拉·萨希迪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帮助下推翻了摩萨台。伊朗国王被请回国，而摩萨台则被捕并被判重刑。——第 198 页

〔4〕 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进步运动的日益发展，印度尼西亚政府制定的“独立积极”外交政策就日益明显地表明，它不认为自己在战争与和平以及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问题上是中立的，而认为自己是站在和平和反殖民主义一边。——第 200 页

〔5〕 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 200 页

〔6〕 目前存在着两个德国，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们的社会制度极不相同并且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由于这一事实，两个德国的统一必须通过合乎客观实际的共同发展过程，并由德国人民自己确定。目前德国人民所争取的方式是，采取两个德意志共和国成立邦联的途径。两个共和国也可以分别签订和约。——第 201 页

〔7〕 **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圆桌会议协定规定印度尼西亚必须承认荷兰女王为联邦元首，并且在有关“印度尼西亚荷兰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必须事先同荷兰谈判。经过印度尼西亚人民长期的斗争，这一联邦终于在一九五四年解散。——第 205 页

〔8〕 **国际橡胶研究小组**——垄断资本家控制的国际组织，它管理和确定橡

胶的生产和銷售的份額等。——第 206 頁

- [9] **苏米特罗外汇条例**——这一条例規定，进口商申請外汇必須先交出极高的預付金（占申請进口貨物总值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七十五），只有外国大資本进口商才能履行這項規定。印度尼西亚民族进口商一般是弱小的，結果，他們只能被迫停业或充当外国大資本的代理人。——第 206 頁
- [10] 除了哈达式的合作社即剝削者的合作社之外，也建立了劳动人民合作社即劳动农民合作社和工人合作社，这是劳动人民为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担的斗争工具。共产党人不断地在劳动人民合作社中間进行工作。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对劳动人民合作社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劳动人民合作社本身也有了广泛的发展。——第 207 頁
- [11] 見《**民族团結和民族警惕**》一文注二。——第 208 頁
- [12] 參閱本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建立一个統一战綫政府**》至《**民主对法西斯的輝煌胜利**》等文。——第 210 頁
- [13] 同注十二。——第 214 頁
- [14] **丹絨摩拉哇土地問題**——由于韦洛坡政府內政部长穆·罗姆（馬斯友美党）企图夺取农民土地而在丹絨摩拉哇（北苏門答腊）发生的土地糾紛事件。这些土地原是外国农場的土地，但是自日本占領时期以来就已为农民自己耕种。根据穆·罗姆的命令，北苏門答腊省省长阿卜杜尔·哈金姆（同屬馬斯友美党）下令軍警用拖拉机压毀农民的作物和房屋。这一事件因造成死亡而获得“死亡拖拉机”的臭名。农民英勇地反抗这一殘暴措施，并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持。这一反动措施是促使韦洛坡內閣倒台并代之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內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阿里政府撤掉了阿卜杜尔·哈金姆的职务，并且頒布了一九五四年第八号紧急法令，以設法解决上述土地糾紛事件。关于这个法令，詳見本卷《**八月革命万岁！**》一文第 276 頁。——第 215 頁
- [15]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主要是进行了反对陈舜如主义偏向的斗争。陈舜如主义偏向不願执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決議，以致大大地妨碍了党的进展。《新道路》路綫胜利的結果，中央全会选出了由艾地同志領導的新的政治局。

自从这个时候起，党就获得了迅速的进展。——第 217 頁

- [16]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这次會議草拟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成果，因为过去在組織方面产生混乱的原因之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明确的和完善的党章。一九四七年在梭罗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总綱和章程显然太过简单，而且不够正确，后来由于发生了茉莉芬挑衅事件，所以也就没有能够制定新的党章，虽然这本应是《新道路》決議的必然繼續。由于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章草案，以及在后来党的建設工作中貫徹执行了党章，因此每一个党员在日常工作中就有了基本准则。——第 217 頁
- [17] 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不断傳播民族团結的理想》一文注五。——第 232 頁
- [18] 开始扑灭反共和国的荷兰殖民主义者阴谋集团——意指逮捕充当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重要头目的荷兰人，如前荷兰殖民軍軍人荣斯拉赫、斯密特等。——第 232 頁
- [19] 阿里政府把关于恢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对西伊里安的管轄权和取消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等項規定列入它的政綱。为了执行政綱中的这些規定，政府把西伊里安問題提到联合国大会，并且設法派遣代表团赴荷兰，爭取解散联邦。——第 232 頁

关于陈舜如主义

- [1] 見《为爭取更大的成就而繼續前进！》一文注一。——第 236 頁
- [2]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 175—176 頁。——第 240 頁
- [3] 《紅星》杂志第六卷第三期，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第 242 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1] 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馬斯友美党控制的組織。——第 256 頁

八月革命万岁!

- [1] **哇德斯**——諫义里附近的一个乡，这里有很多外資农場的土地。革命时期，經過政府和軍事当局的批准，农民耕种这些土地以支援反抗荷兰的战争，好多人已經在这些土地上安家落户，形成許多新的村落，并設有各种政府机构。一九五一年苏基曼政府（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联合內閣）时期，这些村落的居民被赶走，农民的庄稼被拖拉机翻掉。农民对此进行了自卫和反抗。——第 275 頁

爭取印度尼西亚一切民族力量更广泛的团結

- [1] 《**經濟指标**》杂志——美国国会出版的經濟文摘。——第 296 頁
- [2] **科倫坡會議**——印度尼西亚、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和錫兰五个亚洲国家的总理一九五四年四月在錫兰首都科倫坡召开的第一次會議。會議的重要成果是：为亚非国家不分政治观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平等的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气氛。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茂物召开第二次會議，为一九五五年四月在万隆召开亚非會議作了准备。——第 300 頁
- [3] **达朱丁·努尔等人的倒閣活动**——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成立的內閣，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法学士（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任总理，旺梭尼哥罗法学士（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任第一副总理，蔡努尔·阿里芬（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任第二副总理。这一內閣成立前，以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为首的反动派就設法加以阻撓；这一內閣成立后，由于它所采取的措施有許多是对帝国主义不利的，反动派更是不断設法推翻它。后来，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同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的一部分人勾結起来。这一部分人以达朱丁·努尔（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議會党团主席）为首，把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分裂成旺梭尼哥罗派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和达朱丁·努尔—哈蔡林派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这样，議會中支持阿里內閣的票数就減少了。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分裂后，他們在內閣中担任部长的党员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全都退出內

閣，企图以此推翻阿里內閣。然而反动派并没有得逞，阿里內閣进行改組，吸收了国家人民党、白尔蒂伊斯兰教党和旺梭尼哥罗派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的代表入閣以后，仍旧坚持下去。但是，反动派推翻阿里內閣的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不久之后，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尤素夫·維比梭諾法学士（馬斯友美党）、达朱丁·努尔（大印度尼西亚統一党）、苏巴第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卡西莫（天主教党）、丹文南（基督教党）和恩格尔（联邦派分子）等議員提出对內閣的不信任案。表决結果，九十二票对一百一十五票，这一提案也未能通过。——第 304 頁

- 〔4〕**麦卡錫主义**——以法西斯分子、美国參議院議員麦卡錫为急先鋒的美国法西斯主义的表現形式，他們采用恐怖手段来蹂躪美国的民主。——第 312 頁

控訴茉莉芬事件

- 〔1〕**苏普拉多法学士**，建設派議會党团的主席，迪·努·艾地案件的辯护人。

辯护詞全文如下：

檢察官的起訴不能成立

（就对被告人迪·努·艾地的控訴提出的抗辯詞，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雅加达地方法院开庭时宣讀。）

第一部分抗辯

根据起訴书，被告人因为犯有利用印刷品进行誹謗罪而被起訴。构成犯罪行为的文章刊載于《人民日报》，并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向公众散布。

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項，对利用印刷品的犯罪行为和違法行为的起訴权，其时效是一年。这项期限根据刑法第七十九条是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起算，到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截止，因此，起訴权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消灭，除非起訴迟誤的原因由于起訴行为已为被告人所知曉或已通知被告人而被免除。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說明以下几点情况：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最高檢察署的檢察官已經對被告人進行了訊問。對被告人進行的上述幾次訊問並不是刑法第八十條所指的起訴行為。依據刑法學家的意見，像檢察官已進行的上述訊問不是起訴，而只是一種偵查。諾雍和朗額美耶在他們合著的《刑法》一書中（第一卷，一九五四年版，第444頁）和諾雍在他所著的《刑事訴訟法》一書中（一九二六年版，第3頁）都提出了這種看法，書中指出：“唯有當控訴已向法官提出，或以其他方式已將案件提交法官，起訴程序方稱開始。”司法判例也接受這種看法，如日惹地方法院在其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判決中（見判例匯編第一百四十六卷，第396頁）說道：當案件卷宗尚未送交地方法院院長以前，不能說已經有了一個被告人，而只可以說有一人可能被控告。前棉蘭法院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七日的判決中（見判例匯編第一百三十六卷，第185頁），前最高法院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的判決中（見判例匯編第一百四十六卷，第378頁）及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判決中（判例匯編第一百四十八卷，第117頁）皆持有同樣意見。

檢察官已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將有關被告案件的卷宗送交地方法院院長，縱令該行為被看作起訴行為，該行為仍然完全不能免除起訴遲誤效果，因為，無法證實，該行為已為被告人所知曉或已通知被告人。

由以上所述，可以得知：本案件的起訴時效自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起算至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截止，遲誤效果沒有免除。

雅加達地方法院法官根據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1954/3990號起訴書決定，雅加達地方法院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開庭訊問被告人，並命令地方法院檢察官傳喚被告人屆時出庭，同時將起訴書內容通知被告人。

顯然，該起訴書沒有法律效力，因為起訴已經遲誤，起訴時效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消滅。

撇開上述起訴書是否在“有效期間”內提出的問題不談，上述起訴書無論如何不能免除遲誤“效果”，因為，無法證實，起訴書的提出已為被告人所知曉或已通知被告人。

根据印度尼西亚新法典第三百九十条，给被告人有关控诉的通知应在当事人的居所或住所送达当事人亲收。如果当事人不在，则责成村长立即通知本人。检察官没有执行该规定，因为，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对被告人发出的通知或传票并没有送达被告本人，被告人那天确是外出、不在家中，但是发现被告不在家中以后，上述通知并没有送交村长，由他通知被告人。

除了上述关于控诉通知没有履行法定的条件外，也必须注意以下的情况：即使认为起诉权的时效是从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即自检察官进行侦查的最后一起算，起诉仍然已经迟误，因为，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即在“有效期限”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结束以后——再次进行通知，而被告人仍然不在家中，检察官没有依据印度尼西亚新法典第三百九十条行事。

基于上述各项事实，我请求地方法院院长先生閣下裁定，起诉权已经消灭，至少应裁定，对被告人提出起诉缺乏充足理由。

第二部分抗辩

根据主要控诉与从属控诉，被告人被控以违反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与第二百零七条的罪名。

根据临时宪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九十二条，适用于大雅加达地区的刑法条例是未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定都于日惹时颁布的一九四六年第一号法令修改的“印度尼西亚刑法”。在荷兰移交主权以前，大雅加达市不属于一九四六年第一号法令的法律管辖范围，所以大雅加达市仍旧沿用未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日惹时期）上述法令修改的刑法。（见恩黑布莱黑：《法律全书》，第1104页）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和第二百零七条的内容至今仍是维护过去统治我们民族的外国国王、女王和外国政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独立以后，印度尼西亚民族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制订了宪法，所以，上述法律条文是同我们的独立原则和宪法相抵触的。

被告人作为一个参与保卫独立宣言的印度尼西亚男儿，如果现在被控以触犯维护殖民主义的刑法条款，那真是咄咄怪事。

根据以上所述，我請求地方法院院长先生作出裁定，宣告对被告人提出起訴是沒有充足理由的。

檢察官的起訴是違宪的

(本辯护詞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雅加达地方法院法庭上宣讀。)

我作为本案件的辯护人，願意首先向院长先生表示最高的敬意，由于院长先生在审理被告案件时表现的賢明态度，使法院的审讯得以順利进行。所以，我也願意提供帮助，以便尽速結束本案件。

一、起訴难道沒有迟誤嗎？

(1)如先生所知，我已就对被告人的起訴提出抗辯，我认为，起訴已經迟誤。虽然，法庭拒絕了我的抗辯，但是，我不会因而就此罢休，而要继续全力坚持我的論点。在这方面，我想就我以前已經提出的抗辯补充几点理由，希望院长能改变过去的裁定。

(2)先生在卷宗中能讀到檢察官先生在他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函中的一段陈述，其主要内容是說明被告人尚未能傳喚到庭。公函的部分內容如下：

“关于傳喚被告人迪·努·艾地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出庭听候雅加达地方法院法官审理其案件一事，我們謹此通知：上述被告人还未能傳喚到庭，因为他不在居住处所……”

由于这一事实，产生了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的审判庭是否合法的問題。

(3)为了回答这一問題，看来我們首先需要參看印度尼西亚新法典第二百五十条第一款，該条款規定，如果已經依法傳喚被告人，檢察官应就此情况书面通知地方法院。

檢察官先生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的公函正好說明，沒有依法傳喚被告人。难道檢察官先生不是自己說：被告人还未能傳喚到庭，因为他不在居住处所？而依据印度尼西亚新法典第二百五十条第八款的規定，控訴通知應該轉由区长送達。

(4)因为尚未或沒有依法傳喚或通知被告人，所以，地方法院如果

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开庭审理被告案件，那是非常錯誤的。印度尼西亚新法典第二百五十条第十款明文規定，审判长决定开庭日期时应該注意：

甲、被告人出庭所需要的时间。

乙、通知控訴书内容和开庭日期之間所应有的間隔时间。

明知起訴书的内容尚未或沒有通知被告人，而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开庭，这显然違反刑事訴訟法。因此，地方法院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的审判庭是不合法的，不能用作已經把控訴通知被告人的根据，从而免除起訴迟誤的效果。

(5)根据以上对抗辯詞的补充陈述所得的結論，我坚持原有的看法：本案起訴已經迟誤。

二、用以控訴被告人的法律条款是与宪法相抵触的(違宪的)。

(6)根据已經修改的起訴书，被告人被控訴的主要罪名是違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从屬罪名是違犯刑法第二百零七条。在本案件中，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和第二百零七条真的能作为控訴的法律根据嗎？为了回答这一問題，我們首先應該根据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和临时宪法来研究何种刑法适用于雅加达。

(7)根据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自該宪法生效之日起，这一尚未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日惹时期)一九四六年第一号法令修改的刑法在雅加达依然有效，因为，在荷兰統治时期和在荷兰向印度尼西亚移交主权的时刻，这一未經修改的刑法已經存在，并适用于雅加达。但是，宪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規定，繼續生效的法令、法律只是法律中不違背恢复主权的决定和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条文的那些部分。因此，上述刑法中的条款并非全部有效。殖民性质的条款不再符合我們独立的主权的法制国家。殖民性质的条款是和宪法的規定相抵触的，而宪法的这些規定如宪法第一条那样是无需实施法令或条例的。因此，根据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刑法中殖民性质的条款是无效的。

(8)第一百三十四条屬於同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相抵触的条款，因为这一条款的制訂是为了維護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們的

国家是主权的共和制的法制国家，因此，我們不可能承认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百零七条同样也是同我們国家的主权相違背的，因为第二百零七条除了維護印度尼西亚現有的政权外，还維護荷兰的政权，甚至于可以說維護荷兰政权更甚于維護印度尼西亚政权。因此，自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生效之日起，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和第二百零七条就宣告失效。

(9) 自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解散成立单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以后，已經失效的第一百三十四条和第二百零七条当然还是繼續无效，因为临时宪法里的过渡規定的含义，也和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的第一百九十二条相同。临时宪法的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其精神和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第一款和第二款相同。根据临时宪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尚未依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九四六年第一号法令修改的刑法在雅加达还是依然有效，因为，在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已經存在的，并繼續在雅加达有效的仍然是这一未經修改的刑法。从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到現在，这一刑法未作任何修改，而一九四六年第一号法令也沒有被宣布适用于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地区。

因此，原来由于損害主权、違背宪法条文因而失效的法律条款，还是繼續无效，因为临时宪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也不允許沿用和临时宪法的規定相抵触的法律条款，而临时宪法的規定如第一条的規定是无需实施法令或条例的。

(10) 鉴于可能有人认为第一百三十四条和第二百零七条已經根据一九四六年第一号法令自动修正，我在这里想說明，这样的意見是錯誤的，至少是和立法者的意見不符合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以下的例证：为了宣布在全印度尼西亚实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九四八年的劳工法，曾頒布一九五一年第一号法令。倘若一九四八年的劳工法可以被认为已經自动适用于全印度尼西亚，那就无需頒布一九五一年第一号法令，宣布它适用于全印度尼西亚。

立法者认为，雅加达地区不屬於前印度尼西亚法規的管轄范围，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第四号政府法令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說得更明确。在那里面区分了一九四八年劳工法实施的不同地区，即在雅加达地区、在

前屬东印度尼西亚邦、东苏門答臘邦和西加里曼丹邦等地区实施劳工法的时间，不同于被认为屬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地区或者实施一九四八年劳工法的地区。从这事实可以看出，立法者并不认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法規，其中包括一九四六年第一号法令，也自动适用于雅加达地区。

(11)如果有人认为，人們可以把第一百三十四条的国王一詞解釋为总统，把女王解釋为副总统，而第二百零七条里的荷兰字样可以认为完全不存在，那么，这种解釋无非是說明他們想不顾刑法第一条規定的刑法准則来任意判处刑罰，刑法第一条体现了反抗暴虐压迫的民主斗争的胜利成果。刑法第一条的条文内容，是和法学上的一句拉丁文的名言“*nullum delictum, nulla poena sine praevia lege poenali*”(法无明文在先，不为罪，不处罚)一致的。这是一七八九年爱好正义的人們所宣布的人权的内容之一(見《人权宣言》)。这一人权不可侵犯。前面的名言是說，只有法律才能宣布某一行为应该处刑判罪，如果法律对于某一行为无明文規定时，法官不得利用解釋法律的方法宣布某一行为可以判罪(參見哈塞威克和苏林阿合著的《荷兰刑法导論》，一九五三年版，第276頁)。違反这一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名言，对我们国家來說，是意味着灾难，因为它将导致肆意違反正义的行为。正义是民主国家的基础，因为，借用亚里斯多德的話來說，正义能給一国的一般人民带来幸福(參見封·史密梯：《国家与法的偉大思想家》，第25頁)。

三、主要控訴

(12)撇开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是否有效的問題不談，我在这里想闡明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要点。第一百三十四条包括的要点是：

甲、誹謗；

乙、蓄意行为。

(13)我首先要談誹謗的問題。第一百三十四条所指的誹謗应该根据第十六章的解釋来加以說明。在第十六章里我們可以看到誹謗罪有以下几种：誹謗，散布文字进行誹謗，侮辱，散布流言損害他人的名譽信用。第一百三十四条所列举的各种形式的誹謗皆科以同級刑罰，全部列为同一性质的罪名——誹謗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們不可以援

引第十六章有关“誹謗”或以“散布文字进行誹謗”的行为的条款，如果根据第一百三十四条所說的誹謗确实是“誹謗”的性质。因此，如果像在本案件中，被告人被控以进行誹謗的罪名，其性质是第三百一十条第二款所指的“散布文字进行誹謗”，那么，被告有权援引第三百一十条第三款，要求不予論处，因为他的行为是为了公众利益和必要的防卫。諾雍在闡述荷兰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时說，即使是对国王也可以行使維護公众利益和进行必要防卫的权利。（見諾雍：《刑法》第一册，一九五四年版，第567頁）

(14)被告人在反駁檢察官对他的起訴時曾提出，他发表本案現在审理的这篇声明，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和必要的防卫。这一反駁非常重要。我們知道了这一点，便了解纵然存在着誹謗的問題——或确切地說纵然存在着散布文字进行誹謗的問題，对这种誹謗也不能处刑判罪（应免于刑事处分）。

(15)像被告人在庭上所表示的而檢察官先生和法官先生又未加以反駁的那樣，被告人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总書記不得不发表那項声明，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受到它的政敌的攻击。《永恒报》一九五三年九月四日刊載了日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前战斗人員联合会的一项決議，其中說：

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茉莉芬发动了叛乱，并根据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指示，宣告成立一个由慕梭和阿米尔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

乙、这次叛乱是对印度尼西亚国家和人民的大背叛和大罪行。

丙、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把九月十八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集团的共产主义分子在茉莉芬发动叛乱的日子定为国丧日。

丁、要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举行“哀悼游行”，游行时要充滿严肃的精神，并击鼓表示哀悼和悲痛。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南針报》刊載了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大雅加达市分会的声明，声明中提到：

甲、自从共产主义分子在茉莉芬夺到政权之后，价值数亿盾的国家财产被搶走了，他們在那儿建立了苏維埃政权并进行清洗。

乙、当时他們犯下了空前的暴行。无数的伊斯兰教学者、国家公

务員、軍人和伊斯兰教徒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

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也要求政府把九月十八日定为国丧日。

(16)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方面感到，其政敌所发动的攻击是一种誣蔑，是煽动人民仇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至少是为了激怒伊斯兰教徒，挑起他們的狂热情緒。关于这一点，我提醒大家注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蒙受的誣蔑：所謂无数的伊斯兰教学者和伊斯兰教徒遭到共产主义分子惨无人道的杀害。

(17)受到这种攻击，被告人身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書記的职务自然要进行防卫。我說这种防卫是因职务需要而进行的，是要說明被告人有必要进行防卫，因为他的地位使他有責任还击别人对他的党所进行的攻击。因此，他进行的防卫是非常必要的(必需的)。

(18)依据有关“被迫进行必要的防卫”的法律条款，第三百一十条第三款的不予論罪的原則不仅适用于被告人进行自卫的情况，而且也适用于他維護他人的情况，这也就是說，也适用于他維護他的党的情况，因为他接受他的党的委托担任党的主要負責人，也适用于他維護他已故的亲密战友的情况。(參見赫脫亨博斯法庭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判决书，N. J. 一九五四年版，第 1065 頁)

(19)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敌所发动的攻击歪曲了茉莉芬事件的真相，因为他們使用了聳人听聞的煽动性字眼，像“惨无人道地杀害”，“叛乱”，对“伊斯兰教学者、国家公務員、軍人和伊斯兰教徒”的“空前暴行”，所以，被告人认为，对这种攻击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損害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一般共产党人的名誉。被告人发表了本案正在审理的声明，意欲根据他亲身的經歷和目击者的报告說明事实真相，这些目击者願意在必要时出庭宣誓作证。

(20)如果被告在其声明中使用了挑衅这个尖銳的字眼，那也并不过分，只不过是用来說明发生在茉莉芬事件以前的一連串事实，像杀害苏达尔多上校的事件，綁架人民民主陣綫領導人的事件，迫害茉莉芬市政府公務員的事件等等。如果被告也用了“杀害”和“手上沾滿鮮血”这种詞句，那么这一情况也是与下面的事实有联系的：被政府监禁的阿米尔·沙利弗丁和他的同志們，据官方宣称，已依照軍法判决，而其实該案件並沒有經過审讯和处刑判决。如果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敌所使

用的字眼相比，可以得出結論說，被告人使用的詞句並沒有像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政敵在《永恒報》和《南針報》所使用的字眼那麼尖銳。

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政敵在文章中使用了“對印度尼西亞國家和人民的大背叛和大罪行”這樣的詞句，而被告人在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聲明中僅僅使用了發動內戰“有功”和消滅共产党人和愛國者的“英雄行為”的詞句。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政敵寫的是“慘無人道地殺害”，而被告用的是“挑釁”和“手上沾滿鮮血”這樣的詞句。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政敵誣蔑共产党人殺害伊斯蘭教學者、伊斯蘭教徒、國家公務員和軍人，這種說法顯然是蓄意渲染；相反的，被告人僅僅是指責其政敵殺害了愛國者。這裡還沒有把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政敵在攻擊中所使用的其他誹謗性的詞句包括在內，像，“搶走”、“叛亂”、“根據俄羅斯帝國主義的指示”等等。

(21) 非常有必要向公眾說明茉莉芬事件的真相和原委。人們非常有必要防止社會公眾受到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政敵的錯誤宣傳，而被引入歧途，在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政敵所挑動的敵視情緒的一時支配下，被挑撥、煽動和引誘來從事犯法行為。

(22)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被告人在庭上提出的要求是完全正當的；被告人要求對他不予以論罪，已經向法庭提出的理由是根據第三百一十條第三款的條文，那就是，他進行本案所審理的活動是為了公眾的利益，是為了進行必要的防衛，因為他身任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總書記的職務有責任維護印度尼西亞共产党。

(23) 讓我們再回來討論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要點之一——誹謗問題，在這裡我想談一談什麼是誹謗。只有當一個人的名譽蒙受損害時，才存在誹謗的問題。確定構成誹謗的行為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名譽，誹謗的客體，其意義是十分相對的。亞里斯多德說，榮譽與其說存在於受尊敬的人身上，毋寧說是更多地存在於崇拜者身上。關於這個問題可以把達利·穆迪阿拉先生對穆罕默德·哈達碩士的頌揚用來比較。名譽是和人們的道德評價有關，關於這一點，在法學理論中和司法判例是沒有不同意見的（參見西門斯一波姆貝，第二冊，一九四一年版，第55頁以下各頁，又見諾雍，第三冊，第三版，第十六章注三）。因此，對一個人的言行提出的批評不能構成誹謗，因為這種批評牽涉不到道德評價。

关于这个问题，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值得我们重视，那里面说，如果有人论及某一教授的教学内容时使用了诋毁性的词句，不能构成对该教授的诽谤，虽然这一事件的发生与该教授的职务有关。（最高法院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判决书，见 W. 7730）

(24) 根据第一百三十四条提出的控诉涉及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声明，其实该声明的内容不外只是对过去日惹哈达政府的政策或措施的一种批评。这一批评所用的言词虽然可能是指摘性的，但是不能说这一批评牵涉到对哈达先生的道德评价，因为这一批评是针对过去日惹时期的政府的政策。批评中如果提到了哈达先生的名字，那也不外是为了说明哪一届内阁同茉莉芬事件有关，因为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的内阁或政府已经更迭多次。

(25) 如果说对那届政府的政策的批评能损伤副总统的名誉，那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副总统并不对政府负实际责任。所以，不对政府负实际责任的副总统不可能因执行错误的政策从而受到批评。（参见诺雍：《刑法》第一册，一九五四年版，第一百一十一条，注三）

(26) 关于蓄意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所谓蓄意除了指诽谤是蓄意的以外，也应该指诽谤是蓄意对副总统进行的（倘若女王可以解释为副总统的话）。我认为，本案件中所谓蓄意这一点不能成立。被告人写声明时，并不知道他这篇声明会有诽谤的性质，因为他的用意不是要诽谤任何人，而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敌发动攻击时进行防卫。

(27) 被告人也完全没有诽谤副总统的意图。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到副总统，而是提到哈达—苏基曼—纳席尔政府，那是指哈达硕士过去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内阁，在那届内阁中哈达硕士担任总理，苏基曼医生和穆罕默德·纳席尔都担任部长。

(28) 根据以上就主要控诉所陈述的意见，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甲、被告人没有从事任何可以被判处刑罚的行为，因为能够作为处刑依据的法律条文还没有制定或者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事实上没有进行诽谤。

乙、被告人的罪状不能成立。

因此，我请求：被告人免于论罪，至少宣告被告人免于追究一切

刑事責任。

四、從屬控訴

(29)第二百零七條的要在實質上和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要在相同；不同之點只是第一百三十四條指的是對“國王”或“女王”的誹謗，而第二百零七條指的是對“政府當局”或“公共組織”的誹謗。

(30)關於誹謗的問題，看來我無須再重複我在談到主要控訴時所發表的意見，只要指出上述第(13)點就夠了。我在第(13)點里所申述的理由經過必要的變更，對從屬控訴也同樣適用。關於從屬控訴，被告人根據第三百一十條第三款有權要求不予論罪。其次，我請求法庭認定我在第(14)點到第(22)點所申述的一切也是就從屬控訴提出的，因此毋庸重複。

(31)再其次關於誹謗問題，我在第(23)點到(25)點所申述的意見經過必要的變更，對於從屬控訴也同樣適用。

(32)關於蓄意問題，請注意我在第(26)點和第(27)點的申述。

(33)只是關於第一百三十四條和第二百零七條的不同之處，我願意作進一步的申述。第二百零七條的特点是：誹謗不是指對個人的誹謗。要弄清這個問題，非常有必要了解一八八七年為居住在印度尼西亞的歐洲人制訂刑法草案的委員會是如何處理誹謗罪的問題的。關於誹謗罪，上述委員會看到荷蘭刑法只有第十六章所列的條款。裡面只有“誹謗”、“散布文字進行誹謗”、“侮辱”、“散布流言損害他人的名譽信用”等罪名，而且都是有關針對國家公務員的誹謗，並沒有有關誹謗法團和集體的條款。委員會一字不移地搬用了荷蘭刑法的上述條款。與此同時，委員會認為，在印度尼西亞，除了採用荷蘭本土通行的法律以外，還非常需要制訂專門的條款，來制裁對政府權力和政府的誹謗行為，如果政府人員不是作為一個或幾個政府人員受到誹謗的話。為此，擬定了刑法的第二百零七條。由此可見，只有在遭到誹謗的是政府當局而不是個人的時候，才可以援引第二百零七條。這一點在上述條文的解釋中是這樣敘述的：“如果誹謗完全不是針對個人，而只是涉及公共權力機關，則在處刑時應適用本章有關刑事處分的條款，而不適用第十六章的條款。”（見贊·哈杜姆 I. T. dl. 149, 第 71 頁及其以後各頁，又見雷

迈尔,《刑法》,第95頁及其以后各頁)

(34)非常奇怪的是,根据第二百零七条提出的从屬控訴中写道:“以文章形式誹謗由穆罕默德·哈达碩士担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根据第(33)点中的申述,显然,这一控訴不能成立,因为这一控訴正好表明,所謂控訴是針對个人的,所以,援引第二百零七条是不恰当的。此外,控訴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声明完全没有提到副总统。

(35)如果上述声明中提到哈达政府,能不能根据第二百零七条提出控訴呢?我认为也不能,因为如果第二百零七条的意图是制裁对当局的誹謗,条文所謂的当局是指仍然存在的政权,而不是指已經不存在的政权。哈达政府——和茉莉芬事件有关的由穆罕默德·哈达碩士领导的、由他担任总理的内閣,已經早已不存在了。

(36)根据和从屬控訴有关的上述情况,我得出以下結論:

甲、被告人沒有作出任何足以判处刑罰的行为,因为能够作为处刑依据的法律条文还没有頒布或曾經頒布但已失效,或者說被告人根本就沒有进行誹謗。

乙、被告人的罪状不能成立。

基于上述情况,我請求:被告人免于論罪,至少宣告被告人免于追究一切刑事責任。——第335頁

[2] “民主保卫者联盟”——伊斯兰教前战斗人員組成的一个团体,成立于一九五三年九月,領導者为馬斯友美党人,如沙里夫·烏斯曼(現在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和伊沙·安夏里。其活动内容是反对受到人民支持的阿里內閣,和散播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誣蔑,特别是就茉莉芬挑釁事件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誣蔑。这个組織和伊斯兰教团体合作机构一九五四年二月組織的“死亡示威”有关,在这次“死亡示威”中,苏巴达威查雅少校被杀害了。——第337頁

[3] 《关于茉莉芬事件的白皮书》——本书收录了有关茉莉芬事件全部經過的資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傳鼓动部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出版了这本书,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反击了反动派針對共产党进行的挑撥、歪曲和誣蔑。——第351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及其发展

- [1]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下屬組織”人民同盟——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团体，在一九二六年的人民起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直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九四七年在梭罗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人民同盟还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特別成員。而且，共产党人领导的其他群众团体，如梭罗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运动协会和梭罗人民协会，也改为人民同盟。

党中央领导在一九五〇年将人民同盟解散，原来的盟員按照他們的工作部門分別加入其他群众团体。——第 371 頁

- [2] 印度尼西亚民族統一党——泗水的印度尼西亚讀書会依照苏多莫博士的建議，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六日改組后成立的政党。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这个政党同至善社合并成为大印度尼西亚党。——第 376 頁

爭取民族統一战綫在普选中的胜利

- [1] 阿里—阿里芬內閣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倒台——反动派沒有办法从議會內部推翻阿里—阿里芬政府，因此就設法通过議會以外的途徑夺取政权。当政府任命邦邦·烏多約少将为陸軍參謀长时，武装部队內外的反革命分子发动抵制；为首的人叫朱基弗里·卢比斯，他当时是上校銜的陸軍副參謀长，后来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叛乱集团的领导人。在反革命分子的压力同美国的陰謀和威胁同时进逼下，阿里政府将委任书交回給副总统哈达。哈达不等到当时恰好不在首都的苏加諾总统回来，就連忙成立了一个非常反动的內閣，以布哈努丁·哈拉哈普（馬斯友美党）任总理。布哈努丁·哈拉哈普后来出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的“部长”。——第 402 頁

維護和巩固統一戰綫的勝利

- 〔1〕民主派議會黨團——由樊·穆克扶植起來的聯邦派分子議員組成的在臨時議會的黨團組織。一九五五年普選時，他們沒有獲得選票。——第 428 頁

分类目录

革命的基本問題

走人民的道路.....	33
民族統一戰綫及其历史.....	56
国内出現了自圓桌會議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好形势.....	66
民族光荣和民族意識.....	72
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	79
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为爭取自身权利而斗争.....	111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建立一个統一戰綫政府.....	124
組閣人理应交回他們的委任书.....	129
反动派的歇斯底里.....	132
民族統一戰綫內閣是唯一的出路.....	135
建立民族統一戰綫政府的时机已更加成熟了.....	137
民主对法西斯的輝煌胜利.....	141
印度尼西亚农民运动的前途.....	143
民族团結和民族警惕.....	154
加强共和国的地位!.....	160
印度尼西亚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	188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52

八月革命万岁！	271
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起来，争取解散印度尼西亚 荷兰联邦，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版图	283
苏纳里约代表团成功地取消了圆桌会议协定的一 部分	291
联合国没有通过西伊里安问题决议案，暴露了联 合国自己和西方国家的面目	318
控诉茉莉芬事件	331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发展	366
争取民族统一战线在普选中的胜利	402
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的胜利	421
保卫一九四五年宣告成立的共和国！	432

党的建设

克服我们的弱点	1
走人民的道路	33
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	79
为争取更大的成就而继续前进！	181
印度尼西亚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	188
关于陈舜如主义	234
发扬一九五一年时期！	248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52
加强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党！	266
争取印度尼西亚一切民族力量更广泛的团结	293

《党的生活》发刊詞.....	321
使党小组活跃起来.....	325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及其发展.....	366
保卫一九四五年宣告成立的共和国!	432

民族統一战綫

走人民的道路.....	33
民族統一战綫及其历史.....	56
民族光荣和民族意識.....	72
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	79
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为爭取自身权利而斗争.....	111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建立一个統一战綫政府.....	124
組閣人理应交回他們的委任书.....	129
反动派的歇斯底里.....	132
民族統一战綫內閣是唯一的出路.....	135
建立民族統一战綫政府的时机已更加成熟了.....	137
民主对法西斯的輝煌胜利.....	141
印度尼西亚农民运动的前途.....	143
民族团结和民族警惕.....	154
加强共和国的地位!	160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不断傳播民族团结的理想.....	165
印度尼西亚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	188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52
加强民族統一战綫和加强党!	266
爭取印度尼西亚一切民族力量更广泛的团结.....	293

亚非国家在万隆开始集体創造自己的历史.....	363
爭取民族統一战綫在普选中的胜利.....	402
維護和巩固統一战綫的胜利.....	421
保卫一九四五年宣告成立的共和国!	432